他人的血

西蒙娜·德·波伏娃／著

葛雷　齐彦芬／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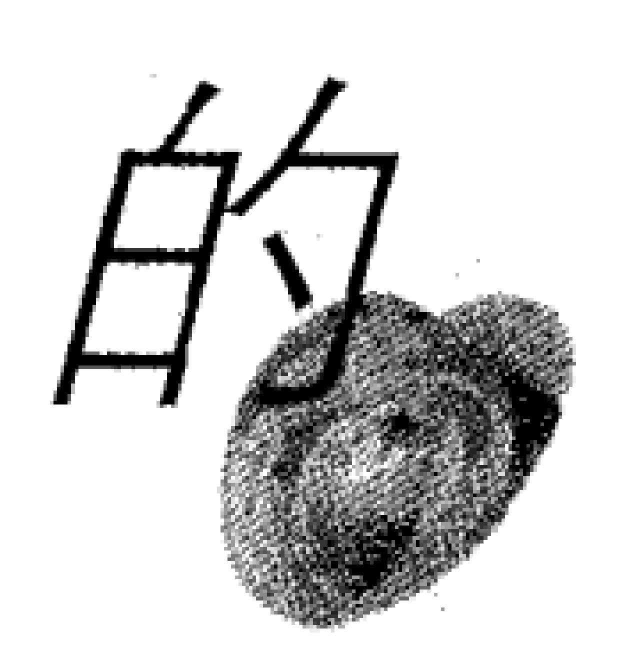
中国书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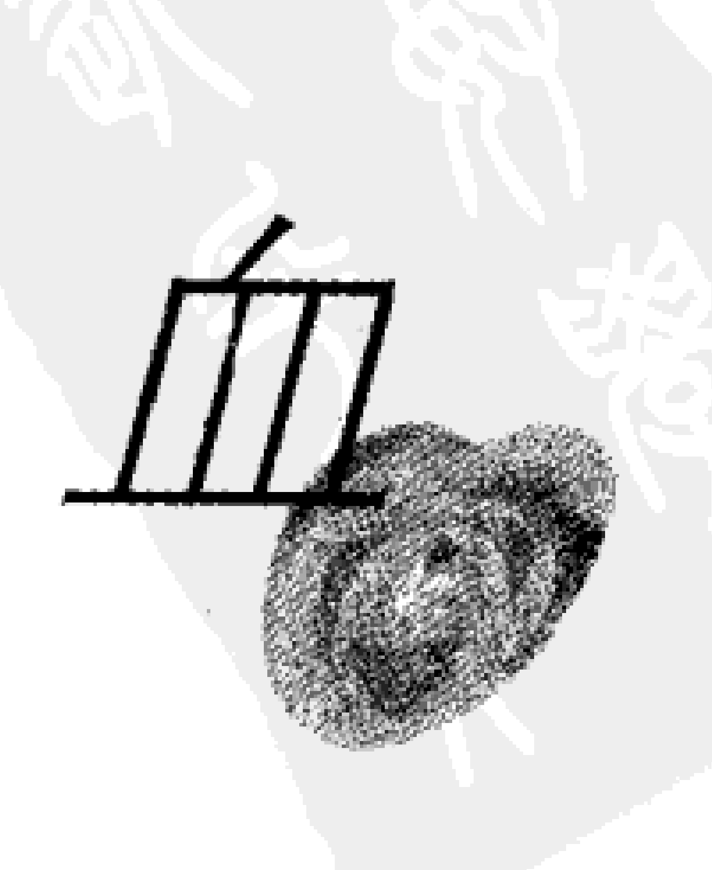


他人的血









西蒙娜·德·波伏娃／著

葛雷　齐彦芬／译



96626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他人的血/(法)波伏娃著;葛雷,齐彦芬译.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7
ISBN 7-5068-0706-8

Ⅰ.他… Ⅱ.①波… ②葛… ③齐… Ⅲ.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Ⅳ.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31174号

书　　名/他人的血
书　　号/ISBN7-5068-0706-8/I·56
责任编辑/郝　捷
责任校对/时　速
责任印制/王大军　刘颖丽
封面设计/北京夸菲特艺术设计事务所
内文设计/高　湛
出版发行/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邮编:100073)
电　　话/(010)63455164(总编室)　(010)63454858(发行部)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地矿印刷厂
开　　本/850毫米×1168毫米　8.75印张　215千字
版　　次/1999年8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2次印刷
印　　数/2001—5000册
定　　价/15.00元(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译 本 序

一部文学作品的命运是由其本身的艺术价值决定的，而一部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又是通过时代的需要来体现的。因此，我们判断文学作品的依据只有在它所经历的时代里去寻找；只有通过研究它与时代的关系，才能判断作家的创造，才能评价作品的艺术价值。几乎没有一部作品不是时代的产物。

波伏娃的小说《他人的血》于 1945 年 9 月出版后，引起法国文坛的轰动，两年内再版了 32 次。该小说受到读者的如此欢迎，不是由于它像某些爱情、侦探小说那样，有什么刺激性的东西，而在于它以丰富的人生哲理和生动的人物形象，深刻地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的爱国热情，

谱写了一曲时代的壮歌。

这部小说是以抗战为题材的存在主义小说。它之所以获得成功，一方面由其艺术价值所决定；另一方面，与战后存在主义思潮的兴起密切相关。因此，评价这部小说，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必须阐述对存在主义的认识和评价，笔者就这一问题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

“存在主义”在我国是一个颇富争议的问题。有人肯定它，有人否定它。但无论肯定也好，否定也好，都说明它在我国的读者中，已是一个“存在”了。既然是一个“存在”，就有认识的必要，肯定或者否定的前提是了解，是不带任何偏见的了解。研究一个问题的基本而可靠的方法，是把研究对象放在一定的历史范畴内去分析和认识，作出正确的判断。如果离开存在主义产生的历史渊源、时代气候、文化土壤等条件来谈存在主义，恐怕很难对存在主义有正确的认识。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萨特就写了一部小说《恶心》。这部小说可以看作是存在主义文学的早期代表作。萨特在这部作品中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现实的强烈恶心感。如果把这种恶心感，放到法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去观察，便会发现，萨特的恶心感和他以前的法国作家们有着明显的联系。可以说它是19世纪以来现实主义传统的继续和发展。反映在巴尔扎克、司汤达、梅里美等作品中的批判意识，到波德莱尔和福楼拜的作品中已转变为一种强烈的厌恶情绪。《恶之花》里所揭示的罪恶，污浊社会的阴暗角落，实在令人作呕；福楼拜就明确宣称：“我的写作目的‘是向我的同代人呕出他们所引起的我的厌恶，我终于要说出我的想法，喷出我的怨愤，吐出我的仇恨，咯出我的痛苦，清除我胸中

的愤懑……'。"[1] 萨特对波德莱尔和福楼拜这两位作家是相当重视的，他不仅写过有关这两位作家的专著，而且在其他论著中也多次提到这两位作家。所以，萨特的恶心感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是人欲横流、道德沉沦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在作家身上引起的一种强烈感觉和情绪。

真正奠定存在主义基础的是萨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完成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1943)。从这部作品繁复深奥的哲学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它实际是在强调人的价值，是在生灵涂炭、浩劫临头的情势下，对人的价值观念的呼吁。有关《存在与虚无》命题的讨论，西方学者已有不少论著[2]，但我们认为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的命题是从黑格尔的一句名言中借来的。黑格尔说："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在存在和虚无之间的中间状态。"[3] 萨特在这里把"人"作为一个特定的哲学范畴来加以研究，强调人生是一个由存在到虚无的过程，但人的价值在于它区别于任何物，它是一个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并自觉创造自己和自觉走向虚无的一种特殊存在。萨特在自己的哲学中提出"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对自己选择后的行动负责"以及"自我超越"等一系列概念，这些概念围绕的一个中心是："一个人的命运不是由上帝，也不是由神仙来决定，而是完全决定于自己，你要使自己的人生有价值，你就应该自觉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存在主义的唯一信仰是"相信自己"。从我们的认识来看，这显然

---

① 引自莫泊桑《见闻录》法文版三卷集。

② 美国学者D·麦克埃尔罗伊在他的论著《存在主义与现代文学》中说，萨特的命题是来自意大利经院哲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本体论哲学的三条原理之一："一切事物不可能同时既存在又不存在。"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点牵强。

③ 黑格尔《逻辑学》，卷一《存在论》。

是极端的个人主义。但我们应该看到，这是在战乱和社会的沉沦中大多数西方人为维护自己的生存而必须和可能采取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帝国主义的战争，不仅毁灭了西方教徒心目中神圣上帝的形象（因为上帝不能拯救他们），也瓦解了一般人的价值观念（因为以往任何说教和堂皇的东西都是骗人的），血淋淋的现实比任何东西都更现实。相对地说，"相信自己"是在混乱世界之中的一种清醒意识。萨特说："失望并不是希望的反义词。失望就是相信我的根本目的不能达到……在写《存在与虚无》一书时，我是把失望看成是对人类处境的一种清醒认识。"① 西方文艺评论家认为："存在主义是一种绝望中的希望。说它是绝望的，因为它确信所有价值都被摧毁了；说它是希望，它确信关键在于创造一种价值的新秩序。"② 所以有人说：存在主义是一种新人道主义。这种思想恰好适应了青年知识分子的需要，这些青年被世界大战所扰乱，被世界的荒诞所刺激，因人世的虚伪而厌烦。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存在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席卷法国、遍及世界，决不是偶然的。可以说，存在主义是受到战争破坏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深刻反映，是带着灵魂创伤的西方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人生观的集中体现。

对存在主义的争议之一，是存在主义理论中的"自由选择"问题。有人说，"自由选择"意味着为所欲为。不可否认，存在主义关于自由选择的理论，没有明确强调应该作正确选择，它所强调的只是选择还是不选择、自觉选择还是被动选择的问题。"自由是选择的自由，而不是不选择的自由。不选择实际上也是

---

① 《萨特与莱维的对话》，载法国《新观察》杂志（1980年第800期）。

② 《一九四五年以来的法国文学》（法文版），雅克·贝萨尼等著。

一种不选择的选择……由此产生了自由的荒诞性。”① 因此，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处世态度，而不包含道德教训。针对这一理论的含混，卢卡契曾批评萨特是介于理想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我们认为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虽然萨特也谈到“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问题，并用“假如我发动战争，我就深刻地负有战争的责任”，婉转地对当时发起战争的法西斯提出了谴责，但我们还是感到这种态度是含混和无力的。然而，说存在主义的自由选择是为所欲为也是一种曲解。萨特所强调的自由选择，是强调了人对自我价值的清醒意识，它否定任何上帝、命运以及权威，反对任何决定论。不难看出，这是在德国法西斯统治下讨人权、争生存的思想。按萨特的想法，即使争不到这种权力，至少自己应该把自己看作人，像一个人一样地去生活，去斗争。萨特多次强调指出：“自我并不是一种既定的现实，而是一种寻求的现实。”② 为了寻找自我，不必向后看，而需向前看。“忠于自我并不是忠于一个物，甚至不是忠于自己的过去，而是越过整个物和整个过去，忠于一种任何东西都不能充实的、向自我展开一种崭新未来的确切的蓝图。”③ 人的存在从本质上说是一个计划。萨特的几乎全部文学作品和波伏娃 50 年代以前的小说均明显地反映着这种思想。我们不接受存在主义的人生观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有着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但我们也不可否定存在主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当时当地的法国所具有的进步意义，否定了这些，就不是一个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因此要对它作出公正的评价。

---

① 萨特《存在与虚无》，法文版第 561 页。

② 萨特《论存在》，法文版第 149 页。

③ 萨特《纳尔西斯的错误》，法文版第 132 页。

二

波伏娃的《他人的血》，以鲜明的艺术形象很好地体现了存在主义自由选择的思想。

《他人的血》围绕着青年人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而展开主题，并把青年人放在最严峻的国家存亡的生死关头，这就使这种选择更加庄严和不平凡。围绕着这一主题思想，作者集中塑造了两个典型人物：让·布劳马和海伦。

让·布劳马走过的人生道路是充满着曲折和坎坷的，他所选择的道路是奋发斗争、充满进取心的道路。他是一个富有的印刷厂主的儿子，父亲财产的唯一继承人，家庭物质条件优厚。布劳马从小受到母亲的溺爱，但长大成人后却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了法国共产党的活动。他们去街上高唱“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那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他们为“没有战争，没有失业，没有劳役，没有贫困”而斗争。同时他加入了共产党。他在一次集会中和警察发生冲突，被警察拘留，父亲知道后很生气，制止他参加共产党的活动。他在共产党和家庭之间进行了选择，决定为实现党的奋斗目标而斗争，决心和剥削阶级家庭决裂，严格要求自己和其他工人一样自食其力。他先是当学徒，后来离家出走，到父亲的竞争对手那里去当工人，工作之余参加共产党人的集会和种种社会活动。与此同时，他说服了他的一位挚友、马塞尔的弟弟雅克和他一起参加政治集会。在一次集会时，与会者因观点不一致而发生殴斗，他的朋友雅克遇弹身亡。布劳马非常伤心，对政治活动心灰意冷，决心以后不再参预政治，并退出了共产党，以后在一系列的问题上采取和平主义态度。他打算以后做些踏踏实实的福利工作，后来成为一个工会团体的领导人。为了改善二人的贫困生活，要求增加工资，他和其他工会团体联合，

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这时，德国法西斯侵占了奥地利，并准备侵占捷克。奥地利社会活动家到法国来要求支援奥地利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并在法国掀起反法西斯的工人运动。但是布劳马对政治保持疏远态度，以“不想把自己的祖国推向战争”为借口，拒绝了奥地利社会活动家的要求，对德国法西斯的侵略行为袖手旁观。不久德国侵占了捷克，继续向前推进，战祸终于降临到了法兰西的头上。布劳马终于醒悟过来，对政治保持疏远是不可能的，不介入实际上是另一种态度的介入。他应征入伍，开赴前线，做了一名在战壕里摸爬滚打的普通士兵。他的未婚妻海伦认为与其英雄地死去，不如浑浑噩噩地活着，保持卿卿我我的恩爱。于是用“走后门”的方法，通过空军司令的关系，背着布劳马将他从前线调回后方的巴黎。布劳马认为在这样严酷的岁月里，让别人在前线流血牺牲、自己在后方过苟且偷安的生活是一种莫大的耻辱，他对海伦的作为感到十分气愤，于是和海伦断绝关系并毅然再次奔赴前线，英勇奋战，打击德国侵略者。在一次战斗中他光荣负伤，伤愈后复员回巴黎。这时，法军已全线崩溃，法国政府向德军投降，巴黎和整个法国全部被德国占领。在德军占领的白色恐怖中，布劳马不顾一切，冒着生命危险奔走串联，联合各有关团体和朋友，组织了地下抵抗组织，袭击盖世太保，搅得德国人坐卧不安。后来他的父亲和未婚妻都加入了他的组织，团结一致，同德国侵略者进行不屈的斗争。一次，他的未婚妻在营救一名共产党员的战斗中，不幸饮弹身亡，但这并未动摇他同德国法西斯进行斗争的决心和信心，他怀着不共戴天的仇恨，采取了新的行动，投入了新的战斗。小说写到他的未婚妻海伦被救回来时已奄奄一息，布劳马向海伦检讨自己的错误，说是他不应该让她去，让她冒生命危险。海伦却说：“在他人的命运里，你永远只是一个工具。人们不会从外部侵犯一种自由的半根毫毛，是我想要我死的。”于是布劳马总结出：“每一个人都有权

走自己的路，如果它是通向有价值的目标。"①

小说中的另一个主要人物海伦，她的一生是短暂而充满曲折的。她在自己的前半生里走过弯路，误入歧途。但后来在布劳马的帮助和影响下，终于选择了壮丽的人生道路。

海伦是一个性格复杂、心灵手巧的姑娘。她是商店的售货员，但画得一手好画，她的画为画商赚了不少钱。她对平淡生活感到枯燥和乏味。起先她和保尔相爱，保尔是个干什么事都一本正经、性情古板的人，他是个共产党员，动不动就爱用共产党人用的政治名词，把海伦叫做"小资产阶级"，这使海伦很反感。一天海伦在她营业的商店旁发现了一辆蓝色自行车，这自行车是一个富人的，在这里放了好几天，也没人管。海伦非常喜欢，想把它占为己有。她自己偷车又怕被别人发现，于是就跑到一家饭店找保尔，她知道这时保尔正和布劳马开会。不巧，保尔还没有来，只有布劳马一个人在等，于是她撒谎说自己有一辆自行车，叫布劳马帮着推到饭店来。布劳马欣然允诺，把自行车推来，正好这时保尔来了，发现海伦这种不光彩的行为，坚决制止她。保尔坚持让海伦把车还回去，他认为这是可耻的偷窃行为，是卑鄙的做法；海伦则认为拿富人的东西是理所当然，不叫偷窃。经过布劳马的调解，这场风波才平息了下去。自从海伦认识了布劳马以后，她觉得他为人诚恳，满肚子学问，同时知道他讲革命是实实在在的，不是口头的，因为她知道他和家庭脱离了关系，于是对他产生了爱慕之情。她三番五次找布劳马聊天，想交换对人生的看法，布劳马感到海伦对自己的感情有点不正常，断然拒绝了和海伦交谈。海伦看出布劳马对自己如此谨慎和回避，是出于对保尔的友谊。于是她和保尔断绝了关系，在保尔和布劳马之间，海伦决然地选择了布劳马。但海伦把和保尔断绝关系的事告诉布

① 西蒙娜·德·波伏娃《年富力强》，法文版第620页。

劳马以后，仍遭到布劳马的冷淡拒绝。为了向布劳马报复，海伦一气之下和一个流氓睡了一夜，后来海伦怀了孕，在朋友的帮助下，海伦经受了打胎的痛苦。布劳马知道了海伦的痛苦是由于他而造成的，产生了怜悯之情，并感到很抱歉，于是接受了海伦的爱，和海伦建立了爱情关系。海伦得到布劳马的爱情之后，沉湎在幸福之中。不料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布劳马应征入伍上了前线。海伦低声下气，求关系，找门路，给布劳马找到了一个调往后方的机会。她千里迢迢去前线看布劳马，并把此事告诉他，本来以为他会同意的，不料遭到了布劳马的拒绝。返回巴黎后，她不顾布劳马的反对强行把布劳马调回巴黎。布劳马大为恼火，感到海伦和自己格格不入，从此和海伦断绝了关系。德军逼近了巴黎，海伦随着逃难人群南逃，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不久法国投降，海伦又重返巴黎，在巴黎认识了一位德国军官贝格曼，并决心跟贝格曼去柏林过活，她和德国军官一起用餐，一起跳舞，完全丧失了一个法国人应有的尊严。但是，目睹德国法西斯的兽行，任何一个正直的人都是不能容忍的。在无情的事实面前海伦终于受到教育，感到震惊。海伦第一次感到震惊，是一次她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工程师因破坏德军设施而被枪毙的布告，她想到这位法国工程师的被害，肯定是由贝格曼之流决定的。想不到这个表面温文尔雅的人，竟是杀害同胞的刽子手。第二次震惊，是她的朋友德妮兹的丈夫马塞尔被德军俘虏关进集中营，德妮兹求海伦托贝格曼帮忙将马塞尔释放，海伦去求贝格曼，而贝格曼却说："所有法国人都是靠不住的朋友……这就是历史的必然。"贝格曼的话引起海伦的沉思。她因而想到难道德国人在法国为所欲为，法国人在德国人铁蹄下呻吟也是历史的必然吗？最后一次震惊，是海伦目睹了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残害。德国人到处搜查、逮捕犹太人，并把孩子和大人分开来，分别送往波兰，在那里用毒气把他们毒死。海伦亲眼看到警察把一个叫"吕特"的

孩子硬从母亲怀里夺走，母亲那呼天抢地哀号的悲惨情景。（吕特的名字到海伦临死前还萦绕在她的心中，在她生命垂危的昏迷中，嘴里还在呼唤着吕特的名字。）在血的事实面前她终于觉醒了，她不仅和德国人决裂，拒绝去柏林，而且为了救助自己的朋友——犹太姑娘伊冯娜，她去找布劳马，当面向布劳马做了自我批评。她认识到和德国人斗争靠个人是不行的，必须靠组织的力量，她要求参加布劳马的组织。布劳马看到海伦的转变，十分欣慰，答应了海伦的请求，从此以后，他们又成了一对志同道合的情人。在这个组织内，海伦完成任务很出色，很勇敢。一次，为了营救保尔出集中营，海伦化装开车，和德妮兹一起执行任务，英勇顽强地救回了保尔，她却不幸被枪弹打穿了胸膛。这位倔强的姑娘出色地完成任务后被救回来时，已经气息奄奄了。在人生的道路上，绕过一个大圈子以后，她终于为法兰西的解放事业、为挽救同胞脱离苦难，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布劳马和海伦的行动，用存在主义的术语说，就是经过了"自由选择"。萨特认为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世界上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人性。人是唯一能意识到自我存在的存在物，人是把自己推向未来的一个计划，一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是懦夫还是英雄，不是由上帝、也不是由任何别的什么人来决定的，而是由自己作选择而决定的。选择的自由是巨大的，人生活在世界上，每时每刻都面临着一个选择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完全由自己来决定。人一经选择，便对其结果承担起责任。人的一生是充满自由选择的一生，也是对世界负有责任的一生，不管你意识到没意识到，不管你自觉还是不自觉，人生就是如此。萨特说："如果存在是先于本质的话，人就要对自己是怎样的人负责。所以存在主义的第一个后果是使人人明白自己的本来面目，并且把自己存在的责任由自己担负起来。还有，当我们说人对自己负责时，我们并不是

指他仅仅对自己本人负责，而是对所有人负责。”① 《他人的血》扉页上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每一个人在所有人面前都负有责任”，就表明了存在主义所讲的选择和责任，并不是孤立的、个人的，而是广泛的、带有社会性的。

波伏娃笔下的两个主人公让·布劳马和海伦是自由选择的英雄。他们意识到自己有进行选择的自由，并充分利用这种自由进行选择，他们的选择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布劳马不甘心过纨绔子弟的生活，他选择了和自己的阶级决裂，加入了共产党；他不顾海伦拉后腿，毅然奔赴硝烟弥漫、枪林弹雨的前线。这一系列的选择都表明他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在每一个重要关头作出的自由选择。这种正确的选择，在存在主义小说和戏剧中是很明显的。如萨特的小说《自由之路》中的马蒂约、戏剧《苍蝇》中奥莱斯特以及《死无葬身之地》中的一些人物，都是自由选择的英雄。

三

《他人的血》在表达存在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思想——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萨特从资本主义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的社会现实中总结出了“他人就是地狱”的名言。揭示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倾轧、互相排斥的一面。萨特强调的自由，也是个人孤立的自由，不是社会普遍的自由。总之，在世界上有了我的自由，就没有你的自由。关于存在主义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波伏娃的第一篇小说《女宾》算是表达得最生动、最深刻了。小说写一个剧院的负责人彼尔与他的同居夫人弗朗索瓦兹收养了外省来的一个贫穷少女萨维尔，企图组成一个“三位一

① 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载《外国文艺》1980 年第 5 期。

体”的新家庭。但不多久，彼尔与萨维尔发生了暧昧关系，弗朗索瓦兹知道以后十分恼火。在嫉妒心的驱使下，她对萨维尔进行了报复。一方面她让彼尔隔着门缝窥视萨维尔和其未婚夫日尔拜吻抱，来离间彼尔与萨维尔的关系；另一方面她竭力引诱日尔拜上钩，使自己在情欲上占有日尔拜。这样，她便以强者的姿态出现在萨维尔的面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两个男人上了战场，家里留下了一对势不两立的情敌。弗朗索瓦兹容不得萨维尔的存在，后来，在一个早晨，她乘萨维尔熟睡之机，打开煤气开关，下了毒手。在存在主义看来，人与人之间就是这样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互相排斥、势不两立的关系。波伏娃用小说把这种关系戏剧化、形象化、具体化了。当然，对《女宾》的结尾波伏娃自己也是不满意的，她认为这样简单化的方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尽管小说中可以把对立面杀死，但实际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简单。波伏娃说：“《女宾》的结尾我是不满意的，凶杀是不能克服共同存在而孕育的困难的。我想不是回避这种困难，而是迎着这种困难而上。在《他人的血》中，在《毕鲁斯与西内亚斯》(1944) 中，我力图确定我们和他人的关系。我决定，我们要干预他人的命运，而且应该承担这种责任。但这种结论引起一种对立面：因为我尖锐地感到我负有责任，但我又不能做什么。”《女宾》过多地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而且这种对立是从单层意思上展开的，是从直接和表面关系上来看问题的，充满着主观性和片面性。实际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这要复杂得多，深刻得多。《他人的血》虽然也是表现人与人关系的一部小说，但《他人的血》中所表达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然更有深度，甚至看问题的方法也有些辩证的意味了。这是波伏娃深入思索的结果。

《他人的血》在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方面，展示出更深一层的内容。例如小说有这样一个很巧妙的情节，深刻地说明了这

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布劳马的地下组织袭击了德国盖世太保，用炸弹炸死德军八人，伤了多人。这使德军大为惊恐，为了报复，他们枪毙了十二个法国人质，并贴出告示，如果肇事者三天之内发现不了，另外十二个人质也要被枪毙。这二十四个人质与布劳马素昧平生，他们不知道、布劳马也没有预料到自己的行动会影响到他们的命运，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布劳马是自首呢？还是忍心让十二名人质被枪毙？作者这样巧妙地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尖锐的冲突，并以此来说明，不仅有直接关系的人之间是互相排斥的，即使毫无关系的人，只要在这个世界上共存就有互相排斥的一面。但波伏娃没有再把这种对立孤立起来，而是从更高的角度把这种对立统一了起来，为了祖国的命运和这个组织的前途，为了更好地同德国侵略者展开斗争，布劳马没有去自首，而是抵住了各方面的压力，下定决心，再次袭击盖世太保，狠狠打击侵略者。这里就显示了波伏娃的辩证观点：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对立的一面，还有团结一致、为更高的奋斗目标服务的一面。

小说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团结的这一面可说是表达得相当生动的。从波伏娃的角度看，这也正是对第一部小说《女宾》的补充和深化。如果说大战给人民带来了灾难，是一场浩劫，那么它的一个副产品却使人民同仇敌忾、团结一致了。小说的前半部中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在后半部里得到了统一和解决；布劳马决心要与之划清界限的父亲，在同德国人的斗争中加入了布劳马的组织，为他们提供资金和印刷条件；布劳马和共产党的抗战组织联合了起来，保尔和布劳马这对曾经是情敌的青年人也言归于好；被布劳马后来甩掉的情人马德莱娜也加入了布劳马的组织；海伦也不再那样放荡不羁，在组织里心悦诚服地完成任务；雅克的哥嫂马塞尔和德妮兹之间也不再闹矛盾，和睦共处，全心全意地执行任务；海伦甚至为营救保尔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等

等。他们团结一心，像爱护自己的领袖一样保护布劳马，听从他的指挥和安排，他们目标明确，信心百倍，没有懊丧，没有厌烦，没有任何怨言。布劳马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可以说上下一心，同心同德。波伏娃笔下的主人公布劳马对这一点十分明确：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用他人的血来换取祖国的解放是必要的。他在建立这个组织、准备向德国人采取暴力行动时就有人反对过，说这太危险了，德国人会报复的。这时在小说中布劳马有一段内心活动："以前，他也曾梦想过通过响当当的理由来确保他的行动，但那就太容易了。必须进行无保障的行动，顾惜人的生命，比较一滴血和一滴泪的价值是不可能的，没有什么可计较的，钱管用，他人的血也管用，不会付出太大的代价的。"为了使法兰西早日摆脱德国法西斯铁蹄的践踏，他们万众一心，充满希望，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甚至为了他人的幸福，不惜自己的生命，唱出了壮丽人生的赞歌，赋予人生以积极的意义。

四

波伏娃说："我的第二部小说具有比第一部小说更多的艺术，它在表现人类关系方面具有更真实、更广阔的视野。"① 她又说："从技巧上说，我有改革的印象，一部分人表示对我祝贺，另一部分人则抱怨故事经过了'长长的隧道'才开展。但大家一致认为我找到了原始的形式，当时法国小说是那样尊重陈规陋习。使我更加吃惊的是我的小说'充满血和生命'。一部书是合作的产物，读者的贡献和作者的贡献是相同的。然而我的小说像我一样陷入道德主义，我采用的观点对他们是那样自然，以致他们以为

---

① 西蒙娜·德·波伏娃《年富力强》，法文版第323页。

这部小说向他们提供了原原本本的现实……"①

波伏娃的话告诉我们两方面的事实，其一是《他人的血》在写作技巧上比《女宾》有更多的创新和改革；其二是这部小说的现实主义成分比《女宾》要多。

这篇小说虽然包括了二三十年的事情，断断续续然而又明晰地交代了主人公布劳马和海伦一生的经历，生动地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人民的苦难和德国法西斯为所欲为的暴行。但小说中所选择的时间集中在海伦受伤后布劳马守在她床前的一段时间里，至多不过十来个小时，这使故事显得集中、凝练。小说别出心裁的地方，在于作者大胆采用了转换人称的手法，在不同情况下用不同的人称来加以叙述，这样使读者既感到亲切又不显得冗长和枯燥。在谈到这部小说的艺术手法时波伏娃写道："我不想让这部小说与前一部相似，我改变了手法，我采取了两种观点：海伦的观点和布劳马的观点，并使之一章一章地交替出现。叙述集中在海伦身上，我写第三个人物（马塞尔）则采取《女宾》中的原则。但对于布劳马，我采取了另外的原则，我把他放在气息奄奄的海伦的床头，他回忆自己的生活，当他进入他的过去谈他自己时，用第一人称；当他在一定距离审视自己在他人眼里所具有的面貌时，用第三人称。我装做沿着他的回忆线索，采取了比《女宾》中自由得多的方法，我时而放慢速度，时而加快故事的进展，时而概括，时而省略，时而混合。我把对话放在次要位置。我尊重年代的次序，但有时用现实打乱旧的回忆，在用斜体字②、用布劳马在夜间感受到的思想和感情来加重语气的同时，我也把它们搞乱。"③ 在小说中波伏娃虽然没有像新小说一

---

① 西蒙娜·德·波伏娃《大势所趋》，法文版第60页。

② 小说原文中的斜体字在译文中改为仿宋字。

③ 西蒙娜·德·波伏娃《年富力强》，法文版第621页。

样，打乱了时间的次序，打乱了故事的逻辑发展，但作者通过用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的转换手法，并用一段段斜体字来加以突出，实际上已把故事的发展次序打乱了。读者在读这篇小说时，用读巴尔扎克式小说的方法来读是不行的。因为作者所给予读者的不是一气呵成的故事，而是断断续续的、有时是跳跃式的故事片断，这要靠读者的创造性的联想和思索才能把故事联贯起来。作者的意图就在于调动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参预作者的创作。虽然作者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叙事方法，但从小说的结构上看，已经和传统小说的结构相去甚远了。作者关于读者加入自己创造的主张，很接近于新小说，但作者所采取的方式，更多的是吸取了意识流的手法和内心独白的方式。尽管作者在不同的方面作了大胆的改革，但从总体上看，我们仍可以把这部小说的创作归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

五

一般说来存在主义文学是一种入世的文学，是一种带有理性的文学，它在文学手法上，虽然也有所创新，但基本上是传统的。存在主义作家认为世界是荒诞的，这意味着他们头脑中有一个衡量荒诞社会的标准，表现了他们头脑中具有的理智和清醒的意识。当然，他们的调子一般显得过于低沉，色彩过于晦暗，甚至“忘掉了婴儿是怎样笑的”。这是不足取的，应该加以否定。但存在主义文学中也不乏优秀的作品，应该加以肯定。

波伏娃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是和她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关心国家和人类的命运分不开的。她的作品是长期观察社会、用睿智的头脑思索人生的重大问题并长期积累资料的结果。法国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迫使作家作出反应。波伏娃在艰苦的战争岁月中，写成了这样的小说，表明了

一位作家的正义立场，证明了波伏娃本人经得住战争的考验，她通过自己的作品，传达了法国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向往祖国解放、争取胜利的心声。《他人的血》不仅继承了莫泊桑、都德以来的爱国主义的文学主题，也继承了法国文学中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并把这个传统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说波伏娃是存在主义小说家，是因为她的小说中表达了存在主义的深奥思想，表达了“自由选择”、“责任感”以及“自我和世界”、“自我和他人的关系”等一系列存在主义哲学命题。我们说波伏娃是现实主义作家，是因为她的小说，从一定的高度客观地反映了作家所在的社会现实，用改造了的传统手法，塑造了一定典型及具有一定特色的人物。波伏娃是把存在主义与现实主义二者结合于一身的作家。她奉行存在主义，又不局限于存在主义；她改造现实主义，但又不鄙弃现实主义。有信仰，有主义，但毫无门户之见，这恰恰是一种大家风范。波伏娃的一些作品，特别是晚年的一些作品，如她的中篇小说集《被遗弃的妇人》，更明显地反映出作者越来越不按照存在主义抽象的哲理写作了，可以说她的晚年的作品，越来越由存在主义走向现实主义。

在《他人的血》里也有很多自身的成分。根据作者自己透露，她在写布劳马的家庭生活气氛时，是受到自己家庭在莱吉庸的住宅的启发而写成的。在写到海伦的童年生活时，尤其是海伦在童年时对上帝的看法和感受，则是根据作者自己在童年的感受而写成。

在谈到这部小说的构思时，波伏娃写道：“乔治巴塔耶在他的《内心的体验》中思忖道：‘人们怎么能同意自己不是一切呢？’这句话使我印象很深，因为这正如《女宾》中弗朗索瓦兹贪婪的希望一样：她想成为一切。我很遗憾没有把她这种妄想和失败阐述得更好，我决定重新采取这个主题。被雄心和欲望所折磨，我的新英雄自诩能与宇宙合一，而后他发现世界导致的个人

自由每个人总是达不到的。于是，在《他人的血》中布劳马确信对一切负责，他因无能为力而感到痛苦。因此，他的冒险将是对第一部小说的补充和对照……在四三～四四年[①]，历史赋予了我权利，我站在我所理解的新的水平上，我的主人公对财富和光荣不满意，他声称对世界进程要产生影响，我产生了使他成为不朽的念头……我反复探索不朽的条件，我按照战争把我拖向死亡的沉思；我对时间进行思索……而我发现它和空间一样能够向我指示我自己……就这样，《他人的血》被孕育并粗略形成了。"[②] 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是作者怀着历史所赋予的责任感，经过对战争中生与死的意义的思考而写成的。书中的英雄人物的塑造，反映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可以说布劳马的形象是时代的产物，是严峻的战争年代中孕育出来的一代英雄人物的写照。

从艺术作品的角度看，《他人的血》也存在着一些缺点。用波伏娃的话说，"架子很大，材料不足，写得很集中，但不够丰满"。尽管作者在布劳马形象塑造上花了不少笔墨，但仍显得有些单薄，有些地方作者几乎把他神圣化了，过分夸大了个人的作用，写布劳马袭击盖世太保的一章有点简单化。除了海伦和布劳马以外，其他人物形象都显得比较模糊，缺乏艺术感染力。正如波伏娃所说："今天重读这部小说，使我惊讶的是我的英雄们那么缺乏厚度。"[③]

尽管作品有这样的缺陷，但无论就其思想价值还是就其艺术价值而言，这部小说都是值得一读的好作品。1984 年夏法国著名导演克洛德·沙布劳尔（Claude Chabrol）已将这部小说搬上银幕。

---

① 指 1943 年及 1944 年。

② 西蒙娜·德·波伏娃《大势所趋》，法文版第 92 页。

③ 西蒙娜·德·波伏娃《年富力强》，法文版第 623 页。

本小说的选定和翻译，曾得到罗大冈先生的帮助及指正，在此我们向他深表谢忱。译文中如有不妥之处，恳请海内学者及同仁予以批评指正。

葛　雷

一九八五年十月廿六日

一

他打开门，所有目光都转向他。

“你们要我怎么办呢?”他说。

洛朗跨坐在炉前的椅子上。

“我应该知道明天上午的事定了没有?”洛朗说。

明天。他环顾四周。房间里弥漫着洗涤剂和白菜汤的气味。马德莱娜吸着烟，两个胳膊肘撑在桌布上。德妮兹前面放着一本书。他们活着，对于他们，漫漫长夜会有尽头，黎明会到来。

洛朗注视着他。

“不能等,”他温和地说，“我应该八点钟去那儿，假如我去的话。”

他谨慎得像对一个病人一样地说："当然。"

他知道他必须回答，然而他没能这样做。

"听着，你醒后来叫我，只要敲敲我的门就行了，我需要考虑一下。"

"一言为定，我六点左右敲你的门。"洛朗说。

"她怎么样了？"德妮兹说。

"她现在还睡着。"他说。说完向房门走去。

"有事叫我们，"马德莱娜说，"洛朗要去休息了，我们整夜都在。"

"谢谢。"

他推开房门，决然地走过来。只见她双眼紧闭，喘气声从唇间发出。盖着的被单时起时落。被单被她翻腾得厉害，虽是一息尚存，但折腾得厉害，因为她痛苦极了，濒临死亡，恐怕连拂晓都过不去了。是我害的。我先害了雅克，现在是海伦。因为我曾经不爱她，因为我曾经爱过她，因为她近在咫尺，因为她远在天涯。因为我存在着。我存在着，她呢，是那样自由、孤独、永恒。她顺从着我的存在，却未能逃脱我存在的意外的事故，在相继而来的时间上随波逐流，在命运之链的尽头，被流弹击中了心脏。金属的严酷存在，我的存在，她的死亡。因为我在那儿，不可捉摸，难以避免、没有道理地存在着。不存在是最好不过了。首先是雅克，现在是海伦。

外面是沉沉黑夜，没有路灯，没有星光，没有声息。一队巡逻兵刚刚走过。现在，再也听不到有人过路的声音了，街上空旷荒凉。高级宾馆和政府各部大门前卫兵在站岗。一切依然。可是这里却出事了：她正走向死亡。"先是雅克。"仍然是这一成不变的话语。在这漫漫长夜中透过其他话语和对往事的回忆，最初的议论展开了历史画卷。它以一种特殊面目出现，仿佛发生其他事情，仿佛我一生，一切都未被安排好，在一切人类命运之中都蕴

育着绝对的腐败。这种绝对的腐败存在在我的出生中，存在在垂死的人的昏暗房间里和气味之中，存在在每分钟和永恒中。今天以及在任何时候，我在那儿，我曾经一直在那儿。过去，没有时间。时间一开始，我就在那儿，永远永远，除了自己的死亡之外。

他是在那儿，可他原来不知道。现在，我看见他倚在走廊的窗户上。但他不知道。他只相信世界是唯一存在的。他望着污浊的玻璃窗，那里油墨味和尘土味不断升腾，这是别人工作的气味。阳光沐浴着旧橡木家具，街上的人在绿色灯罩的暗淡光线下感到窒息。整个下午都响着机器单调的轰鸣声。有时他离开了，有时他却久久地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他的眼睛见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孔嗅到的，都充满着懊悔。在污浊的玻璃窗下，在地的表面，凝滞着烦恼；在这间豁亮的长方形房间里，内疚的气氛在缭绕。他不晓得，工人们只要抬头，就会透过窗子的小孔，发现这张资产者后代的清秀而智慧的面庞。

蓝色地毯柔和地衬托着他的面颊，有着铜器反光的厨房弥漫着熔化的猪油香和焦糖的味道，客厅里传出窸窸窣窣的像丝绸在摩擦那样的谈话声。在夏日的花香之中，在初冬劈啪跳跃的火焰里，内心的责备无休止地徘徊着。出去度假才会把它弃之脑后。看到满天星斗落下，毫不内疚，苹果被牙齿咬得嘎吱作响，淡水打湿了赤脚。但是，当人们一回到散发着香气、四壁都是白围子的房间，当人们摇动樟脑味很浓的帷幔，会看到他仍然安详、完好无缺地待在那里。冬去春来，景色变化无穷，在切口烫金的书中，新的冒险故事出现在眼前，然而，隐约传来的机器轰鸣声却怎么也不能减弱。

气味从阴暗的楼的底层渐渐弥漫到整座房屋。“总有一天它会成为你的房间的。”房屋的前壁上，有几个石刻的字母：“布劳马，印刷厂主的儿子”。父亲迈着稳健的步履，从车间来到大房

间。心绪平静地呼吸着弥漫在楼梯上凝滞、混浊的空气。伊丽莎白和徐宗也并不怀疑什么。她们在她们房间的墙上挂上版画，在她们睡的沙发床上安放沙发垫子。然而他的父亲了解，对这一点他相信，这不安会使艳阳天黯然失色。对母亲来说，闪亮的地板、丝织帷幔和高级毛制地毯，都流露着内疚。

大概她曾在某处，在陌生的面孔中遇见过这种内疚。它在她的皮大衣下，在她熠熠闪光的裙子下，紧贴着她小巧而丰满的身躯，她把它带到她的所到之处。她总是带着歉意，无疑正因为如此，她对佣人和普通售货员讲话总是非常客气，她走起路来像小跑似的，蜷缩着身子，仿佛还要缩小她占据的空间。他本来想就此询问她，可是找不到合适的词句，难于启齿。一天，他想从楼梯上的人谈起，可她马上干脆地说："不能这么说，他们并不那么厌烦，习惯成自然嘛。再说，在生活中，大家也是不得不做一些烦人的事的。"他再也没说什么。她的话没有多少分量，大家都有一种同感，她仿佛是在一个理直气壮的、然而又吹毛求疵的证人面前讲话，因此必须避免争吵。然而当她兴致勃勃地为女厨师的孩子裁剪衣服时——她本来可以毫不费力地去市场买一件——当她通宵修理女佣人缝补得难看的东西时，他好像了解了她。"真是荒谬绝伦，没有道理。"徐宗和伊丽莎白用谴责的口吻说。她并不想为自己辩解。然而从早到晚，她不停地东跑西颠，推着转椅上的年老而四肢瘫痪的女管家，一推就是几小时。她和她的聋子表妹聊天。其实她并不喜欢老管家和表妹，也不是不遗余力地帮助她们，只是由于闷闷不乐的气氛在整座房子里弥漫的原故。

有时，她带让去看望穷人，这是由圣诞树和吃点心的、穿戴整洁的孩子使她想起的。他们对漂亮的长毛绒狗熊或干净的小围裙客气地致谢，他们不像不幸的人。蹲在人行道上的衣衫褴褛的乞丐也无忧无虑。他们翻着白眼，肢体残废，用鼻子吹奏金属笛

子，在大街上占有一席之地，像沙漠中的骆驼，像中国梳辫子的男人。而我们听到的那些富有诗意的流浪汉和感人至深的弱小孤儿的故事，总是用喜悦的泪水、紧握的拳头、洗净的衣服、金黄色的面包做结尾。仿佛贫困只是为了得到安慰，为了让富人的孩子们高兴地施舍才存在着。让并不被贫穷困扰，可是却有另外的东西，他知道，对此切口烫金的书里没有讲过，布劳马先生没有讲过，这大概是不该讲的吧。

我的心第一次遇到震动是在八岁的时候。那时，我正在走廊里读书，母亲回来了，带着我们通常常见的那种表情：责备而又含歉意的表情。她说："路易丝的孩子死了。"

我望着弯弯曲曲的楼梯和铺满石板的走道，许许多多同样的门开在这里。妈妈对我说，每个门后都有一个房间，每个房间里都住着一家人。我们走了进去。路易丝拥抱了我，她的面颊柔软而湿润。妈妈坐在床上，在路易丝身边轻声和她交谈。旁边的摇篮里躺着一个面色苍白、双眼紧闭的男孩子。我的目光停留在红色方砖地上，停留在光秃秃的墙上，停留在煤气炉上，我情不自禁地哭起来。我哭着，妈妈交谈着，孩子死去了。我把攒的钱全拿出来，妈妈整夜整夜地陪伴着，可他还是死了。

"这孩子怎么了?"我父亲问。

"他陪我一起去路易丝家了。"妈妈回答。

她已经把事情的原委讲了，但她还想危言耸听："脑膜炎，折腾了一夜，到早上小家伙的躯体就僵硬了。"爸爸边喝汤，边听她讲。我是吃不下去的。那边，路易丝在哭泣，她茶不思，饭不想。无论什么也不能把孩子还给她，永远不会了。什么东西也不能抹掉这玷污世界的不幸。

"喝你的汤吧，"父亲说，"别人都吃完了。"

"我不饿。"

"强吃一点吧，我亲爱的。"妈妈开口了。

我把汤匙放到唇边，继而又放回盘子里，一看就饱了。

“我吃不下！”

“听着，”父亲说，“路易丝的孩子死了，这是很使人难过的。我也为她伤心，可我们总不能难过一辈子吧。好了，快点吃吧。”

我吃了。这严厉的声音顿时使我像被钳子夹住的喉咙放松开来。我感到热乎乎的汤从喉管滑下，每吃下一勺，比闻到印刷厂的气味还令人恶心。可是，喉咙毕竟松开了。不会一辈子这样下去的。今晚直到天亮前是这样，可能还得几天。不会一辈子这样下去的。反正这是她的不幸，不是我们的不幸。是他死了。他们让他躺在凳子上，他领子撕破了，面部的血迹凝固了。这是他的血，不是我的血。“我永远忘不了。”马塞尔心中也在向他呼唤：“永别了，聪明的小脑袋，小马驹，乖孩子；永别了，你那欢声笑语，你那有神的眼睛。”他在我们生活的旅程中安静而又奇怪地死去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时时想起他的死，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常常想起它，可它已不存在了。对于他这死去的人来说它从未存在过。我们不会一辈子这样的，几天都不会，连一分钟也不会。在这张床上，你是那样地孤独，我只能听见你双唇发出的喘息声，而你是听不见的。

他把汤全喝光了，晚饭也吃过了。现在他蜷缩在三角钢琴旁边。玲珑的糖壳闪烁着火焰般的光泽。冰冻水果，在糖壳下闪闪发光。柔情而妖艳的夫人们，像小火炉似的妩媚地微笑着。他望着他的母亲：她并不像这些香气氤氲的仙女，而是身着一条无袖黑裙子，她那像裙子一样乌黑的头发盘卷在头上。在她面前，人们想不到鲜花，想不起丰盛的糕点，想不起贝壳，也想不起浅蓝色的卵石。她是一个存在，一个纯粹的人的存在。她穿着小巧玲珑的缎面高跟鞋，从客厅的这头跑到那头，她也笑了。她竟然也笑了。刚才这个痛苦的面孔，这个在路易丝耳边絮絮叨叨的声音，现在变成了微笑。不会一辈子都这样的。路易丝的小孩曾死

命地抓着地毯，路易丝的小孩死了。他竭力地凝视着浮现在眼前的情景：路易丝坐在床边啜泣，而他不再哭了。他透过这固定而又透明的景象，看见了眼前这些淡紫色的、绿色的、玫瑰色的裙子。一种欲望产生了：真想咬一口这鲜嫩的胳膊，让头钻进她们的头发之中，像揉搓花瓣一样地将这轻而且薄的丝绸揉皱。路易丝的孩子死了。死就死了，这并非我的不幸。并非我的死亡。我双眼紧闭，一动不动，我回忆的是我自己，他的死闯进了我的生活，而我是不会进入他的死亡的。我钻进钢琴下面，我在床上不停地流泪，直到昏昏睡去，因为有一种东西随热汤流进了我的喉管，这是比内疚还强烈的东西：我的错误。在路易丝哭泣时我却微笑的错误，我流的是我的眼泪而不是他的眼泪的错误，作为一个他人而存在的错误。

然而这一切他是不理解的，因为他太小了。他想到错误出其不意地进入他的躯体，因为他的抽搐的手指松开了，因为他的喉咙畅通了。他并没有去想象这错误，是充满我肺腑的空气，是流动在血管里的血液，是我的生命的热力。他想到，如果他不强使自己这么做，他永远也不会尝到这被玷污的滋味。他这样做了。他端坐在他的小学生课桌前，天真无邪的目光停留在平展的书页上，目不转睛，像未来一样单纯。一张白纸，一块白布，千里冰封、闪烁着未来革命之光的大地。马塞尔扔掉了他的笔，这是雅克脸上的血；这是为了我们避免流的每一滴血，是为了我们流过的每一滴血，沸腾的血。这是你的血，它在白棉絮上、纱布上是那样鲜红，它是在你鼓胀的血管里缓缓流动的血。“她过不了今夜了。”没有鲜花，没有柩车，我们将把你掩埋在地下。我手上的污迹，我们心灵上的污迹，恰如一位幼稚的用粗细笔划描绘着什么的聪明的孩子的前途。他不会猜测。他不晓得他自身存在的分量。这纯洁得几乎透明的人在洁白的纸页前，向着美好的理想的未来发出微笑。

她讲话是那么理智，好像她从未打过寒噤，好像她从未踟蹰过。她说，贫困和奴役，武器和战争，像令人心碎的激情，像闷闷不乐的误解一样，正是愚蠢的表现，人类的不可思议的愚蠢。只要人们随心所欲，一切都将面目全非。对他们的疯狂我感到愤慨。我想我们应该手挽着手，走遍全城。她穿着小巧的半高跟鞋，碎步疾走。我呢，我要满怀少年的激情拉她向前。在空地上，我们使行人停步，我们走进咖啡馆，向群众发表演说。这一切都不是不可能的。在满是塞维利亚人的街道上，在政变发生的那个炎热的早晨，人们突然惊惶失措地跑起来。爸爸夹杂在人流中间，拖着伊丽莎白和徐宗就走。她停住脚步，为了阻止人群盲目地前进，她伸开她的双臂。我相信，如果爸爸不紧拉她的手腕，如果他也伸出他那男人的长胳膊的话，被制服的群众会恢复他们平静的步伐的。

然而父亲是不想阻止人流的盲目行进的。在嘈杂的人群中，他很有尊严地跑着，任何劝告也挡不住他顽强的步伐。当我天真地询问他时，他却乐了。接着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以一种辛酸的自豪感回忆起他的劳动和有节制的生活。他感到他有权得到某种享受，他越是不考虑享清福，这种权利就越是有把握。他白天上一天班，晚上抱着厚厚的书看，边看边记笔记。他不善交际，几乎从不出门。他吃饭和喝咖啡总是漫不经心，却把雪茄烟、勃艮第葡萄酒、法国阿玛聂克 1893 年产的烧酒视为使他感到安慰的唯一而必要的荣誉。

“水平总是从底层开始，”他向我解释道，“你提不高群众的水平，有优秀分子也是白搭。”他的声音是断断续续的，没有辩驳的意味。然而他的眼睛深处却流露出一种可怕的恐惧。我沉默了。我渐渐地预感到这样的真理：他像嗅着熏香一样，愉快地呼吸着世界的腐败气味。因为不只是这座房子，整座城市，整个大地都受到了侵蚀。晚上，在地铁里，是同样使我窒息的焦虑。男

人们将手平放在膝盖上，妇女的眼睛暗淡无光。列车的颠簸将人们的汗水和痛苦在沉闷的空气中搅作一团。火车通过一个瓷壁大厅，那里五颜六色的广告反映出人们用蝶螈炉①、吃肥肝罐头的日常生活的面貌。然后火车钻入黑暗的隧道。仿佛这一切就是这疲惫不堪的人群的全部命运，我的心里一阵难过。我想起和朋友马塞尔一起看过的一个电影：一座城市陷落到地底下，那里的人们在黑夜里、在痛苦中化为灰烬。而另一个傲慢的种族却在白色的露天坐位上，呷着咖啡，沐浴着灿烂的阳光。历史总是以一种吞没、一种抗争而告结束；或者在打碎瓶瓶罐罐的混乱之中，以光彩的和解而告结束。我想："为什么这些人不反抗呢?"星期日，我常常拖马塞尔去欧贝维利耶和庞坦。我们沿着荒凉的城墙，沿着煤气贮存站，沿着工厂的烟囱，沿着发乌的砖房走着，一走就是几小时。整个生活画面展现在眼前，从早到晚，周而复始。一周只有一个星期天。"他们习惯了。"他们习惯成自然的话，那就更糟糕了。

当我在她面前说出"革命"一词时，她涨红了脸，说："你不过是个孩子，谈革命是无知妄说!"我想争几句，可她制止了我，她的身躯被一种可怕的情感摇撼着。在生活中想改变世界的某种东西是狂妄的，如果我们避免触及它，那已经是够可悲的了。对于她内心和理智不赞成的一切：我的父亲、结婚、资本主义，她总是竭力维护。因为弊病并不在制度本身，而是在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应该把身子蜷缩起来待在一个角落里，缩得越小越好，这比堕落地前进、一切都接受要好些。这是谨小慎微！荒诞的谨小慎微！好像有一种遁世的办法，把门关起来，把嘴闭起来，然而我的缄默却是对秩序的呐喊。"你一言不发，那我去了"，或者"你一言不发，我不去了"。我的出现就是语言。前进

① 蝶螈炉，一种燃烧缓慢、置于壁炉中的炉子。

吧，在黑夜的泥泞中前进。决定吧。我决定了你的死亡，我没有偿清债务。再有，我呼唤饶恕，却没有饶恕。啊！没有得到挚爱的人啊！假如我早些识破谨慎的陷阱，我会打开房门，向你伸出双臂，捧出我的心。我缄默着，全身发僵。“关于杀人的事，我连一手指也不动。”我身体的重量压在这大地上。你走向死亡。其他人身上伤痕累累，瘦得皮包骨头，濒临死亡的边缘。两百万俘虏在铁蒺藜网后瑟瑟发抖。小罗沙姑娘从窗户里跳出来了。后来在牢房中发现了她穿着衬裤被掐死的尸体！疯狂的行为！他憎恨自己的谨慎。他抬起手，抬起整个臂膀，愤怒地望着他的母亲：“我要改变这个世界。”这是一种不谨慎，一种失去理智的不谨慎。他想谈话，他要行动。雅克躺在凳子上，衬衫扣子敞开着，他双眼紧闭，脸上斑斑血痕，已经凝结了。

可怜天真的好小伙子啊，一切是这么简单。他举起拳头。他在大合唱中唱道：“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那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没有战争，没有失业，没有奴役劳动，没有贫困。让那些居心叵测的人死去，大地上一片欢腾景象。从思想上，打碎旧世界，然后，像孩子调整器械玩具零件一样，一片一片组成一个新的宇宙。

“好了，我登记入党了！”在走进马塞尔的车间时我爽朗地说。

马塞尔放下他手中的笔，把画架挪到靠墙的地方。他的所有画布都面向墙，只能看见粗糙的背面。

“自然，”他说，“应该走这一步。”

“假如我们连一个手指头也不动的话，你相信世界自己会变吗？”我说。

马塞尔摇了摇头。

“对于这个世界，我没有什么指望。一塌糊涂，糟透了，我愿竭尽全力制作一个新世界。”

“可你的世界只存在在画布上。”

他神秘地一笑：“走着瞧吧。”

他见到了。但是这时候，他年轻，尽管他有疑惑不解的地方，他仍在希望着。我几乎每天都敲他的门，他有时兴冲冲地接待我，有时不动声色。他还是接待我。他本应粗暴地闭门不见的，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或者他大概懂得人们是不能让人家吃闭门羹的。我进了屋，雅克正坐在一张小桌前工作，他很像他的哥哥，只是他显得丰满、秀气些，不像他哥哥那么粗糙。马塞尔把一瓶质量低劣的烧酒放在桌子上，那桌子上满是仙人掌、贝壳、曼德拉草根，以及他闹着玩时用卵石、钉子、火柴和线头制作的拼花。在一个大口玻璃瓶里有一只海马：一个微小弯曲、带刺的黑身子，顶着一个高雅有趣的马脑袋。我们点燃香烟，聊起天来。我喜欢聊天。我的话是经过我精心选择的：话头该把马塞尔引入我所急欲到达的这块纯洁的领地。雅克听懂了。

他抬起了头。

“和无产阶级并肩战斗，”他说，“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们并不知内情。”

“我们有和它同样的愿望。”

“才不呢，一个工人希望的是他的解放。你希望的只不过是他人的解放。”

“这有什么要紧呢？关键在于结果相同。”

“可是结果离不开为它而进行的斗争。黑格尔对此有过鲜明的阐述，你应该读一读。”

“我没空儿。”

他大讲玄妙的哲学使我有些不快。我原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然而他在满腔热情地实践着。

“当然，人们追求是为了获得，”他说，“人们想获得的，是人们追求的东西。我不追求的财富不是我的财富，对于我来说，

它不是财富。这是法西斯分子所无法理解的。我钦佩马克思，因为他要人们去索取而不是接受。只是你和我，我们没有什么可索取的。我们和这不沾边，我们不能成为共产党人。"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他气恼地耸了耸肩，说："我不知道。"

我笑了。仍是这么学生气十足。我不该笑：他至少知道他生活在地球上，知道他永远越不过自身存在的谜团。我从来也不知道我只是注视着没有任何懊悔的未来的世界。

而后，一天，我认识了我自己。我看到自己身体强壮，难以测度，和全家一起坐在饭桌旁，炒好的鸡蛋冒着热气，光芒映照在我剪裁得体的西装上和我漂亮的手上。我像雅克看我时一样地看我，像我在车间来回走动时工人们看我时那样看我。这就是我，布劳马的儿子。众目睽睽，盯住了我的发胀的面颊，我突然变成了一个显眼的存在物。

我的面颊整个上午都在发胀。"我要搞什么名堂？"在去餐厅之前，他用湿毛巾久久地擦洗他的脸，眼睛几乎闭上了。

"妈妈好，爸爸好。"他用一种轻松的口吻说。

他俯下身子去吻他的母亲。

"我的天哪，你怎么啦？"布劳马夫人问，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

"哟，脸色怎么这样！"徐宗说。

他默默地坐下去，用手打开叠好的餐巾。

"你母亲问你出了什么事。"布劳马先生干巴巴地说。

"没什么，"让用手指掰了一块面包说，"昨天晚上，我和同志们到蒙马特尔的一家咖啡馆去了，那里打群架了。"

"什么同志们？"母亲说。

她像往常生气一样，脸微微变红了。

"马塞尔和雅克·勒德宇。"让说。

他不喜欢撒谎，他也怕脸红。

“那么，你在那儿挨了一拳？”布劳马先生慢腾腾地说。

他那敏锐的眼睛在夹鼻眼镜后边闪闪发光。

“是的。”他说。

他用手抚摸着肿大的脸。

“那家伙的拳头确像大头棒那样硬。”布劳马先生说。他用一种冷漠的表情注视着儿子，“你深更半夜到布里耶，在一群怪声高唱《国际歌》的狂徒中间去干什么？”

血液涌上他的双颊，他艰难地咽下一口唾液。

“我从群众大会会场来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布劳马夫人问道。

“事情嘛，”布劳马先生用克制的语调说，“是这样：今天上午警察署专员给我打电话，通知我，你儿子差点被控犯有辱骂和殴打警察罪。幸而贝兰是个正直的人，他一认出我的名字，就让人放了他。”

整个劳动的一生，荣耀的一生……让注视着父亲青筋暴露的双颊，完全像中了风的人的面颊。布劳马先生的平静表现出他的自制力是很少有的。尽管这酒糟鼻子和下巴上斑白的胡须，这道貌岸然的面孔把他吓坏了，让还是徒劳地辩解着：

“他们无故地袭击我们，借口是我们在公共场合下集会了。他们棒打我们，然后把我们带到公安局。”

“我想警察做了他们要做的事，”布劳马先生说，“我想知道的是，你这个人怎么会到共产党开会的会场上去的。”

死一样的沉寂。让的手把面包揉成一个球。

“你很清楚，在这些问题上，我和你的意见是截然相反的。”他说。

“这么说，你是共产党人了？”布劳马先生说。

“是的。”让回答着。

"让。"母亲以一种近于乞求的语调说。她仿佛乞求儿子少说几句不体面的话。

布劳马先生恢复了他正常的呼吸，他作了一个手势，指着摆满饭菜的饭桌说："那么，你在这儿，在可憎的资产者的饭桌上干什么？"

他嘲讽地望着让。

这时，他忽然看到了自己，他失神地望着宽敞的餐厅，装满老酒的橱柜，炒熟的奶酪鸡蛋。他在那儿，和其他人在一起。他站起身离开这个房间。我的套间，我的家：一个人的躯体，所占据的位置是何等狭小，活动范围何等有限。这个巨大而鼓胀的外壳围绕着这么弱小的动物。在他的衣柜里，装满了用精选的布料、可着他的身材做成的各种衣服：为了他，布劳马的儿子。

他走出去，砰的一声关上了门，他走了很长时间。这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在栗树的红棕色叶子中，几朵投错了季节的鲜花在顽强地迎风怒放。他行走着，脚登时髦的鞋子，身着合适的西装：布劳马的儿子。他在地球上占有一席之地，这地盘是他不曾挑选的。他处境尴尬，可他并不担心，他相信一切都会好的，相信有一种生活的方式。他怎么可能猜到这是一种危险呢？危险得像无知觉的树木在路的拐角处无力地投下它的影子，危险得像雅克微笑着望着黑色坚硬的玩具。他双手插兜漫步走着，边呼吸着树木的霜叶的气味，好像这是与世无争的。他用脚把一个栗子踢飞到沥青路上去。他所呼吸的空气，并不是从任何人那儿偷来的。他想："布劳马的儿子将不复存在。"学点本事是很快的事，最多学手艺两年，然后，他就的的确确是自己养自己了，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幸福感。他懂得为什么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老有这种腐败趣味的原因了。旧社会腐败的东西仍在他的血液里流动。而他要和它一刀两断，做一个新型的人。

炒焦的洋葱味飘到了楼梯平台上，透过房门，还能听到劈劈

啪啪的炒菜声。他敲敲门，“请进。”马塞尔说。屋里气味很冲，烟气缭绕，雅克就着炉子炒菜。让两手扶头。

“怎么样了，小伙计？”

他走近懒散地靠在长沙发上的马塞尔。“你好，老朋友。”

“你好。”马塞尔说着，漫不经心地向他伸出了一只手。

他突然惊跳起来。“呀，你的脸色很不好！你看见了吗，雅克？”

雅克从烟气腾腾的炉子上转过身来，锅子上烤着的两根粗香肠发出断断续续的咝咝声。

“我的天哪！”他说，“你怎么变成这样子了？”

让摸了摸自己的面颊，说：“我吃了一闷棍。”

“他们打人打得好凶啊。是昨天晚上的事吧？”雅克以知情者的表情说道。

“是的，我们刚从布里耶出来，棍子就落在我们头上。”

他说话的声音中带有一种自豪感。这种自豪感是愚蠢而盲目的，完全不晓得它的出现的危险性，不晓得在他每一个词语中、得意的谈吐的重音中，都有失足的危险。马赛尔没有把我推出楼外，他让我讲下去，脸上露出一种幸灾乐祸、愚蠢、盲目的微笑。

“他们会叫你粉身碎骨。”雅克说。

“不必担忧，我的小马驹，”马塞尔说，“你看得清清楚楚他没被打垮。”他摸摸让的太阳穴说，“打这儿了吗？”

“还是给我拿点吃的吧。”让说。他望着炒好的金褐色洋葱香肠，口水都快流出来了。香肠的皮微微爆开，露出红而鲜美的肉。

“你还没吃饭？”马塞尔说，“你是不敢回家了？”

“我已回过家了。”让说。

“家里大惊小怪了吧？”

“可以这么说。”让往前挪了几步，在空床头附近停下来，说：“你不知道我曾有过什么念头吧？我想和老马尔丹学习印刷，这是背着我父亲的。我一旦可以谋生，就抛开家了。”

我本应猜想得到，雅克的眼睛里闪着欣喜而又怀疑的光芒，显得格外明亮。

“为什么呢？”马塞尔说，“这样就能使你前进一步？”

“我不想一辈子都生活在虚假的形势下。”

“你相信有恰当的形势吗？”马塞尔说着，一边在炉子上切开一大块肥肠狼吞虎咽地吃下去，“我们吃吧。”

“吃完饭后，把地方收拾收拾，我要工作。”他说。

“我会收拾的，”我望着雅克说，“天气多好啊，我不想独自留在这里。你也工作吗？你不想和我一起出去散散步？”

他露出惊喜的神情说：“不麻烦你吗？”

“既然我向你建议，就没问题。”

我们坐在蒙苏里公园的池塘边上，一只天鹅在水面上嬉戏，一帮孩子在我们周围聚集。

“你运气多好呀，”雅克对我说，“好像对你要做的事情，你总是胸有成竹。”

“如果知识分子的谨小慎微不使你缩手缩脚……”

“可我是一个知识分子。”雅克说。

我耸了耸肩膀说：

“你还是忍耐着点，继续搞你的哲学吧。”

“为行动而行动，这简直是一个骗局，”他说，“说不定我的犹豫不决也是一种骗局。”

他用疑惑的目光望着我，他年轻，热情。生活对他来说本应是容易的，人们会相信他只要听其自然就行了。

“你太腼腆了，”我说，“只要你扪心自问无产阶级的事业是否就是你的事业。它不会是你的事业的。但你就这样说吧：这是

我的事业。”

“是的，”雅克说，“但我这么讲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么说是对的。”他默默地望着一只巨大的天鹅，望了片刻，他笑着说：“我要给你看样东西。”

“好，给我看看。”

他迟疑了一下，然后把手伸进衣袋里：“是我写的一首诗，最后一首诗。”

对于诗歌我是一窍不通，但我喜欢诗。

“我看这是首好诗，”我说，“反正我喜欢。你还写了不少别的诗吧？”

“写了一些，我一定拿给你看，如果你愿意的话。”

他显出高兴的样子。

“马塞尔怎么看？”

“马塞尔是我哥哥，这你知道。”雅克发窘地说。

我猜测马塞尔把他弟弟看成是个小天才。那么，我在天鹅悠游的池畔，在母亲们安详的目光下心安理得地杀害的是什么人？什么人又是我杀害的对象呢？

从此，我整天待在车间。“我想掌握技术。”我对父亲说。我沉浸在油墨的气味中，伏身在罩着绿色灯罩的暗淡灯光下。“通风不好，”我对老马尔丹说，“应该安装新的鼓风机，您最好跟我父亲谈谈。”他拉了拉自己的胡须，说：“向来如此。”他们都在这里，这少数更像职员而不大像无产者的老工人。我厌恶他们恭维的声音和他们的委屈求全。向来如此，正是这样。必须摧毁这现存的、无生气的、未经选择的一切。我自己，端坐在排铸机的键盘前，我重新选择了自己，“我一定这么做。”我领取了我的灰布工作服，我走了出去，随手关上房门，我两手空空，高昂着头走在大街上。不再有布劳马的儿子了，而是一个男子汉，一个真正的无瑕疵的人，一个只依赖他自己的人。我又抬起了头，恰巧

和一个年轻工人的目光相遇，他很快就移开了目光。在我满是灰尘的工作服的里边，他大概看到了我浅色苏格兰呢做的西装，假如我跟他讲话的话，他准会把我当成一个挑衅的人，因为我是老板的儿子。

“你什么时候才能决定?”雅克说。

“等我真正成为内行的时候。”

两年就这样过去了。我成为一个很好的排字工人。我了解了组字和印刷的所有秘密。我没有离开这里。

“我找到了职业再说。”

但我并不找职业，是由于她的缘故。她一动不动，安详地待在那里，什么问题也不提，但准备好在初次休克时紧闭双唇，正如布里耶集会之后吃午饭时一样，正如她发现了徐宗的秘密约会的那天一样。我们是自由的，自由地玷污我们的灵魂，自由地浪费我们的生命；而她呢，她只有受折磨的自由。但是，假如她有过某种奢望的话，那就更糟。对她的要求和她的责难，我会憎恶的。然而她在这里，仅此而已。我怨她在这儿，仅仅因为她在这儿。她的存在本身使我厌恶。我能够爱她而恨她的存在吗？我也弄不明白，我怎么也不能承认这个真理。我的爱情和你的死亡的真理。这不是她的错误，这不是我的错误。错误客观地存在于我们中间，我们只能逃避。由于我的过错而使她逃避错误，逃避罪恶，为了我不在我身上发现加在她身上的秘密而自我逃避。

“只有跟她谈谈，她会理解的。”

一天晚上，他走到她跟前。她在小客厅里，坐在灯旁，正埋头读书。她剪掉了漂亮、乌黑的头发已有一年的时间了，因此头上的短发显得浓密而硬实。她的头发仍然是一种财富，是兽毛和草木无法比拟的。这是女人的头发，是灵巧的手用刷子精心梳理的上了发蜡的头发。他对她的头发望了许久，然后坐在了她的对面。他开始一口气说下去：“你知道，妈妈，我不再搞印刷了。”

她默默地听了一会儿，开口了。她挺着身板，两手放在椅子的扶手上。“你这简直是失去了理智！”愤慨使她发出了威严的声音。

他乞求原谅。“听我说，请理解我，我不赞成这个制度，你又怎么能让我得到它的好处呢？”

“可你已经得到好处了，你拒绝的恰恰是你应履行的义务。你所受的教育，你的身体，全是你父亲给的。而现在，他需要你了，你却留下他孤苦一人。”

“到目前为止，我所得到的一切，不是出自我本心的。我并不认为这是心甘情愿的事。”

他站起身，朝钢琴走去，把花瓶里的花摆了摆，又转过身来。

“那么，在通知你父亲前，你还准备做什么？”

“我想首先跟你谈谈。”

“这是不诚实的，你让他为你付了学徒费，现在你舒舒服服地吃闲饭等找工作，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他气呼呼地凝视着她。她对他的犹豫和怯弱的责备，也正是由于她的缘故。她也凝视着他，紧绷着嘴唇，脸涨得通红。他又自我打量了一番，每个人都用另一个人的眼光来藐视自己那有弱点的面孔。

“好吧，我马上就对他讲。”

“你应该这么做。”

她的声音干脆而生硬。他感到这声音中蕴含着对他的一种乞求；他别去说了，别说；再给我一点时间考虑。但是，这心照不宣的言辞，不论对她还是对他，都不应太当真。他走出客厅，顺便照软缎面小凳踢了一脚。她是以何等打抱不平的愤怒来维护这位她所不爱的人的啊！她一向首先作出自我牺牲，并牺牲她心中认为最宝贵的东西。她愿意这样做。实际上她是对的，我又不能不这么做。他下了一层楼，敲敲办公室的门。

“我想跟你谈谈。”

“坐下吧。”

他坐下来，他像如释重负一样高兴地侃侃而谈，毫不腼腆。因为别迫使他走到这一地步。他为切断自己的后路而感到幸福，这样，他就会被置入芸芸众生之中，他与一个为了塞饱肚子而找面包的失业者就没有多大区别了。他把他的公文包全部掏空，放在桌子上，说：“我敢向你保证，你再也听不到对我说长论短了。”

“我已这样做完了。”他打开衣柜，慰藉地望着衣架上悬挂的衣服。结束了。他在床上打开一张旧的《人道报》，牙刷、肥皂、刮胡子刀。他迟疑了一秒钟，而后又拿了一件衬衣、几块手帕、两条衬裤、三双袜子。把这些东西包在一起并不重。“我要去蒂埃里家、库唐和他儿子家，去法柏尔家看看。”

他用胳膊夹起包裹走了。“我一定这样做。”瞧，他已这样做了。他重复说：“我这样做了。”他又一次望了望那绿色的灯和灰尘飞扬的车间，他又看了看自己穿的灰色工作服，发誓般地说：“我一定这样做。”实际这是何等的简单，他只要决定不见她就行了，甚至不这样做：不决定见不见她，不去看她就行了。然而正在他打点行装的当儿，她在那儿，在小客厅里或者在她的房间里，反正是在她家里的某个地方。他气愤地说：“这不是我的错误。我不能不这么做。”我不能……似乎命运客观地、不露声色地在他身外存在着，似乎有人呼唤它来拯救他。他心中像有一根刺，隐隐作痛：“她只有我一个儿子。”从此以后，她将孤独地待在满是绸缎和绒布的屋子里，满怀内疚，如乱箭穿心。她不会掉一滴眼泪，但是她会把全身心扑在伊丽莎白和徐宗的裙子上，夜里熬夜的时间会更长。然而，这不是她的错误。不是她的错误，也不是我的错误。那么错误在何处呢？他恼怒了。他以为它是存在在某处的，它可以被伸手拔掉，像一棵毒草那样。“我要是慢

慢告诉她，让她有个思想准备就好了，她就不会固执己见了。”但是总会到这一步的：我的出走，她的孤独和无端的痛苦。他最后望了一眼他的房间，他将离开的房间。屋子里的家具、版画都是她为他选购的，从此之后，便只守着空房了；在经过关闭着的房门时，她会加快脚步的。他跨过了门坎。走廊上安静极了，打蜡的地板在他脚下发出嘎嘎的声响。他一直走到走廊的尽头，敲了敲门。

“请进。”

她跪在一堆灰色的和本色的长丝袜面前。她沉溺于自己的存在之中。但是，如何既不伤害她又反驳她呢？在这方面，他有时成功，仅仅是他成功。因此他讲话了。

“我刚看过爸爸。”她抬起头。“他叫我马上离开家。”

“马上就走？”

她双膝继续跪着，然而她拿着的那包袜子从手中滑落下来。

“是的，”我耸了耸肩膀说，“你说对了，我在这儿没有什么事情好做了。”

“这就走，”她唠叨着，没有绷紧的嘴唇微微张开，又生气又心疼地问，“你以后怎么办呢？”

“我会找到工作的。在等待就业的当儿，我住在马塞尔家。”他靠近她，手扶在她的肩膀上，说，“我不愿使你难过。”

她用手指抚弄着他的头发，看到了他疲惫不堪的前额。“既然你相信你这样做对，那就去吧。”

他迈着缓慢的步子下了楼梯，心想：“这是我心甘情愿的，我毫不遗憾。”她跪在一大堆袜子前，一人孤零零地在楼上。是我造成的局面。但我也做了别的事：我不愿她伤心难过。唉，我不愿意你死。她现在耷拉着眼皮躺在床上。散落在枕头上的焦黄的头发像枯草一般。我还能见到她有活力的眼睛吗？他说：“没有什么好遗憾的。”真荒谬！应该对一切都感到遗憾，罪恶遍地

皆是，不能治愈，不可解释：罪恶存在着。“没什么可遗憾的。”他疯狂地援引这句既绝望又感到安慰的话，试图证实他的行动，然而他却感到一股与他自身无异的力量拉他向后转。想到这些，他气不打一处来，说：“自己应没有任何牵挂。”

“人总是有点牵挂的，”马塞尔说，“因此我认为你的尝试是抽象的。”

“但是我并没有任何非分的尝试。”让说。他坐在塞满木屑、吱呀作响的长沙发上，手中拿着白兰地酒杯，“我的愿望是，在生活中不比别人更幸运，一个男人，只要自食其力就行了。”

“自食其力，”马塞尔说，“说是很容易的。”他从头到脚地打量着让。

“是的，”让说，“我父亲花钱买的这套西装，这些鞋子。他也花钱让我学徒，谁也不会绝对从零开始。”

“我说的正是这个意思。”马塞尔说。他微笑着露出灰色的牙齿，额头鳄鱼般的皮肤上顿时出现了几条深深的皱纹。“假如只是这一套西装问题就简单了！你的文化修养，你的友谊，你营养很好的年轻资产者的身体。你不能割断历史。”

“我像一个真正的工人一样生活几个月以后，这些就不是至关重要的了。”

“在一个工人和你之间，将永远存在着一条鸿沟。因为你自由选择了造成这条鸿沟的条件。”

“是的，”让说，“可是，我起码会尽力而为。”

马塞尔耸了耸肩膀。

我的努力似乎并不这样滑稽可笑。我的生活实际上已经改变了。我确实抹掉了我的名字、我的面孔。在库唐父子办的车间里，我只不过是一个同他人完全一样的劳动者。八点钟，我穿过堆满一包包苫布覆盖着的纸张的灰蒙蒙的院落。天天如此。在所到之处，工人们连睬也不睬我，工头们也不对我微笑。我坐在我

的机器前，仔细地检查：是由我来负责的，然后我便开始按键盘上的键。“这是当真，我一辈子要这样干下去！”我脱掉我的工作服时，完全不是为了回到用绸缎布置、飘溢着郁金花香的客厅去。我坐公共汽车穿过克利希凄凉的街道，回到了满是厨房炒菜味和洗衣粉味的窄小房间，煤气炉安放在角落里，在盥洗室旁有一个洗脸槽。“这并不快活。”我妈妈说。然而我希望我的住所仅有一个男人占据的地方，一个必要的房间，一个窗洞透光，另一个洞供我进出。

“你该是幸福的。”雅克说。

“我很幸福。”

我下班时，他常来找我，然后我们一起去一个价格固定的小餐馆吃晚餐。他感到那纸做的餐桌布、盖住瓶口的盐盅、那带指纹的玻璃酒杯，甚至这浑浊的脂肪味都那么富有诗意。这味道对我来说，简直是这个餐馆饭菜千篇一律的味道。我们坐在街道电影院的木凳上，在酒吧间喝红酒，他问我：

“你适应起来不感到困难吗？你和其他人完全平等吗？”

“我甚至相信我不久会很容易对他们产生影响。”我说。

必须耐心，我知道在这些小厂子里，共产主义是很难传进来的。我大力宣传也是白搭。在工会的会议上，我竭力倾听着，一言不发。我希望自己能在工会联合会的委员会中当上代表，在那里，我会大显身手。

“我有点事要对你讲。”雅克对我说。

我坐在克利希门的小咖啡馆里，在靠近玻璃窗处可以读到用粉笔写成的字：“可以把饭带到这儿来吃。”两个浑身上下是石膏味的泥瓦匠在附近的餐桌前喝着一公升红酒。

“这是个好消息吗？”

“是不是，你判断吧。我想入党。”

“真的？你决定了？”

我迟疑地望着雅克，说："我也想入党，可是我犹豫不决。我开始怀疑：现实永远和愿望是两码事。"

"是的，我决定了。你感到吃惊吧？"

他自豪地微笑着。

"那天晚上，你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那么多异议？"

雅克耸耸肩膀说："制度并不重要。对我来说，问题在于要知道我能否干预生活。那么现在清楚了：我可以。"他微笑了。"看到你的生活，我就想起了这个。"

"我现在很高兴，"我说，"过去不高兴。"我多么希望雅克在这些事实面前心悦诚服。我感到他中了我的计。我补充说："我想进一步了解你是怎么决定的。"

"一天晚上，我们争论过之后，我步行回家。我不再考虑我们说过的话，但我想到你，想到我。蓦地，我感到我对自己活着是不能忍受的，我的生命毫无意义。"

"我明白。"我说。

我心里感到不安。难道我就有用吗？对我来说，问题不在这里。在这不公正的世界上，我不会为自己设想一个好的命运的，我渴求正义。为谁渴求呢？为他人还是为我？记得有一天你生气地对我说："人总是为自己而斗争。"我是为悔恨和错误斗争，错误就在那儿，这是我的错误。我怎么敢把我之外的他人拖入这场战斗呢？

我说过："我所寻求的东西，并没那么大的意义。"

可是雅克听不进去，他也如此，他所从事的斗争并不是任何他人的斗争。

"难道你认为我太年轻，会一事无成吗？"

我恢复了镇静，说："年轻人是我们的精锐力量。"我用雅克期待我的目光望着他，这是一个对他的信念坚定不移的战士的目光。"目前，我们需要的是握紧拳头，养精蓄锐。后天，我介绍

你去布尔卡德。”

这个季节，对于想重建世界的人来说，工作是不少的。巴黎街头的墙上贴满了关于选举的海报，几乎天天晚上从城里到郊区，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敌人处于对峙的状态。几乎天天晚上，雅克来找我，我们一起去一个学校大厅的库房，那里满是乱哄哄的人群。我喜欢看他在我身边满面红光，高兴地手舞足蹈。我们会用嘲骂声将慢条斯理讲话的雄辩言辞打断，而当我们一伙的人讲话时，我们则借助拳头使会场保持肃静。

“你相信今晚会有殴斗吗？真正的打架斗殴？”雅克问我。

“我倒希望有。前天，我们未让台丹瑞开口，他们准备邀我们跳舞的。”

这天下午，我们很高兴。德妮兹也是喜气洋洋的。只有马塞尔一人沉着脸。为了赶时髦，他剪掉了头发，但是看上去并不得体。他精疲力竭地应酬着那些称他为一位具有艺术家心灵的上流社会佼佼者的奉承话。

“布拉恩已听到八条建议了，”德妮兹说，“他说这是了不起的成就。《艺术札记》的批评家宣称你是你们这一代人中最伟大的画家。”

她目光炯炯，额头上泛起了一种醒目的红晕。这时你会突然想到她只有十八岁，平时一般是想不到的。她的嗓音，她的微笑，脸上的脂粉和描过的眉毛，一切是那么造作，因此她本身所固有的秀美也仿佛是一种人为的娇柔了。只有她浓密的棕色头发和她那昂贵的长裙使人感到她充满动物的活力的躯体。她从盘子里拿起一块结实的花式点心说：“吃三明治吧，还有一些存货呢。”

让拿起一小块夹着肥肝的面包大口吃起来。这香味使他想起了水晶的光泽，想起了童年时期那些姿色迷人的小媳妇。他脚下的地毯厚厚的，夹杂着油画的气味，他在一种不同凡俗的女性的

芳香中飘飘然了。三个月已经够了，而现在，他惊奇地发现自己置身于甜蜜的气氛之中。这纸张的气味、机器的噪音、没有烧熟的牛排味，是组成他日常生活的基本要素。“我不再是他们之中的人了。”妇女们像玻璃丝制成的物品，他以一种逗趣的愤慨倾听着她们叽里呱啦的嗓音，她们带着柔美重音的唱歌似的声音。

他向墙靠近了一点。刚才，当他走进这个人类的樊笼时，被端端正正装在四根木条中的形象在他眼前显得平庸而又安静。为了了解其中的奥妙，必须相信它们。他想应是这样的。他在一块画布前停下来。在两堵充满阳光的墙中间，一个孤零零的圆圈从这点开始向无垠扩展，无数条平行线又在这一点汇合。他望着画时，画像渐渐变得灵活起来。它所反映的内容，只能意会，不能言传。这绘画表达的意思，是任何其他语言所不能表达的，而绘画却能体现出来。他走了几步。所有画布在他专注的目光下活了起来。它们能唤起你比开天辟地还要早得多的久远的回忆，它们也使人想到在未来的革命时地球无法预料的面目，它们会告诉你一个被毁的海滨的秘密，在荒野之中，地上铺满着的贝壳孤独地蜷缩在那里，不受任何良心的责备。这些没有面孔的塑像，这些茫然不知所措的人，这些被死亡之火焚毁的场地，在瞬间固定在静止状态的大洋，这一切便是空虚的多种表现。当人们观察这没有证人的宇宙时，仿佛自己也空虚得很，在他自身的历史之外，处于虚无而空白的永恒之中。然而这纯净和空缺的梦，是因我在这儿把我生命的力量给予了它，它才得以存在。马塞尔对此是了如指掌的。

“别管那些了，”他说，“还是去喝一杯吧。”他把让拉到盖着白桌布的长桌子前，德妮兹正在桌前忙活。“除了这极次的香槟酒外，你不给我们点别的啦？”

“有波尔图酒，”德妮兹说。

“是食品杂货商的波尔图酒，”马塞尔说，“既然今天是节

日。”

“别埋怨了，”德妮兹说，“这是桩苦差事，反正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

“过去了！”马塞尔说，“就这样吊在墙上，要吊三十天的！我怎么能让人家这样处置呢？”

“我们应该，应该有另一类观众，一些真正的观众。”让说。

“我应该不需要观众，”马塞尔说，他双手抓住一把椅子，“我的画应该像这把椅子一样存在才对，椅子是坚固的，可以坐在上面。坐的人走了，它却四条腿着地，依然不动。”

德妮兹耸了耸肩说：“那么你就做个木匠好了。”她有点火了。

马塞尔一松手，椅子在地毯上滚了起来。“一把椅子，没什么意思。”

“你也抱怨吧！”德妮兹说，“一个月之后，你就出名了！”她露出狡黠的微笑。“不管怎样，做一个大画家是不坏的。有很多不错的人对此是心满意足的！”

没有人回答。德妮兹常常用一些对我们毫无意义的词句。我们不太了解雅克，我也不明白马塞尔为什么决定娶她。毫无疑问，他喜欢那厚厚的头发下干巴然而文雅的小脸蛋，另外他对怎么生活是不在意的。德妮兹想征服他，她也征服了他。她成功地使他同意搞这个展览，她是打算在他身边畅行无阻地走向光荣和幸福。我又见到她甜蜜的微笑，她热情的眼光中反射出她的头发的金光。什么也不能阻止她，这是一个娇惯了的姑娘，一个成绩优异的女大学生。她是带着上流社会的豪放和悠然自得步入人生的，对她来说，过去的日子，就是胜利的日子。

“我们直接去那儿，还是经过你家？”雅克说。

“得经过我家，我们还有几支手枪呢。”

“你认为必须把它们带走吗？”

“这是没有坏处的。那个星期一，他们开枪时，我们的人却赤手空拳，无法自卫。”

夜幕降临了。我们穿过风景优美的市区，我感到有点扫兴。在马路的人流中间，我比在太空中迷失方向的原子还要孤独。对于这些行人来说，我只不过是一个碍事的躯体。在我的周围，我看到的只不过是一群盲目的、万头攒动的蚂蚁。这个时候，商店该停止营业了。女售货员面对玻璃窗，想着下班以后的事。对你也如此，路灯顿时亮了起来。你把满是糖果的瓶子收进铺子里，一边啃着巧克力，一边透过玻璃窗望着夜间街上的行人，他们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自由漫步是那么幸福，你会想到当个孩子是多么可悲。而我呢，透过玻璃窗，只看到那些陌生姑娘的莫测的命运，它和我的命运是永远隔开着的。

我们离开了富人住的街区，沿着平民聚居的拥挤的大街走着，然后进了我们的房间。我从装着食品的橱里拿出一块面包和一块奶酪。

“你想吃点香肠吗？”

“不要，”雅克说，“我喝凉咖啡倒了胃。”

我把手伸进五斗橱的抽屉里。在一堆手帕和衬衫下，有两支手枪，其中一支是我省吃俭用买的，另一支则是雅克从他父亲那儿偷来的。我检查了一下保险。我小心翼翼，因为不想留下任何痕迹。

“嘿，”我说，“不到万不得已时，你不要把它拿出来。这些小先生们对能搞点国葬是巴不得的呢。”

雅克好奇地掂量着武器说：“我原来并不相信这还能打死人，这确实像把玩具枪。”

像一把玩具枪。难道我不像一个善良的不会伤害人的小伙子，坐在同志们中间拍着手、跺着脚吗？他们是我的兄弟，雅克是我的兄弟，我们都热情奔放。明天，由于我们的努力，革命就

要成功。对那些嘲笑我们的人，我们要用拳头堵住他们的嘴巴。雅克敞胸露怀，缕缕长发垂在他那玫瑰色的面颊上，他咧着嘴，在挥起的大棒中间拼搏着，献出生命他也会感到幸福……

“吕特！吕特！”她在床上辗转反侧，她在唤人，我不知道她在叫谁。在这个房间里，只有两个人，一共两个人在这个房间里，每人单独一处。吕特。她见到谁了？我听见了这个名字，但我未见任何面孔。我望着她，我望了她几小时，但在她紧闭眼皮之后，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昔日的回忆，不断在眼前闪现。这是我经历的事情。

外边一片嘈杂声，一声枪响，接着又是一声枪响。“是那小家伙首先开枪了。”

杀人犯，杀人犯。在漆黑的夜里，我走着，蹒跚地走着，我跑起来，想溜出去。他却安详地待在那里，在他的诗歌和书籍中间。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塞给他一支手枪，把他拉向枪林弹雨之中。凶手。在楼梯的上层，马塞尔正在读书，也可能在一动不动的马头鱼前，在油画气味中睡着了。他在等待着雅克。我上了楼梯。我再也上不去了，也再走不下来，必须使时间停滞，必须把自己耗尽，马塞尔也要耗尽，世界也要耗尽。在我的脚下，级级阶梯显得那么坚固，楼梯的横档在它们原来的位置上，门也在它的原来的位置上。门后，马塞尔等待着雅克。我呢，我在这里，我想讲话。只要一句话，事情就会存在，会永远存在下去，绝不停止存在。一句话，咔嚓一声，时间断裂了，它被切成两段，不能再衔接起来的两段。我敲门了。

先是雅克，现在是海伦。这还不够，洛朗将会轮到。时间继续赛跑，争先恐后，不停地推我向前。在通向未来的黑夜中前进。决定了。生活困扰着我，把我推向新的尸体，推向哭泣的妇女，囚室的门关上了，又打开了，为死人而打开。一个黄色的新近贴上的广告，在巴黎街头的墙上，或在地铁的白色瓷壁上，处

处可见。广告上写着一些新的名字。“不要去了。”一切都会白搭，你会无缘无故地死去。啊，怎么遏止这前进的势头呢？前进，前进，作出决定。我的每一下心跳，都会产生一个新的决定。关上门，闭上眼睛：决定关上门，闭上眼睛。

没有任何灵魂的拯救，甚至连绝望的热狂和盲目的决议也没有，因为你在那儿，在这张床上，在你死亡的惨淡光线下。

二

自行车一直放在那儿，它崭新、光彩夺目，连同它蓝里透白的车架子和靠在墙的暗淡石头上的闪闪发光的镀镍车把。它轻便、细长、一动不动，仿佛仍在划破长空地疾驰着。海伦从未见过这么精致的自行车。“我要上上深绿色油漆，它还会更美。”她想。她气恼地离开了窗户。在这里望了又望，心突突地跳又有什么用呢？八天以来，别的什么她也不想，也不干。一个多美的东西呀！她一刻不停地想着它，她竟然会一天二十次地趴在窗台上观赏它，可是她还没办法得到它。“真扫兴。”她伤心地想着。小时候，她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从不犹豫。她把钳子在她的围裙上擦了擦。好了，一天又过去了。明天，是另外的一天，它也同

样会这样过去。她从挎包里抽出一块方纸卡片，上写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她把小空格抹成灰色的。灰色的，黑色的。这个月以来只有两天是红色的。

下面，教堂的钟声响了，清脆悦耳。海伦下了楼梯。一个小男孩站在铺子中间腼腆地望着装糖块的瓶子。

“你想吃吗?”海伦问。

“我想吃这个。”小男孩用食指指着奶油巧克力圆糖说。

海伦用夹子夹起巧克力圆糖，用餐纸包上说：“一个法郎的。”她随即向会计的抽屉里扔了一个法郎，一边透过玻璃窗望着小男孩嘴里嚼着东西上街去了。他回家去了，人人都回家，这是忧伤的时刻。他们也将回家了。夜幕降临在糖衣杏仁上。她感到嘴里又产生了素常的油脂味道。

她打开了朝院子的大门。车把和挡泥板在阴影中发光。海伦走近车子。坐在精美的黄色车座上，把车把抓在手中该多帅呀！她朝门房瞟了一眼，仿佛传达室的老大娘这些日子故意不出来一样。

“我想要它，我应该得到它。”海伦说。它是那么光滑，那样洁净，那样令人陶醉。它那透光的车轮和鼓鼓的大轮胎，把它反衬得既纤弱又强壮。她用手指抓住了一根细长的辐条，用手按了按砖色的外胎。嘻，简直牢固得像一块矿石。真想不到这只不过是又薄又细又能打气的胶胎。海伦稍稍后退一下，她那么自豪，那么自由自在。“我想到哪去，就到哪去。晚上，我会很晚才回家。有这闪闪发光的车轮子带我在寂然无声的街上行走，我会悄悄地听到它那甜美和谐的沙沙声。我会把它保养好。我要置一个小油壶，我要像机械师那样给它的部件上油。”她抬起头来，望着四楼的窗户。“只要她不害怕，只要她不把它搬到房子里。”海伦头脑发热，她的奢望使嘴唇和手指抖动起来。

“等传达室老大娘出去的时候……”

在商店里，电铃响了，她急匆匆走着。

“保尔！好主意！”她兴奋地说。

他一把把她拉过来，吻她的脸。她也给了他一个飞吻。

“你帮我把店门关上，然后我们去我家。你想吃点巧克力吗？”

“这时候不想吃。”保尔说。他把门打开，从人行道上排得整整齐齐的沉重的大口瓶子中拿了一个夹在胳膊下说：“我说不吃巧克力，你总感到奇怪！”他笑着说，“我第一次见你时，你硬是要塞给我。”

“这是我诱惑人的唯一办法，”海伦说。

“不这样，你也讨我喜欢，”保尔说。

“是的，你总是有着无私的友情。”海伦说。她笑了，“你带我去外面吃饭好吗？我还有点钱，我请客。”

“今晚不行，”保尔说，“我和一个伙伴吃饭。”

“唉！”海伦说。

“明天吧，如果你愿意的话。”保尔说。

海伦抓住一个瓶子沉默不语。和保尔一起吃晚餐并不一定就那么美，但这总比在家里吃饭好些。今天晚上她可真想和他一起吃饭。明天，嗨，又是明天。他们默默地把瓶子放回原处。

“你今天干什么了？”保尔和气地说。

“工作了。你还想让我干别的什么吗？”

“你告诉我。”

“假如你愿意的话，”海伦说。

她让他走进自己的房间，保尔向桌子走去。

“真美极了，”他说。

“你知道吗？维尔第对我说他们卖掉的画四分之三是我的作品。”海伦说，“可是你瞧瞧，这个臭婊子，他们一个子儿也不会多给我的。”

每次都是如此。她兴致勃勃地迎接保尔，五分钟后，她便腻烦他了。她以一种批评的眼光审视着他：他棕色的蓬乱头发和有雀斑的鲜嫩皮肤使他显得很漂亮。但是那高高的额头下一对眼睛却显得过于温存。贝壳坚硬，却是透明的。人们透过一个天真的软体动物发现了会在自身中发现的同样的自我。

“你想什么呢？”保尔说。

“我感到生活很没有意思。”海伦说。

“你还是颇有点运气的。”保尔说，“想一想，如果你是在办公室或在工厂每天八小时坐班的话……”

“那就等于自杀。”海伦说，她又以咄咄逼人的语气补充道：“我在想你是怎样做的，情绪一直那样好。”

“你知道，工人们是没有时间研究自己的精神状态的。”保尔冷淡地说。

她生气地望着他，每当他向她大谈工人的品质的时候，她就很恼火。

“我懂，我嘛，是一个小资产阶级，这你对我谴责得够多了。而这又证明什么呢？总是从外表解释人的方法是可笑的。我认为人们的所想，人们的存在，并不取决于我们。”

“多半取决于我们的条件。”保尔说，他笑了。“正因为你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因此这种想法使你反感。你需要想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是唯一的，而你自己也是唯一的。”

“我完全相信是这样。”海伦说。

“一切小资产阶级都有一种新颖的癖好。”保尔说。“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仍然是雷同的方式，”他以固执的、自鸣得意的神态反复陈述自己的观点，“而一个工人对于什么新颖是不介意的。我嘛，与小资产阶级相反，我为和同志们一样而感到高兴。”

“首先你不一样，”她说，“你是排字工人，受过教育。”

“这有何妨，工人就是工人。”

“照你的看法，”海伦说，“在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姑娘都和我一模一样了。”

保尔平静地笑了，说：“你知道，两片一样的树叶是不存在的。”

海伦耸耸肩膀不耐烦地说：“大体上是会把它们混淆起来的。”

“大体上，是的。”一直微笑着的保尔说。

“好，”海伦说着，直直地站在他面前，“那么，你为什么宣称你爱我，我，而不是别的姑娘？”

“地球上也有成千上万像我一样的人，”保尔说，“也就铸成了成千上万对像我们一样的情人。”他抚摸着海伦的双肩，高兴地望着她说，“每个男人都爱他的女人。”

“可是，总起来说，那些每个男人和每个女人是可以交换的。”海伦挣脱了他说，“好像我觉得，当一个人真正爱上某人时，是不可能爱上另外一个的。”

“当然，”保尔说，“在一切爱情中常见的现象是：除了他自己的外，别的他并不想要。”

“哎呀，你把我搞糊涂了。”海伦说。她向他走了一步说：“你会爱上我以外的另一个姑娘吗？会不会？”

保尔犹豫了片刻。对他来说最可怕的，是他对待一切事情都那么认真。她并不要求他老老实实地回答她。

“现在，我很难想象。但是，我清清楚楚地明白，是会的。你也一样，你会看上另一个男人的。”

“我可从没说过相反的意见。”海伦说。

保尔脸微微红了，但他并没有攻击别人的意思。而她竟姿态很低地想伤他的心，他仅仅为此而感到尴尬。有些时候，为了碰碰他傲慢的谦虚，人家就对着他来。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而在他的眼中，海伦也并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人

人都是极平常的，互相爱慕也是一件平平常常的事情。他完全相信她是爱他的。

“提这些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保尔说，“设想事情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也是没有意义的。最可靠的，是我爱你。”他拍了她一下说，“这你清楚，小无赖。”

“你老这么说。”海伦说。

“别装傻了。”保尔说。

他用手臂搂住了她，把双唇贴到她的嘴上。这是诚实而又新鲜难得的双唇，她很愿意让它们贴在自己的唇上。她闭上了眼睛。这把她拦腰抱住的结实的胳膊，他躯体的热流，这使她浑身发热的温情，一切都使她感到是那么惬意。她微笑着挣脱了出来。

“那好，如果你真爱我，答应我一件事。”她说。

“什么事?”保尔说。

“取消和你的伙伴的约会，带我去吃饭。”

保尔的脸色沉了下来，“我不能这样。”

“你最好还是说你不愿这样做。”海伦说。她背向他，从挎包里取出一把梳子，梳理着她蓬乱的头发，“这至少是党的一个成员吧。”

“不是，”保尔殷勤地说，“这是布劳马，你知道……”

“啊，原来是布劳马。”海伦说。

她用手指卷了一个发卷。在保尔向她谈及的所有同志中，布劳马是唯一她想认识的。

“那好吧，不要取消对他的邀请。带我和你一起去。”

“这是什么主意啊!”保尔说。

“为什么？我使你不光彩?”

“可是，这是毫无意义的，”保尔说，“我跟你讲我们要谈话，很严肃的。”

“关于什么事情?”

“这不会使你感兴趣的。”

“恰恰很感兴趣，我感兴趣。”

保尔耸了耸肩。他面有难色。“我不通情达理，”海伦想。但是对什么不通情达理呢？这么久以来她绞尽脑汁地琢磨，她需要一点新鲜东西。假如她自己不考虑自己的利益，谁也不会为她操心。人人都是“我”字当头，这是规律。

“我对你说，这我感兴趣，”她说，“你可以好好向我解释一下。”

“好吧。你知道，有很多工会团体存在。太多了，我们的力量就分散了。在土伦要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宗旨是将这些团体联合起来。布劳马是其中一个团体的代表，我想说服他和我们投一样的票。”

“对，”海伦说，“因为你是不属于他们这个系统的?”

“他过去曾是共产党员，但他后来离开了党。”保尔带着责备的口气说。“而现在，他却坚决拒绝加入‘国际歌联盟’。他想使法国的旧工会主义死灰复燃，不搞政治，工会成员退居专业领域。可是在现在，搞的却是政治领域的赌注。”

他还要继续讲下去。在这些问题上，他是没有分寸的。要么他只字不提，要么他就滔滔不绝。海伦打断了他：“我并不阻止你去交谈。”她说，“你们的约会地点在哪儿?”

“在拯救港饭店，”保尔犹豫了一下，说，“我可不想带你去，跟你毫无关系。”

“因为我想去。”海伦有点赌气地说。

“我求你，”保尔客气地说，“别任性，明天晚上，我们一起出去散步。”

“明天，我感到没意思。”海伦说，她的嗓音甜润了，“你说你爱我，我就要求你给我这么一点可怜的优待……”

“你不愿意理解我，真奇怪。”保尔恼火地说。

“我很理解，不应这样做，对不对？”海伦耸了耸肩膀说．“当人们相爱的时候，是会作出一些平常做不出的事情的。”

“你说的这个，纯属电影上骗人的把戏。”保尔说。他的样子是那样沉着而坚定，这使海伦的血液沸腾起来。

“这是你的最后一句话？你不带我？”她说。

保尔似笑非笑地摇了摇头。

“那好吧，你会马上滚出去，我不留你了。”她向门走去，把门打开。

“海伦，不要这么蠢。”

“你带不带我？”

“好吧，可以带。”保尔说，他走出门，说，“明天晚上见。”

“要是我直接去那儿。”她用恼怒的声音喊着。她倚在楼梯栏杆上。门铃响了，大门又关上了。“他走了。哼，我待在这儿泡时间他是满不在乎的；我对他发脾气，他也满不在乎，他已经不再想这事了。”她坐在楼梯的台阶上。保尔爱她，这是肯定的，三年来，他一直忠实地、一心一意地、狂热地爱着她。但是，她并没感到她在他眼里有多么重要的位置。对于任何人来说，她都是无足轻重的。这个时候，谁会关心她呢？她在商店里，浑身浸透着蜂蜜和可可粉的气味。她完全可以在其他什么地方，那将是一样的。在她的童年时代，她既不在这里也不在别处，她是在上帝的怀抱里，上帝用它永恒的爱爱着她，她感到她也像它一样永恒。她蜷缩在暗淡的光线之下，她把她的每一下心跳都奉献给了它，她的每一声叹息都很重要，因为上帝本身会听得到。保尔对我的专注态度是不够的，即使他十分专注，他总归不是上帝。海伦站了起来。“我不需要任何人，我存在着，我，海伦，难道这还不够吗？”

她回到自己房间里，向镜子走去。“我的眼睛，我的容貌，”

她有些激动地想，“我，只有我才是我自己。”她在自己身上发现这些思想的火花是少有的；摸一下自己的手也是白搭，仿佛那手不是自己的，于是内心深处立刻产生了一阵怅惘的情绪。海伦倒在沙发上。她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她面前空无一人，她把自己关闭在自我的小天地里。她可以宣称她是自爱的，这种爱情只不过是自己的甲壳内部的一种温存的颤栗。这种厌倦，这凝固的牛奶的酸腐味，简直像她的肉体，这是一种含蛋白质的松弛的微微颤抖着的肉体，恰如一个牡蛎，因为牡蛎正是以这种方式感觉自己的存在的。我的思绪，像那颤动的睫毛，它像要飞向某种事物，然后又收缩回来，继而又伸展开去，最后还是落回原处。海伦从沙发上跳了下来。这不是不可能的。必须有点事情干。其他人是怎么做的呢？无疑，牡蛎比我更完美，甲壳以外的事情它们甚至连想也不想。

“是贝尔唐小姐吗?”

海伦倚在楼梯栏杆上望着：

“是的。”

“我出去一会儿。我可以写个条子让来访者找你吗?”

“当然，”海伦说，“你什么时候回来?”

“半小时以后，放在那儿，多谢了。”门房老大娘说。

“没什么。”海伦说。

她等了片刻，然后就噔噔地跑下楼梯。她的心怦怦地跳着。现在或永远，再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她打开院门，沿着墙根溜过去。窗户在黑暗的壁面上闪着光芒，像咄咄逼人的眼光。假如有人看见她，假如她正好遇见她的父母或房东？她像钉子一样一动不动地站住了，她的手上冒出了冷汗，她的双腿瑟瑟发抖。“我真的变得胆小如鼠了?”她想要它，这辆自行车。她仿佛觉得，这就是她在地球上的所在，如果她不攫为己有，对她来说也就再也没有希望了。

“我很想要它。”她抓住了车把。多么轻巧呀！她又停了手。女面包商会看到她走过，肉铺的主人，全街道的人会认出她来，她可以留下一个便条：我拿了自行车。“活该！”她咬紧牙关，说着。她推着这个玩意儿向门走去。现在，她浑身颤抖得几乎支持不住了，她坐在车座上是坐不稳的。“真是荒唐。”她失望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几个字。一小时后，这座房子就会骚乱起来。“我会被揭发，失主会把自行车从我这儿取走。”她焦虑万分地环顾四周。忍痛割爱，对她来说都难以忍受，这是她的财产，一个可爱、驯服的坐骑，她的朋友，她亲爱的孩子。“和它一起逃之夭夭，再也不回来……”她用手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有一个办法，只有一个。”

她又把自行车放回原处，小跑着穿过院落。什么自尊心，去它的吧。反正我们没有撕破脸皮。她沿着圣雅克街箭也似地飞奔着，然后在饭店门前停了下来。如果他不愿意呢？她气喘吁吁，脸上发烧。浓雾把她和世界隔离开来，她的目光一直停留在那儿，那明光锃亮的自行车上。“他要拒绝，我就和他吹，再也不见他。”她推门进去，在铺瓷砖的房间中央，炉火正旺。饭馆里的人坐在铺着漆布的桌子跟前。可是，哪个桌子前都没有保尔的影子。

“您想喝点什么？”老板问。

他系着蓝色围裙，大腹便便。

“我来找人。”海伦喃喃地说。她的目光停在一个坐在里边桌子前的孤单单的小伙子身上。他没有吃东西，仿佛在等谁，在他面前放着一本打开的书。她向他走去。他带着疑问的神色望了望她。这不是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了，看上去他起码有三十岁了。他的目光中并无敌意。

“您是不是叫布劳马？”她问。

他笑了：“是的，是我。”

“您知道保尔快来了吗?”

“保尔·贝尔耶，对吗？我一直在等他。”

他一直微笑着。他的嘴角上那逗人的微笑，不知是友善还是嘲讽。

她犹豫了：“我要请他帮个忙。”她焦虑不安地望着布劳马，说，“是急事。”

“或许我能替他帮帮你的忙吧?”

海伦的心在胸膛里怦怦地跳起来。这比保尔帮忙可好多了。街道上没有人认识这张脸。她端详了他一阵子，心想，我应对他信任到什么程度呢?

“我想我是不是帮不了?”他又说。

“可能。”海伦说。她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上，摇晃着身子，样子一定很可笑。“事情是这样，现在我不想回家，因为我父母硬让我和他们一起吃饭，我不愿意。可是我有一辆自行车在院子里放着，而我现在就需要它……您能不能帮我把它拿出来?离这只有两步远。”

她望了望挂钟。已经七点三十五分了。门房老大娘已出去二十分钟了。

“我可以去，”布劳马说，“然而假如有人看到说我偷你的车，人们会怎么想呢?”

“那你就来这儿找我，我会说是我让你去的。”

她用恳切的目光望着他。布劳马站了起来。

“在圣雅克街200号，在院子里放着一辆蓝里透白的自行车。再说，也只有那一辆。动作快点，因为我还是不想让人看见您。”

“我马上给您推来。”布劳马说。

她颓然地坐在了木凳子上。他能准时到吗？他一旦被抓住……最好不要往下想了。什么也不想，这是唯一行动的办法。随着年龄的增长，想法也就多起来了。

“你在这儿干什么?”保尔说。

他突然出现了，怒气冲冲地盯着海伦，他因生气脸涨得通红。

“我在等你的同志，”海伦说，“他很和气，他这个人。我并没有使他感到那么讨厌的样子。”

“他在哪儿?”保尔说。

“我让他跑一趟。”

“你胆量倒是不小。”保尔语气缓和了些。“那就在这儿吧，既然你已在这儿了。但是可不要闹着玩儿了。”

他坐了下来。

“我玩得很好。”海伦说。她朝门上的毛玻璃望着。十分钟已经过去了，他也该回来了。

“你想吃点什么?”保尔说。

“不知道。”海伦说，“我不饿。”

假如他因为她出了事那是太不像话了。看到他身着肥大卷领毛衣，浓密的黑发，肌肉发达的脖颈，细高的身材是多么可爱。他看上去不像一个工人，也不像一个资产者，更不像拉丁区的人。她战栗起来。这时，她看到他在门洞处笑了。

“你的车在这儿，”他说，“你马上骑走还是我把它搬进来?”

“哎呀，真叫我感激不尽哪!”海伦说。

她真想一下子跳上去吻他。我的自行车，它确实是我的。一会我就要上街，穿过整个巴黎。我相信它会很好用的。仿佛她的全部生活都焕然一新了。

“请把它推进来吧。”

“你的车?”保尔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望着布劳马正在靠墙放的小巧玲珑的蓝色自行车。“这是你的?从什么时候你有的它?”海伦微笑着不回答。保尔用探询的目光望着布劳马，“这自行车是你的吗?”

"不是，这是她的，我帮她搬回来了。"布劳马说，"她要我去帮她搬回来的。"他也以一种疑惑的目光望着海伦。

"这太不像话了！"他一把抓住海伦的肩，"说说，你可以自己去干缺德事，不能嫁祸于人。你想没想到，如果他被抓住！"

布劳马笑了起来窘迫地说："那么，我无中生有是多么滑稽可笑。"

他一笑，显得那么年轻，又和蔼可亲。但是在他的眼睛里，他的嘴角处却有着含蓄的态度，海伦是捉摸不透的。

"您知道，很抱歉，"海伦说，"我自己是不能去的，这里所有的看门人都会认出我。"

"真是的！"布劳马说。他坐了下来，把菜谱递给海伦，"你想吃点什么？这一阵子情绪不安也该使你胃口开了吧？"

"我吃馅饼和一块烤牛排。"海伦说。

"一样的东西。"布劳马对靠近他们的老板说，"再来一瓶红酒。"

"我也一样，来点馅饼和牛排。"保尔怏怏地说。他显出一种固执的神情沉思着，"荒唐事！"他粗鲁地说，"我要把它物归原主。"

"我的自行车。"海伦喊了起来，"保尔，你要是这么做，我一辈子不再见你。"

"我要使它物归原主。"保尔说。

他站了起来。海伦的眼眶里涌出了泪水。保尔比她态度还强硬，而且他很固执。

"你要是去，"她咬紧牙关说，"我就大喊大叫地跟着你到街上去，有你好看的呢。去吧，去吧……"

"听我说，"布劳马用调解的神态望着保尔，"偷了这辆自行车是我不应该。就把它给她吧！"

保尔疑惑不解地说："这是太蠢了，别人会马上怀疑她的。"

“我不在乎，”海伦说，“因为他们没有任何证据。”

“那你把它藏在哪儿？”

“为什么不能藏在你家呢？”海伦说。

“不能，我不想把自己搀和进去。”保尔说。

“那就把它放在我家吧。”布劳马说。

“哟，那太好了！”海伦说，“我可以在你家把它再油漆一下吗？这不给你添麻烦吗？”

“一点也不。”布劳马说，“你想把它漆成什么颜色呀？”

“深绿色。”海伦说，“你不觉得这更美吗？”

“深绿色？”布劳马说，“我觉得这倒不是一个坏主意。”

“这种玩笑，我认为若发生在你小时候，那是有情可原的。”保尔说，“可现在，这也太恶劣了。你还是设身处地为那个找不到车的可怜的善良女人想想吧。”

“就说这个女人吧，”海伦说，“我才高兴呢。这个可怜的善良女人！实际上是浑身珠光宝气、身裹皮大衣的可恶的女警察，家里铺满了地毯。再说，她从来不用她的自行车，那车在院里已经整整放了八天了。”

“你偷了人家的东西，还无所谓。”保尔说。

“不对。”海伦耸了耸肩膀说，“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绞尽脑汁为私有财产辩护，因为你是一个共产党人！”

“这与此毫不相干。”保尔说，“你讲话很像资产者，认为共产党人就是要掏别人的腰包。”

“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偷这些卑鄙的阔佬的东西。”海伦说。

她转向布劳马，希望看到他赞许的目光。

“就我本人来说，我也不会那么干的。”他说。

他仍面带那种可爱而又嘲讽的神情。“好像我才四岁。”海伦略带生气的样子想。

“为什么呢?”她失望地说。

“这不会前进一步的。”布劳马说。

“怎么!”海伦说，“这使我前进了一大步。它现在属于我，这辆自行车。”

“对的，当然。”

布劳马笑着。他微笑起来并不像保尔微笑那么爽朗。海伦不知所措地注视着他。

“那么，你为什么指责我呢?”

“我并没指责你。”布劳马客气地说。

“可你说过你不会像我这样做的。”她不耐烦地说。

他做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动作。

“为自己寻求私利，我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他语气认真严肃。要是保尔认真起来是那么令人恼火，而他的话可不是凭空说出来的。为了不占有什么，二十岁上，他故意离家出走。他大概是对的。

“可是，人们总是图谋私利的。”海伦说。“我认为这是有道理的。”她以一种请愿的语气说，“总而言之，人们心中只有‘我’字。”

“你就是只想你自己。”保尔说。

“因为我是一个小资产者，我知道。”海伦打断了他的话，并向他指了指牙齿。

“私利，是的，”布劳马说，“但这取决于人们把它放在什么位置上。”

“你想要说明什么呢?”海伦说。

他嘴边上讲的全是违心的话。很明显，他拿她当孩子看待了。他不降低自己的身份去和她争论。

“我们的一些小的个人欲望，我并不感兴趣，”布劳马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总是想方设法满足它。”

“我对我的私利感兴趣。”海伦说。她有点恼火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愿意跟他谈话，仿佛他身上蕴藏着源源不尽的秘密。想到他专门和她应酬，看到他那热情的目光，心里感到舒服。他是那样充满自信，这使人马上产生反驳他的欲望。

“我认为人应多一点骄傲。”布劳马说。

“多一点骄傲?”海伦惊讶地问。

“是的。”布劳马说。

她不大懂他的意思。但这些话语像辱骂一样地刺耳。总之，他对偷车一事是持宽容态度的，他认为这是幼稚的举动。他是从一个男人和一个成年人的高度来看海伦的。

“假如连他自己希求的东西都不感兴趣，那么还有什么其他呢?”她用挑衅的口吻说。

“还有很多呢。”布劳马客气地说。

在他的声音中分明有一种友好的东西。他是否也以这种音调和别的人讲话呢?可能跟女人是如此。想到在他背后，在他周围，有一种全新的生活是可笑的。

“什么?”她说。

“一言难尽。”布劳马兴致勃勃地说，“假如你真是不知道的话，你自己会逐渐体会到的。”

海伦顿时满脸怒容。总之，他是不想屈尊和她谈心的，他劈头污辱了她，却那么悠然自得地装没事人。

“啊，我知道，我应该关心全人类的幸福，”她冷笑着望着保尔说，“工人们，他们有团结的意识。”

“完全正确。”保尔说。

“但是，人人顾自己，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了。我嘛，我是自卫的，旁人也只有这么做了。”

“我完全相信你生来就是为自卫的。”布劳马说。

海伦感到喉咙被哽住了。为了嘲讽她，他作出了那么多的微

笑，这真没必要。

“她并不像她所说的那么坏。”保尔笑着说，“她这个人哪，看到一个穷人，是不会不卖掉自己的衬衫来搭救他一把的。”

他没有必要替海伦说话，她已不是小孩子了。再说，得罪布劳马对她也无所谓。

“确实，我不愿看见有人在我的眼皮下受苦。”海伦说。她带着挑衅的神态望着布劳马，“您瞧，大概我是一个魔鬼，对我不认识的人，我毫不在乎。”

“这不是坏现象，恰恰相反，这是司空见惯的事。”布劳马说。

他的声音是无动于衷的。海伦用手握住了酒杯，她真想把它摔到他的脸上。他这个整天参加辩论、泡在会议里的人取笑她确实有一手。“这样会使他嗤笑的。”于是她把酒一饮而尽，把杯子放在桌子上。

“反正这比认为自己了不起而趾高气扬要好。仿佛真的将人类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指尖上一样。”她用犹豫不决的声音说道。

“当然喽！”布劳马说。他笑了。他甚至丝毫不掩饰他的蔑视之情。

“我敢肯定，全人类会对你的全部高谈阔论嗤之以鼻的。”她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她甚至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愤慨地讲，但她已不能控制自己，每反驳一句，她就越气愤。布劳马笑了。她站起身，拿起大衣。“你们玩玩吧，我走了。”她说。

她抓住自行车，越过饭店的门槛，骑了上去。他们在她身后笑着。保尔大概会觉得别扭，布劳马肯定认为这很滑稽可笑。海伦的泪水夺眶而出。这两个摆臭架子的人！现在他们在交谈，是男人间的交谈，而她只不过是一个浅薄的、任性的小姑娘！她颤抖了起来。毛毛雨打湿了她薄薄的大衣，在这种天气骑车兜风可

不是舒服事。“我为什么表现得这么愚蠢？我是永远不会把握自己的。”她刹了闸，把自行车靠在人行道上。把它丢在这里大概不是谨慎的做法。活该！这不过是一辆自行车，不是别的。她推开一家灯火辉煌的咖啡馆的门进去，双手扶在服务台上。“来瓶英国朗姆酒。”朗姆酒会使她的喉咙发热的。是保尔把她激怒的。他要是不在那儿多好。难道他真的关心别人？确实如此？对所有的人：男人、女人、年轻人、老年人。他们笑着，他们大声喧哗，喝着酒。在他们身上，能找到什么东西呢？他们与我究竟有何不同之处？我自己嘛，我对自己了如指掌，总是一样的。而他们并不比我价值更高，“你自己会逐渐了解的。”不对，我什么也了解不到。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东西值得努一把力？

自行车仍旧忠实、驯服地靠在人行道原来的位置上。海伦闷闷不乐地抓起车把，难道应该整夜都拖着它吗？她不想骑上去，推车走更便于思考问题。“我为谁呢？”这无论怎么说是很难想象的。她思前想后，思绪万千。“我需要的是再来一杯朗姆酒。”她走进比亚尔咖啡馆，说：“来两杯朗姆酒。”咖啡馆服务员正在用抹布擦柜台。室内光线暗淡，外面下着小雨。我，我在这里。为什么偏偏在这儿呢？我是谁呢？某人会说是我。终究有一天，不会有任何人感到我的这种存在。她用手扶着柜台。这是不可能的。我曾经一直在这儿，我将永远在这儿，这是永恒的。她观察了一下她的双脚，它们像钉子一样紧贴在地上。她怎么动呢？往何处去？

海伦又来到了大街上。她站在放车的地方厌恶地望着自行车，它像一条耐心却使人腻烦的狗。她厌恶地躲开了它。她宁愿使双手自由自在。她的双脚已为她做过不少事了，要把它们一前一后地放好，这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她走了几步。“这不能前进一步。”她说。她靠在一棵树上，树干已被带潮气的雾打湿了，粘糊糊的，冰凉的水滴从光秃秃的树枝上滴落下来。海

伦感到身上透心凉。她继续前进。“这不能前进一步。”海伦重复着。反正人们是停留在原地，就像在恶梦中一样。前进或后退，茫无目的。

“他能对我说的。”他那暗淡的脸，那漫不经心、一字一板的声音。他在地球上的存在似乎不是荒谬的，好像他有道理。“如果我在没有保尔的情况下同他谈谈话该多好。”蓦地，一种欲望产生了，“只有给他写信了。”一种目标。目标已经有了。她重新感到，时光热辣辣地从身边流过。海伦在人行道边绊了一下，她笑了起来。

三

有人敲门。门慢慢开了。

“你不需要什么吗?”

他摇了摇头说:“不缺。谢谢。”

缺什么?为了什么?这些话语在那里无疑还有一定意义。门的另一侧有个房间,一所房子,一条街道,一个城市。而那里的人,那些在熟睡中或在开夜车的人们。

“洛朗去睡了吗?”

“去睡了,他六点钟来看你。”马德莱娜走近床边,“她一直在睡?”

“她不停地睡。”

“别忘了，”马德莱娜说，“我和德妮兹一起，在隔壁房间。”她将门关上。床上睡的人微微动了一下。

“几点了?”

这是一种童音发出的窃窃私语。他伏下身子抚摸着床单上的手。

“两点钟了，我亲爱的小东西。”

她睁开眼睛：

“我睡着了。”

她仿佛窥视着什么，倾听着什么。她并不是想听外部的声音，而是想听听她的内心。

“他们总是在上面发出这种声音，你听见了吗?”

他没有听见。他贪婪地俯视着垂危的病人，可是他却不能分担她的痛苦。

“我希望他们安静一点。”

“我去告诉他们。你睡吧。”

“好吧。”她蓝色的眼睛转动着，像在搜寻什么，“保尔，保尔在哪儿?”

“他走了。明天晚上，他要越过封锁线。去之前他要来这里的。”

她又闭上了眼睛。这些话语并未进入她的梦。一个淡紫色血液汩汩流动着的沉重的梦，一个我不能再做的梦。别再沉睡了，醒一醒，永远醒着吧。她睁开了双眼，嘴唇微微张开，她又在我身边了，我却不会把她留下来。必须用力钻入到她的心中，划破迷雾，使她听我讲话，求她听听：活着吧，回到我这儿来。来吧，昨天，这还是那么容易的事。你把手放在方向盘上，望着夜空，你说：“多美的夜呀!”一个非常美好而温和的夜晚。你笑了：“我要回来的。”我再也看不到她的微笑了。仿佛她的嘴唇变得更小了，她发现她的牙齿和鼻孔收得紧紧的。她活着的肉体俨

然像一具尸体。必须闭上眼睛，忘掉这死人的面容。明天，我不能，我只能看见这个面容了。我应该拦腰搂住你，手一直不松开：不要走，我爱你，和我在一起吧。在静默中，你听见这些话了吗？你还是走了。我要是大声把这些话喊出来有多好。我爱你。现在，我在讲话，而你却听不见了。你曾那么热情地听我讲话，而我，却一言不发。难道我们不能让生活倒回去吗？她在这儿，近在眼前，穿着浅色上衣显得那么年轻。像这个胜利的夏天的希望。她穿着红绿相间的格子布百褶裙，白衬衫，宽宽的红皮带系在腰间。刘海盖上了她的前额，光滑的头发垂落在脸的两边。当她突然出现在门口时，所有目光都转向了她。她看上去不像一个工人的妻子，然而当她在车间行走的时候，她的存在好像并不是不合适的。无疑这是由于在她的装束打扮上，从她的举止动作上，体现了她整个人的漫不经心。她走近我，带着一副生气的挑衅的神态，她突然递给我一个包裹。

“我给你带吃的来了。”

我接过包裹，一个用牛皮纸包着的大包裹，外边用小绳胡乱地捆着。

“你太好了。”

我用迟疑的目光望着她，她的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上，不自然地摇动着身体。我感到发窘，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回她的信。特别是因为收到了这些信而窘迫。

“唉？”她不耐烦地说，“你连这也不打开吗？”

她大概是想象我们两天没有吃东西吧，把小卖部都给拿空了，挑选了在她看来最实惠、漂亮的甜食：几大块香料蜜糖面包、几大长条巧克力、厚块的饼干。她又情不自禁地见缝插针，向里边放了一些软糖、一个糖渍香蕉、一块杏仁硬糕点。她微笑着用鼻子贪婪地嗅着这些食品。

“快把这些东西分给你的朋友们吧，你们肯定都饿了。”

我环顾车间四周，我的眼睛遇到了六双激动的目光。“谁想来点甜食？”我喊着。我顺手扔出去几块奶油方糕、几盒子椰枣、棕色的和金黄色的糖果。我自己则拿起一块香料面包大口咬了起来。

“你什么也不吃？”

“不吃，这一切都是为你们准备的。”她说。她忽闪着一双眼睛，望着我咀嚼的动作，仿佛她自己的嘴里也有香甜的嚼烂的食品的味道。我越加感到难为情了。她一个劲地盯着我的脸，连我眉毛的形状、我的头发的色调都留心地看。迄今为止，还不曾有人这样地注视着我。马德莱娜没有仔细看过我，她什么也不看的。事物在她周围错综复杂、朦胧可怕地存在着，她尽量不去发现它们。马塞尔有时会打量我一番的，但他仅仅限于用悲凉的公正审视我的相貌。而海伦的目光在探询着什么，在估价着什么，是在责问我。那么，谁自愿在这里，在我面前呢？我在静默中咬了一大口香料面包，然后说：“让你过去啦？”

她耸了耸肩膀说：“事实证明是让的。他们下达的命令是只许母亲和妇女过去……”

她挑战似的微笑了，说：“我讲我去看我的未婚夫。”

“贝尔耶在邻近的车间里。”我急急忙忙地说。

“我告诉他们的却是你的名字，”她说，“我想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没有赶我。”

当时我大概有些不愉快的神情。她问：“你觉得这事不合适？”

“有一点。命令是我下的。我不愿意自己有一丝一毫的特殊。”

她坐在一个小方凳上，腿交叉地放着。这双腿被晒成了褐色，显得很美。她脚穿皮凉鞋，衬上一双白色的短袜。

“那有什么？”她问。

“听着，如果你很愿意和我谈谈，那么就约一个时间。罢工不会持续太久。你不该在这儿待下去的。”

“噢！可是我是自远方来的呀。”她说，“不，我留下，这样，你就会被迫答复我了。”

我笑了。她的信是使我不快的，这是一个厌倦生活的小姑娘的信。但是，她本人实际大概比我的评价要好得多。在她的眼睛里、额头上、颧颊上分明有一种动物的野性，而在她的嘴上却颤抖着数不尽的甜言蜜语和誓言。我喜欢这张脸庞。我向我的同志们瞟了一眼，他们并未注意我们。一些人在一块大理石上玩牌，另一些躺在地上抽烟。鲍达尔在一只酒精灯上热他妻子用饭盒给他带来的饭，洛朗在写信，大家还以为是在老百姓家里一样。我们周围的这幅图景就是我们工作时间的写照。想不到这些过去常被集体任务压得很重的车间里，却看到了个人生活场景的展现。铅在锅里变硬了，火焰熄灭了，键盘上的标志已变成难以分辨的斑点，假如我们不认识字的话，铅字也变为不成形的东西了。只有我们存在着，对这些非人类的东西漠不关心，只顾忙乎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感到了自己的力量。我们不服从任何命令，我们不曾让别人对我们取而代之。罢工浪潮自发地产生了，没有党派的压力，没有政治目的，是发自劳动人民心中的，出于他们的需要和希望的。我心满意足。多少年来，为了达此目的，我耐心地斗争着。在这种神圣的团结中，每个人都在其他人身上汲取力量，使其意志更加坚定，而毫不侵犯个人的自由，完全对自身负责。

她的脚不耐烦地晃荡着，她的凉鞋尖轻轻触到了我的胳膊。

“你生气了？”

“生气？为什么呢？”

“你一句话也不说。”

“我在看。这些罢工是成功的。想到此时此刻，在全法国，

同样的场景正在成千上万的工厂和车间里出现。”

她的固执神情在刘海下越加显眼了，她的蓝色的眼睛变黑了。

“你为什么嘲笑我？”

“我嘲笑你？”

“我大老远走来，不是想听你谈罢工的事的。”

她的眼睛，大胆地扫视着我的面颊，搜索着脸上、额头上的每一条皱纹。她对自己显得过于温柔而感到局促不安了，她笨拙地用舌头舔着双唇。

“你为什么不给我回信？”

“我回了。”

“只回过一次。四行字。”

“没有什么说的。”

她望着我，仿佛要打我一顿的样子，说：

“当你碰到一个人，要是再见到他会对你有好处，这有什么不好呢？”

“而拒绝再见不会对你有好处的人就不好啦？”

我已决定要使她灰心，我没时间和她闲扯。然而她严肃而愤怒的面孔是那样富有魅力，她的脸颊因激动而涨红了。

“是的，很明显，我自己怎么样对你是无所谓的。”

“这肯定对我无所谓，因为我不了解你。”

“现在，你了解我吗？”她向我报以动人的微笑。

“听我说，”我说，“我很了解你，你的年龄正是厌倦一切的时候，不论什么对你有益的娱乐都不起作用。而我却不同，我有很多事要做，我绝对没有时间照顾你。”

“时间嘛，”她的脚不耐烦地晃动着，“假如愿意的话，时间总会找得到的。”

“可以说我没有这种愿望。”我说。

她一动不动，仿佛为了听进这些话语。她低下了头说："难道我对你不好吗?"

她态度那么恳切，使我为难了。在这种残酷无情的答复面前，她表现出的一种勇敢精神使人肃然起敬。你身上这种诚挚的轻率劲，是最使我感动的。

"你很好。可是你知道，你对我所能为你做的事幻想过多，我没有什么可以教给你的，除非你对工会发生兴趣。"

她耸了耸肩说："假如你对我一点帮助也没有的话，我自己也会看得出来。"

要摆脱她执拗地步步进逼实在很难。

"我们还是不谈这些吧。如果我要走访所有我认为很好的人，我的一生都不会够的。"

"你认识那么多?你运气不错。"她出了一口长气，说，"我嘛，我一个也不认识。"

"首先，你有贝尔耶……"

她的眼睛里又闪烁起黑色的光焰。

"原来是因为保尔啊。你放心吧，我丝毫没有想和你谈恋爱的意思。"

"我绝对没想到这儿。"我说。

我并不那么放心，我总觉得她含情脉脉，爱她的未婚夫对她来说已明显地感到乏味了。

"只不过是，"她继续说，"保尔和我，多少年来，我们受到同样的煎熬。我想听到另一种钟声。"

"你喜欢读书。一本好书，要想使你从这种精神状态下解放出来，没有比这再好的了。"

她生气地耸耸肩膀。"我当然读书。但这不一样。"她用脚后跟踢了一下方凳的腿，"很清楚，你不知道一个人从早到晚孤独地待在一个地方是什么滋味。"

“这肯定会改变的，”我说，“我对于你是确信无疑的。”我迈了一步，以便离她远点，“请你原谅我，我还有事情去干呢。”

“有工作？你们在罢工啊。”

“我正在写一篇关于罢工的文章。”

“让我看看。”

“还没写完呢，再说你也不感兴趣。”

“给我讲讲，”她说，“你不是共产党员？”

“不是。”

“什么区别？”

“共产党人把人看成是棋盘上的卒子，问题是要赢，卒子本身并不重要。”

她傲慢地环顾四周。

“那么，你认为他们是那么重要吗？在政治方面，这是唯一有意思的事情，即感觉到他的手中有团乱麻，并从中理出头绪来。”

“你并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我说。

这是一个事故。你不应因此就离开党。你应献身于党，我的孩子。我们将为他报仇。两个拳头，一个脑袋这是微不足道的；但还有那么多头，那么多拳头。夜里我敲门了，马塞尔开了门，他的唯一的弟弟死了。让他们杀死我吧，把我埋在地下。危险啊，像马路拐弯处的树木，像这支子弹上了膛的手枪，像战争，像瘟疫。把我藏起来吧，使我泯灭吧。我活着，但起码我不再行动了。决不再行动了。

“当你组织这些罢工时，你不是拉线的吗？”

“这些罢工是在没有我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的。”我说。

在离开党后的两年内，我都处在一种麻木迟钝的状态。然

后，渐渐地我开始负责起了工会生活。这工作对我来说是合法的，因为它没有任何政治工作的味道，它仍属于人的范畴。我不替别人选择什么，我不去做任何决定，每个工会成员在集体的愿望中看到他自己的愿望。对于我所在的团体，我不操纵任何行动。我仅仅是充当使它得以维持存在的工具而已。在我身上，形形色色的愿望被整理成统一的思想，各式各样的希望，变成一个明确的整体，他们借我的嗓音爽朗地传达他们的意志，如此而已。由于我，在这些生活中绝不会出现出人意料和独断专行的事，没有什么不是出自生活本身的东西。但我不想把这一切都讲给海伦听。我向她伸出手说：

“再见。放聪明点，走开吧！”

“我要是不想走呢?”

“我不能强迫你。”

我立即坐在大理石前，我在大理石桌上摊开了我的纸张。她犹豫了一下后，走向我说：

“那就再见吧。”她的声音中充满了忧伤。

“再见。”

我很好地保护了自己，我对自己一尘不染的慎重态度感到自豪。这又是一次盲目的举动。我有意识地拒绝你，我要拒绝你。难道不是我，我的这声音、这容貌、这过去的一切吸引了你吗?我的拒绝本身却给了我一种新的吸引力。“对此，我没予理睬。”马德莱娜耸了耸肩膀。她说得对，我是有责任的，对我眼睛的温柔和冷酷负责。我在这里，在你面前。正因为我在这里，你才遇见了我，没有什么原因，也不是有意的。从此以后，你是接近还是远离，你可以自己作出选择。但是你不能阻止我存在于你的面前。一种荒谬的束缚加在你的存在上，这就是我本人。对于我的生活，我决定怎么样就怎么样，我相信是这样。我感到自由和不受谴责。对他人，我永远会是这样惹人注目的，但我不知道。我

认为说一声“不”就行了。不，我不能再见到你了。不，我不会把我的同志们拖向政治斗争。不，我们不要求介入。

“他们对你提出反对意见这是确实的，”马塞尔说，“不搞政治，这仍然是一种政治。”

“你可以谈谈，”德妮兹说，“你连表决都没参加。”

在宽阔而空荡的车间里，她在给人倒茶。为了预防查封，我们在前一天夜里偷偷地把贵重家具搬走，还有壁毯，以及马塞尔留有的罕见的画布。

“这像表决一样地荒谬。”马塞尔说。他笑了，“这只不过是少麻烦点就是了。”

“依我看，这种反对意见只是一种诡辩罢了。”我说，“必须向我证明政治是首位，人是一种政治动物，并且证明不管他怎么想，他的态度是带政治性的。我否认这一点。政治，这是关于外人行动的艺术。有朝一日全人类主动组织起来，就不需要政治了。”

“你说得好，”马塞尔说，“这是你准备一会儿以后作的讲演，你先在我们身上试试对不对？”

我同他开玩笑的本领任何人都望尘莫及，我认为是这样。宣称超脱普遍的荒诞，这本身就是绝顶的荒诞，这是任何人都办不到的。德妮兹陷入圈套时的自信，远不如我为避免上圈套时而作的努力滑稽可笑。对于他，他陷入人间圈套却无动于衷，那又是另一码事了。

我不记仇地向他微笑着。八年来，我从未感到像现在这样幸福。在七月十四日的红色工潮中，我庆祝自己的胜利：我的生活的胜利，我的思想的胜利。

“你不想到巴士底广场转一圈吗？”

“这天气去？”他的眼睛望着那湛蓝的天空说，“不，我要睡会儿觉。”

几乎只有夜里他才活跃起来，白天他要睡多半天觉。

“你呢？”我对德妮兹说，“你去吗？”

她带着悒郁的神情望着马塞尔刚刚走出去的房门：“我不大想去。”她把头转向我说，“我们本来是可以很幸福的。”

“你改变不了马塞尔，”我说，“他是怎么样，就让他怎么样吧。”

“我作了努力，”她说，“但他是改不了了，他故意……”

她抑制住自己讲话的声音，她的眼泪像就要流下来了。

“我相信他正在钻牛角尖，一时想不开。”

多年来马塞尔不画这样的形象了：为了活下去，用奇异的目光，祈求施舍。他的的确确想严肃地创作。他用胶泥做模型搞雕刻，甚至搞大理石雕刻。他满意地抚摸着那坚硬的材料，他用自己的手塑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形象：它孤零零地站着，人们可以围着它转，它似乎丝毫不想要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然而，他很快带着阴沉的神情看着他的作品了。大理石存在着，那光秃秃的沉重的石头。“脸部，脸在哪儿呢？”马塞尔气愤地说。他的两个手指指向我说：“在你的眼睛里，不在别处。”一天早上，他把作品装在一个手推车上，他自己驾着辕，把车一直拖到贝尔西的仓库——他把它们倒到塞纳河里。德妮兹为此哭了好几天。

“和他在一起，只要放弃做一件事，”她说，“就会发现必须还要马上放弃另外的事。这要到何时才算完呢？”

她的脸在油光闪亮的头发下，显得很憔悴。她的眼睛里流露出疑惑的光。她身着一条讲究的长裙，但两肘处已磨旧，她腰上系的皮带是很便宜的。

“你自己要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不要做马塞尔的附属品。”我说。

“你让我怎么办呢？我哪方面的才华也没有。”

“不是非有才华才行。”

她用怀疑的目光望着我，她是喜欢肯定的回答的。

“我厌恶平庸，”她指着用贝壳和堆放在一起的卵石构成的假山说，“马塞尔全力以赴搞这些东西，他编绳编草，搞门窗缝隙防风衬垫，用铁块制作镶嵌图案。这些东西给他以乐趣，即使在思想上他也不能把它们深奥的含义和它们有血有肉的存在分离开来。”

“马塞尔并不认为这是美的。”我说。

她耸了耸肩膀，说：“一个碌碌无为的人。这就是目前他正在走的道路。”

为了成功和荣誉，去感受这么刻骨铭心的遗憾是不值得的，对此我很难向她解释清楚。“那么，什么是至关重要的呢？”她说。我不能替她回答这个问题。我知道什么东西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但在任何天堂里我们都不曾遇到过这绝对的、肯定的尺度，然而这却是德妮兹想要一语道破的。

“对他要有信心。”我说。

“难道我还不够耐心吗？”她说。

我望着她，颇有一点怜悯之情。她有着很多优点，对于贫困，她毫无怨言地接受了；她从未责备过马塞尔，反而准备理解她称之为“他的复杂性”的东西；她正直、聪明、又大胆泼辣。但是一种说不出的俗气却使这些品德黯然失色了。

我碰了碰她的胳膊说：“你不应在这儿待下去，跟我来。”

“我怕这样太累了。”

她勉强冲我笑笑，她怕自己有失检点。我并不坚持，我心中也不能对她产生真正的好感，有时我为此而责备自己。

“别在意，”马德莱娜对我说，“这一切都是资产者的不幸，奢华的不幸。”

马德莱娜不懂得人家可以怨天尤人，也不懂得对自己的命运心满意足，更不懂得无所畏惧和无所希望。

“他们在想象些什么?”她指着人行道上流动的黑色和红色人流说。

她在我的身边蹒跚着，她的鞋穿起来总是不舒服，因为她是随便在一次交易会或在替别人办事时偶然买到的。

“他们在想明天比今天更好。”我说。

我也这样想。经过开始时没有经验的犹豫之后，那么多的约言正在出现着!

“呸，不管他们做什么，生命是永远不值钱的。”

我没回答，我从来不想和马德莱娜争论。你的论据说服力越强，她就越是怀疑这些论断的可靠和真实。此外，她的生命确实并不宝贵，因为她自己都把它看成那么低廉。她的身体也不是无价之宝，因为谁想要它，她都会毫不在乎地给他。她的时间也并不宝贵，她总是睡大觉或抽烟，整天睡眼惺忪。如果她认为自己的思想同样不宝贵的话，她是不乏聪明才智的。然而她很少就此止步。她的欢乐，情趣，她的烦恼，甚至她的感情，在她眼里都算不了什么，谁也不能使她把这些东西看得重要些。除她之外，任何人都不能为她的存在的重要性作些什么。但是对于这些边唱边游行的人们，作为一个人，这是重要的事业。明天，生命将会有意义，希望的力量已经使它具有一种意义。

“你跟我来呢，还是在一个酒吧间等我?”

“你还想谈谈吗?”她说。

“是的，我答应同志们作一次报告。”

戈蒂埃站在广场中央的高台上作着讲演。在他周围该有一个肃静的地带的，但是我们离得太远，他的讲话消失在人海的声浪之中。

“他讲什么呢?”马德莱娜说。

“我不知道。”

“你呢，你要讲什么?”

"来，你会知道的。"

"不，我在这儿等你。"她说。

她靠在一棵树上，脱了鞋，发现袜子上有几个洞，并且有几个粉红的污点。为了防止袜子洞抽丝，她把指甲油涂在上面。

"这会很长啊。"我说。

"我对我无所谓。"

一群孩子在我们面前走过，他们脖子上系着红色头巾，头上戴着无边软帽。然后有一群妇女三音节一组有节奏地叫喊着："枪毙拉罗克①！"我们的头上旗帜飘扬，三色旗、红色军旗交织在一起。露天舞台在巴黎的各十字路口搭起来。树木之间飘荡着各种花饰，上边写着一九三六年。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四日。我们昂首挺胸地前进。当然，还没有取得全胜，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我们第一次把党的各部分以外的一切有希望的力量全部联合了起来。难道不是昨天这样做的吗？他穿过人群。他想高声呼喊，以表达他的欢乐心情：这是他的欢乐，他们的欢乐。

"同志们。"他讲话了，他讲出的话语全是他自己发明的，而他们并不是用耳朵听，而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听。他为自己讲话，他们为他欢呼，因为他是为他们讲话的。他讲了刚刚在法国露出头角的无限美好的愿望，它将要在世界上发扬光大。他向他们保证，他们能够把他们的和平法则使全球接受。因为这一天，尤其对于我们工会的同志们来说，是胜利的一天。我们所取得的成绩仅仅是开始。然而使我们为之自豪、使我们满怀希望的，是因为我们通过纯粹职工罢工而取得了成绩。他讲下去，他的语言既不是祈求，更不是命令，而是一支歌，一支节日的歌。他是大家进行大合唱的领唱。仿佛我们每人并不在地球上占有一个位置，仿佛每个人对于他人都不曾成为一种障碍。人人只是为了自

---

① 拉罗克（François La Rocque 1885—1946），法国社会党创建人。

己，存在于其他人身旁，永远离不开他们：一个他人。他们歌唱自由的魔力、团结的力量和作为一个人而存在的至高无上的光荣。战争，暴力，专横，很快就成为不可能了。政治本身也将会变成无用的，因为人与人之间将不再有差别，一个唯一的人类。这就是他们对未来最大的希望：在自由地认识自己的自由中，达到全人类的和解。

“把你的稿子递给我，”戈蒂埃说，“我想把你的讲演发表在《工会生活》上。”

“你谈得太好了。”洛朗说。

布劳马把手放在他的肩上：

“这是车间的一个工友。”

“你讲得也很好，”洛朗对戈蒂埃说，“你经常在《工会生活》上撰稿吧？”

“他是这个刊物的领导。”布劳马说。

他笑了，他很幸福。旗帜在迎风飘扬，群众在歌唱。车间工友们，工会的同志们，沉默的人，讲话的人，在运动中起重要作用的人和不值一谈的人，大家都拍着他的肩膀，互相拍着肩膀，他们互相紧紧地握着手：我们的节日。我们的胜利。他想起了在他童年时代的地铁里，有着另外一些人群，以及长久以来存在的悔恨的气味。这一切已经告终了。他毫不悔恨地呼吸着油墨和尘土的气味、汗的气味、劳动的气味；他毫不悔恨地沿着光秃秃的墙壁走着，他望着煤气表和工厂的烟囱，因为在疲劳和灰色的地平线之外，这些人能够肯定他们的愿望，而他们的生命是一种萎靡不振的草木，他们自己选择命运，他怀着与他们相通的骄傲，想：“我是他们中的一员。”

“我让你久等了，你没有太厌烦吧？”

“没有。”马德莱娜说，“我看到那边使你激动的场面。”她靠着树站着。我拉住她的手。正在这时，你出现在我的面前，你挽

着保尔的手。一条鲜红的饰带在你雪白的紧身衣衫上飘荡，你的面颊因兴奋而闪烁着光芒。

“到处找你。”保尔说。

你生气地瞪了他一眼，然后你看着马德莱娜不利索地将脚伸进鞋子里。我把他们介绍了一下。

“我们听了你的讲演。”保尔用一种可笑的声调说。

“噢，你们也在那儿?”

“是的，”他耸了耸肩膀，“仿佛法国可以把它的命运和世界命运分开一样!”

我想回击他，但你不耐烦的制止了我，把话岔开说：

“我们不能整整站一小时的。”

“站着是累。”马德莱娜说。

你用高傲的态度打量了她一眼说：

“嗯，我不累。”

我们被黑色人流簇拥着前进，这人流在悬挂彩旗的幢幢房子之间无规则地流动着。地上洒满了纸张、旗子、饰带、传单等等。我们坐在十字路口旁的一家普通舞厅里，服务员在我们的桌上端来三瓶啤酒和一瓶大榴果汁。海伦非常喜欢这些五颜六色的饮料。

“这些正在歌唱的笨货们，”保尔说，“他们想象着在欧洲搭一个安乐窝。从南部的比利牛斯山区到北部的马奇诺防线，人人都把自己关在家里，并且门上上锁。正在这个时候，法西斯主义逼近了我们的大门。然而他们很清楚不能停留在一个国家的计划上。”

“当然，”我说，“还是应先考虑在这个计划上赢一盘。”

片刻沉默。马德莱娜微笑着倾听手风琴发出的悦耳音乐。海伦的两腿前后交替地晃动着，像一个不专心的小学生。我不想再争论下去了。我深知法国在世界上不是唯一的一个。我也如此，

也不是孤零零的。但是我成功地在我周围重新组织了一种没有妥协、没有特权的生活，既不欠别人什么，也不对他人构成一种不幸的根源。我向马德莱娜微笑了。她的脸上露出一种安详而幸福的神情。我并没有给予她多少，这是无疑的。然而她对我要求的不多，她知道应该做什么。她生活中没有主意，只能随波逐流，她存在的最美好时刻则是和我在一起。我只感到对我自己的责任，这是我在和平中承担的一种责任：我是我想成为的人，我的生活和我设计的审慎的蓝图是分不开的。然而你呢，你在小铁桌子上，端详这张我尚未作出先择的面孔。

“你真的不会跳舞吗？”

“我会，但我怕是忘记了。”

“你应该试一试。”马德莱娜说。

她既无敌意又无好感地望着海伦。为了不再考虑这些，我还是干脆点：

“我们试试吧。”我说。

我用手揽住了海伦的腰部，我忘得一干二净，只是随着她的动作而动作。她会使两人跳得谐调。

“和你一起的这个人是谁？”她问。

“是我的一个女朋友。”

“她关心你工会的那些事情？”

“当然不，她起码像你一样对此感到厌烦。”

“她做什么工作？”

“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不做？”她望着我，带有责问的神情，“你为什么和她一起出来？”

“因为我很爱她。”

“她呢？”

“她也很爱我。”我冷淡地回答。

一阵沉默。

“刚才看到你站在讲坛上感到很好笑。”她说。

我笑了。

“我大概使你不快吧！”

她严肃地望着我：“不，我尽量理解这一切。你的关于自由的言论，使我很感兴趣。”

“谁知道呢？”我说，“这大概算开了一个头吧。你还很可能对社会问题更感兴趣呢。”

“我感到奇怪，”她环顾了一下四周说，“很明显，当我们在群众队伍中时，就感到浑身是劲儿，大家唱歌，一起走路，和其他人在一起。但是当停止了这一切，就像喝醉了酒一样地恶心。”

“当然，”我说，“但是一项政治工作或工会工作，和这些游行示威是毫不相干的。”

她思索了一下说：“你的讲演中使我最喜欢的地方是你仿佛想到，人们是一个一个地存在的，每个人都为自己存在，而不仅仅是集体存在。”

“群众是由一个一个存在的众人组成，不是数量多少的问题。”

“哟，你真这么想吗？”她说。她的脸容光焕发起来。“保尔总把人看成是蚁穴里的一只蚂蚁。因此，人的所作所为，所感到的一切是那么微不足道！活着确实没有必要。”

她跳着舞，头微微向后仰着，她的金黄色长发，在她清秀的脸上飘来飘去，在太阳下闪闪发光，她那白色紧身衫也发出光泽。但是比她的头发、她细嫩的皮肤、她的蓝色眼睛更使她富有光彩的，是她对生活的热情向往，这使她走向未来。她的目光停留在我的前额上，停留在天上。它搜寻着地平线，仿佛要它作出一切允诺；她的腿速度均衡地抖动着。世界在你面前，是那么广阔无垠，宛如一个美味的捕获物。不再有未来了，世界变得模糊

起来。你双眼紧闭着，无数的影像在你嗡嗡作响的头脑中旋转着，像你心脏里循环流动的血液。即使在你抬起眼皮的时候，事物存在在那里，显而易见、然而却毫无生气，像在梦幻之中，而这一切不再和你自己区分得开。世界失去了它的厚度，它被你吞下去了。它渐渐变小，直到变成这即将熄灭的苍白无力的微弱之光。未来向着停止的时间收缩，很快就只剩一个和她相重合的现在了。不再有时间，不再有世界，不再有一个人存在。你在跳舞，和我贴得紧紧的，在我们之间结成了把我系在你的垂危状态上的纽带。我已经不由自主地进入了你的生活，因此，有一天我情不自禁地单独待在死亡的大门口。

音乐戛然而止。海伦扫兴地向饰有花环的舞台瞥了一眼："真倒霉，我多么想继续聊下去！"

"过一会儿会跳另一种舞的。"

她恼怒地耸了耸肩膀说：

"要是老停就没有意思了。"

她的声音中带有一种专横的请求，我装做没听见。我们回到自己的位置上。马德莱娜和贝尔耶谈话，她和他很谈得来，她向他微笑着。我很喜欢她那种心里不赞成脸上却带着的微笑。她的脸自然舒心地笑起来时还颇有魅力。尽管她不露声色，但她那慢条斯理的举止，她娇嫩的体态以及她迷离的目光却有着一种吸引人的东西。

海伦用一根空心管吸着她杯子边上的玫瑰色水滴。"我还想再喝一杯。"她说。然后，她带着放肆而又厌倦的神情晃起她的腿来。

"已经决定四个人一起去吃饭，"马德莱娜说，"这对你合适吗？"

"当然，我可以的。我们去哪儿？"

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回答的问题。马德莱娜对气氛很敏感。

在有些地方，她感到自己像一只被追捕的野兽一样走投无路；在有些地方，对她则显得宽厚大度，在这里她会暂时忘掉世界使她产生的恐怖。我们开始讨论了。海伦一言不发，带有一种矫揉造作的样子。又给她端上了一杯果汁汽水，她用一根空心管吸着，在玫瑰色液体中吹起无数气泡。蓦地，她站起身说："你答应还要跟我跳一次舞的。"

我彬彬有礼地站了起来，我们默默地跳了一会。突然，她小声地呻吟起来："哎，我头疼死了！"

我停了下来："你想坐一会儿吗？"

"如果你懂事的话，就去给我找点止疼片来。"

"我马上去。"

我跑着走了。我去的第一家药店已经停止营业，我不得不一直往市政厅方向走。帮海伦干点事，我是很高兴的。假如我没有感到我的一举一动都可以把她置于危险境地的话，我是希望为她做点事的。

我把三包止痛剂放在桌子上。海伦独自一人坐在那里，面前放着四个空杯子。

"他们哪儿去了？"

"他们先去占一张桌子。他们说如果不赶快去，位置就哪儿也找不到了。"

"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了？"

"在德茂利啤酒店，在布劳卡大街。"

"那么远！"我说，"那好吧，我们去找他们。你怎么不吃药？"

她犹豫地说："我不那么疼了。我愿意再等一会儿。"

我们高高兴兴地在街道上穿行。天已经不那么热了，太阳的光线变柔和了。这种出乎意料的两人单独在一起，是不使我厌烦的，而是恰恰相反。我尽量回答她的问题。她向我提出一连串的

问题，好像她把我当成上帝圣父了。

“总起来说，”她对我说，“人们为什么活着？”

我们走进德茂利家，我一直走到大厅的尽头。马德莱娜不在那儿，保尔也不在。

“你肯定大家约好到这儿来吗？”

“肯定。”海伦说。

“你的样子可并不那么肯定。”

“我敢肯定。”她说完，向一张桌子走去。“只有坐下等待了。”

“好的，”我说，“他们肯定不久就会来的。”海伦一只手撑着下巴，说：“给我讲讲，人活着是为什么？”

“我可不是一本福音书。”我说，“我，我不知道。”

“肯定有些东西是你所喜欢的，有些是你所向往的……”

她笑了。

“我喜欢巧克力和漂亮的自行车。”

“这总比没有爱好强。”

她又看起她的手指来，她的脸色突然阴沉下来。

“小时候，我信仰上帝，那是多么美啊！每时每刻我对自己都有某种要求，于是我觉得我应该存在。必须这样做。”

我带有好意地向她微笑了，说：

“我认为你的错误在于你想象着你生活的道理该从天上现成地掉下来：实际上这要由我们来创造！”

“但是，如果人们知道这是自己创造的，人们就不会相信了。这只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方式而已。”

“怎么？人们并不是像这样凭空创造。人们是通过爱情的力量、愿望的力量创造的。那么人们所创造的道理便实实在在的、牢固的在你面前出现了。”

我边讲边望着厅门。我有点不安了。我感到刚才发生的一切

有点蹊跷。他们为什么连十分钟都不等呢？马德莱娜是绝不会发这样的神经的。

“真奇怪，他们还没有来，”我说，“我想你是否把一切都搞乱了。”

“没有，”她有些不耐烦地说，“他们大概先去转一圈然后再来，就是这样。”她又盯着我的双眼说，“怎么从自我身上汲取生存的正确道理呢？因为人是会死的。”

“这不会改变什么的。”

“我，我认为这会改变一切，”她说，并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我，“当你想到有一天你已不再存在了，甚至连一个人也不会想到你，这对你也无所谓吗？”

“假如我是按自己的意愿活的，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一种生活，为了使它过得有意义，就应使它像阶梯一样步步高升。上了一个台阶，又一个台阶，然后又一个台阶，而每一个台阶都是为下一个台阶而筑成的。”她耸了耸双肩，“而一旦到达顶端，一切就都塌陷下去……那么，这楼梯的台阶从一开始就是荒诞的。难道你不认为是这样吗？”

“我不这样看。”我漫不经心地说。我已经对谈话心不在焉了，我感到自己确实忧虑起来。

“听着，”我说，“我要乘一辆汽车，到我们谈起的那些餐馆转转，你待在这儿。如果他们来了，你告诉他们我一刻钟后就来。”

她用一种狡黠的神态望着我：

“我们不管他们吧。”

“我敢肯定是你搞错了。他们正在别处等我们。”

“那就让他们等吧。”她有点火气地说。

我站了起来说：“你是不加思索的。”

“我好好思索过了。”

“嗯，我是没有。”

“好，”她得意洋洋地瞥了我一眼，“总而言之，没有必要去找他们，你是找不到他们的。”

“为什么？”

她用舌头舔着双唇说：“我已把他们支到巴黎的另一端去了。”

我不解其意地望着她。

“我说你又有一个突如其来的约会，说他们应早点去饭馆占位子，并说我们随后赶去。”

“哪个餐馆？”

她狡黠地望了望四周说：“另一个。”

我很不愉快。很多人都很无礼地对待马德莱娜。因此，我更想到不能亏待她。

“你为什么来这一套呢？”

“我想和你谈谈。”

“好了，现在我们已谈过了。告诉我他们等我们的地方，快走。”

她摇了摇头：

“我不对你讲。”

“这太荒谬了！”我说，“你该想到你不能强迫我和你谈话！”

她紧闭嘴唇不作回答。我站了起来，说：“如果你拒绝告诉我，我马上回家去。”

她的脸严肃起来，说：

“回你家去吧。”

“本来该是一个多么有趣的夜晚，全被你耽误了！”

“那我们就谈谈吧，”她生气地耸了耸双肩，“刚才的事就已经够腻烦人的了。”

“而你为了自己不腻烦，竟毫不犹豫地让三个人腻烦？你简

直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小人!”

她涨红了脸说:

“让你腻烦一点我感到高兴。你对我这么残酷无情。”

“我并不是残酷无情,我不想和你搅在一起。”

我推开啤酒店的大门,大步向公共汽车站走去。她在我身旁小跑着。

“是由于那个丑陋的贱女人吗?”

她嫉妒得有点窒息了,她那大言不惭的劲头真使我心里发笑。我从未见过对女性的把戏如此一窍不通的女人。

“马德莱娜与此是毫不相干的。”

这是真的。我们之间并没有过任何海誓山盟。在某些时候,我们天天见面,然后马德莱娜就几个星期不露面。她天真地把她感情上的挫折向我吐露。假如我有着一番不凡的经历,假如我爱上一个女人,我都会毫不难堪地告诉她。

“我不要你跟着我。”我说。我加大了步伐。把经过讲给马德莱娜听是再简单不过的了。一些小事情是容易使她感情受到伤害的。但是要是注意到不去触怒她,她是什么事情都好办的。

我走到戈普兰广场。咖啡馆里挤满了人群,一直延伸到马路上。此刻,已是万家灯火,日本灯笼在树下摇晃着。我听到身后一个气喘吁吁的声音:“等等我。”

我回过头来。你来到我的身边,你望着我。你那样神秘地目不转睛地瞅着我,你的眼睛使我感到愉快,我简直不知道你看见的是谁。你恢复了正常呼吸,说:“我对你讲他们在哪儿,我把他们打发到拯救港饭店去了。”

“这并不远,”我说,“快点走,我们到得不会太晚的。”

“我不想去。”

你向我伸出了手,羞愧地低下了头,说:“再见,请你原谅。”我顿时感到自己的臂膀里有一股把你拉向我的巨大冲动:

把你紧紧地搂在怀里，贴在心上。我的双臂中一个很简单的动作：或者搂住，或者松开，一个显而易见的动作，和动作本身一样的明显。但是我让自己的双臂紧紧地贴在我的身上。一个举动，雅克已死了，一个举动，而新的东西出现在世界上，是一种我所创造的东西，它在我之外，在没有我的情况下发展壮大，在它之后带来了难以预料的“雪崩”。“他把我搂在怀里了。”在你的眼睛里，我已感到了我的面颊不由自主地发烧。我给你的过去留下的朦胧的事件如今在你心中起了什么变化呢？我曾无动于衷地握住了你的手，我让你孤独一人走在节日的大街上。你哭了，但我不知道。我从另一边走了，我也认为自己依然是孤独的，心头上笼罩着一种朦胧的内疚。好像所有这些我不曾给你的、没有把我们彼此联系起来的吻和最热情的拥抱同样确实，和我不再给你的吻，我不再对你讲的这些永远把我和你——我唯一的爱——联系起来的话语同样确实。

四

海伦舒展了一下身子。她曾在壁炉前缩成一团，燃烧的火焰炙烤着她的脸。伊冯娜在缝纫，她垂着眼睑，机针有节奏地插入覆盆子绸。天色阴沉，灰蒙蒙的。“好了，就会来的，来了。”海伦想。她手里一把金黄色的果皮，果皮从她手指缝里漏下来。

“我不喜欢星期天，”她说。

“我很喜欢，”伊冯娜说。

星期天，星期一……没有什么大区别。星期天，她在家里，但她仍是做缝纫。她是永远不会停止做缝纫的。灰烬之中，响起轻轻的火炭的毕剥声。

“你还记得吗？”伊冯娜说，“我们第一次炒栗子时，那简直

是一种爆炸声啊!”

“是的,”海伦说,“那时我们玩得多好啊!”她遗憾地补充说。她把火钳伸进红色的炭火中,说,“我想它们熟了。”

有声音从隔壁的房间传来:“伊冯娜。”

“就来。”伊冯娜说。

她放下手中的活计,向海伦作了个鬼脸,走出去了。海伦剥了一个栗子,把它整个放进嘴里。她的手指散发出一种火炭的气味,橘子的气味,烟草的气味。多好闻啊!她用牙嚼着栗子,发出一种声音。栗子很热。“这一切都存在。”她说。但是这不是确实的,她周围只有空虚。“好了,又来了。我是多么憎恶痛苦啊!”她说,然后闭上了双眼。在附近的房子里,无线电里唱道:“石子铺在路上,路上洒满忧伤。”海伦不想再争了,因为这是徒劳的。整整一年了。我和他见面的日子,是屈指可数的。可现在,他孤独一人存在着。

“你不知道她想干什么吗?”伊冯娜问。她笑着说,“她想让我替她擦擦鼻子。她决定把胳膊从床单下抽出来,这使她焦虑不安。”

海伦一直把脸转向炉火,为了使伊冯娜看不见她眼睛里闪动的泪花。

“你不该向她让步。”

“哎,这是她唯一的乐趣呀。”

“这乐趣是折磨你!因为她的病并不比你我更重。”

“她起码不该老那么捧腹大笑。”

伊冯娜又做起活来。海伦把一把栗子放在自己双膝上。

“它们真是美极了,”伊冯娜说,“那么脆,火候又正合适。正因为如此,我喜欢它们。”她瞥了海伦一眼,“你不大会享受这现成的小小快乐的。”她以一种深明事理的口吻说。

“白痴!”海伦说。

伊冯娜肯定产生过猜疑，但她从不发问。她会观察、理解、沉默。跟她在一起总有一种安全感。

“我相信你今夜还会不合眼的。”海伦抱怨地说。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是吗？”伊冯娜说。她把连衣裙鲜红的胸弄得鼓鼓的。“一件女傧相的裙子，鼓得多好。放在那儿，就像结婚礼服一样。遗憾的是新娘的胃长在肚脐底下。”

“在肚脐底下？”

“她身材瘦小得很，没有线条。于是她在大腿和肚子四周缠上了橡胶带子。”

“那么新郎会大吃一惊的。”海伦说。

伊冯娜笑了起来：“你知道有多少女人就是这样使人惊讶不已的呀。当人家给你一件跳舞裙子时，总是把前胸做得很丰满的。”

银针在褶边上进进出出，速度之快使人产生一种幻觉。“不会，不会，他永远不会爱我了。”

“你知道，”伊冯娜说，“不是赶你，如果你六点钟愿去保尔家的话……”

“几点了？”海伦问。

“六点整。”

海伦打了个哈欠：“我要慢慢走去。”

保尔，我的生命，我真正的生命。我不再有生命了，只有这个虚无。几天了，在几天前，我不想见他。而他没有想到他见不到我了。他没有想过他不爱我。在他的周围，一切是那么充实。我不是为他而存在。我根本就不存在。

“可怜的保尔。”伊冯娜说。她专心地把线穿进针眼里。

“为什么叫可怜的保尔呢？”海伦说着，站了起来。“他身体很棒。”她穿上大衣，伏下身子，在伊冯娜的黑发上吻了一下。

“明天见。我六点在比亚尔。”

“明天见，晚安。”伊冯娜说。

晚安，我应感到羞愧。整整一晚上和这件鲜艳的玫瑰色衣服在一起，听着隔壁疯女人的哼哼唧唧。海伦加大了步伐。真怪。伊冯娜整天搞的就是什么缝纫呀，削土豆皮呀，或照顾所谓的病人。然而，她的生活看起来却并不荒诞。想到伊冯娜存在着，像她的习惯那样，在她孤独的房间里忙着做活计。“如果说我的生活是荒诞的，难道是我的过失吗？”我的生活。大概只要信心十足地说一句“这是我的生活”也就够了。但是海伦再也不能这么说了，她不愿这样说。然而，我永远不会有另一种生活。永远不会，绝不会的。

“我迟到了一会儿。”海伦说。

“没关系。”保尔说，“咖啡还热呢。”他收拾了一下沙发，把它挪到炉子旁，“坐下吧。”

他倒了满满一杯，把它递给海伦。

“你煮的咖啡可真好喝啊！”海伦说，“你是一个善于治家的男人。”

“谁要嫁给我，准错不了！”

他坐在椅子的扶手上，她的头正好靠在他的腰上。搭在铁管子上的几块手帕晒干了，壶里发出水开的咕嘟声。

“可怜的保尔，”海伦温存地想着，“我应该对他更好一点，可怜的亲爱的保尔啊。”

“你会看到我为我们设计的一个漂亮住所。”保尔说，“我给你做一张宽阔的办公桌，用结实的好木料做，还有一个书架，放你的书。把你的水彩画挂在墙上，真是太好了。”

“你真好。”海伦说。

这只手伸进她的头发里，慢慢的，然而单调地抚摸着她的头，使她产生一种快感，她是很高兴的。

“我要买一顶帐篷，夏季的礼拜天，我们去野营。”

“你那么好。”海伦重复地说。

渐渐地，这些小康家庭的幸福图景一幕幕闪现在她的眼前：整洁的房间，牛在长满洋葱的地里咀嚼着，在影剧院里看戏，幕间休息吃着大雪糕，还有星期天晚上放在汽车行李架上的淡紫色和黄色的花束。今天是星期天，就要做星期天的计划。

“你好吗?”保尔说。他把海伦搂在怀里。

“很好。”她回答。

一个穿卷领毛衣的黑头像闪电般出现在她的脑海。“他在某个地方。此时此刻，他存在着，有血有肉地存在着。”这一影像随后消失了。一个无关紧要的梦幻。只有这一只肉乎乎的手轻轻地触到海伦的颈项。嘴唇在她的面颊、太阳穴、嘴角亲吻着，海伦如同堕入白茫茫、甜蜜蜜的雾海之中。她闭上眼睛。她沉醉于这将她渐渐变为植物的感受之中，毫无抵抗能力。现在她是一棵树，一棵高大的闪着银光的杨树，夏季的微风摇动着那毛茸茸的叶子。一张热辣辣的嘴贴在了她的嘴上，一只手抚摸着她的肩、她的乳房。那股热气在她周围变得浓重起来，她感到她的骨头和肌肉被溶化了。她的肉体变成了一块潮湿、海绵质的苔藓，对暗淡的生活感到麻木，像有成千上万只嗡嗡作响的小虫用甜蜜的螯针刺着她。保尔把她搂在怀里，把她平放在床上，躺在她的身边。他的手指在她肚子上像在织着一件炽热的紧身衣服。她使劲地呼吸着，勉强能透过气来。她在黑夜中沉浮着，不知所措。她半闭着眼睛，瘫在这灼热的丝网之中，仿佛她再也回不到世界的表面来了，她将永远被禁锢在那绵绵无限的黑暗之中，永远像一个躺在别致的荨麻床上的昏暗而又松弛的水母。她用两只手推开保尔，站了起来。

“放开我。”她说。

她看也不看他一眼，就跳下了床。她的脸颊发烧了。她走到镜子前，她的脸因充血而变红，头发乱蓬蓬的，衣服弄皱了。她

真讨厌她的这副模样。她从挎包里拿出一把梳子和粉盒。她的心还在怦怦地跳个不停。她感到她的身体上那些小虫子仍在攒动着。她惊跳起来。保尔走向她，用胳膊搂住了她的双肩。

“你为什么不愿意?”他说。

他用清晰的声音问着，用清澈的眼睛望着。她把头转过去了。

“我不知道。”

保尔和气地微笑了。

“你已经不是一个小姑娘了，还怕什么?”

“我不怕。”海伦说。

她挣开了他，梳起头来。

“不，你是害怕。”保尔又轻轻抓住她的肩膀，“女人第一次干这事，常常害怕，这很自然。我奇怪的是，你这样一个胆量大的人，竟也像其他人那样害怕。”

他困惑地望着海伦，她还在默不作声地梳理着头发。她这样地安详，这使他怎能和她讨论上边提出的问题呢？她很不好意思，他的言外之意仿佛要她在他面前脱得一丝不挂。

“我们的信任和友情，足以使你走得更远的。”保尔说。

“是的。”她说。

她不知要对他讲些什么，信任和友谊同这种在她身上已经留下了不安的回忆的鬼魅般的孤独又有何相干呢?

“嗯?”保尔说。

说话间，他又拥抱她了。在她沉默的当儿，他自然会想到他这样做是对的。她挺着身子。

“嗯，我不想。”她生硬地说。

保尔并没放手，一股热血涌上脸颊。

“这不会是真的。”他说。

海伦莞尔一笑：“听着，我大概知道。”

“我也知道。”保尔说。

海伦的脸变得通红。他的双耳可以听得出她心跳的次数，他的双眼和双手……

“你要马上伸直身子，”他继续说，“但你要是任性下去……”

“显而易见，当一个家伙乱摸我时，会对我产生影响。”海伦说，她气得结结巴巴了，“我可不是冰做的人，我甚至想和那些在电影院挑逗我的小流氓们去睡觉。”

“你为什么用这种语调说话呢？”保尔说。“我认为我们找一个时间谈谈这些问题为好。”

“可是没什么好谈的，”海伦说，她压低声音，“就算我是害怕吧。真蠢，我知道得很清楚，你就耐心点，一会儿就会过去的。”

“死顽固！”保尔说。

他吻着她的眼角，她紧闭嘴唇。她既不想打他一顿，也不想吻他的嘴，更不想哭。但是她需要使全身肌肉放松，以便消除她内心激荡的暴风雨。

“我们从这儿走出去吧。”她说。

“随你的便吧。”保尔说。

他乖乖地跟她来到了楼梯口。他又一次不理解地顺从了她，容让了她。她怀着瞬间变为忧伤的怨恨心情望着他。她自己也不理解自己。街上不凉也不热。行人在林荫道上无精打采地来来往往，仿佛他们的骨子里也像外边的天气：不冷也不热。海伦心里感到灰溜溜的，而且怅惘。如果她待在保尔的怀抱里，她会抵挡住这星期天乏味的潮湿。她为什么把他推开呢？她喉咙里涌出阵阵凄苦，胃的抽搐，口干舌燥，这一切都不是因为别的，而是一种欲望的表现。

“听着，”保尔说，“我向你提点建议：为什么我们不马上结婚呢？”

“我们结婚?”

“嗯，是的。”保尔说。

海伦惊讶得张口结舌。这种婚姻恰如那革命的前夜，是一种神话的境界。人们总是严肃地谈论它，但没有任何人真正相信它。

“那我们住在哪儿呢?”

“在我家。我会安排妥当的。你在你家一直待到春天是没有道理的。”他抓住海伦的胳膊，说：

“可怜的小要饭的，我知道你会神经质的，但总不能老这样。”

她怨愤地望着他。她真想向他大喊：别这么好心。她真想把他那红润的脸颊撕个粉碎，叫他不再荒唐地殷勤下去。真是蠢极了：他爱她，而她并不爱他；而她所爱的人并不爱她。

“这不会有多大变化的，”海伦说，“因为我不会在这种笼子里工作。只要还没有自己的房子，我还是不得不在圣雅克街过日子。”

“这会有很大变化的。”保尔说。

“我看不到你会有多大变化。”

“我们的关系就完全不同了。”

一股羞辱和愤怒的火焰涌上海伦的面颊：“他想的是我需要一个男人，过几个恩爱的夜晚，会把我稳住。”

“我对你说过，我不想要这种关系。”她挑战地说。

“哼!”保尔说，“你不打算作一辈子处女吧?”

“你以为在这个世界上我只能跟你睡吗?”

保尔责备地望着她：

“听我说，海伦，如果说我刚才太愚蠢，就原谅我吧，但是别不高兴。你很清楚，我所希望的一切是使你幸福。我们友好地谈谈吧。”

她不对，她不好，这她知道。但是她想把这清水搅浑。他不能十分肯定她爱他。难道这是他的错误？没有什么要紧的，既然她那么凶狠地想伤害他，他肯定是有错误的。

“从友好的角度说，”她说，“你为什么必须要我和你睡？”

“哎呀，行了。”保尔不耐烦地说。

她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要使他生气很难。但她有时候还是能成功的。

“我不开玩笑，”她说，“既然你愿意谈谈，那我们就认真地谈谈吧。为什么？”

“我想你是爱我的。”保尔嘲讽地说。

“你呢？”她说。

“我怎么？”

“你爱我吗？”

他耸了耸肩：“你要我怎么样呢？重提这些问题又有什么用呢？”

“噢，我知道，”她说，“我们在相爱，这已肯定了；已经爱了这么长时间了，也是肯定的！再探求它的含义是实在没意思的。”

“我觉得这很清楚。”保尔说。

“我还没这么觉得，”海伦说，她用挑衅的神情望着他，“如果我死了，你会自杀吗？”

“别小孩子脾气！”保尔说。

“你不会自杀的，如果要你在我和你的政治工作之间作出选择的话，你选哪一个？”海伦说。

“海伦，我对你说过五十遍了，我的工作就是我自己，我不能选择不成为我现在的样子。可是我这样一个人爱着你。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和你同甘共苦。”

“对于你的幸福来说我是有用的，”海伦说，“但对于活着来

说，我对你并不必要。”

“谁对谁必要呢？谁都得生活。”保尔说。

“都得生活。”海伦说。

对保尔来说，这是一种相当强烈的联系：他们共同的青春年少，他们在反对平庸方面的志同道合，他们准备结合在一起的躯体间的友谊。但是爱情却是另一码事，简直是一种不幸。

“你还不是一个幻想家，”保尔说，“怎么？你想在我们彼此见面时心跳不已并且互换一束头发吗？”

“取笑是容易的，”海伦说，“你呀，你以为两人合得来，彼此互不嫌弃，就是爱情。”

“你快说吧，”保尔说，“你想不再爱我了？”

他的声音里带着愠怒，海伦沉默不语，她突然感到缺乏勇气。

“我不知道。”她喃喃地说。

她惴惴不安地望着保尔。她要失去了他怎么办呢？世界上，她只有他一个亲人。没有他，她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什么？你和我在一起不舒服？”他问。

“不是的。”海伦说。

“那你不喜欢我拥抱你吗？”

“不是的。”她还这样回答。

“那为什么？”

他们穿过天文台公园。冰冷的地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泥浆。几片稀疏的树叶挂在树枝上。

“那为什么？”保尔又问。

“我想你。”她软绵绵地说。

“和我过一辈子你感到太平淡无聊吗？”

保尔冷笑了一下。他很不痛快。但无论如何，他仍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头脑发热的小姑娘表现出来的任性。她常常这样毫无

道理地对待他。

“我认为结婚对我不大合适。”她说。

“可一小时之前，你还和我设计蓝图呢。”保尔说。

“啊，是因为很难反驳你。”海伦说。她不由自主地抬高了嗓音，“你好像那么相信你的行动，你是不大征求我的意见的。”

“平时嘛，不问你，你也会毫不顾忌地说出你的意见。”保尔说。他疑惑不解地望着海伦，然后用调解的口吻说，“你怨我，你是乱说一通来气我的。”

“我说的可是真话，”海伦说，“我不那么太想嫁给你，你感到很反常吧?”

保尔停下了脚步，把手放在围着公园的栏杆上。

“这是真的？你不爱我?”他说。

她没有回答。

“那么这么长时间你一直在对我撒谎。”他说。

他说话的声音肯定而不连贯，只有在政治辩论会时他才这样讲话。他面部表情很严肃。海伦突然感到害怕起来。他不再属于她了，他站在她面前，他在审判她。

“我没有说谎，我很爱你。”她说。

她用恳求的目光瞥了他一眼。和他在一起她那么不检点。没有必要让他意识到这一点，否则她会感到羞愧难当。

“不要玩文字游戏了!”保尔说，“你应向我说明这是我们中间产生的一个误会。”

“我努力吧。”海伦说。

“你像一个轻佻的小店员，跟我闹过五十次荒唐的口角，可你从未诚挚地向我讲过什么。”

海伦的眼眶里涌满了泪水。他带着真的蔑视她的神情。他是否有时蔑视她而她却没有发现呢？她突然意识到，他只是为了讨好她才这么心甘情愿地受制于她的。

"我怕你生气。"她可怜巴巴地说。

"海伦，你意识到你说的话了吗？"

他真的蔑视她了。他的眼睛阴郁可怕，再也看不清他的一切了。她顿时思绪万端，失去控制，哭了起来。

"别抹眼泪了。"保尔说。

她咬住嘴唇，这一切表演就像一个被娇惯的孩子。难道她没有能力平等地回答他吗？

"过去，"她说，"我从不考虑自己的感情。我爱你，我已习惯于这个想法了。"

"那你怎么发现这不是真的呢？"

她不能正视他的目光，"慢慢发现的。"她含混地说。

他抓住了她的胳膊说："你另有所爱？"

现在是他审视她了。他急不可耐。她不知道该编些什么理由，她要失去他了，她不想失去他……

"是谁？"

"没有。"海伦说。

他耸了耸双肩："你不想说出他来？"

该怎么说呢？她从未怀疑过她是那么强烈地爱恋着保尔！他从未像这样地被看不透、像这样真实地出现在她面前。

"好了，晚安。"保尔说。

他转过身去。她还没来得及作什么表示，他已经走了。她跑了起来，喊着："保尔！"

他转过身子："你想干什么？"

她站在他的面前，呆若木鸡。她想和他保持关系，她想要他继续爱她永不变心，但找不到合适的字眼来表达这一切。

"好了，嗯，你决定跟我谈时，告诉我一声好了。"

她望着他离去的背影。"他感到我这个人龌龊！"她失望地想着，"我对他是有点龌龊。"她颓然地坐在一条湿凳子上。"现在

我一个人也没有了，这是我的错误。”她哽咽着。他是不会哭的，他知道怎么办。但是他的不幸是由她引起的。“我从没关心过他，我只是想让他忠贞不渝地、令人快慰地待在我的身旁。我是怯弱的，不公平的，轻浮的，我是叛徒。令人讨厌，我是令人讨厌的。”她绝望地叨叨道。这充斥心中的内疚是不能容忍的，是无用的，因为这种内疚不会把任何错误抹掉。“对不起……”从沉痛的过去解脱出来的灵魂，是不能冲向任何天空的，因为不再有这样的天空存在。她像被粘住似的站在那里，像葬入黄泉的死者一样孤独，心如死灰。

“我想见他。”海伦站起身，跑了起来。“他会要我向保尔解释一下，我想见的可是他。”

她冲向公共汽车的脚踏板。他那木然的面孔，冷冰冰的话语，管他呢。必须让他知道。只要能想到他知道了，一切就变得不那么可怕了。这个沉重的下午，这悔恨，这焦虑，所有这一切开始为他而存在了，这就没什么可遗憾，也别无所求了。

海伦跳下公共汽车。索伏洛瓦大街。他的街，他的房子。她脊背上掠过一阵颤栗。他周围的世界是那么充实，使人感到不大自在了。当她来到他的面前，突然感到空气不足，一阵窒息。四楼，左侧。哪个窗户是他的？有很多扇窗户，一些黑糊糊的，另一些亮着灯。“我敢吗？”那怕只见他一个小时，作为投给她的精神食粮也是不错的；但是如果他觉得她是不慎重，如果他生气了，可能会借机永远不再见她。她上了楼梯。他的门下有灯光。她心怦怦跳着，想：“他在这儿，有血有肉地在这儿。”她屏住呼吸，听到一种窃窃私语声。

她跑下了楼，两颊发烧。“我要做什么呢？”她望着房子。不是走开的问题。生活就在这里。她靠在一堵墙上数着窗户。所有生活都在这闪光的小方块后面。

小方块变黑了。海伦后退了几步，溜到通车辆的大门后面。

她大概要一动不动地站好久。她冻得浑身打颤了。她等了好一会儿，马德莱娜从大楼门口走出来。布劳马跟在身后。他挽着她的胳膊。为什么是她呢？他为什么爱她？“我真该好好看看她。”海伦想。她觉得她又丑，又老，又蠢。但在她身上，一定有一种比美貌、比智慧更宝贵的东西，因为他爱她。海伦顺墙根蹑手蹑脚地走着。马德莱娜身穿一件薄薄的蓝色大衣，披一个红披肩，头上的毡帽遮住了她半个脸。

他们走进一家餐馆。这是一家外面呈黄色的小餐馆，门前被木棒围起一块地方，大概是围墙一类的东西，夏天可作露天坐位。海伦走近玻璃窗。他们面对面地坐在一张桌子前，布劳马手中捧着食谱，可以看见他的侧面。无疑他们常常来这儿。海伦望着女服务员，望着卖饮料的柜台和放置面包筐、水果和大香肠的小桌，总之，这很令人失望。猜想不到他为什么选了这么个餐馆，而不选别的。那些佐料瓶架、纸作的桌布除了它们本身的存在以外，不能向你提供任何情况。再重新开始二十次也是白搭，在了解布劳马的内心上，是不能前进一步的。然而，海伦却感到心满意足。这个情景毫不费力地、肯定地一下子展现在她的面前，这是她凭自己的内心想象所不能得到的。

“他们吃什么？”海伦踮起脚尖望着，然而却只看见他们的桌子。想到他也会像随便什么人那样吃饭，真是可笑。他望着他盘中的食物，口中品尝着它的味道，专心地咀嚼着。海伦觉得他完全为了俯就于人才吃饭的，为了使自己和他人没有差别。好像他没有愿望，没有需要。他不依附任何人，任何东西，即使是他自己的躯体，他也不依附于它。

海伦离开了玻璃窗，“我应该走开。”他们肯定会一起回去的，这样她是不能和布劳马讲话的。“我要走了。”重新被淹没。把希望、失意、疲劳连同自己一起淹没掉。她没有勇气，却至少还有这一等待。如果她放弃的话，将一无所有，既无缺席又无存

在，什么也没有。八点了，必须去打电话。但是餐厅和瓷盘、可可的气味一起变得那么遥远。不能想象我们会使这餐厅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出现。一个深渊把这个世界和因布劳马的存在而变得辉煌的街道上无生机的树木分隔开来。

她瑟瑟发抖。“他们去哪儿?”他们从餐馆走了出来。她又溜在他们后边。看见他，跟着他：这会把他和她连接起来。我将整夜都跟踪他们。她的嗓子发紧了。他们走近了地铁口，互相握了握手，马德莱娜走下台阶，布劳马却转过身来。

海伦藏在一个路灯后边让他走过去。她不想马上就去打搅他。他孤零零的，只为他自己而存在了。“他头脑中在想什么呢?”他步履稳健，走得比挽着马德莱娜的胳膊时快一些。此时此刻，他确实是他自己。感到他在自己面前绝对的、实实在在地存在着，是多么使人着迷啊。

“晚安。”海伦说。她触了一下他的胳膊，他转过身来。

“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跟着你。”

“好长时间了吗?”

“我跟了你整整一个晚上。”

她微笑了。当她满心喜悦地见到这张面孔时，既不知道该说什么，也微笑得不那么自然了。她再也记不清楚这既疏远又殷勤的目光。

他犹豫地凝视着她说：“你需要见我?”

“是的，”她说，“我应该跟你谈谈，到你家去吧!”

“那好吧。”

她默默地走在他的身旁，不是在他后边，而是在旁边。刚才，她沿着他的足迹徘徊，像影子一样飘忽不定。现在，她确实地在这里了。这些街道刚刚进入到她的生活之中。他亲自请她上楼梯，她曾经像小偷一样从这里溜下来。

"那么，这就是你的住所了。"她说。

"是的，这好像使你吃惊。"

他笑了。当她想到他时，感到他似乎很年轻，他的面孔严肃而坚定。她忘记了他眼睛里嘲讽的烈火，他蠕动的鼻孔，以及这有时使他显得很年轻的有分寸的热情。他走到壁炉旁，拨了拨炉条上发着淡红色光芒的煤球。

"暖和暖和吧，好像你冷得发抖了。"

"我还好。"她说。

他的房间。她望着地毯，望着用美丽的印花布蒙着的长沙发，摆满书的一层层书架，以及那挂在墙上的奇特的绘画。他对自己是那样完全彻底的负责，什么偶然事件也不会发生在他身上。然而他仔细地选择家具，别人更是想不到的。这一切，仿佛他的衣服、他的生活环境的布置、他所吃的菜，同他一起都给人一种永恒的感觉。

"嗯?"他开口了，"什么事?"他好奇地望着她。

"嗯，是这样。"她犹豫了一下，说，"我和保尔一刀两断了。"

"一刀两断了? 你是说你们闹翻了?"布劳马说。

"不是闹翻，是完了。"她说。

"为什么呢?"布劳马说。

他在这儿，在她的对面。她一点也不想向他讲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在这儿，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

"我不爱他。"她说。

"你肯定不爱他吗?"

"完全肯定。"

他低下头去看火，脸上带着关切的神情。他想想她的情况，又想想他。而她却不再需要考虑什么了。没有悔恨，没有忧虑，她安静地把头埋在两只手里。

“他说什么？”

“他不高兴。”海伦说。

“他爱你，”布劳马望着海伦，“从爱情关系上你不爱他了，难道这就是和他一刀两断的理由吗？”

“嗯，我还是想再见到他的，”海伦说，“只不过已不再是婚姻问题，更……更不是感情问题了。”

片刻的沉默。

“你想让我和他谈谈？”

“啊，那倒不是。没什么好说的。”海伦说。

“那么，我能做点什么呢？”布劳马说。

“什么也没有，没什么可做的。”海伦说。

“既然这样，你为什么来呢？”

“我想让你知道。”海伦说。

布劳马的脸阴沉下来。

“我来你生气了？”她问。

“我觉得这没多大用。”

“当然，你永远不会认为见到我有用。”

布劳马把火钩伸进烧红的煤球里，什么也没说。他在自言自语，思绪万千。在这一头浓密的黑发下，有多少东西是我所不能了解的呀！摸一摸这黑发，会给人快感的。

“你知道吗？我计算过了。你每月大概见我三小时，这是你存在的二百四十分之一。”

“我跟你讲过二十次了……”

“你的理由不充分。”海伦说，她转过脸去，“如果你害怕我爱你的话，现在已经这样做了。”

他又沉默了。他望着火，脸上毫无表情。

“你在想什么？”她说。

“我想我们不能再见面了。”

海伦使劲地抓住椅子的两臂："啊！但我并不任人摆布。"她刚刚产生了强烈的恐惧之感，仿佛有人要挖她的五脏六腑一样。"我要天天去车间门口窥视着你，我在街上跟着你，我……"

"不，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他说，"你很清楚，用这样的办法，你是丝毫得不到我的。"

海伦的眼里滚动着因发怒而流出的泪水。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她说。

"我不爱你。"他态度生硬地说。

"我知道你不爱我，我不在乎，"她粗暴地说，"我不要你爱我。"

"保尔爱你，"他说，"保尔又是我的朋友，再说还有马德莱娜，她将会不幸。然而她需要我。"

"我也一样，我需要你。"海伦啜泣起来。

"不，你需要玩玩，你忘记我比想我要快得多。"

打动不了他的感情，他仍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他额头上两条小小的竖纹使他的皮肤显得粗糙了。他的声音是平静的。真是铁石心肠。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她说，"我永远忘不了你。只是当你再也听不到谈论我时，我会像石头那样不幸，你却心安理得。这对你是无所谓的。"她的声音哽住了。"伪君子！"她说。

"现在，你必须出去。"布劳马说。

她用挑战的样子望着他，然而她扶在椅子臂上的手却抓得更紧了。

"我不走。"

他站了起来："那我走。"

"你敢这么做……"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就把你的东西都摔了，把你的文件纸张撕得粉碎。"

"这里没有任何贵重东西，"他说，"你就玩吧！"

他拿起大衣，打开了房门。

她冲过去喊着："别走，别走，回来！"

她在他后边下楼，但因为他腿长，跑得很快。她气喘吁吁，而他已消失在人群中。她转过另一条街去。

"他会看见的，他会看见的。"她咬着手绢说。他什么也看不到，她不会损害他分毫，他已经在我伤害不到的地方了。她靠在一个路灯柱子上。他会认为她要气得晕倒在人行道上的。

我恨他。她跳上一辆公共汽车。永远，永远，他永远不会爱我的。痛苦在这里，有一种说甜不甜的滋味，令人作呕。她不愿陷在这温暖的粘胶之中不能自拔。保尔爱你。难道他们认为我命中注定要和保尔睡觉吗？走着瞧吧。自己害自己，这她是干得出来的。我要滚到小溪之中，一年后，当他在街头遇上我时，我就对他说："你来，亲爱的。"他会大声喊叫："是你呀！"她用挑逗的神情望着她面前坐着的一个中年人。那人打量着她，她转过脸去了。我是胆小鬼。但是，我会有勇气的。你需要玩玩。他会看到我将怎样玩！我要喝得酩酊大醉，然后钻到公共汽车下面。保尔就会对他说："昨晚海伦钻到公共汽车底下去了。"他会出现一种奇特的表情。

海伦下了公共汽车，走进小烟酒店，径直向电话间走来。

"喂，我想和贝特于斯讲话。"

电话那头出现了嘈杂声，一种脚步声。如果他不在，我就给弗朗西斯打电话，给杜尔尼勒打，给哪个白痴打都行。这对我都无所谓。

"喂？"

"喂，是海伦。"

"噢，我还以为你早死了呢。把伙伴们甩掉可不好啊。你怎么样了？"

"今晚你想和我一起出去吗？"

"你想和我一起出去?"

"我烦死了。我想喝酒。"海伦说。

沉默片刻。

"还是来我这儿喝吧，我有葡萄牙产的波尔图好酒，还有唱片。"贝特于斯说。

"好吧，我去。"海伦说。

五

我唯一的爱，这正是你吗？我们还能否说“你在这儿？”然而有人在这里，不是别人，正是你。她发生了变化，已一小时了，她表情很痛苦。她呼吸越来越急促，在带有皱纹的皮肤上血管隐约可见。你没有选择这一切：嘶哑的气喘声，你额头上的冷汗，你脸上那淡紫色的漪纹，这从你身上发出的死人的气味。“由我来选择。”谁选择了？你坐在我面前，头发乱蓬蓬的，面色苍白，你天真地认为你完完全全地在这里。但是，我知道你也在别处，在未来之中。我应更喜欢谁呢？无论我做出什么决定，我所背叛的总是你。

我认为和海伦的事就那么结束了呢。我曾三个月没见到她。

她和保尔确实是吹了，他也不知道她现在的情况。我想她已死了心，把我忘了，于是我感到轻松，因为她真有点使我害怕。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我正在刮胡子，有人按门铃。我开了门，看见一个褐色皮肤的面孔。

“你就是让·布劳马吗？”她说，她严肃地打量着我。这是一个两目炯炯有神的瘦小的犹太姑娘。

“是的，是我。”

“我是海伦·贝尔唐的朋友，叫伊冯娜。我有话对你说。”

我用不信任的神情端详着她，海伦常常对我谈起她。这是她的同谋，死心塌地的效忠者。她们又策划了什么？

“什么事？那就请坐吧。”

她靠壁炉坐着。没有生火。

“海伦快有孩子了！”她说。

“海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不是一回事，这就是说，海伦将不要这孩子。我找了个人会去照顾她。”

她并不看我。她望着那架着冰冷的黑色煤球的炉条。我真不知该怎么想。

“听我说，”我开口了，“你干吗要对我讲这事？这跟我没关系。”

伊冯娜的眼睛闪现出愤怒的火花：“啊，当然！”她说。

“海伦只和保尔讲了，她信得过他。”

“噢，那你认为这孩子是保尔的喽！”伊冯娜说。

我心中产生了一种受到伤害的奇怪的感觉：

“不是他的？”

“不是的！”伊冯娜耸耸肩膀说。

“是海伦不想要这孩子的问题，你懂吗？”

“好的，我能对你们帮什么忙呢？需要钱？”

“不，我们不需要你的钱。”

“那怎么？”

伊冯娜故意地审视着我：

“就是说夜里她身边必须有人。我不能去，我母亲疯了，我不能离开她。另外，必须给她借一个房间。”

该我怀疑地望着她了。我要是被海伦耍了可怎么办？难道这不是要和我过一夜的诡计吗？在这避开我目光的黑色眼睛里，是什么也看不出来的。

“我很愿意去，”我说，“如果我认为这是真的。”

“确实是真的！”伊冯娜用气愤的口吻说，“你以为我们是胡编乱造出来的吗？”

“海伦这个人是猜不透的。”

“嗨！说这话不害羞吗？”伊冯娜说，“我明白了海伦为什么不愿找你。”

“她不愿意找我？”

“是的。她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不认得别的什么人。”

我迟疑不决地说：

“海伦在私生活中只有保尔一人。怎么出的事？”

伊冯娜的眼睛闪出亮光：“一天晚上，你把她赶走了。她是向你来寻求帮助的，你却把她赶走了。她去和一些同志们喝酒，嗯……事情就发生了。”

“那个人知道吗？”

“那是个坏蛋。她已不再见他，这已好久了。”

沉默。是的，海伦是做得出来的。因为我赶走了她。我心中又产生了受到伤害的感觉。

“那个侍候海伦的人，她有把握吗？”

“好像有。只是我很难找到她。我们已浪费了不少时间。如果是在一个月以前，一切都会更简单。”她又补充道，“那也就用

不着你了。”

“要我做些什么呢？”

“只要你守在她旁边。她要是疼痛难忍的话，就给她吸点乙醚。要是情况不好的话，要是到早晨还没有完，请打电话到利特埃32—01，就说伊冯娜找吕西太太，告诉她说病人情况不妙，她马上就会来的。”

“你就相信我吧。告诉海伦我等着她。”

“她六点钟就会到。”

伊冯娜又犹豫了一下说：

“海伦想让我先给你打一下招呼，万一事情恶化，这对你可能是不大好的。”

“让她别为我担心。”我说。

她站起身。

“那就再见了。”

她毫无表情地握了我的手。她是怨恨我的。她下了楼梯，在街上转了弯，她也把我的形象带走了。她要用一种强烈的责难来对待这个形象。

我又拿起我的肥皂刷在脸上抹上肥皂沫。谴责是容易的。难道她愿意让我背叛保尔吗？让我把马德莱娜甩掉吗？我对海伦是不履行任何义务的。刮脸刀划破了我的皮肤。她是用什么眼睛盯着我的呀！仿佛我是一个作恶的人！我生气地说：“这又不是我使海伦怀的孩子。”我这样高声地说了好几遍。但在我心中，却不知不觉地产生了这样的疑问：“难道不是我吗？”

“我是不是太打搅你了？”海伦说。

“当然不。”

她羞怯地站在我的门槛前，我简直认不出她了。她腋下夹着一个大包裹。我最后的疑问也烟消云散了：看来伊冯娜没有撒谎，这并不是一个玩笑。在海伦蓝色的裙子下，在她细嫩的皮肤

下，生长着用她的血液滋养的东西。

“快来暖和暖和，”我说，“我的火生得很旺。”

我在桌子上放了一些鲜花，在我床上铺上新单子。她不敢相信地望着周围的一切。

“在我上床去的当儿，请你回避一下，不麻烦你吧？”

我拿起大衣：

“你想让我给你带回点什么来吗？”

“不，谢谢。”她补充道：“半小时后你就可以回来了。”

外面，天已经黑了。女人们挽着她们情人的胳膊走路，带着女人甜蜜的笑脸。海伦有一个情人，一个坏蛋。一个坏蛋把手伸进她的裙子，他使她难受，她还将再难受，她还是个孩子啊！在灯火辉煌的店铺里，家庭主妇们为晚餐购买面包和火腿。他们要吃饭和睡觉，今夜只不过是把已结束的白天和即将诞生的白天连接起来的破折号。但是在一个房间里，有海伦和她肚子里的东西。漫漫长夜，是一个必须孤立无援地穿过的黑暗而危险的荒漠。我回来时，她已躺在床上了。她穿着一件带红色月牙边的白色睡衣，这是寄宿生穿的衬衣。她腋下的那个大包袱不见了。

“怎么样？”我问。

“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她的双手颤抖着，我发现她全身颤抖，她把牙咬得格格作响。

“你冷吗？”我在床前坐下，拉住她的手。

“不冷，这是神经质的。”她喃喃地说。

她的牙发出互相碰撞的声音，她的手在被子上抽搐着。

“我使你厌烦吧？”她说。

“我的小可怜，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不，这是令人厌烦的。”她断断续续地说。

一滴眼泪滚落在她的脸颊上。

“要镇静，安静些吧。”

她渐渐不发抖了，伸展了一下身子，用快乐的神情望着我。

“你肯定很生气。”她说。

“我生气？为什么？”

“你决不想再见我。”

我耸了耸肩膀：

“这是为了你的利益行事。”

“瞧你，”她说，“你估计错了。”

我软弱无力地望着她。这是真的！这是我！我曾像对待一个任性的孩子一样对待她。她还是一个小姑娘。然而她的身体却已忍受了成年妇女的巨痛。她的嘴抽搐着，脸色变得苍白了。

“你痛吗？”

她闭着眼睛一动也不动。

“这阵过去了。”她说。

“海伦，你为什么干这个？”

“我想报复。”她说。

“你就这么报复啊！”

“我想如果你知道了，你会感到内疚。”这时她的整个面部都痉挛起来，她的手指甲按住了我的手心：“哎呀，我痛！”

她击中了要害，收到了意外的效果。阵发性的疼痛每产生一次，失望和不安就会猛烈地搅动我的心。疼痛消失了又产生，痛得一次比一次厉害。让她睡在这张床上的是我。我不想进入她的生活，我逃遁了，然而我的逃遁却把她的生活搅乱了。我拒绝影响她的命运，然而我对她的占有却像强奸一样地粗暴。你的痛苦是我造成的，因为我存在着。谁谴责过我呢？

我听到被子下面一种奇怪的肠鸣声。

“哎呀，哎呀，我难受死了！”

她像靠在浮标上一样靠在我的手上，她望着我。我的手握着

她的手，我看到的，是她那双惊恐的眼睛和那张苍白无血色的脸中央的微微翘起的鼻子。"勇敢些，就会过去的，就要过去了。"我反复重复着这样的话。疼痛无休止地撕裂着她的肚子，平息一下之后，又来一阵巨痛。"会好的。"然而时间一分分地过去了，还没有好。海伦的眼睛翻着白眼。有时，我感到一种尖叫要从她双唇发出，我便用手心挡住她的嘴。

"哎哟，我坚持不住了，快，快点，缓一缓吧。"她带着狂人一样的强笑等待着痛苦潮流的反复袭击："快疼轻点吧，快，快。"

一股来势凶猛的大浪，把她掩起来，又把她淹没在海底，她的目光变得模糊无神了。

"哎哟，"她说，"哎哟，我的爱！"

我眼眶里涌满了泪水。这是多么不公平啊！这样的爱情我是不配有的，我也不配分担她的痛苦。我想到的仅仅是不要伤害她。我可怜的小姑娘啊，对不起。海伦，对不起。然而这已经太晚了。啊，这是多么简单啊！别去了。在因疼痛而浮肿的脸上，她的眼皮牵拉着：刽子手。被枪托打得皮开肉绽的胸膛，一个孩子死了，因为他的先辈不敢要他。事情到了说"对不起"的时候，那就太晚了。刽子手。姗姗来迟的黎明，我愿永远拖延的黎明啊。这夜是那么漫长，尽管实际上很短，却同样显得那么漫长，这没有希望的夜啊！

"我受不了了。"她说。她哽咽起来，"好不了了，我受不了了。"

我拿了一团药棉，上面倒了几滴乙醚，放在她的鼻前。

"谁在这儿？"她说。

"我，是布劳马。"

她的眼睛认不出我来了。

"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我说。

她没有听见。我下了楼。冷空气使我打了个寒噤，克里希大街上有着稀稀落落的行人。他们已睡完觉了，他们刚刚醒来，在这像婴儿脸庞一样黑糊糊的阴郁的早晨，他们急匆匆地走着。一个新的早晨，然而对于我来说，新的一天尚未开始。因为天的颜色没有变化，而夜也总是不想离去。我走进刚刚开始营业的比亚尔小酒店。一个系蓝围裙的服务员用抹布擦着柜台。

“我想打个电话。”

“在那儿。”

我放了个硬币后要利特埃32—01。

“出了什么事?”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不知道，情况不好，你必须来。”

“这个时候！我叫不到出租汽车的。”

“我向你肯定地说情况不妙。”

电话那边的女人犹豫了一下：“起码你不会为一点微不足道的事就打搅我吧?”

“不会的，她已经难受了十二个小时了。她已精疲力竭了!”

“我是一个老太太，”那声音说，“行动不方便。好吧，我去。”

我又回到我的房间，又坐在海伦旁边的那个位置上。

她闭着眼睛。难道是乙醚起作用了?还是精疲力竭的缘故?她已停止了呻吟，仿佛在她的血管里连一滴血也没有了。我焦虑不安地观察着街上的动静。我害怕了。十二个小时之前，是一个陌生的女人睡在这张床上。但是这场斗争使我们比拥抱更紧密了。她是我的肉，我的血。为了救她，我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我的孩子，我可怜的小姑娘。她是多么年轻啊！她喜欢巧克力和自行车，她以一种稚气的大胆冲向生活。现在她躺在这里，在她妇女的鲜红的血泊之中。而她的青春，她的欢乐，连同那淫秽的汩汩声便一起从她的肚子里流走了。

“嗯，我的小白菜，还有哪儿不舒服？”老太太说。

我担心地望着她。人工流产。

她像平常那样态度安详自若，好像这不是真的一样。她身着黑色衣服，金黄色的头发，红白分明、肌肉松弛的面颊，一张桔黄色的嘴，她的眼睛是典型老妇人的眼睛：苍白，带着眼眵，眨个不停。她能看得清楚吗？可以猜到在她的脂粉下，是没有洗净的皮肉。我看着她染着指甲的手。一个有把握的人。她掀开被子，我转过脸去。一种淡淡的气味马上弥漫在房间里。

“还没到时候，”她说，“你叫我来是做对了，我来帮帮你，马上就会完的。”

“快完了吗？”海伦说。

“一会儿就完。”

“一切都好吗？”我说。

“是的，”她笑了，“你刚才神情那么紧张，我就要做最坏的准备了。上帝呀，好像你从来没见过什么世面一样。”我听到她在我身后说，“我的包呢？人老了真是倒霉，三步远的地方我都看不见。”

“在这儿呢。”我说。

她拿起黑包，打开了它。我发现了一块手帕，一个香粉盒，一个钱包。她把染着指甲的手伸进小黑包底下，拿出一把金色小剪刀。我向窗户走去，望着街道那边的灰色房子。我很冷。我不敢对她说烧一烧剪刀。

“不要害怕，我的小白菜。”

我听到了海伦不均匀的呼吸声。

“使劲，”老太太说，“再使劲，这儿，这儿……”

海伦呻吟着，一声嘶哑的喊叫声从她的双唇发出。

“在这儿，”老太太说，“完了。”她叫我：“先生！”

我转过身来。她两手捧着一个脸盆。她的手指、手腕和整个

前臂都像她的指甲一样红。

“去把脸盆里的东西倒掉。”

海伦平静地躺着，两眼紧闭，从身上那件很随便的衬裤里露出了她的双膝。在她的腿下，铺着一块油布，上面布满了血淋淋的棉花。我端起脸盆，穿过楼梯平台，打开了厕所的门。盆里满是鲜血，在这红色的血浆中飘着几大块小牛肺状的东西。我把东西倒进马桶，冲了水。我回到房间时，老太太正在自来水槽里洗那些红棉花。

“给我一张大点的纸，”她说，“我把这些棉花全包上，你把它们扔进下水道去。”

“一切都很顺利吗？”我问。

“是的，没什么了不起的。”她笑了，“看来你很不习惯。”

她洗了手，又对着镜子正了正帽子。我又捅了捅火，使它更旺。老太太走后，我又到海伦身边坐下。她对我笑了。

“搞完了，”她说，“我真不敢相信。我感觉很好！”

“你知道吗？”我说，“你愿意在这儿待到什么时候，就待到什么时候。”

“不，那善良的女人告诉我说我可以回去了。我很想回去。”她撑着枕头挺起身子，“你愿意时不时地见见我吗？”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很清楚我愿意。”

“我希望你把我忘掉。”我说。

“是的，你曾把我看成是一只惹人讨厌的、用几块石头就可赶跑的小狗儿。但这是无济于事的。”

“我看得出来。”

“我不是一只小狗。”她用责备的目光望着我，“你真怪，你常对我讲你是那么尊重人的自由。你替我作决定，你把我看成是一个东西。”

“我不希望你不幸。”

“如果我心甘情愿地作不幸的人呢？这要由我选择。”

“是的，”我说，“这要由你选择。”

她把她的脸贴在我的手上。“我选择了。”她说。

我把她抱在怀里，用嘴唇去吻她的脸。

“由我来选择。”是你说出的这话吗？如果这是你，那我没有杀死你，我亲爱的爱。但是除了她自己外，谁会对我说“是我”呢？你的眼皮遮住了你的眼睛，你的双唇在牙齿上翘起，憔悴的脸上继续露出笑容，露出坚硬的牙齿。你不再对我讲话了。

他没有作出选择。我们欢快地在雪地里跑着，他半路碰上了我们。天色已晚，我不能肯定他看见了我们。但我感到脸红。我们互相挽着胳膊，我们胸前抱着装着热乎乎的栗子的书包。他能看见我们。有我，有海伦：这已经够复杂的了。但还不尽然。有保尔，有马德莱娜，以及眼前世界的其余一切。然而他们没有作出选择。

翌日清晨，我来到车间后，就去和保尔握手。改版工人都已各就其位，手里拿着小钳夹，坐在高高的凳子上。女工们总是先干起来。保尔开始拼版，他正在大理石上聚精会神地安排长条。

“昨天晚上我遇见了你，你没看见我。”我说，“我和海伦在一起。”

“是的，我看见你们了。”他说。

他面部开朗，额头微微隆起，还有那略带稚气的嘴。我扣着我灰色工作服的扣子。在我们下面的印刷间里，机器开始了轰鸣。

“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你们之间的事。”他说。

“你们吹了之后，我没有见过她。后来她来找我。我犹豫了。她这个人你是知道的，她喜新厌旧，而且感到没意思。”

“噢，原来如此！”保尔说。

“为了使她凉下来，我作了一切努力。”我说。

“我能猜想到的。”保尔说，“她心没凉啊？”

“我对她有着深厚的友谊，但我不爱她。这我也对她讲过了。她回答我说这没关系。”

保尔耸了耸肩膀：“哼！她活该，这跟我没关系。”

我在我的键盘前坐了下来，因为再表白自己也是没用的。不管我怎么说，和我在一起他不会再和我像第一次那样犹豫不决地接吻了。他要是我就好了，因为在世界上，他占有这个陌生的位置，他只能从外表上了解我。我和海伦一起在雪地里奔跑着，他会想：“他把海伦从我这儿夺走了，他不爱海伦，但却接受了她的爱情。”在作了长时间的思想斗争之后，我离开了党，他会想：“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儿子。”使我突然震惊而恍然大悟的是，外表并不是一种假象，它像我的身体那样肯定地属于我，并在难于启齿的尴尬中使我承认了事实：“这是不公平的。”但是，不公平并不在保尔的怨愤中，而是在对厄运那样能经常预感到、而又那样粗暴地加以拒绝的我的心中：这作为一个他人而存在的厄运。

“这不是真的，这不是我。”当海伦带着充满敬佩和爱情的目光望着我时，我真想喊出这样的话。然而是我，这是确实的。是那个在我父亲的办公桌上把我的公文包掏得空空的我，是把我的资产者的服装脱下来换上灰工作服的我。这个房间是我的，我的全部面貌都在这里。它用我自己的血肉铸造了这个英雄，他具有我的回忆，我的思想，我的微笑。但是在英雄身上，我却看不到自己的影子。

“我认为自己是背信弃义的。”我对她说。

“怎么这么讲呢？”她说。

在长沙发上，她坐在我的身边，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带有一种小动物的自信。

“我好像觉得滑进了一个他人的角色里。”

"你是说我没有全面了解你这个人吗?"

"是的，是这样。"

她向我笑了。

"你这人到底怎么样。"她说。

"不完全是和蔼。"我说，"瞧，当你问我为什么不爱你时，我的回答是你太年轻，我们关注的问题不同。当然，这也由于我是天生的冷血动物。我是从来不会有激情的。我满怀悔恨和踌躇不安转着圈子，我唯一的关心是不要弄脏自己的手。我把它叫做不讨人喜欢的本性，一种使人尴尬的本性。我羡慕保尔，我羡慕你……"

海伦把她柔软的金栗色嘴唇贴在我的双唇上，打断了我的话。

"原来是成天琢磨这事。因为你自己对自己满足，我们产生了一种印象，即你是自己创造自己的。"

"我并不难达到自我满足，因为我的需要是那么少。"

"那么你会有什么需要呢?"她说。她的眼睛炯炯有神。再继续谈下去是没有用的。这个停驻在我内心的真理，只有用语言把它表达出来，而这些言词以一种意外的含义回响在海伦的耳际。它们从我身上出来，在她听到它们时，它们就已经不再属于我了。她从这些言词中发现的是真诚的努力，感人的谦虚，这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对此，她感到无比欣悦。

"你是一个小顽固。"我说。

"啊，要让我讨厌你那太难了。"

她那热烈的目光盯得我真想把脸藏起来。她看见的是谁呢?"这不是我。"这正是我，是在陌生的目光下失去控制的我。这个不忠实的同志，这个勤于思考而自信的英雄，不管我怎么样，仍然是我自己。

海伦用她的脸在我脸上厮磨着。

“你想让我讨厌你吗？”

“我不愿意你由于我的过失而糟蹋自己的生命。”

“没有危险。”她说。她抓起我的一绺头发，在手里卷着。“被别人爱并没有多大意思，找到自己可以爱的人才更有意思。”

“长此以往，害单相思是可悲的。”

我一只胳膊搭在她的双肩上。

“我想肯定一件事，你不要因为我而失去一切良机。”

她用驯顺的表情望着我。

“应该继续善于了解人，观察世界。比如，如果你家建议你去美洲，既然已决定去，就要高高兴兴地去。”

“当然，”她说，“我希望在我的生活中，还会有除你以外的东西。”她躲在我的身旁，“但不能马上有，以后再有。”

“不，不要马上有。”我说。我温存地吻着她的脸。有时候，我感到她十分妩媚，我真想毫不撒谎地对她说：“我爱你。”然而又怎么样呢？她的在场触动着我的心，但是在我远离她的时候，我决不会想到她。假如有一天我离开了她，那是毫不遗憾的。我的柔情、我的敬重离爱情还是很远的。当我们接吻的时候，她闭上眼睛，带着集中心思和驯顺的表情。然后她又看着我，用舌头舔着她的双唇。

“听我说。”她说。

“什么？”

她犹豫了一下说：“以后，我要努力和你拉开距离，我向你保证。但是这不应该阻止我们寻求一种尽可能紧密的联系。”

我把她抱在怀里，她的勇气感人至深。

“假如这只是暂时的话，我们相互间愈加紧密的依恋难道还有必要吗？”

“那活该，”她说，“不要因为害怕未来就把现在也断送了。”她身向后靠，头发在枕头上飘动着。“我愿意我的一切都属于

你。”她喃喃地说。

在我的生活中，起码在这一刹那我是没有支吾搪塞的，是没有和我的良心讨价还价的。你能把我从悔恨中解救出来。和马德莱娜一起时，我们默默地性交，几乎每个晚上。她怀着恐惧心情经受着骚乱和快感，正如她接受声音、目光、乃至事物凝滞不动的面貌一样。当我抚摸她时，我总有一种负罪之感。你呢，在我的怀抱里，你不是一个遗弃的躯体，而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女人。你面对面朝我微笑，为了让我知道你在这儿，自由自在地在这儿；知道你没有消失在你汩汩的血流中，你不感到自己是令人羞愧的厄运的牺牲品。在奔放的狂热之中，在你的声音、微笑中，有一种东西在说："这是因为我愿意这样。"由于你要做自由人的坚韧精神，你和我自己和平相处了。在你面前，我不内疚。在你面前。但是在世界上，我们不是唯一的。

"在我和海伦的关系中，有一些新的发展。"我说。

"是的。"马德莱娜冷漠地说。

我曾想把事情真相让她知道，但是每当我向她谈这事时，她便把话题岔开。

"是的，我们都一起睡过觉了。"

"我从没想过你一生都会忠于我的。"马德莱娜说。她从没对我不好意思过。我对她没有解除过任何诺言，然而我却很不自在。我相信这个消息是很刺激的。"她没什么可说的。"我恼怒地想。无疑她自己也意识到了，因为她什么也没说。然后，她仿佛完全忘记了我对她讲的事。对马德莱娜来说，从来都是既没有完全对的，也没有完全错的，她的态度含混暧昧，因此常以冷漠的态度在深不可测的水中航行。她要求于我的只是不强迫她面对面地看海伦的存在。海伦呢，从她这方面来说，对我从来不提马德莱娜。她们是那么坚决地不承认，我能同时想到一个和另一个，这常常使我感到奇怪。海伦走在我身边，步履稳健，有着无数美

好的回忆，向往着那唯一的未来：这充实的一切是没有马德莱娜的位置的。而马德莱娜呢，在她那弥漫着杀虫剂气味的旅馆的房间里，生活也同样充实饱满，在这里海伦则是绝对地被排除。每个人都全神贯注于自身。她们比太空附近的两个星云的距离还远，比在一块岩石的两边对称地附着的贝壳更加分离。然而我在这里，出现在一方和另一方面前，使她们一起存在。

“怎么你不认为这使人焦虑呢?”我对马塞尔说，“想想是你造就了他人的生活，不管他乐意不乐意。”

我们坐在克利希大街一个小餐馆里，我们吃着香肠拌面条。马塞尔身着一身穿坏了的西装，为了遮住他的衬衫，脖子周围围着一条变得和尘土一样颜色的挪威头巾。他摇了摇他的大脑袋。

“我对德妮兹可没有任何要求。她愿意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

“你很清楚不是那么回事。她不能使你们变成富翁，使你名扬天下。她也不能使你爱她。”

他们最后离开了四壁无饰的大的车间。他们在八层楼上租了一个奇形怪状的单间房子，屋顶是宽大的玻璃天棚，四壁几乎都是窗户，屋子四处透风，墙壁渗着湿气。“我每天早上花一小时时间生炉子，”德妮兹恼火地说，“但白天还是冷得发抖。”

“总是可以安排的嘛。”马塞尔说。

“对别人说安排安排，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事。”

“为什么?我自己就安排得很好。”马塞尔说。

“这是你的事。你是你，你不是德妮兹。她在世界上怎么混法，只跟她有关系。而你，你应对她所在的那个世界负责。”

马塞尔饶有兴味地望着一个金黄头发的胖妓女，她在狼吞虎咽地吃着香肠，准备去富人聚居的蒙马特尔大街。仿佛他没有听我讲话，但我知道他在听着。

“人是自由的，”我说，“只不过是人人为自己。我们不能触

及他们的自由，既不能预见它，又不能要求它，这正是我深感棘手之处。构成一个人的价值的东西，只对他本人存在，对我就不存在。我，我所能触及的只是他的外部。而对他来说，我不是别的什么，只是一种外部条件，是一种荒谬的已知条件，一种我没有选择而成为的已知条件……”

“那么，你就既来之则安之吧，”马塞尔说，“如果你甚至连选择也没有做，那就没有必要忧虑不安。”

“我没有选择成为我现在的样子，但是我是这个样子。一种自负其责的荒诞，这就是我的情况。”

“有某种东西是必须的。”

“但是还可能会有别的什么，没有你的话，德妮兹将是另外一种生活。”

“什么生活？”马塞尔说，“一切生活都被糟蹋了。”

“你要是继续画画的话……”

他打断了我的话：

“然而假如我仅仅有一个小画家周密布置美术展览室的画布的话，她能爱我吗？假如……人们这么讲：如果我做了这个，如果我不做那个。然而事物是怎样就是怎样。”他朝我冷笑着，“我看你为自己总有那么多的内疚而相当的自高自大。”

有时我想，我对事情太认真了。其他人似乎生活得那样自然。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是自然的。我希望一切人类生活是一种纯粹而透明的自由，而我在生活中却遇到了一些看不透的障碍——他人。我是不能听其自然的。我躲着保尔，我难为情地望着马德莱娜。即使在海伦面前，我也感到不安。我们的吻，我们的触摸很快就失去了最初日子里的那种幸福感。她的脸上常常掠过阴影，当我拥抱她时，她闭上眼睛，流露出一种痛苦的神情。有时，我紧紧地搂抱着她，她却猛地挣脱了。我把胳膊搭在她的肩膀上。

“怎么了？怕生的小姑娘。”

她坐在床边，她的脚摇晃着，她以一种严酷的神情注视着寥廓的天空。她的衣服还没穿好呢，她的头发散乱地披在双肩上。她惊跳起来：“没什么。”

“那么，你为什么脸色这么难看呢？”

“啊，我想到的只是浪费这些时间太遗憾了。现在，我该走了，我们又未能谈谈。”

她没有诚意。这从她软弱无力的声音中可以看出。当然，我爱她的身体。然而如果我们见面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拥抱中度过的话，这是她的错误，而不是我的过失。这她是很清楚的。

“我曾建议你去散散步。”

“当然，这对你是无所谓的。”

“什么对我有所谓呢？不拥抱你？然而是你说的这是纯粹浪费时间。”

“因为你不愿意，所以说是浪费时间。”

“你真蠢，”我说，“难道我有不爱你的身体的表情吗？”

“是的，就像对他人一样，随便爱上一个。”

我沉默了一会儿。很明显，迟早有一天，我们会成这样的。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说。

“我之所以这么说，因为确实如此。”

“想到我和马德莱娜有这些关系，你就感到不舒服是吗？”

“你想这会使我高兴？”

“我以为这对你是无所谓的。”

她耸了耸肩，两颗泪珠从眼睛里滚落下来。

“你一直知道在我的生活中有马德莱娜，我说，为什么今天突然……”

“不是从今天开始的。”她说。

“那你应该早些告诉我。”

“那又能改变什么呢？”

我低下了头，我害怕看她哭。但是如果我向马德莱娜建议改变我们的关系的话，我知道这会深深刺痛她的心。

“你听我说，你知道我丝毫不爱马德莱娜，从我个人来说，我断绝和她身体上的一切关系是毫不遗憾的。”

“哼哼，”海伦说，“你像看我一样地看她，你拥抱她……这对我是难以忍受的。”她沮丧而失望地说。

我默默地把她搂在怀里，我感到她的身体在发抖。

“过去，你是不管马德莱娜的。”

“不能像过去那样了。”

“为什么？”

“因为我开始这么想了，”她带着笑意地说，“你本该注意一些的。有一天，你去赴约会，在你的脖子上带有口红，就是我们去狗坟的那天。”

“噢！”我说，“就是头非常痛的那天。”

“我没有头疼。”

我感到脸红了。还是那回子事。在我的肉体上，这口红的痕迹对我是不存在的，然而你的双眼却看得出。一个难于觉察的印迹便成了你心中的创伤。

“海伦，我很抱歉……”

“哎，我看得那么清楚。”她小声啜泣起来，“我拥抱你时，不能不想到她也拥抱你。”

我沮丧地望着她。她整个都是我的。为了使这专一的赠品适得其所，在我心中，必须留有一个她能填补的很大位置。我感到我的抚摸对她具有怎样的庄重感，她认识的它们的价值是种幻觉还是真实都取决于我。在把另一个女人搂在怀里的时候，不仅我使她蒙受暂时的不快，而且我还阻止了她的肉体和心灵所表现出的狂热的爱情。

“听我说，”我说，“我想办法和马德莱娜谈谈。”

她擦了擦双眼，露出诚挚的表情，然而她的脸却仍然显出痛苦的样子。

“这可能比我想象的要容易解决。”我说。

一个时期以来，马德莱娜把我们约会的间隔时间拉长了。她离我更远了，比平时更加漫不经心。

“你真好！”海伦说。

我抚摸着她的头发：

“你好像一点也不高兴。”

“啊！这一切该有多笨啊！”她说，“虽然你不和她睡，可你本心想跟马德莱娜睡，这有什么用呢？”

“我对你说了我不愿意。”

“是的，但是这最终对你合适。”她唏嘘地说，“多么蠢啊！你照样要继续干的。”

“我看看我能做些什么。”

“不，我求求你，不要改变什么了。”她突然激烈起来，“这对我是一样的，不可能是另外的样子。”她把脸埋在两只手里说，“哎，我羞死了！”

我把她搂在怀里，然而我什么话也对她说不出来。对我来说，决不能对除她以外的别人产生欲望。对于她所能给予我的东西，我必须只能从她那里接受。我的一些温情就是使这一愿望得到满足。我只能支配我的行动。我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这是不以她的意志、也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没有办法的。

至少，我是愿意为她冒险并讲话的。“我尽量和马德莱娜谈谈。”但是在马德莱娜面前我的嗓子却变紧了。她在这里，她心不在焉地用小匙猛烈搅动着咖啡，是那样专注，仿佛什么也不考虑，什么也不相信一样。然而在她的心灵深处，不幸、污辱、遗憾却一天天地聚积起来。只要一句话，就会把这沉积的淤泥搅

动，我是没有勇气说这话的。当我回到海伦身旁，她的眼睛在询问我：“你还是什么也没说？”她的痛苦是合情合理的。怎么选择呢？是马德莱娜的眼泪呢，还是海伦的眼泪？这不是我的眼泪。那么，如何比较这些陌生眼泪的苦涩呢？我又不是上帝。

“那么，星期三，你愿意吗？”我把手伸给马德莱娜说。“不，不要星期三。”她聚精会神地戴上手套，“星期三我和查理·阿尔诺一起出去。”

“阿尔诺，”我惊讶地说，“你见到他了？”

“是的，已经一个多月了。”马德莱娜说。她露出朦胧的笑意，“他出了院，他们给他戒了毒。只是为了忍受那个疗程，他偷偷地没命地吃匹尔诺①，于是他就上了瘾。”

这是我向马德莱娜产生的唯一的影响。我曾阻止她和这个吸毒的人来往，阻止她和他一起吸毒。对于饮料，自从她认识我以后，她的嗜酒习惯慢慢在改。

“别再开始了。”我说。

“开始什么？”

“开始喝酒，还有干所有的蠢事。”

她用无精打采的眼神瞟了我一眼：

“这又碍你什么事呢？”

我犹豫不决了。我可以挽起她的胳膊，把她带到离这地铁口很远的地方，对她说：“别赌气了。海伦的事改变不了我们之间什么。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地见面吧。别理这个家伙了。”我可以鼓励她，求求她。我肯定她会听我的话的。然而，我又看见了海伦痛苦的脸。“当我想到你拥抱她时……”再重新和马德莱娜和解，这就是一种背叛。

“噢，什么也不碍！”我说。沉默了片刻。“那么，你愿意星

---

① 匹尔诺（pernods），一种毒品。

期四吗?”

“那就星期四吧。”

我离去了。我对我自己很不满意。“我不能不这样做。”旧有的托辞已经用滥了。我不能不这样做。而我母亲孤独一人，待在大套间冰冷的客厅里。马德莱娜又在吸毒。这里不是“吸毒”的问题，错误不在任何行为之中。我逐渐懂得了：她是我体内的浆液，是我自己。我第一次想到：这大概是得不到解决的。

讲话是有罪的，沉默也是有罪的。反正我是错了。我把轮胎拿在手中旋转着。我肯定，这会重新开始的。同样的历史，我的历史。“她想让我怎样呢?”最近一个月，我几乎没看见她。有两次，她经过我和海伦吃饭的餐馆，她带着一种挑战的微笑要我借给她点钱“去喝酒”。她喝酒，和阿尔诺一起睡觉，她吸毒。我走进弗尔什咖啡馆心里很难过。难道其他男人不如我在地球上的分量重吗?难道他们对自己身后留下的足迹关心得不够吗?我觉察到我的存在引起的到处不安的征兆。或者大概这是向我压过来的一种命运：我的每一个动作和我的每种拒绝一样，都随之带来一种致命的危险。我只是想拥抱海伦，然而我却背叛了保尔，伤害了马德莱娜。

“她又做了些什么蠢事?”我边想边推开了咖啡馆的门。

马德莱娜漫不经心地喝着一杯巧克力水，她在看晚报。她没有把手伸给我，就像我离开十分钟后又回到她旁边的位子上一样，她指着一篇关于西班牙战争的文章说：

“真混蛋!”她对我说，“他们不派任何援兵，就让他们这么断了气。”

“你知道，干涉，这会产生严重后果的。”

“你为什么不搞一次罢工呢?可能布鲁姆[1] 会让步的。”

---

① 布鲁姆，当时法国的副总统。

"我不想搞政治罢工。"我说。

我也如此，全力希望佛朗哥的摩尔人溃败。但是我不承认自己有权从个人的意愿和灵机一动出发，形成一种意志，并把它强加给自己的同志们。想把他人拖入斗争，拖入我的斗争。开了一枪，又来一枪：雅克死了。我把一支手枪放到他的手里，然后他死了。不幸降临在雅克身上。马塞尔目瞪口呆的样子，鲜花的香味和蜡人一般的尸体周围燃着的蜡烛。因为我对他产生了影响。我一向知道不能限定一种行动的范围。我们现在做的事，人们是不能预见到它的影响的。我决不再丧失理智冒险了，我决不动手去发动一种盲目的事件。

"不管怎么说，"她说，"秘密运送武器和批准一些志愿军是不难的。"

渐渐地，她对一种事业热情很高：两年前，这位布列塔尼人曾经是个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了从经费上对运动资助，她同意在一个犹太人的书店里作为职员每天工作八小时。对于她新近忙乎的事情，我也不过分地吃惊。我只是有点耐不住性子地想了解为什么她那么急急忙忙地把我叫来。我听她表述自己对布鲁姆的义愤将近半小时了，而后，我利用她一时的沉默说：

"告诉我，你想对我说些什么呢？"

她平静地望着我说："讲这一切。"

我笑了："你心里对此想的真是那么多吗？"

"啊！你不明白。我需要你的帮助。在共产党内你认识的人不胜其数。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会让我越过边境。但是我单枪匹马是难以办到的。"

"你想去西班牙？"

"我想当个女民兵去。为什么不呢？就像在这里一样，为此我不惜献出生命。"

她的确是做得出来的。我的心充满焦虑不安。

"这太荒谬了，你没有任何道理。"

"不需要有这么多道理，生命并不那么可贵。"

"这只不过是一时的冲动。"

她厌倦地望着我。

"我不是来征求你的意见的，而是请你帮忙。你愿不愿意帮我，肯定还是否定？"

我犹豫不决了。

"帮这个忙可有点棘手，如果去了，哪天要出点什么问题，我会感到不自在的。"

"我要打消你的一切顾虑。"她笑了，"再说就是在这儿，我也很可能出点什么事的。"

"你很苦闷？"

"我不苦闷，我想远走高飞。"

想再了解更多的情况是不可能的了。

"我看看我能做些什么。"我说。

这是很容易的，只要和保尔或者布尔卡德说一下就行了。只有什么也不对他们说。他们曾把他放到卧室里，让他平躺在床上，周围摆上蜡烛和鲜花，就像一个蜡人，一个为某超现实主义艺术展览准备的令人不安的模特。马塞尔看着他。同样的一件事。因为我存在着。难道我不能装出我不存在的样子吗？我使自己在世界上销声匿迹，不发生任何变故；只是在我的位置上留下了一条涂抹的痕迹。海伦没有被禁锢在一种不幸的爱情之中，马德莱娜别在西班牙被杀，重压向四周伸展着它的秘密的、颤动着的纤维，这些纤维在不可预测的远处绷断了，大地因此而变得轻飘飘的。把自己抹掉，不再存在。"我将不对保尔讲。"然而在充满杀虫剂气味的房间里，早上发现了一具满是可卡因的肥胖的尸体。

光线猛烈地照射着我。你是抹不掉自己的。谁也不能为你决

定什么，甚至命运也不能决定。其他人的命运，就是你。决定吧。你有这个权利：一种还没有突然爆发的事物，孤零零地存在在虚无中，它只取决于你自己，然而却有一个深渊把你和它隔开。它从深渊上被抛过来，这除它自身以外没有任何其他道理，唯一的道理就在你身上。

我不愿意，我再不愿意了。他们让这些人穿着帆布连裤工作服，脚踏草底帆布鞋在雪地里干活。我们却说："嗯，我们是爱莫能助啊。"然而如果房屋爆炸，马上会尸体遍地！有一个女人正在某处睡觉。她终于想着问题入睡了：他什么也没干，这不会是他。等到明天晚上，这将是他。是由于我引起的。把我自己抹去。不再存在了。但是，即使我自杀，我还是继续存在的。我将死去。他们将继续被束缚在我死亡的链条上，而这猛然出现在地球上的缺口使千万条出人意料的纤维颤抖并且绷断。贝尔蒂埃将代替我，或者朗方代替我。我将继续对我不在时可能产生的这一切行动负责。有人对洛朗说："走吧。不要去了。"这将是我的声音。我不能把自己抹掉。我不能藏匿在自我之中。我存在着，在我之外存在，在世界各处存在。在我的路途上，没有一寸不是和另一个人的路相重叠的。没有任何一种存在的方式能阻止我无时无刻地自我表现。这用我自己的实体织就的生活，呈现在成千上万张他人的陌生面孔前，它迅猛地越过他们的命运。他醒了，他希望着。"他们将会把我遗掉。"他的生活展现在他面前，是那么宽阔。然而我在这里，在被我害死的你的身旁，我把子弹装上枪膛，明天要杀死他。不，我不愿意。让我们放弃这作法吧。我们放弃它。我们低下头。那里，在未来之中，为了我们节省的每一滴血，这所有的血。让我们继续吧……让我们放弃，让我们继续。决定吧。决定吧，因为你在这里。没有任何办法逃避。甚至我的死亡，也只是属于我自己。

"我和布尔卡德谈了。"

这一夜仍然是温和的。这一夜我能作出决定：我不孤独，在我的对面，耸立着自由。如果不能在自由面前做强者，做自由的主人，那就只能是做自由的工具了。

“你明天去看他吧，他会把你推荐给让你过边界的佩皮尼昂的同伴们，也介绍给巴塞罗那的同志们。好像他们不会自愿地把枪交到一个女人的手里的。”

“谢谢，”马德莱娜说，“你不知道你帮了我什么忙。”

我们在她的房间里。这是一种狭窄的走廊式的房子，里边胡乱地堆满了一些空箱子和一包包的衣服、被单等东西。嗅到的消毒剂味道，夹杂着洗头膏的香气。在小炉子上，两盘熏香燃尽了，留下白色的灰烬，一锅水沸腾着。要是我爱过她……要是我对她多关心一些……我好像万箭钻心。现在，我才完全明白过来，我永远是错误的，从我出生直至死后。

然而，还不仅仅是这一次。这鲜血不是为她流的，临终的喘气声也不是给她听的。仿佛恶魔般的机器，为了取笑于人而空转着，仿佛命运热衷于这种滑稽可笑的模仿。在她出发十天之后，我收到了巴塞罗那的一家医院发来的信。他们没有把她派到前线去，而是让她在炊事班工作。头两天，她认真地洗着碗碟。她不慎用脚踢翻了沸腾的大油锅，因此她在床上整整躺了六个月，而后又回到巴黎。

“你知道吗，他们说法国人是地道的混蛋。”她回来后对我说。

这是一个春天。晚上从车间下班之后，我和海伦在阿斯尼埃尔堤岸闲逛。她在街头买了几束堇菜花，坐在淡红褐色的啤酒杯子前，我们倾听着电影院的铃声消散在淡紫色的天空里。像我们一样的对对情侣漫不经心地在克利希大街上穿行着。我用焦虑不安的目光，注视着这些用安详的心境领略这恬静夜色的男人们，他们没有罪犯的表情。啤酒和烟草的气味，明亮的广告的光彩，

嫩叶的馨香，所有这一切都不像是有罪的。我们在这儿，沐浴在巴黎柔和的黄昏之中，我们不伤害任何人。然而，我们也同样在那边，在巴塞罗那，在马德里。不再是无害的漫步者，而是地道的混蛋。像这些节日中的街道那样确实，我们在响彻斯图卡[①]飞机的轰鸣声的漆黑的天空下存在着；我们存在在柏林，在维也纳，在犹太人和衣睡在泥泞地上的集中营里；在社会主义战士在那里腐烂的监狱里。一个顽固的压倒一切的存在，和带刺的铁丝网的存在，和穿不透的顽石的存在，和机关枪、坟墓的存在混淆在一起了。这些笑逐颜开的无忧无虑的脸，对于其他人来说就是不幸的面貌。

“你能料想得到吗！法国的工人、小职员是怎么生活的！”雷纳·布吕芒菲尔德说。她愤愤地望着摊在土豆上柔软的肥香肠。看到这一情景，我吞下的那一口也就卡在嗓子里咽不下去了。第一次，也是在饭桌上吃饭时，我站了起来。“我要自己想办法糊口。”他走在和煦的林荫道上，用脚踢着一个栗子，他深深地、心安理得地、大口地呼吸着空气。“我自己的办法。”但是，通过我的日常劳动，换取到的是带血的牛肉，而不是夹带麦琪琳的带水的土豆，这是出自哪一条法律呢？我不想趁机捞一把，我曾堂而皇之地放弃了父亲的遗产，然而我却无所顾忌地利用了一种繁荣，而这种繁荣在饥饿的民族看来是吝啬和压迫。“你相信不相信有正确的情况存在？”马塞尔看得很清楚。我离家出走了，而现在，我逃向哪里呢？悔恨在所有十字路口徘徊着。我彻头彻尾、里里外外地充满懊悔。我感到我和我母亲很相像，真想拆毁墙壁，避开那反映出我的真实面貌的目光：一个法国混蛋，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一个饱食终日者。

“您会为之遗憾的，”布吕芒菲尔德说，“你相信希特勒将停

---

① 斯图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俯冲轰炸机。

留在奥地利吗？您走着瞧吧。快该轮到法国了。”

他绝望地憎恨地望着我们。他专程从维也纳赶来这里，以唤起我们的愤慨和同情。他是一个非法组织的最重要的成员之一，这个组织在奥地利开展反纳粹的秘密斗争。德妮兹一个一个地向我们作介绍。这些日子来，她决定努力为她自己的利益生活，她热情地进行反法西斯活动。我把布吕芒菲尔德带到工会办事处，以便使他和我的某些同志进行接触。德妮兹和马塞尔也来了。布吕芒菲尔德讲了很长时间的话。他向我们描述了穿白袜的民兵气焰嚣张的游行示威，受到大赦的纳粹分子们为庆祝他们未来的胜利而组织的宴会，以及在警察沉静的目光下发生的挑衅和暗杀事件。现在，他望着我们。然而他沉默了。

“那你们怎么不能阻止他们的运动呢？”戈蒂埃说，“你们之中可是有百分之四十二以上的社会主义者呀。”

“我们被搞得走投无路，”布吕芒菲尔德说，“任何有效的行动对我们来说都是不可能的。秘密集会，散发传单，简短的演说，这些只能引起骚乱。”

“可舒士尼格[1] 应该明白和你们结盟对他是致命的。”朗方说。

“没有办法，”布吕芒菲尔德说，“一切和解的尝试一直都遭到他的拒绝。”他目光严峻起来，“此外，你们相信群众会俯首听从，被舒士尼格杀害吗？他们记住的往事太多了。”他又望着我，“只有法国和英国强有力的态度能够拯救我们。”

---

① 舒士尼格（Schuschnigg），1934 年为奥地利总理。希特勒为建立日耳曼人大德意志帝国，支持奥地利纳粹分子，于 1934 年 7 月发动一场未遂政变。1938 年 2 月，强迫舒士尼格签订有损国家主权独立的协定。3 月，德军入侵奥地利，宣布德奥合并。这一行动受到英法的纵容。

沉默。到处都是沉默。只有共产党人除外。

“总之，你们希望于我们的是什么呢?”朗方说。

“假如你们组织一些集会、新闻运动，以便把我们那儿发生的事告诉你们的同志们，你们就能够把舆论造起来。”

“这可不是小事，”我说，“把一个国家推向战争。”

“不。”戈蒂埃说，“再说还没有丧失和平解决的希望。”

“哎呀，吞并奥地利将是和平的。纳粹分子用不着攫取政权。他们无处不在。”布吕芒菲尔德的声音发抖了，“舒士尼格一块一块地把国家交给他们。我得到可靠消息说他正在和他们签署一个新的条约。只要希特勒的一句话就行。”他又焦虑又气愤地望着我们：“只有法国能够拦住他。”

“法国不能向自己献上一场战争。”戈蒂埃说。

“你会为此而感到遗憾的，”布吕芒菲尔德说，“你以为希特勒会在奥地利停步吗？你瞧着吧，快轮到法国了。”

戈蒂埃冷冷地望着布吕芒菲尔德说：

“我们能阻止一个国家自取灭亡吗？你对我们讲的这一切，这是一个国家自取灭亡的事。”

他对他的和平主义是那么相信，对他自己是那么相信。“我是和平主义者。”他最终给自己下了定义。他只凭自我意志而行动，既不左顾，也不右盼。他不往前看，仿佛道路已经开通，仿佛未来每时每刻都向他敞开着。

“自取灭亡，这或多或少是谋杀。”我说。

“噢，”布吕芒菲尔德说，“你这么认为?”

讨论了这么长时间，马塞尔第一次开了口。他微笑了。

“他确信，他的每一个举动都是--种谋杀。”

这是一种谋杀。此刻，以及随即到来的整年里，我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新闻界的活动，集会，罢工。保尔，从他那方面折磨着我。“战争，这会是法西斯主义的溃败。”我们能对流血的西

班牙袖手旁观吗？能对玷污德意志、屠杀犹太人的行为视而不见吗？能对在奥地利滚滚向前的棕色人流无动于衷吗？在布吕芒菲尔德冰冷而绝望的目光下，我感到羞愧。然而羞愧并不是理由。在充满杀机、鲜血淋漓的战场上，伤员的呻吟使我充满了恐怖之感。在比利牛斯山后，西班牙的劳动者倒在法西斯的枪弹下。难道我能用法国人的生命，用唯一的、不是我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赎买他们的血吗？犹太人像苍蝇一样惨死在集中营里，难道我有权用法国农民无辜的躯体和他们的尸体交换吗？我可以用我的身体，用我的血去抵偿。但其他的人并不像我使用的钱币。哪一种至高无上的思想能把他们作一比较，计算一下他们的人数，声称知道对他们正确的估计呢？这种自以为是的意图，上帝也是办不到的。人既不是受人摆布的棋子，不是赌注，也不是可以骗取的力量。每个人在别人所不能及的自我的最秘密处都拥有真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只属于他自己，任何补偿都是不可能的。海伦的微笑并没有抵消马德莱娜的厌恶情绪，没有减轻滚油的烧伤。任何东西都不能抹掉雅克的死亡，任何新出生的婴儿也绝对代替不了这个属于他的生命，他唯一的生命。这些命运的绝对分隔，在世界的任何地点都是不能自行消失的。

“我不会做任何事情。我一向禁止自己的一切政治行动。”我拒绝自己像造物主一样把自己昏庸的意志强加给世界。搞政治，这就是使人成为只有一览无余的外表的人，就是把他们当盲目的群众对待，以便把存在的特权像一个活跃的思想一样留给自己。这个思想本身，为了影响那些无生气的人们，鼓励他们，必须变成一种机械力，一种难以测度的机械力，在这里，我自己也辨认不出自己了。在人声嘈杂、烟雾弥漫的大厅里，我慷慨激昂的讲演，把那些陌生的人们带到人所不知的彼岸。我要使我的自由去为令人愤慨的荒谬——不情愿的荒谬推波助澜。“不，我不能把我的国家推向战争。”

“我祝你永不遗憾。”布吕芒菲尔德说。

然而羞愧存在着。我必须习惯于和它一起生活，这是悔恨呈现出的新面目。可以把它从生活的一角驱走，使它变得柔软、光滑、清晰。然而很快就会发现它躲藏在另一个角落。它总是待在某处。我毫不羞愧地把海伦搂在怀里，然而在马德莱娜苦涩的微笑面前，我却低下了头。我毫不羞愧地看着工会的同志们，然而当我想到我们西班牙兄弟或奥地利兄弟时，我的嘴却干涸了。

“你随意地折磨自己。”海伦对我说。

早上的各种报纸告诉我们：奥地利已被吞并。当海伦到车间门口来找我时，我对别的什么也不想谈了。然而和她在一起，我不愿触及这方面的话题。在这些时刻，她好像一个局外人一样。她有点心烦地接着说：

“反正这不是你的事。”

“不是我的事，”我说，“我想让你告诉我什么是我的事？”

“你有自己的生活，”海伦说，“你不认为这就足够了吗？”

“然而我的生活正是由我和其他人的关系构成的。奥地利在我的生活中，全世界也在我的生活中。”

“当然，这些我们遇到的人是在你的生活中，因为你看见了他们。”海伦脸红了，声音变得有点尖刻了，就像平时每当一个论据把她难住时一样。“这并不是说你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负责。”

“这要走着瞧。”我勉强地对她说。已是晚上七点钟了。圣乌昂大街上人群熙来攘往。在街头报摊上，人们争购当天的《巴黎晚报》。灯火辉煌的面包铺里，又堆满了松脆可口的羊角面包、圆奶油蛋糕以及金黄色的长面包。在方砖地上撒满木屑的肉铺里，整牛、整羊被掏空、洗净，用铁钩钩着头，一排排整整齐齐地悬挂在天花板上，像故意在炫耀一样。肉案上成堆成垛地放着用花纹纸裹着的带血的肉包，这一切都呈现出丰盛、愉快、和平

的景象。男人们把胳膊肘撑在酒吧间的柜台上，在高谈阔论，毫不畏惧什么。铁的护窗板放下来了，咖啡馆里已空无一人。在荒凉的街道上，只听到纳粹分子皮靴的有节奏的响声。人们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慌，他们躲在自家的百叶窗后默默地窥视外面。“该轮到法国了。”

“你仿佛创造了世界，”海伦说。

“有一天我读到这样的话：每个人在所有人面前，对一切都负有责任。我认为这是千真万确的。”

海伦用赌气的神情望着我说：“我不明白。”

“很明显，如果人们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蚁穴中的蚂蚁，那将是一事无成的。我不是说我伸出双臂就能阻止纳粹分子的长驱直入。”我的母亲在塞维尔街头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她的双臂张开着。“可是，假如我们大家都伸开双臂的话……”

“可能。但没有人会这样做。其他人也都像你一样负有责任。”

“这是他们的事情。当然喽，我们大家都是负有责任的。但是，大家，就是说每个人。我一向这么认为，即使在我的童年时代也这么认为：为了使这林荫大道存在，只需要我的眼睛就够了；为了使世界有一个声音，只需我的声音就够了。它沉默时，这就是我的过失。”

海伦转过脸去。

“你还不明白？”我说。

“不，我懂了，”她不高兴地说。

“我没有创造世界，但是用我的存在，我每时每刻都在重新创造它。对于我来说，发生的一切事情，就像发生在它身上的事要通过我才发生在它身上一样。”

“是的，”海伦说。她把憔悴的脸转过去看着地。

“怎么了？”我说。

“不怎么，”她说。

“你的脸色怎么那么不好？”

她耸了耸肩膀说：

“有时候，我感到自己在你的生活中像一个原子那样微不足道。”

“你真傻，和你那时抱怨的只是我时间的二百四十分之一相比，你现在可是有增长的啊。”

“你根本不需要我，”她说，“在你真正的生活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和我有关系的。”

“人是可以非常眷恋某人的，虽然并不需要他。”

我用胳膊使劲搂住她的胳膊，然而她缩回去了。

“我感到自己是个废物。”她说。

本来应该对她说：“我爱你。”但是我不敢向她撒谎。我曾发誓使她自由。为了自由，她必须明明白白地生活。她明明白白地看到我的温存和我的无动于衷，而她却像拖着一个沉重的包袱一样拖着这对我来说并不必要的爱情。

“你肯定不爱她吗？”德妮兹对我说。

“这不是爱情。”

“大概你没有另外的爱法。”

“可能，但这什么也改变不了。这不是她所谓的爱情。”

海伦需要的，是我对她的基本需要，这样，她就完完全全地存在了，她就会奇迹般地被证实她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就像我爱过她那样。

“你不想爱她，”德妮兹说，她耸了耸肩，“你也如此，你故意耗费生命。再说这样美好的爱情也不应该这样忽视。”

她以为，一切男人都会自发地互相爱着的。她对大家都很好，她也并不怀疑别人会对她不好。在马塞尔刚直的脾性中，她只希望看到一种用功的反常行为。他不需要用功。马塞尔憎恨德

妮兹宣扬的这生活着的兄弟般团结的羊棚，一个整洁的人间天堂。在这里，大量的道德洋溢着，在这里，价值、真理、美像金黄色的果实挂在树上。我自己嘛，她常常把我惹火了。我讨厌听她预卜世界命运的声音。她努力从她自己生活的焦虑中解放出来。只有历史的普遍前进才靠得住。

"这并不是忽视，但是必须得有能耐。"

"是的，"德妮兹说，她露出生硬的微笑，"我在想马塞尔哪方面有能耐。起码，你在活动，你有一些同志。而他呢……你不认为他有点精神失常吗?"

她惶惑地望着我。马塞尔什么也不做，他甚至连把糖块弄碎和缠线的活都拒绝干。他整日披着件大羊毛套衫，躺在潮湿的床上，然后他就走来伸伸腰，嚷嚷着要见一些朋友。他是那么兴高采烈地接待我们，以至如果没有德妮兹私下对我讲的话，我是绝不会想到他日常的忧郁的。我只是发现他有一些怪癖。他的双手总在忙个不停：他或者紧紧抓着椅子扶手，或者在他的手心里紧紧地攥着他的装烟草的小荷包或一个小瓶、一个柑桔。他背靠墙坐着。"感到我身后的空虚，我很害怕。"他说。他笑了："我害怕空虚。"地板上摆满小鲤鱼、靠垫、各种动物的皮，墙壁上也没有一块空地方。马塞尔在墙上挂着蝴蝶、贝壳、风流人物像以及画着捧着鲜花的泰雷兹·德·李西圣像的明信片。

"他准是在寻求不可能的东西，"我说，"而不是精神不正常。"

"那他寻求的是什么呢?"德妮兹说，"你知道吗？我要是问他，他就冷笑。"

她的眼睛里闪烁着贪婪的光芒。如果马塞尔鄙视爱情、财富、荣誉的话，那他唯一的希望是为自己保留一种比其他一切财产都宝贵的东西。而她也想要她的那一份。

"我想这是只对他有意义的事情。"

她失望地耸了耸肩膀，说：“这事有意义或者没有任何意义。”她用肯定的语气回答着。正是这种貌似公正的小学教员的声音使马塞尔大怒起来。和德妮兹一起，他总是处于守势。和我在一起，他会无话不谈。使我感到困惑的是，他用一种神秘莫测的狂喜神情窥视我的一切动作。

“不是吗？斟满一杯酒真是趣事！”他一边望着杯子里正在增加的红色液体一边说：

“干了这一杯也是趣事。”我拿起杯一饮而尽。

“不，使你高兴的是你对自己的满足。”他说。他用手指使劲地按着烟荷包。“人人都寻求充实。看一看吧，大街上很多人避开人行道中央不走，而贴墙根走，为的是能感觉到在他们旁边有种充实的东西。甚至有的人把手贴在墙面上擦着走路，像胡乱弹着一只吉他。”他望着自己的手指说，“没有比摸东西更确定的了。”

“你完全拒绝创造吗？”

“人不可能去创造。总是有东西在这之前存在。”

“这是确实的，”我说，“从各方面来说都是确实的。”

未来空白的一页完全掌握在我的手中，这只不过是小学生的一种幼稚的梦。现在我知道了。只有不在，不可能的不在是清白无辜的，没有比这更清白的了。选择。羞愧的和平还是流血的战争？杀人还是被奴役？必须选择好要选择的时机。

“或者，人们创造的是不能达到存在的思想。”马塞尔指着挂在墙上的一样东西说，“形状本身应该是稻草做的，或者是从我脑袋里抽出的一根根稻草。”

“那么你要做什么呢？”我说。

“没有更多的事情。创造，这是为表现其存在而作的一种努力。但是，首先要存在。事情就是如此。必须寻求一个和存在接触的办法。”他把头转向右边，又转向左边，“看一看，摸一摸，

这已经是一种接触了。"

"这样久而久之，你不怕烦吗？"

他大度地笑起来：

"我习惯了，腻烦也并没意思。"

可怜的德妮兹！当她热情地谈到苏台德[①]和捷克斯洛伐克时，他是含着怎样的微笑听她讲的呀。这一天，她开完了反法西斯会议兴冲冲地回来，她在会上发了言。在她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多年来我未曾见过的亮光。

"她很满意。"马塞尔说，"你看她，她以为自己做了点什么。"他充满善良的神情，把他的大手放在德妮兹的肩上。德妮兹缩了一下身子，她的目光呆滞了。

"你看到了吧。"过了一会儿她对我说，"他就是这样对待我，一向如此。在他身边我感到窒息，他使我憋气。"她的声音颤抖了，"从早到晚，要么是这样静默地大笑，要么是像要把我望穿的目光。他会使我和他一样变疯的。"

"为此，"我说，"我认为和他一起生活并不合适。"

德妮兹盯着远处某种可怕的东西："简直可怕极了！"

岁月如流，一天天、一夜夜地过去了。马塞尔常对我说，对于一个身体的接触，他只有把它绝对看成是样东西，他才能忍受这种接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没有碰过德妮兹一下。而当他用他那短而粗的手抓住她时，这大概更糟糕。

"你为什么不试试不再和他住在一起？这可能会更好些。"

"我不和他住在一起？"德妮兹惶惑地望着我。她努力使自己的脸上保持一种庄重而理智的表情，"没有我，他会成为什么样子呢？不。"她坚定地说，"我应该在内心把自己从他那儿解放出来。"

---

① 苏台德，捷克一地区，1938 年至 1945 年，被德国吞并。

“这要难得多啊。”

“我要对你讲一个秘密，”她不自然地笑着说，“我已经开始写小说了。”

“是吗？”我说。

“一本关于他和我的小说。当然要加工塑造，”她紧闭嘴唇，“我要是能写出来多好啊！总之，马塞尔有道理：在政治行动中，人真的做不了什么事。你不这样认为吗？”

“这要看情况。”我说，“我们开始聊天时，存在很多误会，这样，我经常不能回答他。”

“只是，你要我怎么工作呢！”她绝望地说，“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要吃饭，要穿衣。这占去了我的全部时间。”

“是的，马塞尔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说。

“我没关系。”她用愤愤的声调说，“我会找到时间的。”

我们能信得过她。她从不浪费一分钟，脑袋也很好使。

“一个可怕的种族。”马塞尔说。他用眼球突出的眼睛望着我，仿佛他真的害怕了。因为他不想浪费时间。“他们不愿意失去赠品，失去钱财。然而他们却从不思量他们这样什么都不想失去，会得到什么。”

“你对德妮兹太凶了一点。”我说。

“你让我怎么办呢？我们没有共同语言。德妮兹是一个社交人物。人们怎么想，怎么说，赞成什么，这是她所关注的。”他拍着自己宽阔的胸脯，“我呢，一个可怜的孤僻的人，我关心的是我自己的命运。这在她看来简直是疯子。”他摇了摇头说，“我对你讲，她是一个危险人物。”

“就算她错了，”我说，“这也不是强迫她处于这种可怜境地的理由。”

“我不强迫任何人。”

“你很清楚她很不幸。而你却心安理得，说什么她不配得到

幸福。你责备她声称把善恶的天平掌握在手中，你自己并没有去衡量她的价值。再说也不存在衡量的尺度。我看不出在德妮兹的错误和你给她的麻烦之间有任何关系。”

“那么为什么说她是不幸的呢?”马塞尔说，“人们是可以戒掉很多东西的。我就戒了威士忌……”

“这是你的事情。你没有权利用你的伦理道德狠狠打击她。你寻求达到你的存在。是你的存在，不是她的存在。这是一种只能对你行之有效的经验。反正，”我有点火气地说，“你不能要求德妮兹整天摸索东西。”

他笑而不答。

“我向你保证，你扮演的是审判员的角色。你能谴责德妮兹，但是没有任何人叫你惩罚她。”

他在手心里来回扔着一个苹果。

“不幸的人哪!”他说，“如果我不存在，地球将成为粉红色糖块搭成的美丽宫殿。”他对我笑了，“我还是不能取消自己。”

“在物质享受上你要是给她一点方便呢?”

“挣钱吗?”马塞尔说，“如果你高兴的话，我很愿意去赚钱。为什么不呢?”他很快地捕捉住空中的苹果。“给德妮兹买几条裙子，再配上一个保姆，以及漂亮的地毯。为什么不能呢?”

我作了很好的辩护。我很会规劝别人。然而如果马塞尔对我说:“你呢?你认为你使海伦幸福吗?”那我怎么回答呢?时光在流逝，渐渐地，她成了一个成年妇女。她不再满足于一头热的爱情了。她不责怪我什么，然而她常常心情抑郁。有些日子，我想到我的一句话会使她欣喜若狂，而我却不说这句话，这在我看来是多么荒谬可笑。

“我要对你说点事，”她对我说，“但先保证你不会生气好吗?”

我们坐在塞纳河畔，两腿摇晃着，在狗坟所占据的这个小岛

的顶端。这是海伦非常喜欢的地方。

“说吧。”

这是八月里的一个礼拜天。她穿上她最漂亮的裙子——一条印花绉绸裙子，上面的图案是她自己设计的。这条玫瑰色的裙子，像宝塔似的色彩斑斓。她戴着中国帽子，她的脸、她的脖子、她的臂膀在阳光下呈金黄色。她似笑非笑地望着我。

“嗯，昨天上午，格朗茹安大娘建议我和她一起到美洲去。”她转移了一下目光说，“我拒绝了。”

“海伦！”我抓住她的肩膀，“这太荒唐了。三年以前你就等待这个机会。你今天晚上就给她打个电话。”

“不，”她说，她望着我，“我求求你。我不能接受。在那边，起码要待一年时间。说实在的，在那里还得白手起家呀。是建立一个商店分店，并且进行经营管理。”她摇了摇头，“我不愿意。”

“想想我们的契约吧，”我说，“我们的事绝不应使你失去任何机会。走吧，待上至少一年时间。想想，你是多么想旅行啊！”

“在没有你的情况下去一年！”她说。

“你会再见到我的。”

“我心有余悸，特别在这个时候。万一真的发生战争呢？”

我把她搂在怀里。我很清楚，她不想旅行，不想自行车，不想除我以外的任何东西。两年来，她和我同心协力，铸造了她和我的紧密联系。她怎能作出决定一下子把它们割断呢？

“你失望了？”她说，“这是你把我摆脱掉的最好方式吗？”她苦笑了。

“我不想看你走。”我说，“然而，使你失掉这样一个好机会我感到遗憾。”

我心里很痛苦。在世界上，她除我以外别无所爱。在她的眼睛里，地球上其他的一切都黯然失色。而我呢，我所给予她的，只是一种苍白无力的温情，我把她禁闭在可怜孤独的爱情之中。

"哎呀！"我说，"你待在巴黎，继续看着你见惯了的大街小巷、那些面孔，继续在你的房里作画，去卢森堡公园散步。这一切单调乏味的存在常常使你厌烦。这是由于我……"

"从积极意义上说我留下来只要不使你厌烦就行了。"她低声地说。

"海伦！你为什么说这种话呢？你要是离开了我，我会像一个受折磨的灵魂。"

我双手搂住她，吻着她充满阳光的头发、脸颊、嘴唇。我感情冲动地拥抱她。寻找着甜言蜜语，我弄不明白为什么我老不愿讲出口。我望着饰有贝壳的坟墓和石卷毛狗上的字："永志纪念梅道尔"。砂砾被我踩得嘎吱作响，我们肩并肩地漫步着。她很美。

"你知道，"我说，"我过去从来没有想到我能像现在这样地爱恋着你。你不走，我格外高兴。"

她咬着嘴唇。她流露出的惊奇使我很不好受。

"这是真的？"她说。

"是真的。"

她望着我，两目炯炯发光。我也激动地凝视着她那因我的话而引起的喜悦神情。确切地说，什么是真正的东西？真理又重要在何处呢？

"你为什么不和她结婚？"我母亲说。我把海伦向她介绍过。她们时不时地在我房间里一起喝茶。海伦认为我母亲威严令人生畏，我母亲认为海伦年轻，但她器重她。

"从爱情上我不爱她。"我说。

"那你就不该像这个样子进入她的生活。"

"是她愿意这样。她说要由她自己选择，说她是自由的。"

"是的，让人家自由这是很好的。"她叹了口气。她让伊丽莎白和徐宗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结婚。伊丽莎白这一对搞不到一块

儿、徐宗那一对却和睦相处。我的母亲不知道两家中哪一家更使她忧伤。

“这是你让她们这样做的，”我说，“你是有道理的。”

“啊，我在想，”她说，“这样做也是白搭，人是有责任的。”

我又瞧了瞧她那苹果一般红堂堂的脸和她那双坚定的眼睛。“这要由你来选择。”但是留给她的又是什么选择呢？难道她能选择我爱她吗？选择我不存在吗？选择她遇不到我吗？让她自由，这还是为她作的决定。在她的意志面前表现得驯服而无生气，这仍是我擅自创造的一种局面，她只能逆来顺受。她在这里被我温顺的手束缚得紧紧的，被禁锢在毫无乐趣的爱情之中。这是不由她的意志也不由我的意志为转移的。

“那怎么？”我说，“没有爱情而去娶她，她是不接受的。难道要向她撒谎吗？”

“啊！我劝不了你。”母亲忧伤地说。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她教我们不要撒谎，十分严厉。然而她不再确切相信什么了：不相信谨慎，既不相信慈善，也不相信真理。为什么不能撒谎？渐渐地，这种思想在我身上潜伏了下来。如果我不能让你自由，如果我个人的存在是一种束缚力，至少为什么就不能成为我强加给你的那种形势的主人呢？人们强迫我作出决定。那好，我只有按照我的心去决定。我希望爱你，我爱你了。我想使你幸福，通过我，你是幸福的。谎言，总之是使我向具有过分强力的现实挑战的唯一武器。在你面前我为什么这样固执、这样愚蠢、心这么硬呢？就像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来的样子？我可以讲很多客套话，行动是矫揉造作，来欺骗你的命运。

这天晚上，一种节日的气氛在巴黎弥漫着，人们歌唱着，面带笑容，情侣们拥抱得更紧了：我们把捷克斯洛伐克给了德国，因此我们说，我们已宣布了世界和平。

“你满意吗？”保尔对我说，“这是一些像你这样的人使这些

可耻的条约成功的。”

我正和洛朗及雅尔迪内在更衣室里，我洗着手。保尔和马松气愤地打量着我。

“这些条约，”洛朗说，“就是和平。这是一种我们争来的和平。因为人们不愿互相残杀，所以战争才成为不可能。”他很年轻，他的奔放的热情使我不好意思了。

“你是在用你的和平主义玩资产阶级的花招。”保尔说，“在避免战争的借口下，他们随便塞点不论什么性质的和平给你。”

“以革命为借口，你们会把我推向随便什么性质的战争。”雅尔迪内说。

“因为，我们是革命者。”马松说，“你是害怕革命。”

“不对。”我说，“但我们不愿用世界大战来赎买它，这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人们付出的代价绝不会太大的。”保尔清高地望着我。“你们永远一事无成，因为你们不想付出代价。”

“用他人的血作代价是容易的。”

“他人的血和我们的血是一样的。”保尔说。

“要想达到一种目的，采取什么手段是无所谓的，”马松说，“我们，我们，懂得希望。”

“可能你们懂得希望，但是你们不知道你们希望的是什么。”我说，“如果你们把人的生命看得价格很低的话，那么，为他们的幸福和尊严而斗争还有什么意义呢?”

“你不是一个工人，”保尔说，“正因为如此，你没有留在党内。也正因为如此，你和资产阶级一个鼻孔出气。”

我不是一个工人这我知道。但这并不阻止保尔犯错误。如果人们只是一种毫无计划地被处理的物质，为什么还要关心他们未来的命运呢？如果残酷屠杀和专横暴虐分量这么轻微的话，那么正义和繁荣的分量又如何呢？我拒绝他们盲目的战争，这是出自内心

的。然而我们陷入的这个和平在我看来是不带任何胜利色彩的。

海伦在车间门口等我，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

“这是确实的？”她说，“肯定吗？和平到来了？”

“和平到来了，”我说，“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是这样。”

她挽着我的胳膊，笑着，像所有女人那样笑着。

“为了捷克人去互相残杀，这毕竟是傻事。”

在维也纳，犹太人用酸洗着人行道。他们的手指被烧得很疼，过路人发出了幸灾乐祸的声音。为了这，我们不去送死，也不为阻止布拉格夜晚沉闷的暗杀声而去送死，更不为为防止即将在波兰农村发生的火灾而去送死。在全神贯注于宣布我们为什么不愿去死的时候，我们所关心的是，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还活着？

“怎么，你不高兴？”海伦对我说。“可你是不赞成打仗的吧？”

不赞成战争，不赞成和平。我什么也不赞成。我是孤独的。我既不会高兴也不会愤慨。我把根子牢牢扎在世界上。这根子里流动着我自身的汁液和大量的被吸收来的汁液。自己想避免跨越它、摧毁它、重新创造它是不可能的。只有我自己的存在所感受到的这种忧凄的焦虑才把我和它分隔开。

“人们连希望什么也不知道了。”我含糊其词地说。

“啊，我是多么幸福啊，”海伦说，“我曾经那么害怕，现在好像我复活了。”她抚摸着我的手指，“他们会把你弄走，放到一个洞窟里，用大炮和枪对着你。想到自己所爱的人面临危险，我会忧心如焚，逐渐被折磨死的。”她对我笑了，“捷克人的事使你感到内疚吗？”

“看到这些人那种高兴劲，我就感到有点恶心。因为他们救了他们的性命。”

“我倒很理解他们。”海伦说，“人一死，什么慷慨、英勇和所有这一切还有什么用呢？嘿！我多么怕死啊。”

“我怕死。”你轻盈地大步走着，你的裙子的褶边磨擦着你的被晒成褐色的膝盖。没有人想到你会死去。你使自己和我挨得更紧了，并说：“你死我更害怕。”

她爱我。她很幸福，因为我让她爱。我不愿使她扫兴。我微笑，我高兴地谈话。我们穿过整个巴黎，在梅迪西斯广场吃着冰淇淋。夜是温和的。我坐在圣雅克街拐角的小阶梯上，她把头靠在我的肩上。

“你觉得我很小，是吗？是我不太理解你？”

我抚弄着她的头发。我想：人们不再知道希望什么。我们所做的一切要向坏的方面转化。这样做或那样做都无关紧要，最终会得出结论的。既然我想使她人为被爱着，我只能讲一些她喜欢听的话。

“两年来你长大了。”我说。我又补充道：“我对你的感情也增长了。”

“是吗？”她说。她抓住了我的手，说：

“你好像比过去更爱我了。”

“你知道，你抱怨我不需要你，真的。然而你创造了这种需要。现在，你对我是必须的。”

“我？对你必须？”她说。“你对我必须，因为我爱你。”我说。

你躺在我的怀里，我的心情很沉重。这是由于这节日的怯懦的吵闹声所致，因为我对你撒了谎。这些事物存在着，我是无能为力的。我被它们压得粉碎，只有我的焦虑把我从中分离出来。不再有什么东西了，这张床上已空无一人。在我的面前，是一个虚无的深渊。在无知觉的事物的外面，焦虑独自在真空里降临了。我孤独一人。我就是这单独存在的焦虑，不管我的意志如何。我和这盲目的存在混淆在一起了。这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然而却是从我自身迸发出来的。拒绝存在，我却存在着。决定存在：我存在着。拒绝。决定。我决定着。黎明会出现的。

六

那边，在一条栽着栗树、矗立着铜狮子的林荫路的深处，他坐在父母中间。他的存在涌向街口，涌向整个大地；世界总是因他的存在而改变着模样，这是他的世界。一阵快活的骤风掠过这富丽、和谐的世界。海伦胳膊下夹着马扎和画具走过来，她不需走得太快，如果她提前到达，和布劳马先生碰个面对面那就太难堪了。两点钟了，再过片刻，我会听到他的声音："你干得不错吧？"直到明天傍晚。现在，我爱星期天了，爱这在他怀抱里度过的夜晚了。他在爱着我。她在橱窗的镜子里迅速地照了照，自作风流地把刘海弄光滑，她的发色、鼻子的形状都变得非常重要了，因为他爱的是这张脸。

她走到房子跟前，布劳马和儿子都是搞印刷的。她按一按电钮，一阵嗡嗡声，门打开了。楼梯里弥漫着一股灰尘的气味。她登上楼梯嗅着这种气味，气味就在那里，还有蓝色的地毯。但给人好印象的、穿粉红色衣服的小伙子却到处不存在了。然而，在人们的印象中，这过去还继续存在着，它并不遥远，并不比上海或君士坦丁堡更遥远。她推开车间的大门，厌倦地走上楼去。他把我丢得一干二净！他本可以从不认识我。一朵愁云飘过海伦的心房，土地在她脚下仿佛蓦地变得不那么坚硬了。她用手指按响门铃。

“小姐请进。”

女仆在她面前侧着身子。海伦下着通往大厅的台阶。一阵喜悦袭上她的心头，他就在那里，在他母亲身旁，面对着放着杯子的独脚小圆桌。一束蜡质的、精心摆设的郁金香插在水晶花瓶里。

“你好，夫人。”

“你好，海伦。”

海伦把手抽回来。

“我手头有一张画，是用一整个上午画的。”她向让莞尔一笑，“你好。”

“这是优质咖啡，”让说，“你大概想来一杯吧？”

“为什么不呢？”海伦说，她坐在布劳马太太身旁。这是他的母亲，想到必须由某人生出来，真好笑。难道他本来不存在吗？布劳马太太坐在一张安乐椅上，双腿在她身下蜷着，用手攥着一只脚踝子，她显得还很年轻。

“什么事使你这么惊奇？”让说。

她忸怩地笑了。她不习惯人家看透她的心思。

“我从不认为你就是他母亲。”她对布劳马太太说。

“因为他太高大了。”布劳马太太说。她用惊喜的目光瞟着

他。也是，这是很奇怪的：人们竟能给他一个特殊的体貌。他身材魁梧，棕色皮肤，三十出头的年纪。他就是这样在拯救港饭店第一次出现在她面前的。

“今天下午你们要做什么？”布劳马太太问。

“我们和马塞尔、德妮兹去散步，”让说，“海伦想让我们去参观动物园。”

“多好玩啊。”海伦说。

“令人扫兴的是我需要向德妮兹谈对她的小说的想法。”让说。

“你要向她恰如其分地谈什么呢？”

“你读过了，我有什么办法呢？没有希望。”

“平淡无奇。”布劳马太太说。

“平淡无奇。”让柔声柔气地说，“一天人家给我们一条腐烂的鲤鱼，你也说‘平淡无奇’。”

“可怜的德妮兹！她绝对坚持在家务中也会有天才的看法。”

“她一边干着，可能会取得进步的。”布劳马太太说。

“她干得太猛了，”让说，“她每天早晨六点起床，也不见人。”他惴惴不安地望着母亲，“你觉得让她这样下去合适吗？她还要我拿出诚挚的意见来呢。”

海伦的心上好像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对这种正经事，他是从来不会征询我的意见的。”她想。

“难道就不能把她引导到别的事情上去吗？”布劳马太太说。

“政治，”让说，“这对她来说已经不够了。遗憾的是，她没有才华。不过一切都会好的。”

“很遗憾，”布劳马太太说，“她是那么勇敢。”

“她有一大堆道德。”海伦说，“使人伤脑筋的是人家不知道她的任何意图。”

“我，我觉得她很可爱。”布劳马太太有点火气地说。

“可这部小说真令人讨厌，”海伦说，“这个女人被丈夫的脾气压服了。他那一贯否定的伟大天才真令人好笑。我在思忖，她是否真的那样去看马塞尔。”

“马塞尔是讨厌的，”布劳马太太说，“他的行为已丧失理智。”

“他有进步，”让说，“他接受了为施劳斯贝格做布景的工作，他要去挣钱了。”

“无论如何，他希望的一切是让他安静，”海伦说，“德妮兹至少不能要求他违背自己的意志行事。”

“他的意志会对他说：德妮兹存在着。”布劳马太太说。她的双颊泛起一阵红晕。“有道德上的忧虑那是好事，不过假如人们按照我们喜欢的那样去约束它，那就好办了。”

“可是，为什么其他人对我们有权利呢？”海伦说，“对此我从来不能理解。”

“问题不在权利，”让说，“权利是明摆着的。”

“是的，”布劳马太太说，“必须装聋作哑不去看它。”

海伦望着她，她望着让。“我装聋作哑。”她怏怏地想。

让站起身来。

“哎！现在我要来执行了。”他俯身向着母亲，“你的鞋子真漂亮。”他说着，夺过一只皮鞋来。

“让！”布劳马太太痛苦地喊。

他摸摸蜥蜴皮的皮鞋里厚厚的垫片。

“你因自己不是个胖大妇人所以从没感受到安慰。”他说。

“混帐小子。”布劳马太太说。

“给，”让说，“拿着你的宝贝。”他拥抱了母亲，“星期三见。我要和海伦谈谈我们的计划。”

“什么计划？”他们走在林荫路时海伦问。

“我要告诉你的。”让摸摸她的肩膀，“你今天真漂亮。”

"什么计划？"海伦重复道。

"你真好奇！"让说，"好！我告诉你吧。妈妈给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也思索好久了：为什么我们不结婚？"

"我们结婚！"海伦说。她用舌头舔舔嘴唇。每天夜里在他的怀抱中，每天早晨醒来时，望着他的脸。然而她不想因喜悦而讲些比祷告还更冒失的话来。"你是一点也不喜欢结婚的。"

"为什么不喜欢呢？"让微笑着，"我不会使你不幸的。"

"你真可爱。"海伦说。

"我不可爱，我爱你。"

"你因爱我而可爱。"她踌躇地望着他，他是那样温柔慷慨。难道他心上不是只有她一人吗？

"我害怕自己会有点令人讨厌。"她说。

"小傻瓜！"让说，"瞧你，倒变得谦恭起来了。"他把海伦的手握在自己的手里，"我们决定结婚你愿意吗？"

"决定吧。"海伦一阵兴高采烈。她情不自禁嘴上笑着，目光炯炯，感到心里像有着沸腾而灼热的金汁。他微笑着。在一段时间里，他们默默地走着，他们相爱着，无需用任何语言来表达。

"我们会使马塞尔感到惊讶。"让说。

他们登上楼梯。门上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用力敲门"，电铃总是发生故障。让敲过门，德妮兹开了门。她带着一顶带短面纱的小帽，像一位贵妇人，手上带着手套，提着手提包。

"别进去，"她说，"里边说不上来的乱，"她恶心地撇着嘴，"在这窑子里没法收拾整齐。"

从她那高贵的嘴里讲出的粗野的言语使她的声音显得庸俗而虚假。

"马塞尔不和我们一起去吗？"让说。

"他来找我们吃晚餐。他不想放弃他那盘象棋。"

"他总是这么固执？"

"他念念不忘当冠军呢。"德妮兹冷冷地说。

他们慢慢地走下歪歪扭扭的楼梯。"开始就不吉利。"海伦想。在短面纱的绢网下，德妮兹的面颊上有着两片红晕，嘴角下垂着。

"我来叫出租汽车。"德妮兹说。她打个手势，一辆出租汽车贴着人行道停下来。"请问，你能送我们到万塞纳动物园去吗?"她用那种对出租汽车司机或咖啡馆堂倌讲话时悦耳的声调问道。接着她又声音冷冷地说："坐出租汽车快，既然马塞尔决定挣钱了。"

"他顺利吗?"让说。

"很好。他先像在楼上绘画似的准确地画出草图，然后，平心静气地去推木块。"

"不过那收入大。"让说。

"好像我永远抱怨穷似的。"德妮兹说。一阵沉闷的静默。德妮兹眼睛盯着空中，露出不高兴和心不在焉的样子。海伦因而想到：不幸是可怕的，人们在世界上是那样孤独。

"我要都指给你看，"海伦走过入口处的小门说，"鱼缸、鹦鹉、猛兽、袋鼠，你愿看吗?"

"当然愿看，"让说，"我很喜欢看兽类。"

海伦微笑着。她经常到这里来，画红鹳、长颈鹿、犰狳和食蚁兽。中午，她登上猴山的高处，吃着夹肉酱的面包片，注视巴黎。这是些美好的日子，火红的日子。可是此刻，即使在这幸福的时刻也回味无穷。

"等一等，我去买点鱼喂海狮。"让说，他走到站在柜台面前的女商人跟前，柜台上放着一筐活蹦乱跳的鱼。他向她讲了几个字，女商人笑了起来。人们总是对他那么亲切，可能是因为他用兄弟般的方式看他们，同他们讲话。

"你要吗?"他对德妮兹说。

让用手捏着一条鱼的尾巴，趴在水泥水池的边沿上，一头巨大的长着髭须的海狮，直立起来，张开双颔，贪婪地吼叫着，直跳起来。让把鱼撤了回来。

“你会把手指给它咬去的。”海伦说。

“没事。”

他又开始了他的把戏，他显得那样满不在乎，那样快活。过去，他总是忧心忡忡。“他爱我。”海伦想。他松开那条鱼，海狮叫着吞吃下去。

“这兽真好玩。”他显出深信不疑的样子。

“所有兽类都好玩。”海伦说。

她向他微笑，他爱她。她感到充实而明朗。她无需考虑去哪儿或者考虑又何必待在哪儿。好像大地上有她的准确的位子，她准确无误地嵌在那儿。恰好，这位子在他的一边，头与肩齐，在这遍地石子、充满野兽气味和新芽芳香的公园里。“我们要结婚。”

“哎，你没好好带我们呀！”让说。

“可现在你们和我一样熟悉动物园了。”海伦说。他们坐在有桔黄色条纹的篷子下，挨着一只小船，船上孩子们喝着红绿汽水。海伦喜欢这灰扑扑的货架子：弯曲的蜀葵棒、甘草糖、玛大肋纳点心，大瓶大瓶五颜六色的汁液，在一根木棍上摇晃着的五光十色的气球，像一大串酸糖果。

“这简直是一幅引人入胜的水彩画。”她说。

“是的。”德妮兹说。她的目光扫过气球和瓶子，好像它们是不显眼的。海伦瞟了让一眼。他不动声色地喝下半杯，但他也知道时候已经到了。

“您还记得您的诺言吗？”德妮兹说。

让露出疑问的样子望着她。

“您该向我谈谈您对小说的意见了。您读完了吗？”

“读完了。”让说。

“那么?”

沉默了片刻。德妮兹微笑了一下，嘴唇肌肉又收了回来。

“很吸引人，”让说，“内容很充实。”他显得开朗而坦率。甚至连海伦也被他瞒过去了。“只是，不可避免，这是部处女作。我认为，学写小说就像学做鞋一样，您还不在行。”

“确切点，您想说什么?”德妮兹说。她的脸蛋容光焕发，声音里带着难以克制的声调。

“您的解释太多，”让说，“您没有写出任何东西，您有些事情要讲，但您不大注意讲的方式。这与其说是一部小说，不如说是一本私人日记摘要。”

“可是我描写了萨比娜，描写了艾鲁瓦……”

“您谈到对他们的构思，但您没有刻画好。他们还很抽象。你没有想到构成一个完整故事的情节。”

德妮兹点燃一支香烟，样子显得很细心。

“总之，必须全部重写。”她说。

“坦率地说是这样的，几乎是全部。”让说。

“我想不到坏到这种程度。”德妮兹说。

“坏……不。这是初作。”让说。

“是初作。”

她默默地吸了一会儿烟。对德妮兹讲话措辞不能婉转，因为她一直是面对现实的。

“你想那还值得从头写起吗?您认为我能成功吗?”

“这我说不好。”让说。

“我不是要您预言，”德妮兹说，“只是谈谈您的印象……”

让踌躇了。海伦不安地望着他的嘴唇。他尽讲大实话。

“我认为您最好还是写点散记，”让说，“必须找到一种适应您自己的形式。”

德妮兹蓦地把短面纱拉下，盖在她的脸上。

“噢！我想我已懂得了什么对我合适。”她说，“谢谢。”她站起身来，“马塞尔该等我们了，我们该走了。”

“别这样，”让说，“一举成功的事是很少有的，问题是您是不是真想写作……”

德妮兹也不答话，她快步地走着，走到一辆出租汽车跟前。

“圣—日尔曼—德—普雷广场。”

她缩在车子后面，眼睛直盯着司机的脖子，满脸沮丧，她甚至连点面子也不顾了。她平时是那样有礼貌，讲面子；现在，她真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

“我们到了。”让说。

她转过头来，吃惊地望着他。

“请下车。”让打开车门说。

她下了车，向司机付了钱。推开转门。

“你训斥她了！”海伦说。

“可她为什么要问我的意见？”让愤愤地说，“真伤脑筋。真……”

他们进去。马塞尔坐在客厅里边，向他们微微一笑。

“我等你们等得不耐烦了。”他说，“我已饥肠辘辘了。”

“我们也一样。”让说，“全怪狠心的海伦，她让我们从猴子那儿跑到鳄鱼那儿，又从鳄鱼那儿跑去看秃鹫。”

“遗憾的是您没来。”海伦说。

“至少，你们玩得不错吧。赢了吗？”让说。

马塞尔神秘地笑了笑。

“我有进展。”他说着，把菜单递给海伦，“您想吃什么？”

海伦不知所措地望着菜单，她本想什么都吃。

“我下楼去洗洗手。”德妮兹说。

“先定下饭。”马塞尔说。

她耸耸肩膀。

"给我定吧，什么都可以。"

"我要馅饼，"海伦说，"还有，我不知要牛腰肉还是鸽子肉好。"

"牛腰肉和鸽子一块要吧。"马塞尔说。

"噢，不！"她不安地说。

"为什么不呢？既然您那么想要。"

"真是的，为什么不呢？"她说。

她提着手提包，走下通往洗脸间的楼梯。她推开门，德妮兹站在镜子前，她撩起面纱，照着镜子，她那痴痴的样子，仿佛永远沉浸在毫无希望了解答案的疑问之中。

"我的样子有点野。"海伦说。

德妮兹眨着眼，伸手去拿口红，机械地在唇上抹着。海伦懒洋洋地梳着头发，仿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开口，准会骂人的。然而每一刻的沉默都变得越加令人窒息。突然海伦变得张惶失措了。"啊！好了，就这样吧！"她跑上楼梯去。在她身后，德妮兹迈着八字步走着。

"晚餐备齐了。"马塞尔说。

桌子上铺着缎纹台布，一个长颈瓶浸在冰桶里。海伦的碟子里摆着一大片玫瑰色、带着菰块花纹的肥肝。

"啊！肥肝！"海伦狂喜地说。

"今晚是个节日，"马塞尔说，"让告诉了我一件新闻。"他在杯子里斟满酒。"你说什么？"他对德妮兹说。"你认为让会是个模范丈夫吗？"

德妮兹做了个鬼脸。

"可能，"她说，"好像是有一对对幸福的夫妇存在的。"

她没有再化妆，只是她嘴唇上的口红涂得浓浓的。一双眼睛在那张黄脸上闪闪发光，带着石头般的冷峻。

“为你们成家干杯。”马塞尔说。

为你的象棋冠军干杯。”让说。

他们碰了杯。海伦低着头望着自己的盘子。德妮兹的不动声色使她难以应酬。

“你怎么不吃?”马塞尔说。

“恶心。”德妮兹说。她失神地望望马塞尔，又望望让和海伦。“我们在这儿，我们吃肥肝。”她说。

“对肥肝没说的。”让用老好人的声调说。

“把你的盘子给海伦，她会帮你吃完的。”马塞尔说。

“她会吃坏肚子的。”让说。

“她还不至于那么弱不经风。”马塞尔说，他把那块肥肝搁到海伦碟子里，“我喜欢看她吃。”

“谢谢。”海伦有点拘束地说。

马塞尔的笑与德妮兹的脸形成难堪的对照。他显得无拘无束。

她望着让，让也如此，他也不安地望着德妮兹。

“这地方真有趣。”为了打破沉默，她说。

“不是吗?搞装饰的人很内行，没留下一点空白。”

墙上贴着黄色和蓝色的镶嵌画：鱼、鸟、棕榈树。

“谈谈你的布景吧。我很想看看，”让说，“好像你干得不错。”

马塞尔笑了。

“当然，要使他们满意还不容易。”

“啊！你以为很容易?”德妮兹如梦方醒地说。

“太容易了，就没有意思了。”马塞尔说。

德妮兹冷笑道：

“那象棋有意思吗?”

“非常有趣，”马塞尔说，他把身子转向让，“这是纯粹的创

作。”他用手指尖点着颅骨，“都是从脑子里出来的。棋盘圆形是不存在的，那只是一个方位标的问题。”他狡黠地微笑着，“此外，我很快就能闭着眼睛玩了。”

德妮兹用手指尖敲着桌子。

“施劳斯贝格到底说了些什么?”

“他说人们很快就会识别一位画家的风格。”马塞尔得意洋洋地摊开他的大手。

德妮兹难堪地冷笑着。

“可惜你不是一位画家。”她说，“你比我这个蹩脚作家强不了多少。”

“施劳斯贝格很满意，这很好。”让用和解的声调说。

德妮兹盯着他:

“是啊，您才不在乎呢。”她大声地说，“您有您的工会运动，而马塞尔有他的象棋。海伦有您，可我……”她呜咽着说，“我，我一无所有。”

一阵寂静。德妮兹转过脸去，用手指掰开一块面包。

“堂倌!”马塞尔说，“上菜。”

“马塞尔有他的象棋，而我有让。”海伦重复着。她望着让，他孤零零的，那还不够吗?她确信自己又重新感到那带着蜂蜜和可可气味的以前的黄昏正包围着她。过去的焦虑就在那里，随时都有可能向她袭来。

“瞧，鸽子先上来了。”马塞尔说。

堂倌把一盘扣着金属罩子的菜放在桌上。他揭开罩子，海伦快活地嗅着青豌豆的香味，顿时，过去消逝了。

“吃!”马塞尔对德妮兹说，“你的错误就是不吃。”

她用那闪电般的目光瞟了他一眼。海伦同让交换了一下不安的目光。

“这是老实话，”马塞尔说，“对人来说，再没有比吃更吸引

人的了。”

德妮兹用手背把她的盘子推下去，在铺砖地上鸽子和青豌豆都压碎了，和破瓷片混在一起。

“我腻透了。”德妮兹说，“够了，够了！”她重复着，站起身来走向门口。

“我和她一块走。”海伦说。

“去吧，”让说，“不用着急，今晚和明天上午我在家等你。”

她望着他，心里一阵难过。一周只有一个星期六，只有一个夜晚。她冲到德妮兹身后，抓住她的胳膊。

“我陪着您，”她说，“好吗？”

德妮兹走了几步，没有答话。

“这个人！”她说着停下脚步，往墙上一靠，“我不想再见他了，永远，永远。”

海伦扶着她的胳膊，感到她浑身颤抖。

“别待在这里，”海伦说，“上楼到您家去。”

德妮兹喃喃自语，不知究竟说了些什么。

“什么？”海伦说，“您不想回家了？”

“永远不回了。”德妮兹说。

她把背靠在墙上，眼睛发愣。海伦犹豫不决地望着她。

“哎，过来，”她突然说，“我去给您在旅馆找一个房间，您别站在这儿了。”

她拖着德妮兹穿过大街。恰好，对面有一家旅馆，前厅铺着红地毯，摆着坐位很深的皮椅，一丛蜘蛛抱蛋花从青铜花盆的套盆里伸出枝叶来。

“今晚您这里有空房间吗？一个人。”

“爱玛，您把七号房间指给这两位太太。”女老板说。

女仆摘下钥匙，爬上铺着厚厚的机织割绒地毯的宽大楼梯，打开一个房门。

“这就好了。”海伦如释重负地说。她关上门，“躺下，”她对德妮兹说，“休息吧。”

德妮兹解下面纱，把帽子小心翼翼地放在桌子上。

“我没有病。”她说，她坐在床边。“假如我有病，人们还可以照料我。不，而我是有难言的苦衷，这是没法医治的。”她带着一种仇恨望着海伦，“告诉我，我这是怎么了。”

“您没有什么。”海伦说。

德妮兹冷笑起来。

“您不想对我讲吗？”

海伦的心怦怦地跳起来，她害怕。

“我会想办法知道的。”德妮兹带着挑战的口吻说。

“德妮兹，这是荒谬的。”海伦说，她把手放在德妮兹的手上，德妮兹猛地把手抽回来。

“您知道，您知道马塞尔为什么恨我。”她说，她战栗起来，“夜里他睡在地上，因为我们的接触使他发窘；他总是那么彬彬有礼，我宁愿让他打我。我说，他为什么恨我？”

“他不恨您。”海伦说。

“别瞎扯。”德妮兹激愤地说，她望望四周，“您为什么把我领到这儿来？”

“为了让您休息。”海伦说。

德妮兹的眼里射出一道闪光。

“我休息！”她蹙起额头，“您是作为朋友还是作为敌人来的？”她用不安的口吻说。

“您知道，我是您的朋友。”海伦说。

“我的朋友！”德妮兹说，“我没有男朋友，我憎恶自己。”蓦地，她瘫倒在床上，呜咽起来：

“我是个无能之辈。”她说。

海伦用手轻抚着她那浓密的棕发。

"不必这样痛心，"她说，"人们是不能一下子成功的。"

"我知道，"德妮兹说，"我无话可说，我什么时候都知道。那又怎么样？"她绝望地喊着。她呜咽起来，呜咽声越来越大；一声长长的叹息声从她的唇边发出来，她从头到脚全身颤抖起来。海伦扑向她身边，把手捂在德妮兹的嘴上。

"别喊，"她说，"安静点。"

德妮兹突然止住哭声。

"我真疲倦。"她说。

"睡着吧，"海伦说，"我会待在这里的。"

"谢谢。"德妮兹说，"原谅我。"

她闭上眼睛，海伦熄了灯，坐在床的旁边。从绒幕的缝里透过一道黄色的光亮。"那又怎么样？"她重复着。"怎么？"她望着德妮兹。在乱蓬蓬的头发下，她的脸因发烧而红扑扑的，何必那么多眼泪和斗争，那么多欲望和懊丧？她的心冰冷冰冷的。德妮兹的生活，我的生活。黑色海洋中的无数小鸟，消失在空旷的蓝天下，很快被茫茫的海水覆盖了。"我有让。"然而他有朝一日会死去，他对我的爱情会死去，只留下这个甚至连想都想不起来的凄凉的夜晚。"我瞎了眼，"海伦想，"我也如此，我是故意装瞎子的。"她真想像德妮兹一样扑到床上去，呼号起来。

德妮兹睁开眼睛，蓦地坐了起来。

"您在这里干什么呢？"她说。

"我想您会需要我的。"海伦说。

"我不需要任何人。"德妮兹落落寡合地说，她用手摸摸自己的额头，"我做梦了。"她说。

"您想让我走吗？"海伦说。

"是的。"德妮兹说，她疑惑地望着海伦，"我睡觉的时候您看着我来？"

"没有。"海伦说。

“您看着我来，”德妮兹大声地说，“我不需要您在这里。”

“那好，我走。”海伦说，她站起身来。“明天早晨我再来。”她说。

德妮兹没有作声。

“明天见。”海伦重复着。

她走出门去，犹豫不决地望望门。而后转过身去，大步流星地走下楼梯。

“出租汽车。到索伏洛瓦大街。”她把身子缩在车座里。还要等一会儿才到。红头发下那张因发烧而闪闪发光的脸，一个声音在说：“那又怎么样？那又怎么样？”过了一会儿，声音缄默了下来。算了，就算我瞎眼，算了。那是不能忍受的。她俯身走出车门。克利希广场。岔道口。她敲敲玻璃。

“就是这儿。”

她爬上楼梯，按了三下门铃，门开了。

“哎，我没想到你来这么早！”让说。

她扑向他的怀抱，默默地、紧紧地搂着他。

“你怎样给她安排的？”让说。

“我让她睡在一家旅店的床上，她不想回家去。”海伦把让抱得更紧了，“真可怕。”

“我可怜的宝贝！”他抚摸着她的头发，“马塞尔还是那样令人感到可怕。”让说，“我准备和他谈谈。但他说德妮兹是个人类疯子，无法使他改变这种想法。”

“我在思量，是否真的没有发疯。”海伦说。“她失常得有点古怪。她几乎把我赶了出来。”

“她要是疯了就糟糕了。”让说。

“为什么呢？”海伦说。她离开他，开始脱衣服。她很快躺到床上，躲进让的怀抱。

“因为正如马塞尔所说，她是那样爱交往。她不想写这部小

说，可她想当作家，真是矛盾。”

“爱交往……”海伦说，“可她毕竟和别人一样：她企图存在，正如马塞尔所说。”

“可能。”让说，“无论如何，她选择得不好。”

“谁选择得好呢？”海伦说，“你觉得我选择得好吗？”

“至少你是幸福的。”让说。

“然而这可能是一个错误。”她说。她钻进洁净的被窝里，微笑着。他就在那儿，她是幸福的。她没有什么可悔恨的。“她知道马塞尔不爱她，”她说，“她说她不想再见他。”

“她会见他的。”让说。

“她没有必要。”海伦说。

“她爱他。”

“最正确不过了。”

让微笑了。

“这是你说的？”

“是的。”海伦赧颜发颊地说，“我嘛，你不爱我的时候，我要征服你。”她望着他，“可现在你要是不爱我，那就是另一码事了。”

“那你又怎么办呢？”让说。

“啊！你瞧着吧，我就走。”

他把她搂在怀里。

“我将什么也瞧不见。”他说。

她拥抱着他，而后放开手。

“快来。”她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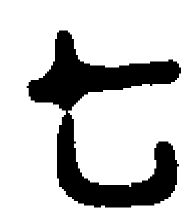
“就来。”让说，“你藏起来。”

她把脸转向墙去，听到他的脚步声穿过房间，衣服的窸窣声，流水声。他就要来了。她闭着眼睛，一阵炽热的雾流入她的血管，她内心炽烈而迷惘，一片乌云把她和过去、未来、死亡分

离开来。

“你来啦!”她说。

她搂着他，这身躯温暖、光滑、有弹力而且坚硬。他就在那里，她用胳膊搂抱着这个男人身躯里所蕴藏的一切。整个白天，他到处游离：他的过去，连同他的思想，在他母亲和德妮兹身边，在世界上到处游荡。而现在，他就在那儿，贴着她的肉，在她的手下、嘴下；为了和他交合，她听之任之，没有回忆，没有希望，没有思想，任凭自己在凝滞的时间里沉浮：除了这只被万点毕剥的火花照耀着的躯体而外，什么也没有了。别背叛我。别远离开我的躯体呼唤的躯体。别让我一个人受那欲火之夜的折磨。她呻吟着。你在那里，和我一样确实。这颤动的肉；你的肉，是为我的，不是为你的。你在那儿。你对我产生了欲望，你要我。我也一样，我在那儿，时光在这灼热的充实上被打碎了。此刻，是永远实在的，和死亡、永恒一样实在。



天将黎明，时钟敲了四点。冷落的街口，时针转动着，它在洛朗睡着的房间里转动着。肺部的伤口加大着，心力衰竭。她缓缓地呼吸着周围的空气。难道她会不知不觉地死去？假如我把她唤醒呢？然而即使她的眼睛还睁着直到最后一刻，死亡会离开她的。死亡是属于她的，但永远和她分开了。她不会经历死亡。不会有黎明了。

大概不会有黎明。寂静，夜，决心说话，决心缄默。无尽无休的低语停止了。焦虑袭上心头，无边的寂静，没有什么再存在了。

然而这个死亡的梦存在着。我存在着，我想着死亡。她正走向死亡，而我在活着。两小时以后它会说："一切准备好了。"我会听到它的声音。我将在那儿，在它面前，全部在它面前，缩在焦虑的痛苦之中，而又全部是在另外的地方。我既不能退出这世界，也无法在其中消失。死了，什么也不再知道，不知道我的尸体的重量。但我活着，我知道，我将一直不断地知道。

我知道在今年的没精打采、陈规陋习中度过的岁月。我感到头上最初不幸的分量，不必再挣扎：没有任何方法挫败它，我满不在乎地凭着各种偶发的任性摇摆着：一种欲望、懊恼、反抗的偶然性。我在我面前走着，什么也看不见；我哪里都不去，在夜里踟蹰；难以预料的命运戏弄我们，使我们陷入迷惘，我们等待天明，以便看看我们陷于怎样难以挽救的泥淖里。

"你该学会玩象棋。"马塞尔对我说。

我们趴在他的车间的阳台上，在我们底下的屋顶闪耀着灿烂的阳光，远处白色的圣心教堂显现在蓝色的迷雾中。

他微笑着：

"仿佛这就是你做的一切。"

"我结婚。"我说。

"那也永远救不了任何人。"

一阵沉默。

"德妮兹怎么样?"我说。

"德妮兹到南方去休息了，她照顾她的不幸就像人家照料病人一样。"

"她步行了好长时间。她恢复了常态。"马塞尔带着歉意说道。

"哎！那就好了！"我说。

"是的，"马塞尔说，"可怜的德妮兹，人家不能让她终生发

疯啊。”他摇摇头，“我从来不那么看她。”他赞赏地说。

“等她回来以后，尽量让她的生活过得去，”我说，“这并不难。”

他意味深长地望着我：

“你的设想使我十分吃惊：那显得很容易。我么，我想她要从骨子里改变。”他耸耸肩膀，“不，她听话。”

“是的，”我说，“这是一个机会。”

“你撒谎也不脸红？”马塞尔说。

“这是自卫的唯一方法，因为不折磨别人，是不会心安理得的。”

“因此你才结婚。”马塞尔说。

“我从中得到好处。”我说，“我想海伦时，我不想自己。”

“你常为她着想吗？”

“我希望她幸福。”

“那会把你拖得很远的。”马塞尔说。

“是的，那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

“噢！原来如此。你在强人手里，”马塞尔亲昵地笑着说，“她总是知道把你造就成什么样的人。”

我给了她幸福，起码这是确实可靠的。她向我微笑，我说“我爱你”。使她容光焕发的快乐又激起了新的谎言，然而只要我决定永远不揭穿自己的假话，那又有什么关系？我爱她，我们要结婚。看到我不再计较我们一起度过的时间，她喜出望外。她激动地拥抱着我。

“你真可爱。”她说。

“我不可爱，我爱你。”

“因为你爱我而可爱。”

她不怀疑，对我来说，从此以后每失去一分钟，就拯救一分钟；我只希望使我的生命消失在四面八方而不在任何地方留下一

点痕迹。

“从去年开始你变了。”她对我说。

“你这样认为?”

“是的，你更不在乎，更自由了。过去，你给人的印象是在各方面分心，从来没有全部在我身旁。”

“可能。”我说。

我们把船靠河岸停下，其他船顺流而下，载着上半身黝黑的年轻人；花朵般的裙子迎风飘摆。纤道上，自行车静悄悄地驶过。

“这儿真好，”海伦说，“多美的一天啊。”

空气中散发着绿色草木和水的气味，还有油炸东西的怪味。影子拉长了。美妙的一天。一小堆金色的尘土，细得几乎摸不到，被风吹向寥廓的太空。海伦在双膝上放了一大束淡紫色的鲜花。

“你采来了美丽的花朵。”

她笑了起来：

“我做保尔的未婚妻时，总是把夏天的星期日想象得像自行车把上的一大把淡紫色的花朵，我心里充满了痛苦。”

“因为自行车的缘故?”

“傻瓜，因为保尔。”

由于幸福，她显得更漂亮了，她的外表更成熟了。照耀着她面庞的阳光比以往更温和、更质朴。

“他献给我的爱情是那样可悲。”她又说。她用手指划着平静的水面。

“他真的爱你。”我说。

“是的，可在他看来，爱情是自然命定的，就像饿和渴一样。我们的爱情恰好是这成千上万类似爱情中的一种。”她犹豫地望着我，“我知道，还有其他情人们相爱着……”

“其他活着的人和其他死去的人，”我说，“那并不妨碍每个人只有唯一的生命，出于自己的考虑而死去。你是有道理的。企图用天狼星的眼光看世界是荒谬的，我们不是在天狼星上，而是在地球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境。”

“相爱不是那么自然而然的，”她说，“想到你对我来说是唯一的人同样是可笑的。这并不是幻想是不是？你是唯一的人。”

“不是你自己又是谁来决定呢？”我说，“我们自己造就真理，这正是爱情动人心弦之处。”

她严肃地望着我：

“但你必须爱我，把我也当成唯一的人。你真的爱我吗？”

“如果我不爱你，那我在这里干什么呢？”

“真的，我们三个月之后就要结婚？”

“绝对是真的。”

她往后一闪，把脸转向天空。她爱我，我爱她。她不再有什么要求。然而，我怎么能证实她的存在呢？我在那儿，没有什么理由，无法辩解，毫无用处。我又划起桨。这是带着音乐、鲜花、亲吻、油炸土豆、白酒和凉水浇在骄阳曝晒着的身体上的美妙的一天。很快她会死在天边，她的骨灰是轻盈的。想到这儿，我心一阵难过，并不那么轻松。蓝天一平如镜，阳光澄澈、执著。一种枯燥的气味在我周围浮动着，仿佛在闪光的胶片下，这些时间在他们心里腐烂了：这是顺从的枯燥气味。

海伦坐起来。

“你觉得有孩子是荒谬的，是不是？”

我惊讶地望着她。

“你想要孩子？”

“又想要又不想要。我在思忖着那样是否会使生活充实。”

我微笑着。

“你不想失去使你充实的机会？”

“别嘲笑我。你怎么认为？”

“过去，我认为把一个人抛向世界是荒谬的。你对此不感到害怕吗？”

她迟疑了一会儿。

“不，即使是一个不幸的人，难道能说最好他别存在吗？”

“事实上，”我说，“如果他对周围的人作恶呢？”

“如果他要行善呢？”

“噢！你有道理。让一个孩子出生，阻止一个孩子出生……是同样荒谬、无关紧要的。”

“但假如人们希求一件事，就不再是无关紧要的了。那么去做这件事就不是荒谬的了吧？”

可能我的错误首先在于不希求什么。

她笑了：

“你的错？我不相信你会有那么多的错！”

我划着桨，小船不着痕迹地滑行着，是那样平静。白色的浪花翻腾起来，又消失在明镜般的水面上。必须消灭这一声音。那声音说：“我愿做这浪花。”她说：“必须消灭这一声音。”浪花无声地出现又消失了。

跳台高处，一个棕色身躯跳入河中。对对情侣在河岸上溜跶着。一个和平的星期日。时光在我们手指间悄悄地溜过去了。在那边，它却在工地上沉积，在铸铁和钢里流动。每一天从德国的工厂里运出新的大炮和坦克。

“我在思量，我们是否走错路了。”我对戈蒂埃说，“大概只有采取他们的方法，才能战胜法西斯主义。”

我折起《工会生活》，上面第一版就是戈蒂埃论和平的文章。

“那么我在思量，做一个反法西斯主义者又有什么意思呢？”他说。

“我也这样想。”

他用冰冷的目光望着我。

“这话是你说的?”

他耸耸肩膀。假如我们信奉的对价值的尊崇要导致他们失败的话，那又怎么办呢?为了保持自由，必须变为奴隶，为了保持手的纯洁，必须屠杀吗?为拒绝做奴隶就必须失掉自由，为了不屠杀就得被千万桩罪恶玷污吗?我搞不清楚。

“你向我们鼓吹和平,”我说，“这很好。但怎么?假如那是我们一厢情愿呢?”

“只要情愿就够了,”戈蒂埃说，“孤掌难鸣嘛。”

“你想让整个欧洲不动一刀一枪就法西斯化吗?”

“那也比战争好。”戈蒂埃说。

“有很多与战争同样可怕的东西。”

对我来说，战争不是无可比拟的坏事，它只是一种冲突的形式，我不由自主地被投入冲突之中，就像不由自主地被投在世界上一样。因为我们这一部分人为另一部分人而存在着，然而每个人又为自己存在着。因为我是我自己，然而对于他们，我又是他人。我是布劳马的儿子，保尔的情敌，一个社会叛徒，法兰西的孬种。一个敌人。我所吃的面包永远是别人的面包。

“这样，你也变成了好战分子?”戈蒂埃说。

“不对。”我说，“请放心，我不会为战争写一行字、讲一句话的。”

天气温和，我们穿着衬衣，胳膊肘凭倚在我房间的窗台上。平静的小街的角隅里，一盏路灯亮了。孩子们在小街上玩造房子游戏。

“我不是好战分子，也不是和平主义者，我什么都不是。”

戈蒂埃是和平主义者，保尔是共产主义者，海伦是个热恋中的情人，洛朗是个工人。我，什么都不是。我望着自己的房间，四壁抹着石灰，但渐渐地，母亲放上靠垫，挂上壁毯，吊上马塞

尔的油画。我每天在车间工作八小时，但我有资产阶级的朋友；我住在克利希街，但我经常和海伦去圣米歇尔林荫路和风光优美的区域漫步。保尔说，如果说我什么也不是，是因为我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工人；然而我想最好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工人，因为我永远不可能成为什么：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工人；不是好战分子，也不是和平主义者；不是钟情者，也不是满不在乎的人。

“你在想什么呢？”海伦说。

我们坐在糖果店小楼梯的阶梯上。她把头倚在我的肩上，我们沉默着。那边，玻璃门的另一边，就是人声喧闹的街道，袒露在天空下面；这里是寂静的背阴处。我用手抚摸着海伦的头发。她是我的未婚妻，我的爱人。一种煮粥的气味中夹杂着蜂蜜和巧克力的香味；糖衣杏仁在玻璃瓶里闪闪发光，宛若比利牛斯激流里的卵石。甜美的糖壳像一个肚子，充满记忆和芳香，寂静和阴暗。明天它会碎片横飞。人们会裸着身子在被污染了的糖衣杏仁中间，在被践踏的花朵中间，光着身子，手无寸铁地在钢的天空下。

“你在想什么？”她重复着。

“我在想战争。”我说。

她抬起头来，手也离开我的手。

“还在想？”她说着，不自然地微笑着，“你从来不想我？”

“我想到战争时，就想到你。”我握住她的手，“你有点使我害怕。”

“我？”海伦说。

“你不想正视目前的形势，我相信战争爆发的那一天，我会惊惶失措的。”

“可这是不可能的，”她说，“这样一个笨蛋！你真的那么认为，你？”

“你知道，我给你说过一百遍了。”

“是的，你对我说过。”她说。她倏地露出焦虑的神情，望着我，“可最终，你不会听之任之的！”

“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你不会拒绝走路吧? 过去，你解释说，你只要袖手旁观就行了，人家离开你将一事无成。”

“对我们必须拒绝这一点，我一点把握也没有。”

“什么?”她说。

“难道你想让法西斯主义占据整个欧洲吗? 你想让我们在法兰西做一个唯希特勒之命是从的区长吗?”

“你说的和德妮兹一样，”她说，“我不想让你在战争中送命。”

“想到你将只是蚁穴中的一只蚂蚁，你会胆战心惊的。如果法西斯主义赢了，人将不会存在：只有蚂蚁。”

“我不在乎，”她说，“一只活蚂蚁，也比一个死人强。”

“有时，为了某种事情，人们会接受死亡，”我说，“那是为了捍卫活着的意义。”

她没有答话，只是忧心忡忡地盯着那辽阔的天空。她的脸耷拉了下来。

“你的父亲关系很多，”她说，“肯定他会使你退役的。”

“你想笑。”

“是的，这对你是无所谓的，”她愤愤地说，“你离开我毫不感到遗憾。”她望着我，“有时我在想你是否爱我，这一切是不是逢场作戏?”

“如果我不爱你，我会接受贝尔唐先生和夫人的邀请和他们一起进晚餐吗?”

她耸耸肩膀：

“如果你爱我，就不会那么迫不及待地去送死的。”

“我爱你，海伦，但要尽量理解……”

我知道她不想理解，但我还是搜索枯肠，讲些温存的字眼。“您不想爱她。”德妮兹说。现在我真想这样做，然而在这八月的酷热中，是海伦在我们之间竖起一道栏杆。我经常一心向她，希望她来分担我的犹豫和焦虑，但我是孤独的。她疑惑地望着我，好像一个敌人走在我的身旁。只有在这行将消失的平淡的和平中，在那等待着的折磨中，在备尝艰辛和羞辱的时候，希望能在爆炸中夺去我的生命。

说到就到了。要战争也好，不要战争也好，从此，如何回答是无关紧要的了：战争来了。我出发的日期已定，只等走上指定好的火车，穿黄褐色军装，服从命令了。我的思想和欲望成为在世界上不引人注目、在我灵魂中不占分量的泡影。卸下了自我的重负，解除了作为一个人的焦灼的使命，我仅仅是一个战士，无动于衷地俯就世俗的陈规陋习。去，不去，这不由我来讲话，而是由某个人来为我讲。这非人的寂静。在赞同和反抗之外是死一般的休憩。死亡很容易，这是很容易的。但怎样成为一个死者呢！一个活人是怎样死的呢？一个声音在说：我想死。而这个声音就是生命。我闭上双眼，但这也是枉然。寂静不存在了，我不能沉默了。走，还是不走，由我来讲话。

“让。”

另外一个人在说话。门的另一边，一个温柔的声音呼唤：“让。”这是我，我还有一个名字？他转动门把手。

“保尔在那儿。”德妮兹说。

他眨着眼，一个人出现在他面前。灯泡的强烈光线使他目眩。

“保尔。”他说。

他走过去，保尔在马德莱娜沙发旁站着，手里拿着鸭舌帽。

他已经理了光头，他皮肤干瘪，皮包着骨头。他握住他的手。

“可怜的老朋友！”马德莱娜说，“他需要休养。”

保尔向布劳马微笑着，他的眼睛还是那样湛蓝而年轻。

“谢谢把我从那儿撤回来。”他说。

“不是我。”布劳马说。

保尔望着门口。

“她怎么样？”

“伤着了肺部。”布劳马说。

在满是灰烬的灶前，马德莱娜吸着烟。德妮兹走到厨房去。人们听到洗碗碟的声音——一阵日常的、有生气的声音。闹钟的针像是一动不动。

“医生对你说什么？”

“他说她过不了夜。”

保尔低下头去。

“我能看看她吗？”

“请进吧。”布劳马说，“她睡着了。”

他坐下。德妮兹进屋来，把一碗咖啡放在他面前。

“喝吧。”她说。

“谢谢。我不想喝。”

“必须喝。二十四小时你没吃东西了。”

他喝了。“必须喝。”人们还在等待他什么吗？二十四小时。时间过得真快，黎明来临了，接着又是夜幕降临，黎明要出现了。蓦地，他感到自己身躯的存在；他四肢酸痛，脑袋沉重，全身发冷。

“她睡着，”保尔说，他望着布劳马，“都是为了我。”

“如果说是某人的错误的话，那是我的错误，”布劳马说，“我本该自己去的。”

“不，你不应该去，”德妮兹赶忙说，“你没有权利。”

“我有权送她的命吗?”布劳马说。

“头两次，我被围住了，”保尔说，“我不能出来。然而，自从接到你的信，我每天晚上都做好准备。”

“不是你的错误。”布劳马说。他把手伸进兜里掏出一支烟，他的手颤抖了，烟丝有一股呛人而甜丝丝的味道。

“你躲在乐洛家里?”

“是的，我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进入巴黎，谁也没问我什么。另外介绍信很管用，那人像弟兄般接待了我，他给我一张去苏维特的票并告诉我一切应注意的事项。”

“你不会再有什么危险了，”布劳马说，“封锁线就像小孩的游戏。”

保尔微笑了。

“我还以为我永远见不到伙伴了呢。”他说。

“两年不见了!”布劳马说。

“你不厌烦吗?”

“相反，我预感到我们有一次可能的合作。我的过去，没有使我受到牵连。”

“现在呢?”保尔说，他好奇地看看他的周围。

“现在，”布劳马说，“我受牵连了。”

“是指逃跑一事?”保尔说。

“也有其他事。”

保尔的眼里闪烁着光芒：

“这使我感到快活!”

“这使你感到惊讶吗?”布劳马说，“过去你把我当做叛徒?”

“过去，这些词并没有和今天同样的含义，”保尔说，他拍着布劳马的肩膀，“不，我相信你不会向他们伸手。仅仅是，我不该相信……”他犹豫了一下，“你那么讨厌暴力。”

“我一直讨厌暴力。”

一阵沉默。

“这是不能避免的，”保尔说，“每次获悉新的谋杀，你就会看到怎样的事实使我们结成统一阵线的！只有这样才能给我们信心：不用言语，不用行动。没有其他形式的抵抗。”

“我知道。”布劳马说。

“你工作上能和党保持一致吗？”

“我们是一个独立的组织，但我们共同前进。在那边，你打算做什么？”

“找到首长，听从他们的命令。”

“努力说服他们和我们取得联系，像这里一样，建立一个统一战线。此后，我们还要彼此进行斗争，但不是现在。”

“不，”保尔说，“不是现在。”

“给，”布劳马说，递给他一张纸条，“这是地址，用心记下。这是另一地区的同事们。他们已准备好和你们联合。”

保尔接过纸条。

“你们没有给敌人沉重打击吗？”

“没有，我们谨慎从事。你瞧，这里是一个家庭式膳宿公寓，运动的最积极的分子，用假名登了记，同时，保持着他们真正的身份。这是自然的，这样可以搞乱敌人的线索。”

“我掌管这个公寓。”马德莱娜说。

“在最近六个月中，”德妮兹说，“四列载运德国兵的火车出轨了，三个兵营被炸，十个旅馆被征用。”她望着布劳马，“一会儿，一个同事要把一枚定时炸弹放到反布尔什维克展览会的一个大厅里去。”

“干得利索，”保尔说，他的眼睛盯着门口，“那么海伦和你一块工作？”

“是的。”布劳马说。

“她大概变化很大。”

"她理解了。"

"这很好。"保尔说。

布劳马站起来。我们谈着。德妮兹、马德莱娜、保尔，还有我们的话语，我们的出现就足够了。仿佛她不存在。明天。永远。仿佛她从来没有存在过。只有我们唇上的话语，我们心中的一个形象。一种传说。

"你待在这里，是不是?"

"他要等到上车的时候。"德妮兹说。

"到九点钟。"保尔说。

"那么，以后再见，"布劳马说，他向门口走去，"一会儿见。"

仿佛她没有存在。然而在这床上，还有某个人。一个不为自己而存在的人，但这人在那儿。他走过来。很好，一个美妙的故事，一种美妙的死亡。我们已谈到你的死，而你，正走向死亡。海伦，你，唯一的人。而我在那里，在灯火通明的房间里，一个人说了话，一个有鼻子有眼、有名有姓的人，说着大家想说的话。但这里涉及的是我，他把我带到这里。所有出路被挡住了。我不能再为你做什么了，也不能为我做什么了。他没有想到我们，他说着话，他做着手势；他杀死了你，我的爱。我还容忍他再杀吗?

八

海伦跳上月台，向一个职员身边跑去。

“是去贝吉尼的快车吗?”

“啊！它已经出发一个小时了!”那人说。

“下一列几点钟开?”

“明天。”职员说着走开了。海伦的泪水夺眶而出。

让在那边，带着两辆自行车，他微笑着看列车驶进站来，随后，他的微笑凝固了。她紧追在职员的后面。

“没有汽车吗?”

“我不知道。”他望着海伦，“你可以办到的，是乘十九点的快车到勒维尼，到那里，就只有十五公里路了。也许在那里你会

找到一辆汽车。”

“谢谢。”海伦说。

拎着这么沉重的箱子，走十五公里。她咬紧牙关。“我想今晚见到他。不是明天，是今晚。”明天，大概太晚了。等到她到达的时候，老妇人会说：“他们恰巧刚走！”我跟着他，跟着他的团队。夜里我溜进他的营房。她把箱子递给行李寄存处的职员。他是否就在那边高处呢？蜷缩在一个洞里，炮弹在四周爆炸着。不是明天，是今晚。

灰蒙蒙的街道之上是灰蒙蒙的天空，海伦走进一条长而笔直的林荫街。所有商店的门都关了，人行道上一个人也没有，马路上没有一辆车，仿佛像一座已疏散的城市。所有街道交叉成直角，房子俨然像大兵营。一座东方之城，干旱得像列车刚才穿过的贫瘠的平原。人们猜测着天边的情况，虽然依稀难辨，但铁蒺藜网、野外防御工事、大炮都已经存在了。海伦吓了一跳。汽笛的长鸣划破了沉寂的空气。突然，车辆、行人、士兵出现在大地上。海伦不胜惊讶地望着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对不起，夫人，您知道餐馆在哪里吗？”

“现在餐馆都关门了。”那妇人说。她含混地指着空间的一处说，“可到‘现代酒店’去看看。

“有警报吗？”海伦说。

“天天有。”那妇人耸着肩膀说。

海伦穿过广场。一个堂倌正在露天平地上摆着桌子，地上绿木栽培箱里，灌木葱茏。咖啡馆里面空无一人。海伦坐在一张人造大理石的桌子前。

“能不能给来点吃的东西？”

堂倌露出责怪的神情望着她。

“这个时候？”

“来几个鸡蛋，好吗？或者冷肉？”

“这时候可没有。”堂倌说。

她站起来。

“好吧，我到别处看看。”

她穿过广场，天下起毛毛雨来。她走进一家“商业咖啡馆”。大厅宽阔而空寂，像对面的咖啡馆一样。包着植物纤维的软垫长凳，坐垫上破了口，露出里边的纤维。

“能不能给点东西吃？”海伦说，“鸡蛋？巧克力和面包？”

“鸡蛋？”堂倌说，“全城您也找不到一个。”

“什么都没有吗？”

“有啤酒和咖啡。”

“来杯咖啡。”海伦说。

她坐下，从提包里拿出烟来。现在他正在乡村的大街上游荡，内心忐忑不安；而她在这里，在这座灰蒙蒙的城市里，没有一个地方是为她准备的。没有任何办法通知他。“没有任何标记，只有这无尽无休的惆怅。”她把那杯咖啡一饮而尽，在桌子上丢下三个法郎。外边，雨一阵紧似一阵地下着。那也没办法，必须步行，快走，分秒必争，为了不再使您焦虑。“从明天起，他要在这申请书上签字，他必须签字。”过一会儿钳子即将松开：他将到沙特尔，他给飞机的马达上油，不再冒什么风险。我定能见到他。她嘟囔着：“他会签字的。”她放慢了脚步。士兵们三五成群地闲逛，等待涌入咖啡馆的时刻。有些人在电影院门前排队。他们的头会被打穿，孤独地倒在污泥里，可能就在此刻，恰恰在此刻。她咬着嘴唇，感到眼睛在眼眶里坚硬得像石头一般，坚硬得有点痛，当她注目凝视的时候，映像难以成形。

“我该找点东西吃。”她想。她又走回到大街上来。没有一家水果店，没有一家食品店。她推开一家糕点铺的门，碟子是空的，士兵们吞噬了一切；在白铁盘子上，只有三块可怜的奶油水果小馅饼。海伦把它们吞下肚去，又喝了一杯水。她走上去火车

站的路，只有坐在一个角落里等待了。她整夜没有睡觉，全身疲惫，两腿发软，难以支持。

她走进候车室。人们守着大包裹，有的坐在凳子上，有的坐在桌子上、地上，都是从东方逃难来的。他们把手放在膝盖上，两目茫茫，在等待着。从战争一打起来，所有的人都在等待，无尽无休地等待，不知吉凶如何。海伦坐在地上，迎着门，缩成一团。人身上发出的气味和热使她喘不过气来。

“他们不想谈这个，”一个妇人说，“但在我们那儿，已经死了很多人。”

“在我们那儿，好像有许多电报，市长都不敢把它们带给家属们。”另一个妇女说。

一列火车呼啸着通过。第一节车厢里是些男人，士兵们头上戴着盔帽坐在踏板上，身旁放着挎包和枪支；最后一节车厢，是大炮，伪装成秋天的颜色，巨大的炮口，朝向天空。列车驶向东方。那里，在闪光的铁路的尽头，战争等待着炮和人。那里，离这里很近很近。她已经在这里了。两目茫茫，在行色匆匆的包裹中间，在嘈杂的火车呼啸声中，海伦闭上眼睛，把额头倚在膝盖上，头脑中充满了黑夜。

当她坐上乡下的带木格子的火车时，身体已经冻僵，疲惫不堪了。雨，大滴大滴地落在车顶上。她头脑中又闪现出希望，“我要见到他了。”车轮的每一转都使她和他靠近一点。“我会找到一辆汽车，几小时后，我就在他怀抱里了。他会接受的，不能不接受。”她满怀激情地想。

勒维尼车站一片漆黑。

“行李寄存处在什么地方？”海伦问。

“把您的箱子放在那儿。”职员指着在门前值勤的哨兵说，“他会给您看守的。”

“好吧。”海伦说，她放下箱子向出口走去。

“您的证件呢？”哨兵说。

海伦拿出通行证和身份证。安全通行证是合乎手续的，上面没有标明任何动机。

“贝吉尼。这里不是贝吉尼。”

“我找辆车去那儿。”

“好吧，请过去。”士兵说。

海伦小心翼翼地收起宝贵的证件。“但愿平安无事，但愿人家别阻拦我。”她忧心忡忡地想。深夜一片漆黑，天一直下着雨。她踉踉跄跄地陷进一个水洼又一个水洼，水没到她的踝骨。往哪儿去呢？街口站岗的宪兵使她害怕，不敢向他问路。她穿过一座桥，胡乱地走在一条街上。有一个车棚。

“这里有出租汽车吗？”

“没有。”那人说。

“您知道我在哪儿能租到？”

“需要到马拉尔家去看看，在车站广场。”

她返身走回来。一群士兵拖着脚步走过。咖啡馆里挤满了士兵，他们的笑声越过关闭着的门传入耳际。她敲敲停车场一边的小门。

“请问，人家告诉我的，可以租到一辆车吗？”

妇人脸色阴沉地望着她。

“我丈夫不在。”

“您知道不知道他就要回来？”

“这个时候他不往外租车。”

重新走上黑暗的街道。水在脚下飞溅，雨水湿透了外衣。敲过一扇门，不行；另一扇门，不行，再敲另一扇门。

“到‘运动咖啡馆’去瞧瞧，在南锡街的尽头。”

海伦把门推开一条缝，她气馁了。大厅里满是士兵，他们围坐在桌前，杯子里斟满了红葡萄酒，这些笑声……这些眼光……

她鼓起全部勇气，走向柜台，老板们满面春风地吃着一大盘豆角。

“请问，先生，”她说，她的声音颤抖了，她简直想哭出声来，“人家说您有一辆小汽车。”

那人吃着，他穿着干燥的套领毛衣，身上很暖和，一张舒适的床正在等着他。

“晚上不开车，”他耸着肩膀，“不能打信号灯。所以您懂得！夜里没人开车了。”

海伦咬着嘴唇，她一筹莫展，只有睡觉，把一切置于脑后了。

“您这里有房间吗？”

“房间？可怜的夫人！全城您连张草垫也找不到，我们这里住着军队。”

“谢谢。”海伦说。

她两腿打颤，今天晚上不行了。泪如泉涌。她从“金狮旅馆”前走过，没有什么必要再进去和打听了。不，永远不。一举一动都十分困难，她像挣扎在使人窒息的荆棘丛中。让。她永远不能和他相会了。这夜茫无尽头，这夜，这战争，这沉寂的、死一般的空虚。

“最后，我回到车站。”海伦说。“一个职员动了恻隐之心，指给我一个可以睡觉的车厢。”她打着哈欠，“但我没有睡着，迷迷糊糊而已。”

“可怜的小心肝，”让说，“我正担心呢！我怕你不会来，因为没有通行证，人们会找你的麻烦。”

“你想到人家会找我的麻烦吗？”

“很多军官和下级军官把他们的妻子弄来了，”让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大不了把你送回巴黎去。”

“可我不想让人送回去。”海伦说。她望着铺在地上的红瓷

砖，一张带着鼓鼓的鸭绒褥子的乡下大床，铸铁炉子，两人住在这里满有意思。她打开她的箱子：瞧，这一切都是给你的。她把一瓶老酒、几盒肉酱、烟、毛袜放在桌子上。“这些都是你母亲送给你的。我么，买了几本书。”她指着五本黑色仿皮漆布的小本子说：“这是我的战争日记。有一堆剪报、谈话和文章的概要；我记载了我的思想历程，这你会感兴趣吧？”

“当然。”让说，“你真好！”

她凝视着他，紧裹着他上身的黄褐色套领毛衫对他是不错的，他没有变。然而，在这两个月中，在他的头脑中有着成堆的思想，对此，她是一无所知的。这使他感到惴惴不安。

“我有成堆的事情要对你说。”她说。

“我很想听。”他穿上外套和军大衣。“十一点半我回来，和你一起吃午餐，从五点半到明天早上我不离开你。”

“很好。”海伦说，她投向他的怀抱，“快回来。”

“别害怕，我带回吃的来。别在乡村露面太多。沿房前的小巷走就是田野。”他拥抱过她，向门口走去，“回头见。”

她跑到窗前。两只母鸡在小巷里觅食，一个士兵穿过广场。她轻轻地敲敲玻璃，让回过头来，莞尔一笑。她把帷幔放下来，在十几天里，她将生活在他身边，好像他们已经结婚了。“正好在这些日子里结婚。”她想。她伸伸腰，一阵倦意，肚子也有点饿了，然而她是多么幸福啊！她拿起一本书，披上雨衣。天空湛蓝湛蓝的，院子里散发着湿木头的气味。

“你好，夫人。”

老妇人到水泵那儿去汲水，她抬起头。

“哎，您是来找您丈夫的吧？他高兴吗？”

“是的，我来找丈夫。他在睡觉。”海伦说。

她走上泥泞的小道，快活地微笑着。

这个地区样子相当难看，一马平川，一片黄褐色，只有这里

那里散布着光秃秃的小丘。但她喜欢野草、太阳和那自由延伸的地平线。她爬上一个小丘，把书放在身旁。这是一个秋高气爽的秋天。一阵淡淡的忧虑咬啮着她的心。“我必须对他讲。”不在身边时，显得是那么省事，可她不能随心所欲地支配他。在这次谈话中，他将会作出答复。“他不能拒绝，如果他爱我，他不会拒绝。”她转过头来，有人走近她。是两个军官，手里拿着手杖，从她面前走过去，而后又漫不经心地走回来。

“您在散步？”

“是的。”海伦说。

“您住在贝吉尼？”

“不，我是巴黎人，今天早上到这儿来的。”

“您有证件吗？”

“瞧！”海伦说着，出示她的身份证。

军官轻轻地用手杖划着他那双漂亮的皮靴。

“必须有上尉的签字。”他说。

“啊！我不知道，我一会儿去。”海伦说。

“您本该到达以后马上去办。和我们一起去吧，我们有车，带您去。”

“行。”海伦说。她跟在他们的后面。他们两个，一个高个子，白白的；一个矮个子，留着黑胡须。她坐上车子。

“一个美妙的日子。”她说。

他们也不答话。汽车进了村，越过穆兰夫人的房子，停在主街上。

“在这里。”

两位军官侧侧身，海伦一人走进一个小房间，房间里一个炉子呼呼地响着。她心怦怦地跳着，这是最后一道手续了，办完这道手续，一切就平安无事了。她急着把一切手续办完。

上尉抬起头来，他坐在一张堆满公文的桌子后。

"您今天早上来贝吉尼的?"
"是的。"海伦说。
"您有证件吗?"
她递过她的通行证和身份证。上尉默默地看着证件。
"您来这儿干什么?"
"我来看望一位旧亲穆兰夫人。"
上尉望着她。
"不，小姐。穆兰夫人不是你的亲戚。"
"不完全是。"海伦说。
"您不认识她，"上尉说，"今天早晨您到达时，还从来没见过她。"
海伦低下头去，她的生活算断送了。
"我们了如指掌，"上尉说，"我们知道给您订房间的战士的名字。"
"嗯！是的，"海伦用挑战的口吻说，"我是来看未婚夫的，像这种情况的不只我一个人，这您很清楚。"
"如果不是迫使我们认真的话，我们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上尉说。
"可谁迫使你们来着?"海伦显出哀求的神情说，"我请求您，至少让我待几天……"
"决定权不在我们手里了。"上尉说，"你已经引起了主管机关的注意。"
"我引起了注意?"海伦说。
"啊！我们，警察局神通广大。"上尉说。他站起来，"一会儿带您到车站去，您乘第一次列车回去。"
"起码，让我和未婚夫告个别呀。"海伦说。她把指甲掐入掌心，她不想在这个男人面前哭鼻子。
上尉犹豫了。

“在这儿等一等。”他说。

他站起来，走出房间去。引起了注意，引起谁的注意？怎么引起的？她痴痴地坐在椅子上。不要哭。她饥肠辘辘，困顿不堪。又将是列车的颠簸，胃空空的，喉咙发干，车厢里熙熙攘攘的人。火车要把我带走，带到远离让的地方。“无可挽救了”，她想着，带着绝望的恶心。

那个高个子、面色苍白的副官推开门，容光焕发地带着微笑。

“您可以回去吃午饭了，”他说，“我刚才说服了上尉，您不是一个间谍。”

“我，一个间谍？”海伦说。

“您本来不该带这么一个装着无价值的文件的大箱子。”副官说，“勒维尼的站长打开了您的箱子，他以为那是些煽动性的传单，他让今早运您来的汽车司机告发您。”

“我以为你们和我是偶然相遇呢！”海伦说。

“幸亏我很快地检查了一下，看出您不是危险的宣传分子。”副官说。

“你们拿走我的证件？”

“在您去乡下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您房里搜查过了。”副官说，“我们会把所有东西还给您的。”他向海伦鞠了一躬，“过一会儿我们来接您。”

“我没有任何留在这儿的希望了？”海伦说。

“目前是不可能了。”副官说。

海伦奔跑着回到房间，扑倒在床上号啕大哭起来，就像在她的童年时代，一双奇异的巨手支配着她的幸福和生活。处在她的地位，她又有什么办法呢？伪君子们！废话，空洞的命令。总之，这是一次可怕的旅行，她几乎见不到让就要离开他了。她回过头来，老妇人走进来，露出怀疑的样子。

“关于您有很多军人来问过了。”她说。

“我知道。”海伦说。

“他们说你不该待在这里。”老太太说。

“一会儿我就走。”海伦说。

妇人不客气地望着她。

“我们为大家服务，反倒惹出许多麻烦来。”她低声抱怨着，离开房间。

“老臭虫！”海伦愤愤地嘟囔道。她涕泪交流，“他们读过我的日记，我在他们手心里。”

她跳下床来，让推开门，满脸淳朴的微笑，他手里拿着一包血淋淋的东西，抱着一瓶酒。

“我没弄到红葡萄酒，但我给你带回美味的牛排。”

“刚好，我还来得及吃。”海伦说，“你不知道我发生的事吧？”

“什么事？”让说。

“哎！我被发现了。”她说。

“这不是真的吧？”

海伦神经质地笑起来。

“他们在田野里逮住了我，把我带去见上尉。好像是昨晚，勒维尼的站长打开了我的箱子，他们把我的日记本当成了和平主义者的传单，并告发我是间谍。”

“这很容易说清楚。”让说。

“是的，只是已向警察报告。”海伦抽噎起来，“他们强迫我离开。但我不走，”她绝望地说，“我只是假装离开，我藏起来，晚上再回来……”

“我可怜的小心肝！”让搂着她说。

“我不想离开你。”海伦说。

“我认为你必须回巴黎。”让说，“不过你只有再申请一张安

全通行证了。你再回来住在离我四五公里远的地方。”

“我不同意！”海伦重复着，“这样一折腾，你会出发上前线去，我再见不到你了。”

“我们不一定走得那么快。”让说，“你知道，现在上面很平静：我再下来……”

“不，那是不可思议的！”海伦说，“我会发疯的……”她焦虑不安地望着他。必须对他讲了，时间有限了。“每时每刻，我都想到你在铁蒺藜网中呼号着死去，你还没意识到……”她的声音沙哑了。

“我知道，”让说，“处在你的位置，比我更难过。”

她转过眼睛。

“如果人家建议你退到后方去你会说些什么？”她说。

“怎么回事？”

“你必须写申请调到空军去，”海伦说，“格朗茹安夫人认识一位元帅，元帅答应很快把你派到沙特尔一带的营房去。”

“你求她办的这事？”让说。

海伦的血液涌上面颊。

“是的。”她说。

让坐下，默默地斟满两杯酒。

“你知道，空军在战争中比步兵更危险。”

“可不是飞行的问题，”海伦说，“普通士兵不飞行。人家让你到办公室或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给马达加油。”她摸着他的手，“我可以住在你的身边，我们天天见面……”

让望着杯底没有答话。海伦撤回她的手。

“怎么？你有什么不方便的？”她说。

“我不喜欢离开火线担任没危险的工作。”

海伦一阵寒心。

“你不拒绝吧？”海伦惶恐地望着他，让踌躇了一下。

“我对你说，我不能很快答应你，我必须思考。”

“思考什么?”海伦说，“人家给你一条活路，我们会重新团圆！而你却犹豫，你怕礼仪上过不去?”

“你知道这不仅仅是个礼仪问题!”让说。

海伦咬咬嘴唇。

“没有你，战争也能打赢。”她说。

“这是没疑问的，”让说，“但对于我，那完全是另一码事!”

“是的，”海伦愤愤地说，“让我从早到晚地胆战心惊，过不幸日子，你却无所谓……”

“我亲爱的小宝贝，”让说，“你会理解的。”海伦摇摇头。

“不，我不理解，”她哽咽地说，“你什么时候死了，你就进步了。”

“然而，如果仅仅为了一条性命的得救，我也就不能进步了。”让心平气和地说。

海伦把手伸进头发里。

“你放几枪也丝毫无关大局!”

“你听着，海伦，在同伴们被屠杀的关头，你能想象我躲在一个平静的角落的情景吗?”

“对其他人我不在乎，”海伦绝望地说，“我不亏任何人什么。”她放声痛哭起来，“假如你死了，我要自杀，可我不想死。”

“除了你自己以外，你连一次也不打算想别的事情?”让说。

他的声音变得硬邦邦的。

“你呢?你就不想自己?”她愤懑地说，“难道你关心过我吗?”

“不是我们的问题。”让说。

“不，”海伦说，她的手在桌子的台布上抽搐着，“人斗争总是为了自己。”

“海伦！我们之间的斗争不会成什么问题的。”

“为了你，我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她仇恨地说，“我去偷，杀，背叛……”

“但我去冒生命危险你却不允许。”

“不能，”海伦说，“不能，从我这儿你是得不到这个允许的。我们在争吵，这你很清楚。”

“假如我们之间还有一点友谊的话……”

“友谊……”海伦说，“我，我有的是对你的爱情。”

“我不理解这种爱法。”让说。

他评判她，评判这种使她全身血液干枯的炽热的疯狂。

“没见到过这样的人。”海伦说，“你，你不爱我。”一种盲目的显而易见的理由突然使她感到撕心裂肺的痛苦。“在你心上我从来没有位子。”

“我爱你，”让说，“但不能只有爱情……”

他在那儿，固执、阴郁、满脑袋钢铁般的思想；他额上的每一道皱纹，眼里的每一道闪光，都似乎在喊道：“我不需要任何人。”

“好，”她说，“我去给你办妥让你回来的手续，不征求你的意见了。”

“海伦，我禁止你这样做。”让说。

“啊！你禁止我！你究竟要我怎么办呢？人人都为自己。”她冷笑着，“迟早有一天，你会特地被调回巴黎的。”

“我请求你，”让说，“我们只有几分钟了，不要这样分手吧。”

“活该，”海伦说，“这无关紧要，因为一个月后你就又到克利希去了。”

“如果你那样做……”让说。

“你和我吹？那就马上吹吧，因为对你来说这是轻而易举的。”

“请你考虑，你伤了我对你的一片挚情，我不能没有尊重的感情而去爱。”

“好啊，你不爱我了，这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海伦！”让说。

她惊跳了一下。一阵沉重脚步声震动厨房的玻璃。有人敲门。

“请进。”她说。

两个副官走进来。让站起来，扣上腰带。

“不要怕。”白脸高个子说。

让微笑了。

“我怕什么呢？”

“马斯格莱上尉想见见你。”

“我就去。”让说。他拿起橄榄帽，迟疑地望着海伦。她一动不动。

“再见。”他说。

“再见。”她说着没有伸出手去。

“人家不会给他找麻烦的，请放心，”小个子副官说，“这是个好战士。”

海伦站起来。

“我想该收拾行李了吧？”

“请吧。汽车在等您。”高个子副官微笑着，“我自我介绍一下：米莱上尉。”

“布拉上尉。”另一个说。

米莱副官把黑皮本子抛到桌子上。

“这是拿到的东西。”

她拿起本子。他们读过了，用男人的眼睛。她一下晕眩了，头嗡嗡地响。房子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那包肉还在多半瓶酒的一旁。仿佛是另外一种生活的记忆。

“我准备好了。”她说。

他们走出门去，她上了汽车。米莱副官坐在她身边。

“那么，你们对我下逐客令了?”她说。

“请相信我们对此也感到遗憾。”米莱说，他带着军人风度和蔼地微笑着。他那白皙的脸上，一双蓝眼睛像两个深不可测的深渊。

“设法搞一个安全通行证，悄悄地再回来。”布拉说。

“我们尽量不碰到您。”米莱说。

“谢谢。”她说。

“噢！有些事我们懂，”米莱说，“我们都是结过婚的人。”

海伦软软地笑了。他们男人的肮脏思想。我微笑了，我受他们摆布。必须无所依恋，我想无所依恋。

“现在你们不能放了我吗?”她说着下了车，她带着乞求的神情望着米莱。

“帮人帮到家，我们必须亲眼看您上火车。”米莱潇洒地微笑着说。

她转过头来，完了，没有任何希望了。进行一些新的活动，得一个多月的时间，而这第二次不会成功的。完了，她盯着铁道尽头空阔的天边。她心急如焚，希望火车快点到，以便单独在这儿，大哭一场，以发泄对他们的仇恨，对他的仇恨。

“一路平安。”米莱说。

她登上踏板，也不答话，走进列车车厢的第一个分隔车室。他们待在月台上，窥视着她。她把箱子放在行李架上，坐在挨着走廊的一个角落里。这是一个漂亮的分隔车室，有着皮软垫长凳。天气很热，三个士兵用四分之一升的酒杯喝着白色饮料，他们是休假的军人，脸上带着微笑。

“来点阿尔萨斯烧酒好吗?”他们之中的一个说，“这是优质酒。”

“好吧。”她说。

士兵精心地用手帕的一角擦擦杯沿，斟上一满杯烧酒。

“您说这酒怎么样?”

“很有名。”海伦说，她干了一杯。她的头产生了轻微的爆裂声：像一团火，炽烈地熊熊燃烧着。不一会儿，她的心变成了一堆灰烬。

“喝不搀水的酒。”士兵们赞叹地说。

“他会看到，我满不在乎，他会看到。”她思量着，脱下外套，卷成一个卷，把头枕在上面，把全身躺平。士兵们笑着，火车行驶着，摇晃着她。今天，一切都结束了。

九

他把我领到了这里。然而从他那身黄褐色的军装和头上的橄榄帽看来毫无恶意。大概当初的倒霉事已经解除了。存在的厄运，还存在吗？在贝吉尼和戈蒙的谷仓里，在火车或卡车上，在路途上，在他站岗的寒气袭人的洞的深处，只有一个无名的士兵，一个无忧无虑、问心无愧的士兵。一切是那样简单，他没有选择的愿望，他愿意这样。他只和自我打成一片。任何问题也没有提出。耸立在他面前的目标毫无争论，十分明确：战胜法西斯。这种宽厚的必然性统帅着他的每一个行动。

出其不意，他陷入愤慨和羞耻之中，他必须重新面对事实。他从那蓝色玻璃窗的大楼里走出来，上尉在他身后带着轻蔑的微

笑。他穿过小广场，他所遇到的士兵们的目光使他的脸一阵阵发烧。是她干的，她竟敢这样干。他们还不知道，但他们会知道的，必须对他们讲，必须对布歇、对杜布瓦、对李维埃讲。他们会知道的。他们会知道一切只不过是谎言：军装、饭盒、醉酒的笑声，在谷仓的干草里活动着我们冻僵的足趾，这是动物那种唯一取暖的方式。当他披上黄色军大衣时，当他把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浓密的头发剪短时，他是那样喜悦！然而，这全是欺骗，我不属于他们那类人，我绝不会像其他那些人一样，赤条条地，光棍一人，没有保护者，没有特权……“特殊调动，做民族印刷厂的校对员。”他曾经常憎恶自己的脸，但这张脸最可耻，一个远离火线的人。

“我向你们发誓，我在那边待不了多久！”

“你回来才是蠢蛋呢。”李维埃说。

桌子上放着六个空酒瓶子，每个碟子里留着一小块骨头，酒的气味没变，红酒洋葱炒野味没变，他们的笑声没有变。但一切都大不相同了。“我没有提任何的要求。”但他们拍着我的肩膀，像鼓励似地说，“去吧，处在你的位置上，人都会这样做的。”但他们没有处在我的位置上，他们很清楚。是我处在这样的位置上；现在，每人有一个位置，他自己的位置。我是孤独的。是我上了火车，逃到远离战争的地方，带着假的休假军人的表情，女人们看着我微笑着，离开了东方车站。在戈蒙，那里还是冬天；这里，已经春天了，女人们微笑着。那些巴黎女人们，生着太黄或太黑的头发，朱红的嘴唇，向这个伪君子微笑着。假工人，假士兵。他们开上前线，队伍里没有我了。我，我在自己的宿舍里睡觉，我在挤满老人和妇女、用纸当台布的食堂里吃饭，我是完全孤独的。我贴着墙根走路，害怕遇上洛朗、戈蒂埃或者彼尔，同志们会知道，他们会说：“布劳马设法调回巴黎了。”即使我喊：“不对，不是我……”他们也会冷冷地望着我：“反正你在那

儿。"是我，一点不错。我的喉咙由于愤怒像打了结似的难受，我真想用我的双手扼住她的脖子，直到我的手里什么也没有。

"喂，我找海伦。"

"喂，我是海伦。"

"我是让。"

电话的另一端传来一声抑制着的惊呼。

"你在巴黎！"

"你不怀疑吧？"

"你对我恼火吗？"

"我有事要对你讲。什么时候我到你那儿去？"

"我还是去你那儿吧，"她说，"马上去？"

"可以，一小时之内见。"

"让！"

"什么？"

"你听着，让……"

"一会儿你再对我说吧。"

我挂了电话。她要来瞧我。我已经轻松多了。我开始上克利希大街了。瞧，我回到我的家，正像以前一样。咖啡馆、商店都一如既往。然而自从九月以来，有些东西变了。以前，我的生活似乎全部封闭在那些高高的房子里。它们一直在那儿，它们将永远在那儿，而我只不过是匆匆的过客。当它们依然故我地耸立着的时候，我可能已消失很久了。我望着它们，它们已经不同了。它们不再是一个不动声色的整体了，而是一堆石头，暂时的平衡顷刻间会被摧毁。过去，房子的每一面都有一种特殊的模样；而今天，它们只不过是被铁架支撑的易碎的物质外衣。歪歪扭扭的铁架，倒塌的墙壁，水泥片，被烧的石头，这大概是明天的景象；而我，我可能还在那儿，我还是同一个人，在那些残砖剩瓦之中。我的未来，不再和这些街道的未来混淆在一起了。它只是

我自己的。没有什么东西能禁锢我。我不在任何地方，我在子弹打不到的地方。突然，不论什么事都是可能发生的。

“我要和海伦断绝关系。”

我曾想揍她，掐死她。然而我离得她那么遥远，所以，我甚至没想到和她中断关系。现在，我要去见她，要对她说。我要对她说什么呢？我望着笔直的林荫道。我是那样孤独，那样自由，不再怀念往事。过去的谎言约束不了我了。假如一会儿之后我再向她撒谎，这将是新的谎言。我的气消了。我惊诧地想：“必须断绝关系，真的。”

既然我知道我的每个行动都违背我的誓言，我还能撒谎吗？明天，我要面对死亡、流放或革命；我要独自一人，自由地向它们迎战。我要不考虑海伦的因素，自己作出决定。

每一次她都仇恨我，设法和我唱反调。我们将是冤家对头。不，那是不可能的，不能继续下去。然而，我能抛弃她吗？我的母亲孤独地待在像缎子那样光亮的房间里，海伦也要孤独地生活。啊！当一个士兵是容易的，再变成一个平民百姓可不那么简单。他又感到，一切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我要去讲。某种事物将是那种到处尚未存在的东西。我慢慢地登上楼梯，平时，我感到像是一个犯罪后的罪人；这次，倒像是犯罪前的罪犯。谎言还是不幸？我应该选择我自己的错误。“本来不该遇见她，我本来不该出生。”可我出生了。

她向我伸出手，转过眼睛。

“你好。”

“你好，坐吧。”

她在我面前显得羞涩而不幸，我感到万分愁闷。

“海伦！你为什么这么做？”

“我不想让你送命。”她挑战似的望着我，“你可以和我断绝关系，你可以打我，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我还是觉得那比炮

弹炸掉你的脑袋好。”

“别以为我能在这里久待下去。这次，我打算好好利用我父亲的关系。”

“那总会办得到的。”她说。我高兴地看到她眼里那种傲慢的光芒。

“你明白不明白你使我们的关系变得不可能继续了?”

血液涌上她的面颊。

“这要由你决定。”她说。

“没什么可决定的。一切全让你搞糟了。”

“噢！你能甩掉我才打心眼里高兴呢，你一有借口就抓住。”

“这不是一个借口，你把我当仇人看了。”

她泪如泉涌：“是的，我把你当成了仇人，”她说，“我恨你，你从来没有爱过我。好吧！不要怕，我会走的，没关系!”

她抽抽搭搭地哭起来。她的鼻子、脸颊顿时变得红肿起来。我感到嘴里有一股脏水的味道。我真想对她说：“好吧，我们不想这些吧。”但我们之间的争吵又很快会重新开始，是那样的激烈。她垂着泪眼望着我：

“真的？你想让我走?”

“我爱你胜过爱任何人，”我说，“但我们之间有相当严重的误会。你从来不想分担我生活中的忧愁，你只是为了你自己才爱我的。”

“我想成为你的生命。”她绝望地说。

“这是不可能的，我不能像你希望的那样爱你。”

她的脸色变了：“你不爱我!”她说，她用那双哭肿的眼睛默默地望着我，用舌头舔舔嘴唇，“那你为什么还说你爱我呢?”

“我对你曾有那么多的柔情。我想爱你。”我踌躇起来。“我本应理解我们相差太悬殊，这并不是你的过错，但我们不能共事。”

“你不爱我。”她慢吞吞地说，“真可笑，我却那么爱你。”

她注视着空中，仿佛是在辨认一篇难以理解的文章。我心里充满痛苦，难道我不爱她吗？她显得和我那样亲近，我真想去安慰她一番。

“真奇怪，”她又说，“尽管一切是那么清楚，可为什么人家还会爱我呢？”

“海伦！”

她已是孤独一人，离我很远了。而我却还感到她就在我的身边，而且那么亲切。

“什么？”

我低下了头。我什么也不能对她说，这种浸漫于心头的毫无结果的痛苦，有一种泥沼的味道。

“原谅我。”

“噢！我不怨你。”她说，“这样最好，像这样，我就再也不能骗自己了。”她站起来，“我想走了。”

“你不要这样走嘛！”

“为什么不呢？”她环顾了一下屋子，带着惊讶的神情，把目光落在我的脸上：

“你不知道这一个月里我过的什么生活，你不会想到的。那是……那是下流的。”

“你愿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我说。假如我不是克制着，眼泪就从眼里流出来了。“不该轮到我哭鼻子。”

“我永远不想见你了，”她说着，强作微笑，“再见。”

这似乎是不可能的，我不解地望着她。仿佛人家把我自己那只带着瘢痕、有着特殊指甲的手放在了大口玻璃瓶里给我看。

“再见。”她重复着，向门口走去。我心里一阵痛苦，向她扑过去：我爱她，但她已走出门，下了楼梯。我爱她，因为她真挚、勇敢；我爱她，因为她走了：我不能再召回她。海伦！我的

手指在椅子扶手上抽搐着，控制着这明天再也喊不出来的呼叫。木已成舟，这些泪水，这种痛苦，在以前都是不存在的。现在，就在那里，是由于我造成的。

我这样做了。为什么这样做，偏偏这样做呢？你会哭的，但这是徒劳的，因为明天我要爱你。可能你无故地死去，无故地贴出黄色广告。门打开了又关上，一大清早子弹劈里啪啦地落下来。无缘无故。他无缘无故把我带到这里来。我们会战败，或者他们会成为战胜者，而我们不是。而这一切罪恶，并不为了什么。他没有想到这个，他说：“必须干点事情。”他做了什么呢？只有你的死亡和今夜是确实的。

“我再也见不到她了，结束了。”他在载着他远远离开巴黎的火车上想。就像一道伤口，过去使它渐渐愈合。现在，决定就在他身后，俨然像他那并没有选择而存在着的东西。决定了。这并不比生活着更有罪。与海伦的断绝关系，恰巧和拯救港饭店的晚餐上的心情一样。决定杀他，杀了他，死了。加之，他不再向后瞧了。他展望着未来，那铁路的尽头。唯一的目的，唯一的道路。他又成了一名士兵。美妙的假期！他现在独自一人，就像在童年的草地上，嘴里无忧无虑地大口嚼着苹果，一切都称心如意：他可以毫无危险地舒展四肢，打滚，索取，毁坏；他的动作不再威胁任何人，他的对面不再有任何人。人们只不过是一些工具，或是障碍、背景，所有的人声都已沉寂：窃窃私语、威胁的声音、内疚和不安的声音。只听到隆隆的炮声，飞机的轰鸣和子弹的呼啸。平静得就像嚼苹果，他投出手榴弹，朝着敌人扫射。大炮对准坦克和装甲车射击；他呢，他的工作是对准人射击。但水泥、钢、肉这一切统统都是材料。他只不过是路上挡住另一架机器的那架火与铁机器上的一个齿轮。“是我。”一天他躺在树林的边缘，手里握着机枪，惊愕地想；他想大笑；在那边，在耕种的田地里，人们纷纷中弹倒下，他心里一阵轻松。“是我杀死他

们的。”这仍然心安理得，因为他知道他想做什么。他只是一个士兵，他大笑，因为他不能再做任何坏事。他感到左肋一阵疼痛，于是他知道他什么也干不成了，他算完了，又完全得救了。他感到安宁像高烧一样在他身上升腾起来。

他在氯仿的气味中，在床单的一片银白中，在安静而明亮的大厅里，他晕头转向了——只有一种莫名的痛苦。时光不再流逝。只是这一刹那间，永远是这一刹那——这种纯正的疼痛，像风中的残烛一样，稍吹即灭，对任何人都无异样，不再闪光，不再发热：闪着鬼火。

渐渐地，世界在他周围重新成形，他又活在人世间。伤口变成了伤疤。“发生了什么事?”他赤着脚躺在亚麻油毡上，军队向塞纳河撤退。据说德国人已经到达鲁昂，但他还想再睡一会儿。

他清醒了！他溜进一个办公室里，扭动无线电开关，一个有着沙哑口音的人在讲着法语：“我们进了奥尔良。一位上尉带着几个人攻进凡尔登，凡尔登被攻陷了。法军被我截成五段，溃不成军，成千上万的难民阻塞了交通，整个法国瓦解了。”这个傲慢的胜利者的声音宣布了他们的胜利。我们的失败，我的失败，他垂下头去，长时间地一动不动，嘴里充满难以忍受的酸辛滋味，这是他人生的滋味。因为我们不敢有什么愿望。能听到保尔的声音，他又见到了布吕芒菲尔德的目光。春天的傍晚是多么温和，像红旗和三色旗在七月十四日的阳光下呼啦啦地飘着！“没有政治罢工。”这种谨慎，这种荒谬的谨慎！“我不把我的祖国推向战争。”然而这就是战争，是失败的战争。我不敢杀戮，我们不想死，这个绿色的寄生虫，活活地吞噬了我们。妇女和婴儿，在沟壕里倒毙；在这已经不再属于我们的土地上，大片的铁网倒下来，围住了成千上万的法兰西人。这是由于我，每个人对这一切都有责任。一天夜里，在钢琴下面他抓着地毯。这个苦涩的东西，就在他喉咙里。但他还只是一个孩子，他哭过之后，睡着

了。一天夜里，在大街上，他像疯子似的走着，眼睛盯在一个血淋淋的面孔上；但他还年轻，生命在前面，他力图忘记他的罪恶。现在，生命已在他身后了，他的生命失去了生机。已经太晚了，一切都结束了。因为我想做一个纯粹的人。然而原始的腐败就潜伏在我的身上，夹杂在我的血肉里、呼吸里。我们被打败了，人们被打败了。在他们的处所，一种新的兽种在大地上增殖。生命的盲目的跳动和死亡的腐败混淆在一起了。生命肿胀起来，又以同样的速度拆散开来，肌肉、血液、精液以及饱食终日、蠕动的蛆虫。毫无见证，不再有人了。

闪光而空寂的大路直伸向巴黎防线，它显得那样宽阔，只有几辆自行车打破沉寂。稀稀落落的行人，露出孤独的神情；在逃亡、不幸、恐惧之中，他们感到自己的孤独，他们惶恐地缩在自己的处境中，陷入灭顶之灾就如同陷于荒漠之中。他自己也是孤独的，从早晨起他就兜里装着复员费在巴黎游荡，印刷厂关闭了，母亲已远离巴黎。海伦的情况他一无所知，他独自一人，但他在这儿。孑然一身。他在阴惨惨的太阳下走着。商店像一堆沉睡的铁；透过红色肉店那饰有鳞片的栏杆，可以看到光秃秃的大理石；在食品店关着的门前，排着一长溜黑压压、无生气的队伍。这回轮着法国了，维也纳、布拉格、巴黎。在一家帽商的橱窗里，贴着一只肥大的黄蝴蝶："犹太人之家"。他走着，"我在这里。但我能做什么呢?"像其他所有人一样的孤独。他们，他们仍在排着长长的队列行进在荒凉的林荫路上，带来一阵皮靴的浓烈气味，像一片乌云一样。卡车把他们一车一车地载向蒙马特尔高地，他们迈着整齐的步伐绕着泰特广场转一圈，一阵哨声，队伍四散开来，十二三个人一伙去到圣心教堂拍照。他们杂沓的脚步声、鞋后跟的落地声、歌声都响成了一片，他们的军装在人流中织成一张宽大的灰绿色的网，是那样浓厚，那样混杂，难以辨认出每一个人的面孔。他买了一张报纸，愤愤地把它揉皱。我

们的主人。而我们将低着头，无言语，不动弹。在波兰，妇女从窗口射击，在井里撒毒药。

“只有忠实地合作，才能避免新的灾难。”戈蒂埃说，“你为什么拒绝呢？我们还从来没有机会使《工会生活》影响面这么广。你决不会被迫去写你思想之外的东西的。”

“我想写我想的一切，或者什么也不写。”

“但你可以全写出来。”戈蒂埃说，“总之，我们不是一直希望在欧洲有一个更加公正的组织吗？”

他约我在咖啡馆露天座上和我见面。这是一家资产阶级的大咖啡馆，在那里他仿佛非常自在。那大概是他现在经常光顾的地方。在我们的周围，是麇集着的穿绿色军装的人们，他们之中那小型望远镜盒子的黄皮子，说明他们是一群旅游者。一个妇女从桌子之间走过，她脖子上挎着一个篮子，篮子里摆满照片、带插图的报纸和《巴黎回忆录》，好像是在美国人的时代。他们漫不经心地把印有不熟悉图案的新纸币雨点似地投向篮子里；他们几乎都订了香槟酒；他们把精心包起的包裹放在冰桶旁边：巧克力、香料、丝绸衣服；他们亲切地把最后几家巴黎高级商场采购一空。

我气愤地望着戈蒂埃：

“很多同志都和你有同样想法吗？”

“有几个人，”他的眼避开我的目光，“我们中没有一个人希望这场战争发生。”

“我们所希望的也不是这种和平。”我说。

“是和平。”他说。

维也纳：和平。布拉格：和平。巴黎：我们还要说：这是和平吗？

我看到邻桌上一个德国女人正把一包茶叶千叮咛、万嘱咐地交给一个堂倌。她把一瓶果酱、黄油、糖放在桌子上。我们喝的

是加糖精的燕麦咖啡。他们在我们中间，犹如殖民主义者在土著人之中，俨然两个世界，上下两层。他们的世界是汽车加飞机的世界，而我们只靠两条腿，至多骑自行车。对我们和对他们，距离不一样，一杯酒的价钱也不一样。

“你真的接受要把报卖给他们吗？”我说。

戈蒂埃冷漠地微笑着：“在他们控制下为什么不工作呢？达拉第[1] 的控制不使你感到别扭。”他耸耸肩膀，“我原以为你是很开明的人。”

“我是开明人，你也如此。你知道你的所作所为。”我站起来，“如果你还能在你干了那事以后在镜子里照照你的尊容，那就太好了。”

我气得战栗起来，生戈蒂埃的气，生我的气。难道保尔是有道理的？难道我们是叛徒？我带着焦虑努力驱散对过去的追忆：不，我们不是尿包；不，我们没有背叛。证明它，证明它，该由你证明这一点。然而，我这不是正在背叛吗？我和戈蒂埃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呢？他匍匐在他们的面前，他比我更坦率。我也一样，我是同谋。我在巴黎走着，每一步都证实我是同谋：我吃着他们赐给的面包。而这面包是他们拒绝给雷纳·布吕芒菲尔德，拒绝给马塞尔，拒绝给饥馑的波兰人的；关我的笼子是又宽又大的，我温驯地在笼子里走来走去。“不，”他说，“不。”他瞧瞧自己颤抖的手。这是无济于事的，愤怒无济于事；问题也是无济于事的，过去的事已经成为过去了。使自己的过去成为奴隶的过去还是成为人的过去，要由我来决定。证明这一点吧。我将拿出证据来。

“能做什么呢？”他知道：事在人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人。每一个人都会一个接一个地去找他的同志。如果我们团结

---

① 达拉第，1938 年至 1940 年的法国总理。

起来，我们就不孤立了。只要我们斗争，我们就不会被战胜。只要我们在那里，我们就会有人。他讲着话，他的同志又去找另外的同志，也要讲话。就这样，他们讲着，于是便团结起来，投入斗争，他们不是失败者。

“光说还不够，”他说。

两位先生惴惴不安地望着他，两个人的头发斑白，莱克勒克生有一副和蔼的面孔、一对恬静而湛蓝的眼睛；帕芒蒂埃的仪态端庄而冷峻，他有一种新教徒的气派。

“我知道，”帕芒蒂埃说，“一种危险在等待着我们，由于缺乏明确的目标，我们的会议变成了一个学社，或是空谈的沙龙。”

“因此，我们自愿与你们合作，创办一份报纸，”莱克勒克说，“同时起草和散发传单。”

“那也还不够，”他说。

莱克勒克摸着下颔，流露出困惑的神情。屋内鸦雀无声，帷幔、厚厚的地毯、皮门，与外部的声息隔绝开来。在笨重的桌子上，有三杯咖啡和几杯斟满的烧酒。靠墙摆满了书籍。

“怎么办呢?”莱克勒克说，他又热烈地补充道，好像要避免别人的答话似的，“我们也可以设法成立一个情报处。”

“这一切只不过是行动的伪装而已。”布劳马说。

一阵沉默。现在，在这所门窗紧闭的文明的民房里，充满着一种威胁。这些人不是尿包，他们是敢想敢干的人，这就足以使他们和平共处了。这和和平有关，他们敢于冒任何危险。

帕芒蒂埃鼓起勇气：

“没有什么打算?”他说。

“真正的行动。”布劳马说。

“行动。”莱克勒克说。他不看布劳马，而是看着他自己。对这个竖在他道路上的障碍，他从来没有想过请求援助之手来把它托起来。要靠自己的手。他能摧毁它，他怕的是他自己。

“用钱很容易搞到武器，”布劳马说，“我有一些同志能够制造爆炸品，我们准备去冒各种风险。”

“噢！钱可不缺。”莱克勒克说。

“从原则上说，我不是拒绝暴力，”帕芒蒂埃说，“但我向你坦白地说，杀他几个无辜的士兵我看无所裨益。”

“要是我们愿意建立一支能团结群众、能坚持到战争结束并建设未来的武装力量，那就必须行动，”布劳马说，“我们只有行动才能存在。”

“我们大概能搞些破坏活动。”莱克勒克说。

“必须进行引人注目的行动，”布劳马说，“使满载给养的列车出轨，使征用的旅馆爆炸，必须让法国人感到战争还在继续。你们想不想去组织一支抵抗力量，要使整个国家动荡起来，不是你手里举着 V 字牌、洛林的十字架和钓鱼竿所能奏效的。”

“您想到那会引起可怕的报复吗？”帕芒蒂埃说。

“想到了。”布劳马说。

“想到了？”

帕芒蒂埃愤怒地望着布劳马。“我知道。”布劳马想。谁能比他知道得更清楚呢？手里捧着一杯速溶咖啡，他慷慨陈词，讲得上气不接下气。但问题并不在他。

“这些就是我所预料的报复，”他说，“为了不使他们的合作政策成为不可能，为了使法兰西不在和平上睡大觉，必须使法国人流血。”

“你就这样毫无内疚地让无辜者遭受枪杀？”帕芒蒂埃说。

“从这场战争中我懂得，我们想少流血和他们让流血不是一码事。”布劳马说。“过去以为，不搞政治罢工，我不会把自己的祖国推向战争，可战争来了。够了，够了。这是荒谬的谨慎。想一想吧，我们的抵抗或许使生灵不再涂炭。”

他们沉默了好久。

“但如果我们的努力失败，”帕芒蒂埃说，“我们就会担无益的罪名。”

“那是毫无疑问的。”布劳马说。反正人总是罪人，可这两个人不知道这一点，罪恶使他们害怕。“但我们必须设想成功。反正你们的游击队员冒着坐牢和杀头的危险。一份报纸，几张传单，这也不见得就是可靠的事业。”

“这不是一码事，”帕芒蒂埃说，“我们的成员已经不怕冒险了。”

“他们接受是为了取得一些成果，如果我们使他们处于危险境地而又毫无益处，那么我们就是犯罪。不，”布劳马说，“我们只是应该关心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为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做些什么。”

“您认为所有这一切的办法好吗?”莱克勒克犹豫不决地说。

“相反，这一切办法都不好。”布劳马说。

以前，他也曾梦想过通过响当当的理由来确保他的行动，但那就太容易了。必须进行无保障的行动。顾惜人的生命，比较一滴血和一滴泪的价值是不可能的，没有什么可计较的了，钱管用，他人的血也管用，不会付出太大的代价的。

“对。我们有钱。”他对同志们说。

“你真行!”洛朗说。

“我们终于要真的干起来了!”贝尔蒂埃说。

大家都笑起来，但有几个人，脸上显出忧虑的神色。

“我们要知道为谁而干，”朗方说，“如果是为了雷诺[1] 和达拉第回来……”

“不。”布劳马说，“你知道，我们是为了成为强者而工作，为了明天我们起支配作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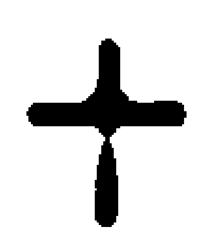
[1] 雷诺，1940 年任法国总理。

“我们能强大吗?”朗方说。

“真的,”贝尔蒂埃说,“怎样才能确保我们斗争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资本,为了盎格鲁—撒克逊的帝国主义,为了反动势力的胜利呢?”

他犹豫了一下。“真的,人们从来不知道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的前景。”他犹豫了,但他用肯定的口气回答道:“无论如何总比法西斯好。”他自己在思量:“至少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希望什么,必须为希望而行动。其他的和我们就没关系了。”

他希望。他了解他的希望,他去。不知他在做什么。在旧的谨慎的圈套里踏步不前,盲目地投向未来,放弃怀疑:可能一切都是无用的,可能我是无故地把你杀死。



海伦合上书，她读不下去了，望着先贤祠上黑沉沉的天空。天气像孕育着一场暴风雨似的，但不是乌云遮住了太阳，而是黑色的灰末在凝重的空气中飘浮着。据说，巴黎周围的几个油库起火了。天边隆隆地响着，白色的气浪在幽暗的天边滚动着。他们逼近了，威胁像铅块似的压得城市喘不过气来。很快，最后一道防线就要让步了。他们涌入街道。海伦身旁马约咖啡馆的露天坐位，一派萧条景象。苏福洛街，一片荒凉。街上没有一辆出租汽车，小汽车在圣米歇尔林荫路上向奥尔良门单向飞驰。林荫路成了贯通全城的大道，逃难的人流在路上像巨浪一般推进着。然而，一个穿蓝色工作服的人，爬在梯子上，正在小心翼翼地擦拭

路灯的灯泡。

“明天，他们会在这儿。”海伦有点不安地眺望着。小汽车该在十点钟到达。她不想待在这座毫无出路的城市里束手就擒。沉寂笼罩着房屋正面模糊难辨、凝滞了的大街。每个居民比失落在被水淹没的荒野里的灾民还更孤独。很难相信天塌地陷了，房子还会完好无损，栗树还会无所变化地在卢森堡公园里投下完好无缺的影子。

在车水马龙之中，逃难的载重汽车载着整座村庄缓缓地鱼贯而进。一辆辆宽大的四轮马车，由四五匹马拉着，车上装满干草，草上盖着绿色苫布。车子的两头，堆放着床垫、自行车；车子中央，一家人像蜡塑般地挤在一把大伞下。俨然是一幅活生生的有着庄严队列的油画。海伦眼含热泪，“我也一样，要过逃亡生活了。”

她望着她的周围，过去全在那里，在乱石丛中。在这条人行道上，她和伊冯娜，在上帝仁慈的眼下玩造房子游戏；在这路灯的旁边，保尔曾经拥抱过她；在这条街的高处，让说过“我爱你”。她擦了擦眼泪。上帝是不存在的，她不爱保尔，让不爱她。一切海誓山盟都是假的。未来在城外一滴一滴地淌着，过去变成了空壳。一个没有生命的空壳不值得遗憾，它已落进尘埃。再也没有过去了，也没有逃亡了。整个人间只不过是一去不复返的流亡。

洗涤东西的女人走出咖啡馆，手里提着一只沉甸甸的箱子。这时，泰立叶先生的小车靠人行道停下来，德妮兹的头出现在车门：“您不知道，”她喊道，“人家刚告诉我们说，俄国人和英国人开进汉堡了！”她拎起海伦的箱子。车子里，车顶上，箱子成堆。车灯前系着一辆自行车。海伦坐在后边，在德妮兹的一边。汽车开动了。一家大食品店的老板正在开栅栏门，门后边放着糖水水果罐头。所有商店都关门了。

“您的父母不走吗？”德妮兹问。

“他们怕有人抢商店。”海伦说，她又大声地补充说，“您的父亲把我带走真是太好了！”

“这是很自然的，”泰立叶先生说，“房子很大住得下的。”

小车越过奥尔良门，上了一条小路。在门关户闭的别墅之上，天空湛蓝湛蓝的，令人觉得仿佛要去度周末似的。“完了，”海伦想，“全完了。”她久久地待在那里，在栗树的树荫下，嗅着扑鼻的蜂蜜和可可的香味，她将永远待在这被淹没的城市，她，连同她那失去爱情的幽魂，也永远地被淹没了。这个倚在车门上的人，只不过是成千上万其他难民中的一个。

在大路上，人们看到与刚才在林荫路上看到的那些相像的车辆在鱼贯而进。但这里的车子是分开来的，农民们在马旁步行着，车上备的干草已吃去大半。这些人该是来自远方，走了很长时间了。人们时不时地发生争执，阻住道路，小汽车便停在一长列车队的后面。车队在飞扬的尘土中慢慢地行进着，像一只脱节的毛虫。

“明天就不能再行驶了。”泰立叶先生说，他扭过头来问，“你们饿吗？”

“可以在邻村稍加休息。”德妮兹说。

“我们停下吧。”

在开着玫瑰和鸢尾花的房屋前，农民们窥视着：

“怎么？巴黎失陷了？完了？”

“巴黎不是法兰西。”泰立叶先生说。

他们走进一家咖啡馆。德妮兹打开包取出三明治、奶油点心、水果，并要了咖啡。一个妇女正坐在无线电一边听新闻公报。泪水不知不觉地涌入海伦的眼睛，她自己也辨不出这是她的泪水。这是她的眼泪，几个月来她已饱谙绝望和愤怒的滋味；眼泪热辣辣的，有点咸味，毫不痛苦地在她双颊上流淌着。

一辆小轿车，像是为了参加乡村的化妆晚会似的，车上盖着树叶，停在门前。它从埃夫勒来：埃夫勒像一片火海，卢维埃燃烧着，鲁昂燃烧着。整整一下午，人们在路上遇到一辆辆从诺曼底下来的车子，满载着床铺，用树枝伪装着，俨然一派过节的景象。“出事了，”海伦想，“不是我出事，我不存在了。这世界出事了。”已经不是撤退和躲避的问题了。在那注视着车辆、充满焦虑和抱怨的眼睛里，在那逃亡者风尘仆仆的面孔上，在堆满着被子、瓶瓶罐罐和椅子的卡车上，可以看出失败就在其中。

傍晚降临了。车子靠着斜坡停下来，马匹卸了套，人们燃起火来烧汤，准备搭帐篷过夜。海伦想到反映美国西部生活的侠客影片中的那些开拓者；想到她如果是在遥远的大地上，她也会感到迷惘。好像时间已变成未经勘察的辽阔空间。

“到拉瓦勒我们停一会儿，给妈妈打个电话告诉她我们到了。”泰立叶先生说。

整整一天的时间，这座安静的小城充满一片混乱的嘈杂声。人行道上挤满汽车，地上全是黑压压的难民。最富有的人，精疲力竭地倒在咖啡馆里挤得满满的桌子前的椅子上。其他人索性就躺在地上了。

“你待在车子里，我和海伦到邮局去。”德妮兹说。

她拉着海伦的胳膊，她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的脸色变了。

“我们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快断了，”她说，“我再也听不到马塞尔的消息了，两眼一抹黑，我怎么生活呀？”

海伦没作声，她无话可答。两眼一抹黑，什么也不知道了。只有这疲惫的躯体，这颗跳动的心，它已不为任何人跳动了，它是一颗无名的心。历史在前进，我不再有历史，不再有生活，不再有爱情。

“布劳马受了伤算他幸运，”德妮兹说，“人家肯定会把他撤

到南方去的。”

“那是肯定的。”海伦说。她从布劳马太太那里知道他受伤了。

她们走近小窗口，一阵灰尘和汗的气味扑鼻而来，一群疲惫不堪的人挤在那里。一个身材矮小、穿黑衣服的妇人，衣衫寒酸，一副乞求的面孔，问电话员说：“劳驾夫人，能给我挂个电话吗？”电话员耸耸肩膀。“怎么样，夫人？”那妇人重复着。

海伦捅捅她的肩膀：“您往哪里打电话？”

“给村子里打，通知一下我的丈夫。”

“什么村？”

“卢吉叶村。”妇人说。

“等一等，我去给您找一找。”海伦说。她浏览着电话号码簿，卢吉叶：在曼恩－卢瓦尔①。“打给谁呢？”

“我不知道。”妇人说。

卢吉叶有十来个电话用户。“给布萨德打？”

“噢！不，他不在村里了。”

“给费隆纳？”

“哎呀！这个时候他在田里！”

“给麦西埃？”

“噢，不！”妇人惶惶不安地说。

在这个异常辽阔的世界上，她失望得不知所措了，我们都不知所措了。我还永远存在吗？海伦想。有什么用呢？何必去伸手呢，这颗不再有所希求的心还在希望着什么，不由自主地希望着？一无所求，一无所知。简单地在那儿存在着，全神贯注地倾听着生活的汩汩流水声，它流走了，但不知流往何处。

她们向汽走去。泰立叶先生靠在引擎盖上卷了一支烟。

---

① 曼恩－卢瓦尔，法国省名。

“俄国人没有动，”他说，“而意大利人刚和我们宣战。”

每天都有汽车满载着妇女、儿童、床上用品、餐具从村里经过。他们来自阿朗松，来自莱格尔。一天晚上，司机喊道：“他们在勒芒。”屋里的居民都面面相觑。德妮兹的父母、祖母、姑姑和两位嫂嫂都来了。泰立叶先生的车太小了，装不下家里这些人，又没有人愿像那些面容憔悴的难民那样，晚上去乞求过夜的住处。

“我们需要给村民们做个榜样，”泰立叶太太说，“我们待在这里。”

第二天，从黎明开始，村民们乘着小卡车、带篷小推车或骑着自行车逃跑了。那些不能逃走的人，关上商店门、家门，跑到田野隐蔽处躲藏起来。远处传来隆隆的炮声，时而听到一声沉重的爆炸声：是昂热油库爆炸了。

“我们把帐篷支在大草地的边上。”泰立叶太太说。

“何必呢？”德妮兹说，她和海伦在公园里。她望着从拉瓦勒开过来的卡车在阳光下驶过大路。三十公里。最多几小时。正在缔结停战协定，人们会安定下来，不再互相残杀了。

“为谨慎起见，还是不露面好。”一个荷兰人说，他和妻子、岳母住在公园小亭子里。

泰立叶太太抱着被子走开了，荷兰人手里提只装满食品的篮子，跟在她后面。德妮兹把胳膊肘撑在栏杆上。

“马塞尔肯定当俘虏了，”她用低沉的声音说道，“他们被后边来的敌人俘获了。”

“他们可能来得及逃跑。”海伦说。

德妮兹咬着嘴唇：“几年之内我见不到他了！”

一辆卡车突然出现，这是一辆军用车，载着唱着歌的法国士兵。又一辆卡车开过来，又是一辆。人们笑着挥手。

“他们唱着歌!”德妮兹说。

“战争结束了，他们得救了。”海伦说。

一辆小轿车停下，四个军官下了车。他们像贝吉尼的军官，风流，潇洒，脸上一对神采奕奕的眼睛像两洼秋水。“这是去绍莱的大路吗?”一个年轻的副官问。

“是的。”德妮兹说。

“必须了解的是，”少校露出困惑的神情，“是不是德国人在昂热。”他果断地望着德妮兹，“邮局在哪里?”

“我带你去。”德妮兹说。她推开栅栏。两名士兵走过来，没有戴头盔，也没有带枪，拄着拐棍：他们是从德国人手里逃出的俘虏。街上没有其他人。精锐部队的卫兵前一天还在大街上神气十足地散着步，肩上扛着枪，如今一下子踪影全无了。

邮局里电话铃响着，门被锁着。

“负责人在哪里?”少校用激怒的声音说。

“在田野里某个地方。”德妮兹说。

“荒谬!”少校说。他向副官打个手势，“给我撞开!”

副官用肩膀猛撞了一下门。

“这不灵，”他说，“必须有一把斧头。”

“我去找一把。”德妮兹说。

现在，大炮和坦克在穿过村庄。

“他们很快会到这里来吗?”海伦说。

“一小时以后，但不要怕，什么事也不会有的，”副官说，他矜持地微笑着，“我们到卢瓦尔河去牵制他们。”

“给，斧头，”德妮兹说。副官敲掉门锁。少校进去，过了一会儿又走了出来。

“我们走吧。”他说。他们慢步走向轿车。

“回到你们的屋子里去吧。”副官说。

“我们就回去。”德妮兹说。她望着轿车向卢瓦尔河方向驶

去。坦克继续鱼贯而进，它们的机枪朝向南方，把背朝着敌人。

“德妮兹！”泰立叶太太叫道，“你们俩快来！”

“我待在家里，”德妮兹说，“我想看看。”

“你父亲不想让任何人趴在窗子上，那样会惹祸的。”泰立叶太太烦躁不安地说。她脖子上带着珍珠项链，手指上带着她所有的戒指，她的腹部、胸脯奇特地鼓胀起来。

“但我不开窗子，”德妮兹说，她笑了……“你以为你的首饰就保险了？”

“他们不敢从我身上把它们拿走。”泰立叶太太说。

海伦走进德妮兹的房间，她们走近窗子，轻轻打开百叶窗。又有一辆坦克在窗下驶过，而后，路上显得荒凉起来。海伦心里一阵难过。此刻，这个村庄被弃在法国和德国之间，没有主人，没有法律，没有保护，所有护窗板都关上了。屋子里只有阳光的白色，此外再没有别的生机。人们仿佛置身于世界之外，在无穷无尽、神秘莫测的狂热中漂浮着。

“啊！”德妮兹叫了一声。她抓住海伦的手。街角上一个东西爆炸了，餐馆的窗玻璃炸成碎片。接着是一阵出人意料的寂静，突然一个带喉音的声音不知喊了句什么。他们出现了，都是高个子、黄头发、红脸膛。他们严肃地走着，目不斜视，步履稳健得像钢铁一般。他们是战胜者。“我们是失败者。我们是谁？”德妮兹眼中涌出泪水。“那么我呢？”海伦想。“法兰西被打败了，德国胜利了。而我，我在哪儿呢？不再有立足之地了。”她用干涩的眼睛望着走过的外国的人、马、坦克和大炮，她望着历史成为过去，这历史不属于她，不属于任何人。

荷兰人站在坐在人行道边上的三个妇女面前，摇晃着空油桶。

“没有汽油了。”他说。

他的岳母耸耸肩膀说："那是自然的。"

有人说一辆油罐车要来，这事已经嚷了八天了，现在没有人相信了。

荷兰人放下油桶："我很想吃东西。"

"我也想吃，我饿——饿。"那个年轻的妇女说话还带着孩子的口音。

"他们不会这么早就吃东西。"海伦想。勒芒的商店比遭受过蝗灾的田野还萧条。没有一块面包，没有一个水果；在挤满穿灰绿色军装的士兵的餐馆里，没有一个坐位。海伦不再感到饥饿，她不再有任何需要。她可以长久地坐在这些石块上，待在被太阳侵蚀的长长的阴影处。整条街上都有行走的人，从省政厅广场到高耸着德国军事指挥部的大广场，他们手提油桶和空喷水壶。他们时而把手里的器皿放在地上，坐上片刻，而后又站起来走了。不一会儿，又会看到他们从另一边走过去——从军事指挥部到省政厅广场，他们手里提着油桶和喷水壶，他们像西绪福斯①，像达那伊得斯② 那样不知疲倦。在这地狱般惊人的炎热中，生活运转得越来越快了，俨然像一个疯狂旋转的轮子。成千上万辆汽车停在围满妇女、孩子的土台上，这些妇女和孩子带着忧郁的目光，在车阴下坐在包裹上、床垫上，或者坐在地上。另一些闪闪发光的灰色汽车、装甲车在大街上一辆接一辆地行驶着；广场周围，摩托车响着嘟嘟的马达声。咖啡馆出出进进的人流一直涌到马路上，成千上万的年轻士兵，穿着新军装，紧扎着皮带，挤在咖啡馆里。列队的士兵，迈着沉重的步伐，在被饥馑、酷热折磨

---

① 西绪福斯，科任托斯王，埃俄罗斯的儿子，暴君，被罚在地狱中推巨石上山，及到山顶，巨石滚落下来，于是再推。

② 达那伊得斯，埃及王达那俄斯的女儿，共五十人，因杀死丈夫被罚往没底的桶里倒水。

着的人流中劈开一条小路。一个扩音器里播送着军乐。这火辣辣的声音，这没有生气的光亮，这昏黑的气氛，从黎明时就存在着，永恒地存在下去。海伦也成为永恒的了。血液在她血管里枯竭了。她在那里，没有记忆，没有欲望，永远如此。

“请坐，”荷兰人的岳母说，“别那样老摇摆着胳膊了！”

荷兰人微笑着。他面色红润，一头金发，微笑时牙齿突露在下唇上。他的微笑像孩子那样天真，像尸体那样凝滞。

“注意阳光。”年轻妻子说。她头上戴的白帽子从前一天就不鲜艳了，她的袍子也弄皱了。她把一个三角形的大纸筒递给丈夫：“把它戴在头上。”

他乖乖地服从了，坐在车子的脚踏板上，一直微笑着。

“天气真热。”他说。

他的岳母生气地望着他。

“前天在昂热您还说您会有二十五公升油呢。”

“队伍太长了，”他用息事宁人的语调说，“我还以为德国人路上会供给我们必需品呢。”

当海伦接受车里的一个坐位坐在车里时，她也以为油箱是满着的。无论如何，她并不后悔自己已出发；尽管德妮兹很殷勤，但她感到她在这个人口过多的家庭里是不受欢迎的。

“省政厅前面还有人。”她说。

“应该去瞧瞧。”荷兰人的岳母说。

“肯定和今天早上一样。”荷兰人说。

“去瞧瞧。我们不能在车上再过一夜了。”他的妻子说。

她穿着她那路易十五式的薄跟鞋站起来。海伦也跟着他们站起来。有二三百人在栅栏前，腋下夹着空空的器皿。妇女们在一个戴有羽饰大帽子的国民公会议员的塑像下面烧火做饭。另一些妇女，则躺在床垫上睡熟了。

“人太多了。”荷兰人说。

“耐心一点，我亲爱的。”他妻子说。她用一块带牙边的小手帕捂着鼻子。

“味很难闻。”

海伦把脸转向一个妇女：

“人们究竟在等什么？”

“在等着拿号，为了得到汽油票。”

“拿了汽油票就会有汽油吗？”

“等汽油来的那天。”

栅栏打开了，人们一涌而进，海伦被挤到一个大走廊的深处。一个男人在向人们分发他们视如珍宝的小方纸条，海伦拿着发给她的小纸条，跑向排在队尾的荷兰人。

“我有一个号！”

“在这个城市的那边好像有一个库房，配给五公升汽油。”岳母说。

“对。”荷兰人说。他愚笨地望着手里的小纸片。

“那你快去瞧瞧。”岳母说着，推了他的肩膀一下。

“我，我去转一圈。”海伦说。

她朝着车站方向走去。没有这五公升汽油，但必须想办法离开这座灼热而又被劫掠一空的城市。活该荷兰人倒霉，可能她会爬上一列火车的。那边，铁路的尽头，有一张舒适的床，有香料蜜糖面包、热茶。她走进大厅。

“几点有去巴黎的车？”她说。

“我们不接受去巴黎的旅客。只有到沙特尔的车。”售票员说。

海伦犹豫了。成群死气沉沉的人们躺在地上，在大小包裹之间，不知他们在等着什么。什么都比这愚蠢的忍耐好。

“给我来一张去沙特尔的票。”

“你有证明你住在沙特尔的证件吗？”

海伦转过身去。

“既然人家不让我们动弹，为什么又说让我们回家呢?”一个把孩子放在膝盖上的妇女说。

“似乎巴黎在闹饥荒。”一个男人说。

“可这里呢?”妇女说，“他们宁愿让人当场饿死吗?”

海伦望着她。她蓦地感到膝盖上孩子的重量和妇人那充满抱怨的眼睛的呼唤。她惊讶地听到自己过去的那种声音：“他人存在着，必须装聋作哑，去瞧他们。”她在妇人面前停下脚步。

“您是巴黎人吗?”

“我是圣德尼人。”妇人说。

“我的同伴有一辆汽车，”海伦说，“他们可能会得到汽油，把车开动起来。您想让他们带您一下吗?”

“让他们带我一下?”妇人不理解地说。

“跟我来，”海伦说，“我不向你担保什么，但您还是有点运气。”

妇人跟着她。一个谷仓供人睡觉。吸着乡间的清新空气。喝着牛奶，吃着鸡蛋，明天就到了巴黎。“为什么偏偏是我而不是她呢?”海伦想。饥饿和毒阳的炙烤使她头昏眼花，但她既不想吃东西，又不想找个阴凉处。这是很奇怪的，过去她是那样地渴慕这一切。

两个妇女坐在汽车的踏板上，她们两个都长着一头金发，穿着鲜艳的衣服。

“莫里斯还没有回来，”母亲说，“可怜的孩子。”

“可恶的德国人，”女儿说，“这一切都是他们闹的。”

海伦向那妇人走过来。

“需要稍等一下。”她说着，把身体靠在墙上。这甚至不是在等待，因为没有什么可等待的。我没有生命了。只有一个凝滞的水洼，映照着世界多变的面孔。

“他们给了我十公升。”荷兰人说。

两位妇人吃惊地站了起来。

“啊!”年轻的妇女说，“我们可以离开这里了!”

“好像离这儿再远一点的地方，更容易搞到汽油。”荷兰人说，他打开发动机罩。海伦走到他跟前。

“劳驾，我把我的位子让给那边那个抱小孩儿的妇女，您不会感到不合适吧?我自己另想办法，如果我的箱子您愿先保管一下的话。”

“这个年轻的女人?”荷兰人说，他露出犹豫不决的样子。那妇人一副狼狈的样子，头发蓬乱。他用疑惑的眼神望着她。

“是这个女人。如果我们不把她带走，她的孩子会饿死的。”海伦用威胁的口气说。

“可您呢?”荷兰人的岳母说，“车子里装不下五个人啊!”

“我知道，”海伦说，“我对您说过我另想办法。”

“那么让她上来吧。”荷兰人说。

妇人犹豫了。

“上车吧。”海伦说。

她上了车，坐在荷兰人的岳母身边。后者用厌恶的目光审视着她。

“您不来了?”那妇人说。

“是的。”海伦说，她向荷兰人微笑着，“再见，谢谢。”

她离开车子向大广场走去。车门在她身后咣当一声关上了，车子开动起来。她在荒凉的街道上疾走着，向着充满碎草气味的阴凉飞奔。海伦独自待在那骄阳下仆仆的风尘之中。“哪里都一样，”她满不在乎地想。

广场上，德国兵正围着一辆卡车忙着，难民们带着恐惧和希冀的神情望着他们。他们是战胜者，是主宰。他们年轻，一般都很漂亮。从他们整洁的军装里露出结实的脖颈。他们带着高傲的

神气俯视着这些羊群般无家可归的难民。一个士兵伸手去拉一个爬上车的妇女。

“他们往哪儿去?”海伦说。

“去巴黎,”一位老太太说,“如果他们车子有空,可以带人。”

不一会儿,卡车上挤满了妇女和儿童。

“还有其他的卡车吗?”

“不知道,得等等看。”

海伦坐在地上,在老太太和一个头发蓬乱的黑姑娘中间。

“好吧!我等着。”她说,把头倚在膝盖上,闭上了眼睛。

她醒来的时候,身旁那个棕发姑娘正在咬着一大块面包。炎热的天气变得凉爽了些。

“大概您睡得很好!”姑娘说。

“我太困了。”海伦说。

“您没有东西吃吧?”

“没有,我什么也没有。”

“给。”她说,露出一副神秘的样子。她递给她一片面包。

“噢,谢谢。”海伦说,她贪婪地咬着面包。面包又硬又咸,很难吃。

“注意!”棕发姑娘说。广场上来了一辆汽车。“来,奶奶。”她拉着老太太的胳膊说。她向海伦打个手势,“您也来。”她们扑向前去。

“Nur zwei。”[1] 德国人向空中伸出两个指头说。他让老太太爬上车去,棕发姑娘的腿跨上车帮,用手拉海伦。

“这是我姐姐。”她对士兵说。“上车,上车吧。”海伦攀在卡车边上上不来,士兵笑了,向她伸过手来。

---

① 德语:只有两个。

海伦坐在车后边的一个空油桶上。卡车上挤满了人。一块厚雨布盖在车子上。汽车的颠簸，使人窒息的汽油味，火热的天气，海伦感到一阵恶心，想吐出来。她望望周围，不能动弹。她一阵颤栗，额头上沁出冷汗。车子一端的另一个妇女，满不在乎地呕吐着。“管他呢。”海伦想，她把脚收回来，头尽量向远处伸，俯着身子在油桶间吐起来。她擦擦嘴和脸，感到轻松一些了。她脚下一摊白乎乎的呕吐物，但没人留心它。“仿佛人们不再顾忌肉体的耻辱，”她想，“仿佛这躯壳不再属于我自己了。”

灌足汽油的卡车，在平坦然而这里那里被炮弹炸出坑来的路上无阻拦地行驶着。沿途，人们看到沿坡翻倒的轿车，被烧毁的轿车和带十字架的坟墓。拉草车、自行车和步行者络绎不绝。卡车穿过一座城市：炸弹炸毁了屋顶，两座建筑群被焚毁了，断壁残垣前堆着扭曲的废铁。到处是逃难、贫困、死亡。然而在灰色漂亮的汽车里，年轻体壮的德国人，歌唱着，开过去。

“Heil!”① 他们之中一个快活地挥着手，他和他的同伴们一样，穿着灰色军装，每个人胸前带着红艳艳的玫瑰花。

卡车在巴黎大门前停下来，海伦跳下地来，她的腿勉强支撑着身体。她照了照镜子，发现自己灰尘满面。格朗德－阿尔梅大街一片凄凉。所有商店都关着门。她在一派宁静中停留了一会儿，而后向星形广场走去。一切都在那里：房子、铺子、树木。而人们却被消灭了：没有人再去打开被封闭的商店，没有人再到街上散步，没有人再建设明天，没有人再记起过去。只有她自己在这个没有生机的世界上完好无损地、荒谬地活下来。然而她既没有肉体也没有灵魂。只有一个声音在说道：“我不再是我自己了。”

---

① 德语：希特勒万岁！

德妮兹把本子放在膝盖上，用她那密密麻麻的小字写着。

“我写完了，”她说，“您什么时候愿意，我们就什么时候走。”

海伦用一个胳膊肘支撑着身体站了起来。路仍然是白热的样子。正是五点钟，法国时间三点整。空气沉闷，塞纳河水在凝滞的天空下悠悠地流淌着。

“人们不会相信今天是星期天。”海伦说。她扶起倒在坡沿上的自行车。没有汽车，没有情侣，没有爱情，没有欢笑，乡村是荒凉的。每隔很长一段距离，可看到树荫下坐着几个上身黝黑的男人。人们从他们剃去头发的后颈上把他们辨认出来。他们是法兰西唯一过这个星期天——遭难的星期天——的人。河水中，忧郁的阳光下，一个人独自乘着一只小舟，拉着手风琴。海伦的脚跟一动不动。时间和空间在她周围爆炸开来，她仿佛沿着秘密的渠道，被抛到一个时代之中，被抛到一个她毫无联系的世界里，她在茫茫的天空下不知何往，她进入一段不包括她的存在在内的历史。“我仿佛根本没有在那儿，仿佛我在那儿只是为了说：‘我没有在那儿’。”她俯在车把上，所有别墅都关闭着。客栈的招牌也开始失去光辉或成鳞片地脱落。有时，在一座敞开的大门后面，看到砾石上停着灰色的汽车，听到很重的声音在花园里回荡。

“海伦!”

她加快了速度。有时，她为自己处在这样异乎寻常的冒险之中感到陶醉；有时，她又感到害怕。回来的路上她丢了钥匙，“永远再不会有另一把了!”

“您的德国人能为马塞尔办些事情吗?”德妮兹说。

“吃晚饭时我对他说说，他有一大堆关系。反正我要是到了柏林，我会结识一些有用的人的。”

“必须快点办，”德妮兹说，“四分之三的战俘营被疏散到德

国去了。”她望着海伦，“您真的要走吗？”

“为什么不呢？”海伦说，她挺直身体，她知道德妮兹想些什么，她知道让会想些什么，她带着挑战的神态盯着天边的深处，“您说得对，我们在一起没什么事可干了。”

“为他们工作，对您无所谓？”

“这能改变什么呢？”海伦说。

“问题不在那里，”德妮兹用责备的口气说，“为我自己考虑，我也不愿去干。”

“我自己，”海伦说，她望着握着自行车把的手，“我，海伦……”人们在路上失去了他们的汽车、衣柜、狗和孩子，她失去的是她自己。

“总而言之，您对当前的局势是认定了？”德妮兹说。

“噢！我不赞成法西斯主义，”海伦说，“但又怎么样？它存在着。而后呢，又有另外的东西，还有另外的东西。”她耸耸肩膀，“那么又该怎么办呢？”

“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我们活着的时候。”

“是我们让它重要，它才重要的。”海伦说。她记得起来，让说：“由我们来决定。”但是，恰恰因为如此，为什么我必须来决定是我个人的命运重要，还是法兰西的命运重要，还是我被偶然抛向的这个世纪的命运重要呢？她沿着林荫路疾驶着，无动于衷的太阳，像流星一样划破冷漠的云层。

她们穿过巴黎的大门。

“我去把信送到红十字会去。”德妮兹说。

“我陪您去。”海伦说。

乌云遮住了太阳，人们沉浸在一种湿热之中。十来个年轻的妇女眼里流露出暮气沉沉的目光，在值班室门前徘徊。灰色的轿车，一排排整齐地停在人行道上。林荫路深处，带着黄绿色圆顶的歌剧院，像一座宗教纪念碑，过去岁月的见证人。

女营业员看看信封，把它推给德妮兹：

“我们不再接受去巴卡拉的邮件了，”她说，“集中营已经向德国迁移了。”

“巴卡拉的也迁移了？”德妮兹说。

“是的，太太，巴卡拉的也迁移了。”女营业员有点不耐烦地说。

海伦抓住德妮兹的胳膊，把她拉向出口。德妮兹面色苍白，几乎晕过去。

“他们得到的消息经常不可靠。”海伦说。

“在德国！”德妮兹说。

海伦的喉咙紧巴巴的，她从德妮兹的脸上，在这星期日傍晚的灰蒙蒙的炎热中，看到不祥的阴影。

“他还可以从德国回来。”她说，“我们想想办法。”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多亏上天保佑，这不是她的不幸，对于她来说，她算完了：没有爱情，没有生命，没有不幸。

“您想象一下这次转移吧。”德妮兹说，她的声音变得暗哑了。

“我想马塞尔不会有什么不幸。”海伦说。

“他可能，”德妮兹说，她挣脱海伦的胳膊，“请原谅，我需要独自一人待着。”

“我理解。”海伦说，她握着德妮兹的手，“明天早晨我给您打电话，把贝格曼的答复告诉您。”

“谢谢。打电话吧。”德妮兹说。

海伦向她微笑着，骑上自行车。为他人而痛苦：这是怎样的骗局啊！他们满不在乎，用尽心思，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完了，全完了。她穿过圣日耳曼林荫路。隆隆的装甲车鱼贯而进，后面跟着坦克车，坦克上露出穿黑衣服的士兵，他们头上宽大的贝雷帽迎风飘动。他们微笑着，用他们风华正茂的青春向胜利致意。

胜利。失败。他打仗打输了。她把车把握得更紧了。既没有胜利，也没有失败；既没有你的，也没有我的：恰巧是历史的一个时刻。

海伦在糖果店前停下来，放好自行车，走到她的房间里去，穿上那件印着她自己设计的花样的漂亮袍子。衣柜里衣架上挂着一件崭新而鲜艳的外衣，一旁是一件美丽的花式西装。德国顾客大大地破费了。

“晚上好，妈妈，晚上好，爸爸。”

“晚上好。”贝尔唐夫人冷冷地说。贝尔唐先生的眼睛没有离开他读着的报纸。他们对女儿目前的情况感到欣慰，但他们指责女儿和侵略者混在一起。海伦打开商店门，长长的金属链子发出丁零当啷的声音。像以前一样，当她去和保尔或让幽会时，她真想把它们拉下来。

自行车在圣米歇尔林荫大街上疾驶。它污迹斑斑，生了锈，黑漆皮下露出绿漆和蓝漆，但仍然是一辆好车子。“我把它带到那边去。”海伦想。她刹住车，林荫大街的低处，在一座木栅栏前，有一群人。她跳下车来，木板上贴着一张黄纸布告：“罗贝尔·加第耶，洛里昂的工程师，因破坏活动被判处死刑，今晨已经枪决。”人们默默无言地站在这张纸前面。枪决了。海伦蓦地离开了。“怎么！肯定要经过他们的手。”海伦想。她疯狂地蹬着车。“这一切都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没有！”

她推开饭馆的门，在大铜盆和一串串洋葱中间，天花板的大梁上吊着大量的红肠和火腿；走廊两端的凹室敞开着，里边摆好了桌子。海尔·贝格曼站起来，脚跟下发出轻微的喀哒声，俯下身子去吻海伦的手。

“俨然像一个男人。”他微笑着说。

他身着一身优雅的暗色西装，带着硬领。他的脸在一头栗色的头发下，显得和蔼而庄严。他打个手势，穿着农民装束的店老

板向堂倌也做个手势。

“我们的专用菜。”堂倌把一个摆着猪肉糜、熏火腿、红肠和熟肉酱的托盘放在桌子上时说。

“我相信在这里吃得好一些。”海尔·贝格曼说。

“大概是这样。”海伦说。她吃得很丰盛。邻桌上一个胖女人，通红的脸，身穿缎子上衣，大口吞吃着一块烧牛排。这里的堂客是些德国军官，他们或一起吃晚餐，或陪着那些花枝招展的年轻女人。几个进行拳击表演的人，已被厚厚的幕布遮挡起来了。

“我和格朗茹安夫人谈了好长时间，”海尔·贝格曼说，“我们最后一致达成协议：何况您又没有签订任何合同。”

“是的，可我在她家当学徒呢，现在离开不太好。”

“她本该吸收您参加她们的事务管理，”海尔·贝格曼说，“把您当普通职员对待，那就是剥削了。”

“过去，她建议我去领导一个美洲的分公司，”海伦说，“是我拒绝了。”

“您为什么拒绝呢？”

“那时，我想待在巴黎。”海伦说。

“您不会遗憾的。”海尔·贝格曼说，“对您来说在法国没有前途，很快里昂也保不住了，我们是生丝的主宰者。”

他讲话的神情突然变得像邻桌的军官那样得意而又庄重起来。

“请等一等，”海伦莞尔一笑，说，“一切尚未结束。”

“是的，一切仅仅在开始。”海尔·贝格曼说，他给海伦倒了点波尔多甜酒。“法德已准备和解，瞧，您和我合作是会有益的。我生产布匹，您给我带些我们国家没有的东西：法国风味的。”他殷勤地说。

“对。”海伦说。

“通行证已经办完了。”海尔·贝格曼说，“我预订了星期一的车。”

“星期一……”海伦说。

“我本来想多待些日子，”他犹豫了一下，“尽管发现巴黎现在的这种状况是使人感到凄惨。它已不再是首都，而是一个驻防城市。”

“您过去常到巴黎来吗?”

“我在蒙梭公园附近住过一年。”海尔·贝格曼说，“早晨，我到公园里去散步，看孩子们嬉戏。”

“我更喜欢卢森堡公园。”海伦说。

“卢森堡公园我也喜欢。”他说，“还有拉丁区、塞纳河畔。早晨五点钟我和法国同事在中心菜市场喝洋葱汤。”他叹口气，“这个饭馆很有趣，到处都是地道的法国人的面孔。现在，在蒙马特尔，在蒙巴纳斯只能听到德语了。”他给海伦杯里斟满纯香槟酒，“以后，必须恢复过来。”

“过去一去不复返了。”海伦说。

“是啊，可还有别的东西。您不想看到‘新欧洲’吗?”

“想，我很想，”海伦说，“我喜欢新的东西。”她向他微笑。过去一去不复返了，结束了。她也如释重负，再没有拯救港饭店的晚餐，再没有雪中的笑声，再没有充满堇菜花温馨的黄昏的泪水了。对所有人来说只有一个未来：德国人、法国人、男人、女人，他们都具有相等的价值。没有人再有同一的面孔，再没有不同的眼神。这个男人同样有一双手、一颗心、一个脑袋，一样也不比让少。

“有件事必须请您帮忙。”海伦说。

“我很高兴帮忙。”

“有没有办法使一个刚刚被送到德国去的俘虏回到法国来?他是我挚友的丈夫。”

“我有几个朋友在大使馆，”海尔·贝格曼说，“请把他的名字和地址给我，我看能不能走走门路。”他踌躇了一下，“尽管我想这可能顶不了什么事。”他说。

海伦心里一阵难过。“马塞尔会在那儿待多久呢？四年？五年？”

“这个有关俘虏的问题令人头痛。”海尔·贝格曼说，“如果我们能把他们交还给你们，我们之间会更容易友好。”

他向嘴里放了一大块腓力牛排，他吃得很快。海伦惊愕地看着他那只精心修剪的手，白皙的手指上戴着徽纹大戒指。“我们不能把他们交还给你们。”他在撒谎；她在自己骗自己。两个人都知道；他们没有一分钟处在同一历史之中。

“只要您想办，您一定会办得到的。”她说。

“所有法国人都是靠不住的朋友。”他用彬彬有礼的声调说，“您想怎么办？这就是历史的必然。”

海伦把餐叉放在她的碟子上。她吃不下去了。她望着带夹鼻眼镜的军官们，饱享着法国的佳肴。此刻贝尔唐夫人正在热一盘大葱头，德妮兹正在剥土豆做糊糊，马塞尔八天了粒米未进。明天，伊冯娜，这个犹太人将丢掉工作，很快连住房也没有了，这无疑也是历史的必然吧！而我呢？为什么我在这儿？

海尔·贝格曼把菜单递给她：“一块乳酪？一个水果？”

“谢谢，我什么也不想吃了。”她说。

“来杯白酒？”

“不，谢谢。”

海尔·贝格曼要了奶油草莓，他用勺子把红色果子戳碎。

“您知道哪里有度过夜晚的好地方吗？”他说，“一个真正的法国夜总会，不是为旅游者的。”他露出同谋者的神情补充道。

“我知道的很少。”海伦说，她尽量克制着自己，“据说，拉丁区有个地方可以跳舞。”

“好啦！咱们到那里去，”他说，“我有车。”

“我的自行车怎么办呢？”海伦说。

“别担心，”他说，“这很容易，我让人给您送回家去，这里，他们都很乐于帮助人的。”

海伦从挎包里掏出粉盒。当然，这很容易，一切对他们来说都很容易。他用一板一眼的声音对店老板讲着话，并从皮夹里掏出纸币。店老板点头哈腰满脸堆笑。我也同样地微笑着。你们微笑吧，微笑吧。那些不微笑的人们会遭枪毙的。今天早晨，天蒙蒙亮时，他孤独地、没有一丝微笑地被枪毙了。这是历史的必然。然而，我继续笑下去，或者我不再笑了，这由谁来决定呢？

她上了车，天还大亮着。

“需要在哪停车？”

“在梅迪西斯广场停车。就在广场一旁的小巷里。”梅迪西斯广场非常安静，可以听到两家大咖啡馆露天坐位上传来的喧闹声；林荫大街变成了一条萧条的大路。然而，池塘、栗树以及六月十日早晨那人小心擦拭的路灯却依然在原来的地方。人们以为一切会改变模样：房子、面孔乃至大地的颜色。但这里仅有静寂、这奇特的天光以及在海伦身边的这个装得一本正经的恭顺的男人。

“到了。”她说。她推开门，他们走进一座铺着红地毯、装饰着绿色花草的小礼堂。乐队在悬在半空中的台子上奏着乐，几对男女在跳舞。

“瞧，这里穿军装的不算多。”海伦说。

他们坐下，海尔·贝格曼要了香槟酒。他露出思索的神情环顾一下四周：

“一个很好的地方，”他说，“但缺少一点……你们怎么说？

我们叫做 Stimmung[①]。"

"是因为战争。"海伦说。

"是啊，这是很自然的。"海尔·贝格曼说，他摇着头：

"你们是深受其苦啊！"

"柏林更活跃吧?"海伦说。

"您就要看到柏林了，也是一座漂亮的城市。"海尔·贝格曼说。

海伦望着一对翩翩起舞的舞伴，心情变得沉重起来。乐队奏着战前的小曲，已经遗忘了的往事又涌向她的脑海：这是温存而温馨的记忆。突然她感到万箭穿心般的痛苦。最后的几天。最后的几夜。八天以后的此时此刻，她周围的人讲着陌生的语言。

"我从没有旅行过。"她说。

"啊！现在您要变成欧洲人了。"海尔·贝格曼说。

一个穿黑袍子、打着桔黄结子的年轻妇女怀里抱着一只篮子，走到桌子跟前："要巧克力？香烟?"

"一盒巧克力。"海尔·贝格曼说。

海伦赧颜发赪，她认得这些束着彩带的盒子。一个年轻的金发妇人，和这人一模一样，每周向贝尔唐太太买这种巧克力："我以四百法郎再卖给弗里茨[②]。"她笑着这样说。

"不。"海伦说。

"请允许我。"海尔·贝格曼说。

"不，我不想吃。"她大声地说，而后补充道，"我讨厌巧克力。"

"抽烟吧?"

"我不抽，我请求您，我什么也不要。"

她仇恨地望着他。除了马塞尔的自由、伊冯娜的安全，她一

---

① Stimmung，德语，"气氛"的意思。

② 弗里茨，泛指德国人。

无所求；除了今天早上被枪毙的工程师罗贝尔·加第耶的生命，她一无所求。卖巧克力的年轻妇人走开了。一阵冷冰冰的寂静。

“肯赏光和我跳舞吗？”海尔·贝格曼说。

“我愿意。”海伦说着，站起身来。他把我抱在怀里，我们跳起舞来，旗帜在蓝天下呼啦啦地飘着，他站到讲坛上讲演着，大家在歌唱。“这是属于我的，”她惴惴不安地想，“这是我的过去。”我将把它带到柏林。我要和我的整个过去一起去柏林。海尔·贝格曼把她紧紧地抱住。他跳得很正确，很专心。他们的脚步很谐调，然而身体却不一致。她想：“他搂着我。”她向镜子里瞟了一眼。在他怀里的正是我。她自窥着。德妮兹望着她，马塞尔望着她，伊冯娜望着她，他们望的是我。

“请原谅。”她说着放开手，向桌子走去。

“怎么啦？”海尔·贝格曼用慈爱的口吻说，他微笑着补充说，“我跳得不好？”

“不，我太疲劳了。”她坐下来，并没有强作笑脸。她不再想笑了。他们瞧着我，他们存在着，让存在着。她双手托腮。因为我不想忍受痛苦：我撒了谎，我存在着，我永远不断地存在着。要出发去柏林的是我，连同我的过去。他抱在怀里的，是我。我现在正过着这样一种生活。

“喝点香槟酒吧。”海尔·贝格曼关怀地说。

“谢谢。”她喝了一口辣酒。“为了忘却，为了报复，我撒谎了。我选择了撒谎，我选择了在这里，在这个男人的身旁。”顿时，她如乱箭穿心。“我存在着，我却永远失去了让。”

“您好一点了吗？”

“是的。”她说。她又辨出长久以来郁积心头的苦闷，感到心的跳动和嘴里唾液的味道。是我，正是我。我们的失败。他们的胜利。我们的俘虏。她望着海尔·贝格曼：

“我想我不能去柏林了。”她说。



我无故地杀害了你，因为你的死是不必要的：我本该自己去，或者派约娜或克莱尔去，为什么派约娜？为什么派克莱尔？为什么派你去？我敢怎么选择？我记得，他说过："为了达到目的，必须行动。"这是他说的。这是昨天的事。我无话可说了。说不上是他有道理，还是他错了。然而既然我无话可说，必须使这声音缄默，必须使我的生命缄默。

有声音在讲话，历史在前进。我的历史。而你却沉默着，你的眼睛闭着。天将黎明。你永远沉默了，我却在高声讲话。我要对洛朗说："干吧，或者不干。"我不再讲话了。

他讲着。他知道他的意愿。他在荒凉的大街上走着讲，他在

他的房间里讲，他通过巴黎时讲，星期天他在莫尔旺农场讲，在诺曼底和布列塔尼的农场同埋藏了武器的农民讲。农民们听他讲，工人们和资产者听他讲。人们在英国听他讲。有时，晚上，电台回答他："丽春花会在墓地怒放。"在诺曼底和布列塔尼的原野里，飞机空投下机枪和手榴弹。

"就要真正开始了。"

他们在郊区租了一座孤零零的小楼，布劳马先生同意供应印刷材料。一座印刷厂。一座武器库。我们坐着小卡车去寻找武器。一切即将开始。某种事将发生，是由于我，我不再是不由自主了。因为我愿意这样。

他打了个寒噤，有人敲门。

我一时认不出他来了。他剃了光头，胡须乱蓬蓬的。

"马塞尔！"

"是我！"马塞尔说。他笑着。

"你怎么来的？逃出来的？"

"你想不到他们给了我安全通行证。"马塞尔说，他走进我的房间，用满意的神情，环顾一下四周。

"瞧！你身边总有我的油画。"他说。他默默地审视了一会儿油画。

我抓住他的肩膀：

"我简直不相信你会来。"我说。

"正是我。"他说。

我从壁橱里拿出一块面包和黄油。

"你肯定饿了！"

"我想吃东西。"马塞尔说。他坐下，"巴黎真的闹饥荒？"

"还没有。"我说。我在火上放上一个烧土豆的锅子。马塞尔在这里，他长着硕大的头，短粗的手，带着神秘而残酷的微笑。他在我的房间，我感到幸福。

"我们还以为你已上了去德国的路了呢!"

"噢! 那是他们想把我弄到那里去。"马塞尔说。

"你脱身可是不容易吧? 很难吧?"

"不，我喜欢走走路。"马塞尔说，他把黄油涂在面包上，抬起头来：

"你讲一讲，这里怎么样?"

我耸耸肩膀。

"德国人在林荫路上蹓跶吗?"他说，"在地铁里你们坐在他们身边吗? 他们在大街上问路你们回答他们吗?"

"是的，"我说，"是这样，大概不会永远这样下去。"

我开始讲述，他边吃边听。

"这样，你就成了一个恐怖运动的头头。"他说，他笑了起来，"坚决些，不能使任何人失望。"

"我们遇到了意外的同情者和支持者，"我说，"你能想象我和父亲和解了吗? 民族资产阶级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

"很好。"马塞尔说，他一直在吃着。尽管他长了胡子，剃了犯人的光头，他还是像他的老样子。

"你要做什么?"我说，"我给你一个在蒙索莱米讷附近住的同事的地址，他会使你通过封锁线的。"

"我必须去那里复员?"马塞尔说。

"如果你想遵守规则，必须这样做!"

"那么我去。"马塞尔说。

"而后呢?"我说，"你再去下棋?"

"我在营房里下得很多，最后，我闭着眼睛玩了七盘。"

"那边怎么样?"

"很平静!"马塞尔从衣兜里掏出烟斗，"你有旱烟吗?"我把烟荷包递给他。他露出赞赏的神情，掂掂荷包。

"就这么点烟?"他说。

“你没有烟吗?”

“不经常有。”他慢慢地装上烟斗，“你能给我找点事儿干吗?”

“你是和我们一起干啰!”我说。

“那要看情况。我不愿写东西或做报告。”

“可我不能派你去投炸弹，也不能派你去车库放火，你第一天就会送命的。”

“那是明摆着的。”马塞尔遗憾地说。我犹豫了。有一种差事他是可以做的。

“你真的想参加进来?”

“你感到吃惊吗?”马塞尔说，“你以为在任何制度下都能下棋吗?”

“在你家，对政治漠不关心这一点并不使我感到吃惊，你总是那么不合乎情理。”

“我改掉。”马塞尔说。

一阵沉默。

“有件事我要向你讲。”我说。

“讲吧。”

“嗯！我们要藏武器和设印刷厂的那座小楼还没有承租人。在我们的一切活动之外，我们需要有一个人。你结婚了，这有益于干这个差事。只要你每天绘画或者雕刻就行了。”

“你们的楼在哪里?”马塞尔说。

“在默东。”

“默东。”他带着苦恼的表情说，“好吧！不必讨价还价了。”

“只不过，你意识到没有，”我说，“这要你和德妮兹冒生命危险。”

他微笑了。

“德妮兹会很乐意的。”

“你肯定这不是为了帮我的忙而是接受任务吗?”

“这能帮你什么忙?”马塞尔说，他笑了，“你只需把这看成和你的事业有关就行了。”

“不。”我说。我感到心里不安，认为有些话没有讲出来。首先是雅克……“我不愿把你当工具一样使用。”

“我看你还不具备领袖的素质。”马塞尔说。

“可能。”我说。我没有微笑，他严肃地望着我。

“你总是那样自以为是。你以为你能把我当工具使吗？我是干我愿意干的事。”

“任凭你去干吧。”

我的心里一阵难过。为什么他去？知道他愿意，就让他去干，这似乎很简单。我想要武器，想有一座藏武器的房子，这座楼需要有承租人。但我不希望是马塞尔去冒这种危险。他不去谁去呢？为什么维宁去就比他去好呢？光辉的目标是显而易见的，但它并不能照亮不确知的道路。各种手段都不好。为什么你去?

他把我带到这里，你在这儿，你走向死亡。而我，我望着你。她心绪不宁，她呻吟着。“吕特，吕特”，她在叫谁？她是谁？我也不知道。现在，历史在飞速行进着。仿佛我沉溺到水底，只有几秒钟喘息的时间了。在水底。在失望之中。小卡车在路上穿行。甚至有德国卡车开进巴黎，载着沉重的箱子。司机认为他们运的是黄油和火腿，造价昂贵。在默东别墅，我们卸下家具、床垫和一包裹，卸下箱子。尽管天气很冷，洛朗还穿着衬衫，他汗水淋漓，满面灰尘。火药压得他弯着腰走下通往地窖的楼梯，脸上堆着笑。我已经进入了德妮兹的客厅，她已经摆好了地毯和家具。炉子里的火呼呼地响着。我指着穿过巴黎平面图的一条弯弯曲曲的红色细线对洛朗说：“你瞧：第一组从右边绕过，第二组从左边绕过，我们走这条林荫路。”

“好吧，”他说，“我懂了。”

“你把地图记在脑子里了吗？”

“我可以背着给你画下来。”

我把地图揉成一团，丢进火炉里。马塞尔坐在一张棋盘前，沉思着。德妮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我喜欢从盖世太保着手。”洛朗说。

我望着他的鬈发，湛蓝的眼睛，粗犷的嘴，我还从来没有这样真切地看过他。他和雅克不一样，但他有着和他同样的血。

“你的衣兜掏净了吗？”

“别怕，”他从皮夹里掏出一张假身份证，满意地凝视着，“它太好了。你说，彼尔有消息吗？”

“没有，一点也没有。他一直情况不明。我们把他从集中营里一转移出来，就努力和他取得联系。”

“好像人家发现辛日在单人囚室里被缢死了。”德妮兹说，“可随军神甫说他从未想到过要自缢。”

“这是很可能的。”

我瞧瞧挂钟，十点五分，时间还很早。我站起身来，走到马塞尔跟前。

“怎么，老将自卫了？”

他抬起头来：

“我的心思还没在那上边，”他说，“一心不能二用啊。”

“你又开始了绘画我很高兴。”

“我也很高兴。”他向我微笑着，他知道我很想谈谈，谈谈其他事情，“我是个白痴。”

“你不再感到绘画是荒谬的吧？”

“是的，”马塞尔说，“在集中营里我才明白过来。有人曾请我画壁画，装饰阅览室。你要是看到他们那睁大的眼睛，也会感到那真诚的赞赏。真是妙极了。因此，使我激动不已。”

“你首先缺少的是观众，我一直这样想。”我说。

“这也是一种推断，”马塞尔说，“我希望我的油画独自存在着，不需要任何人。确实，是别人使其存在着。然而这却是引人入胜的。因为我迫使他们使其存在着。”他脸上露出神秘而残忍的微笑，“你理解吗？他们是自由的，而我，我来了，我践踏他们的自由。在我使这种自由自由时，我却践踏了它。这比制作东西还更有趣。”

“是的，”我好奇地注视着他，“正因为如此，你才对你身边的事情关注？”

“那当然，”马塞尔说，“我想选择我的观众。”

我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他哪方面都好，我从未对他太挂心过。我确信他除了干他愿意干的事情外，不会干别的。我望着德妮兹。

“那个秃头一直在这里蹓跶吗？”

“有三天没见他了。”她微笑着，“我该是做梦吧，他一点也没把我们放在心上，没有任何理由使人家对我们挂心。”

“当然。”

她用练达的声音讲着。但她的眼睛下有黑眼圈，她夜里总做恶梦，白天，又透过花园的栅栏窥伺着。我知道她不会打退堂鼓，她不会背叛，对一切任务她都能胜任。然而她没有选择死亡，她只是选择了某种生活的方式。她害怕。死亡会到来。死亡只是像绳子断了那样是荒谬的事故，是向你突然袭来的浪潮。“让人自由是很美的事。”她的自由在哪里呢？

“再要一点咖啡吗？”她问。

“好吧。”

她把我们的杯子斟满。十点二十了。洛朗咂着嘴唇喝着咖啡。他很沉着。他自愿接受死亡，但他相信他死不了，因为他和我一起工作。我一切都想周到了吗？我又检查了保险槽，都想周到了。我放下杯子。

“我们走吧！”我说。

德妮兹惊愕地望着我。

“怎么？您不和洛朗一块儿去！”

“当然和他一块儿。”

“可你不必……”她说，“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运动会向何处去呢？”

“我知道，将军们死在自己的床上，我没有将军的灵魂。”

“必须另换一个人去，”德妮兹说，“您知道，任何人也不能替代您。”

“您想让我派别人去冒生命危险，而我却坐着品咖啡，这是难以容忍的。”

德妮兹用责备的目光望着我。

“您只管您自己，”她说。

这句话击中了我的要害，她是有道理的。大概我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所以总是关心自己。

“对您个人的重重顾虑我们不感兴趣，”她生硬地说，“我们信赖您，把您当做领袖，您应把党放在首位：你没有权利背叛我们。”

我瞧瞧洛朗，他无动于衷地听着。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我瞧瞧马塞尔：

“对此你作何感想？”

他笑了：

“和你的想法一样。”

“是的，”我对德妮兹说，“您的话是对的。我一定下不为例，但这次我陪洛朗去。必须两个人，我不想再另外派人了。”我站起身来，“还有，我想亲眼看一次情况如何发展。”

“我要把问题提交委员会，”德妮兹说，“我要先了解他们的决定。”

"我赞成。"我说。

我们出发了。我们的自行车在夜里前进着，车前闪出一个小小的光圈。在我的挎包里，在洋葱头和胡萝卜下面，有一个像没有开封的沙丁鱼罐头似的东西。右边，在一片黑暗中，有一种微弱、暗淡的反光和一种清新的气味，这就是塞纳河。一堆沙袋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跳下车来，绕过沙袋。进了巴黎。城市在沉睡，街上没有一个行人，房屋是一堆阴暗的石头。只有他们，不屑掩饰他们的窗子，他们住的楼房灯火通明。在林荫路的深处，可以看到那灯火辉煌的长方形大楼。我把手伸入挎包，抓住沙丁鱼罐头。洛朗跟在我的后面，我知道，他也捏住坚硬、冰冷的金属盒。右侧那灯火通明的长方形大楼逼近了，从窗玻璃的另一侧，看到里边穿蓝色军装带黄色臂章的人。整个大楼上上下下都可见到这样的人。一辆汽车在门前停下来。德国军官们在车前站着，我转过身去。

"不凑巧。"我对洛朗说，"跟我来。"

我们从他们前边走过，他们没看到我们的手。我们沿着林荫街走下去，又向右转。我放慢了速度。

"真可笑。"洛朗说。

"他们不会整夜待在那儿，我们先闲逛一会儿。"

我感到失望。昨天下午还没有汽车，我头脑中没有想到汽车。然而，它就在那儿，简单而又十分自然。我想的是，我们要快快活活地回马德莱娜家睡觉。是真的吗？人们发现他在单人牢房里自缢而死了……我们默默地逛了好一会儿。

"我们再过去看看。"

我们又到林荫路的高处，我们不紧不慢地走过来，马路上冷落萧条，一个警察孤零零地在人行道上来回地踱着步。我放慢了脚步，对准闪光的窗玻璃，把罐头盒扔了过去。

"成功了！"身后，响起玻璃被打碎的声音，一声爆炸，一阵

叫喊声，一阵口哨声。林荫道坡度不大，我们把车子蹬得飞快。有人在我们身后吹哨子。当我们第一次向右转弯时，人们还在吹哨子。我们向左转了第二个弯。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蹬着车，当我们缓过气来的时候，已是一片寂静了。街道沉睡了，蓝天沉睡了，仿佛任何地方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似的。

"命中了。"洛朗说。

"是的，我想是这样。"

"一点也不惊险，太容易了。"

"他们还不习惯，稍等一下。"

我们不慌不忙地骑着车。我感到热，但很轻松。想办的事很容易就办到了，轻而易举。明天我们再从头来，让其他楼也爆炸，让火车、仓库、工厂都开花。我们到了高利布利膳宿公寓门前，守着火炉和马德莱娜喝潘趣酒。那边，他们抬走死者或伤号，他们喊着口号，要枪毙我们。我们望着热气腾腾的潘趣酒，安详而怡然自得，仿佛在游击队基地里似的。

第二天中午，马德莱娜到车间门口来找我。

"干得好，"她说，"死了八个，我不知道伤了多少。全区都震动了。"

我喜悦地在克利希街上走着：这些死者在我心上不占多大分量。在我的脸上、手上没有任何痕迹；他们和我相遇，他们看到我，或者他们没有看到我，我只不过是一个无害的行人。在车间里，同志们并不惊讶地望着我们，我们一点也没有被处死刑的样子。这一天，和以往的任何一天一样。傍晚，我必须到我的父母那儿去吃晚餐，七点钟，我走进地铁，看到白瓷砖上贴着红色布告。

"你看到了吗？"母亲说。

"什么？"

"布告。今夜有一次谋杀，他们枪毙了十二个人质，来进行

报复。”她望着我，双眼塌陷，满脸浮肿，俨然是一个老太太的样子。她用因害怕而失真的声音复述道：

“如果肇事者三天之内发现不了，另外十二个人质也要枪毙。”

“我知道，他们开始了。”我说。

“他们悬赏五十万法郎，作为提供可靠情报的报酬。”父亲用挖苦的语气说。

“难道他们不会自首吗?”母亲说，“难道他们会让十二个无辜者被枪毙吗?”

我的手没有颤抖，脸没有红。然而在我的手上、脸上有迹像，我感到了；母亲看到了，她的目光使我感到烧灼。

“他们不会的，”我说，“如果他们自首了，他们就永远不能再干了。”

“他们献身于事业。”父亲说。他非常自豪，好像是他把炸弹抛出去似的，他并不悔恨自己的行动。他是一个硬骨头汉子。

“我看，他们不该那么干，”母亲说，“他们屠杀了法国人。”

“你知道在波兰发生的事吗?”我说，“他们把犹太人装进列车里，把车厢门封闭起来，在里边顺着走道充煤气。你想让我们充当这些刽子手的同谋吗? 眼下，他们一直在杀人。”

“难道这颗炸弹救得了波兰人一条命吗?”母亲说，“反而多了二十四具尸体，如此而已。”

“这些尸体分量是很重的。”我说，“你以为通过这，法奸的话就有意义了? 你以为他们还会向我们露出兄弟般的微笑吗? 现在，他们和我们之间有着新的血海深仇。”

“谁想斗争，就让他们斗争去吧，让他们流自己的血去吧。”母亲说，她用手理理头发，“可这些人并不想死，人家才不理睬他们呢。”她的声音哽住，“他们没有权利，这是谋杀。”

我无力地耸耸肩膀，我的喉咙像打了结似的。幸亏父亲讲话

了，他解释着。旧有的尘土和油墨气味在走廊里弥漫，过去，它使我感到窒息。我在钢琴下搔着地毯：路易丝的儿子死了，不可救药地永远死去了。我永远夺去了他们的生命，他们唯一的生命，没有人能使他们起死回生。他们连认识我都不认识我，而我却夺去了他们的生命。有人敲门。马塞尔在车间里看书，两脚放在桌子上，我敲过门。够了。够了。我知道，我愿意这样，明天我们再干。

用人端来汤。我不饿，但我必须吃点。母亲不吃，她望着我。不应让她知道。她知道了。我知道她知道。她永远不会原谅我。

我吃饭，喝着大麦咖啡。如果我对她说：好吧，我去自首，她又会怎样呢？然而，我什么也没说，她除了对我充满憎恶以外什么办法也没有。她不听父亲的，她的眼睛望着远方，流露出落落寡合、心不在焉的神情。父亲讲着话，我同他应和着。

我们谈着，时针在转动着。十一点了。我心里一阵难过。蓦地我仿佛变成了五岁的孩子，我感到害怕，感到冷，我希望母亲在我床上给我塞好被子，希望她长时间地把我抱在怀里。我想待在这里：睡在我那过去的房间里，蜷缩在过去之中，可能我会睡熟。

"我该走了。"

我站起来，感到腿很沉重，但我不能待下去。她的眼神在赶我走，我俯身拥抱她时，她绷着嘴唇，全身挺直。她沉默着但我听到她那冷酷的声音："是你干的。现在就自作自受吧。"她到死也不会谅解我。

我沉浸在黑夜之中，我在我面前走着，我是罪犯，是甘心犯罪的罪犯，我真想走到天明。半夜里，我走进自己的房间，孤独地坐在空空的壁炉旁边，孤独地和我的罪恶一起被关闭起来。我看到炉条上旧报纸燃烧的熊熊火光。"如果一切都没用呢？如果

我无端把他们杀害?”黎明时分，我在壁炉旁醒过来，半身麻木了，嘴里一股苦味，我想到：“必须再干，否则，一切都等于零。我会使他们无端地送命的。”

我没了力量。我不能再继续了。今夜，这张床上，你死去了。我想自我报销，难道我不能自我报销吗？我把手枪对着太阳穴。而后呢？他们以后怎么办？我将不存在了。然而我在这里，只要我在这里，未来就存在着，在我的死亡之外存在着。我想死，我想在死中求生。我决定死了。还在作决定，独自决定，可以后呢？以后怎么办？



海伦把锉刀放在床头柜上，左手浸在带泡沫的水盆里。她在沙发上半躺着，她拉上了窗帘，点亮了床头的台灯，这样，可以觉得白天很快结束了，然而她很清楚这不是真的。可以想象得到窗子外边的天空仍是湛蓝的。这是一个乏味的五月的星期天。下边，糖果店的门还开着，孩子们正吃着用纸盒子盛着的玫瑰色冰淇淋。海伦撤出浸在水盆里的手，拿起浸在酒精里的带药棉的小棍，拨弄着她指甲根部的死皮。每天，消磨了多少小时啊，这样要持续多少年？即使他爱过我，那能改变什么呢？就像是一个壳里的两只牡蛎。本来一直是安安静静的，可这蓝色乏味的汩汩声……她把裙子提到腿上。有人敲门。

“请进!”

是伊冯娜。她手里捧着一束堇菜花，她的样子很可笑。

“哎，行了。”她说。她微笑着，含混而虚假的微笑，仿佛她在同海伦捉迷藏。

“什么？怎么回事？”

“他们在家里，把所有犹太人都装进了列车。”

“这不是真事吧？”海伦说。她困惑地望着伊冯娜，她嘴上还带着微笑，但脸上却挛缩着。

“真的，”笑容消失了，脸颊颤抖起来，“我可怎么办呢？我不想让他们把我带到波兰去。”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海伦说。

“我不清楚。我出来呼吸新鲜空气，回去的时候我买了一束堇菜花，卖花的大娘告诉我，让我快逃命。”

海伦从沙发上跳起来：

“别怕，他们带不走你的。”

“我担心母亲，”伊冯娜说，“如果我不回去，他们会难为她的，现在他们可能正打她呢。”

“你不宜在此久留，”海伦说，“这里是她告诉他们来的第一个地方。来，咱们走!”

“海伦，我不能这样丢下她，不知道……”她怯怯地望着海伦，“你想到那边去吗？如果需要我回来，你就告诉我，我一定回来。”

“我马上就去。”海伦说，她披上大衣，“我到哪里去找你？”

“我想藏在圣艾蒂安－杜－蒙，他们在全区进行大逮捕，但我想他们不会到教堂去看。”

她们三步并两步地走下楼梯。

“他们把犹太人装进列车！我简直不能相信!”海伦说。

伊冯娜望着她，眼睛里含着一种忧郁的嘲讽。

“我能相信。我知道会这样干的。”她用手碰碰海伦的肩膀说，“快去，我在圣母小教堂。”

海伦跑着走了。她跑也是白跑，伊冯娜的目光一直注视着她，她满腹的羞辱。我不相信，我没想到，我睡着了；夜里，她回到她的床上，不能入睡，她在等待着。就在我给指甲上油时，他们在把犹太人装入列车！我把自己关在这间充满困倦、寂静和厌烦的房间里，而外边却是大白天，人们活动着，受着苦。她放慢了脚步，她已经上气不接下气。街上还是老样子：一个像往常一样的星期天，一个什么事情也没发生的星期天。

她穿过汽车经过的大门，门廊下站着两个警察，从房子里传来一阵高声争吵的声音。房门吱吱呀呀地响着，什么沉重的东西咕咚一声落在地板上。在一片陌生的语言之中，一个女人沙哑的声音嘶喊着。在楼梯上，海伦遇到一个警察抱着一个婴孩，他显得笨拙而尴尬。她停在三楼的楼梯平台上，门敞开着，从小套间里传来男人们七嘴八舌的声音。海伦走了进去。

“伊冯娜！”

一个警察从屋子里走出来：“啊！您来啦！”他说。

“我不是伊冯娜。”海伦说。

“是来瞧瞧的。请进吧。”

海伦犹豫了一下。被查封的房间里，一片黑暗，充斥着恶梦和发疯的味道。门窗大开着，电灯拉着了，床脚下有两个警察。科茨太太裹在被窝里，只露出她的头，一个剃光的脑袋，圆鼓鼓的脸上长满黑色的汗毛。

“伊冯娜在哪儿？”她说。

“您有证件吗？”警察说。

海伦从挎包里掏出身份证和食品供应证。

“发生什么事了？”

“伊冯娜在哪儿？”科茨太太重复说，“她从来不在外边待这

么长时间。”

警察检查了证件，在本子上记着什么。

“行了，”他用失望的口吻说，“您到这儿来干什么？”

“我来看我的朋友。”

“您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一会儿她肯定会回来的。”科茨太太用哀求的口吻说。

“那好！你最好告诉她别想法躲藏了。”警察说，“明天，德国人来找她。如果找不着她，他们可不总是这样有耐心的。”

两个警察离开了房间，门被他们弄得吱呀乱响。

“她会把我害死的。”科茨太太说，她闭上眼睛，“哎，我走了，我走了，把我的药水给我。”

海伦胡乱从床头柜上拿了一个瓶子，并倒了一汤匙。

“谢谢。”科茨太太说，她深深喘着气，“告诉她，快回来，他们要杀死我了！”

“我想他们不会杀您的。”海伦说，“别害怕，今晚我再来看您，我来照料您。”

“可伊冯娜呢，伊冯娜在哪儿？”

“我一点也不知道。”海伦说，“一会儿见。”

她出来把门带上。在伊冯娜的桌子上，有剪刀、饰针，空花瓶旁放着线轴。一件蓝白相杂的毛料袍子吊在窗户把上，仿佛她五分钟之后就会回来的。她买了堇菜花，然而花瓶将空着，她不回来了。在她把书整理得井井有条的书架上，放着一只长绒毛做成的小熊，这是十年前海伦给她偷来的，现在它已经像个孤儿了。海伦拿起小熊，装进衣兜里。

楼道里再也听不到半点声音，仿佛整座房子都空了。海伦走上大街。卖花老大娘坐在绿车旁边的马扎上。伊冯娜不再向她买花了，她也不进面包店了。她会在哪儿呢？她孤苦一人，走投无

路，没有朋友……我，我拉上窗帘，摆弄着指甲！

她一下子停下来。在壕沟外护墙广场上，贴着人行道，停着四辆公共汽车，土台左边的两辆是空的，右边的两辆车上装满儿童。警察在平台上站着岗。一长队妇女突然出现在穆弗塔尔大街，被警察押解着。她们两个两个地走着，手里提着包裹。小广场鸦雀无声沉寂得像农村空地似的。透过大汽车的窗玻璃，可以看到那棕色的、带着被追捕的小动物神情的小脸。广场周围，人们一动不动地观看着。

妇女们穿过平台，走向空着的汽车。有一个妇女，用手拉着一个小女孩，孩子相当小，金色的发辫上打着红结子。一个警察走近她们，讲了几句海伦没有听清的话。

“不，”妇人说，“不。”

“快走，”警察说，“别罗嗦。以后再还给您。”他把孩子夺了过来。

“不，不，”妇人说，她两手扒着警察的胳膊。她大声地喊着，“给我孩子！吕特，我的小吕特！”

孩子开始嚎叫起来。海伦握紧拳头，热泪盈眶。难道我们就无可奈何？如果我们一起向警察扑过去呢？如果我们从他手中夺过孩子呢？但没有人动弹。警察把吕特放在右边的一辆汽车的平台上。她呼喊着，车里几个孩子和她一起叫喊起来。

那妇女在广场中央一动不动。汽车轰隆隆地开动了。

“吕特，吕特！”她向前伸出双手，在汽车后面跑着。她穿着旧薄底浅口高跟皮鞋，笨拙地向前一冲一冲地跑着。一个警察迈着男人的大步不紧不慢地跟着她。她还在喊：“吕特！”这是一声绝望的尖叫。而后，她停在街角上，双手捂着脸。小广场一片沉寂。她站在那儿，在蓝色星期天的光天化日之下，用手捂着脸，她的心碎了。警察伸手去抓她的肩膀。

“啊！为什么？为什么？”海伦绝望地想。她哭了，但她和别

人一样没有动，她看着。她在那儿，而她的存在和别人无所区别。她穿过广场。“仿佛我不存在，然而我存在着。我在关闭着的房间里存在着，我在虚无中存在着。我不算数，这是我的过错吗？”先贤祠前，德国兵从大客车上下来。他们显出疲惫的样子，不像是那些在大路上喊着“Heil”的步履矫健的战胜者。“我看着历史滚滚而去，这是我的历史，一切都发生在我的身上。”

她走进教堂，管风琴在石穹隆下回响着。大殿里挤满了人：他们在祈祷，孩子们在母亲的身旁，一家子一家子的，内心里充满着音乐、光明和神香的气味。小教堂里蜡烛的水气升腾着，水气后面，圣母冷漠地微笑着。海伦捅捅伊冯娜的肩膀。

“啊！你已经来了！怎么样？”

“我看到你母亲了。”海伦说，她跪在伊冯娜的旁边，“警察很有礼貌，他们知道她病了，没有找她的麻烦。她说你别为她担心。”

“她这样讲的？”伊冯娜惊讶地说。

“是的，她很好。”她打开挎包，“给，我把你的小熊带来了，它因为你不在而感到惆怅呢。”

“你真好。”伊冯娜说。

“现在要为你挂心了。我去见见让，好像他可以使你穿过封锁线。”

“你去看让？”

“德妮兹对我说，需要时可找他帮忙。”

“可是，那不麻烦你吗？”

“不，为什么呢？”海伦站起来，“待在这儿，我尽快赶回来。”

“给，”伊冯娜说，“拿着吧。”她把那束堇菜花放在海伦手里。“谢谢。”她压低声音说。

“你这个傻瓜。”海伦说。

她穿过教堂，管风琴停了，钟声响着，一声声打破沉寂，牧

师在他头上竖起金的圣体显供台。海伦走到苏福洛街，推出自行车，骑了上去。“我去见让。”没关系，这是很自然的。她不怕，她对他没有任何希求。“吕特，我的小吕特！”这难以磨灭的叫喊声，永远不断在她耳边回响。其他什么都无关重要：“吕特！吕特！”大街上，这是星期日的终了，上教堂的星期日，围着茶桌的星期日，心力交瘁的星期日。“我的历史：它处于没有我的状态。我睡觉，而有时，我注视着：没有我，一切都发生了。”

她登上楼梯，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一会儿。屋里传来一种啃啮东西的声音，他在那儿，她拉响门铃。

“你好。”她说，她的话到了喉咙口又止住了。她没有想到他用这样的眼神瞧她，他没有微笑。她鼓鼓勇气，首先微笑了：“我能和你谈五分钟吗？”

“当然，请进来。”

她坐下，很快地说：

“你还记得我的朋友伊冯娜吗？人家搜查她，要把她送到德国去。德妮兹对我说你可以把她转移到自由区去。”

“可以，”让说，“她有钱吗？”

“没有。”海伦说，她想着那鲜艳的大衣，吊在橱子里的漂亮西服，“她会有一点儿，但不是马上能拿到。”

“那没关系。告诉她，五小时之内请她去奥塞尔大街，12号，朗方先生家，他会等她。”

“朗方，奥塞尔大街，12号。”海伦重复着。

蓦地话语到了唇边，她不想讲出来，然而这些话已那样显然的表现出来，仿佛她是特意为讲它们才来这里的，“让，我想和你们一起干。”

“你？”

“你这里没有我能干的事吗？”

他凝视着她：“你知道我们干什么吗？”

“我知道你们帮助人，我知道你们在干一种事，也给我点事干吧？”

“等一等，”他说，“让我考虑考虑。”

“你信不过我？”

“我要慎重考虑！”让说。

“人家会对你说我曾想去柏林。”她微微一笑，“可我没有去。”

“你为什么想和我们一块干？”

“请放心，”她说，“不是因为你的缘故。”

“我没这样想。”

“你可以这样想。”她用眼睛环视了一下房间，一切都没有变，我的爱情也没有变……“不，不是为了重新同你的生命混在一起。”

“这是危险的工作。”让说。

“那没关系。”这句话她事先没有想过，然而它在那儿，时刻准备表现出来。“我不再活着了，我像一个死去的人。你还记得，有一次你曾对我说，为了使自己的生命有意义，甚至可以去冒死亡的危险。我想，你的话有道理。”

“是你在这样说？”

“你觉得我变了？”

“没有。你应该这样。”他沉思了一下，“你会开车吗？”

“我开得很好，反应迅速。”

“那么你就能帮大忙了。”沉默了一会，“你对自己很有把握吗？”让说，“如果你被捕，能不讲出去吗？要知道，万一人家发现了我们，会马上把我们枪毙的。”

“是的。”海伦说，她迟疑了一下，“你们帮助人……还有……就是这些。”

“不只这些。”

“啊！你也变了。”她说。

“变化倒不大，”他说。他怅怅地望着前面。“他在担心……他孤独一人……我不知道爱他。”海伦想。她想：“现在还不算晚，我将永远爱他。”她站起身来。

“用得着我的时候，你就向我打个招呼。”

“在三两天之后，”他望着她微笑了。“我又看到你，真高兴。”他说。

海伦用舌头舔舔嘴唇，她害怕自己哭起来。

“你知道，我明白过来了，”她说，“我不该那样做，我……我是令人讨厌的人。”

“噢！我也有责任。”让说。

他们默默地、情意缠绵地对视了一会儿。

“再见。”她说，“我希望你不再讨厌我。”没等他答话，她就打开门，走下楼梯去。

海伦推开窗子。沙砾在脚下吱嘎作响。夜里很热。一股绿色植物的芬芳升向黑暗的天空。她靠着墙坐在小木凳上。“总之，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她想。山谷里，响起一列火车的笛鸣。它在低沉、无形的夜幕中行驶。“不该这样想，每次都会出事的。”她摘下一片月桂的叶子，她把它在手指间搓揉着。“我不再害怕了。”她感到轻松和满足，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那些美妙的夜晚，她休憩在慈祥的上帝的怀抱之中。去死：人们从来没有死过。不再有人去死。我是一个活人，我要永远活下去。她感到她的生命在胸中跳动，此刻，是永恒的。

“海伦！”

香烟的红色亮光划破黑暗，她认出是让。

“海伦，我请求你，”他说，“今晚你别去了！”

“你说也没用，”她说，“我一定去。”

“干不成的话，千万别再干，人家会在半路上认出你们来的。等几天吧。”

“他们可不等，他们会把他带到另一个集中营去。机不可失。”

让坐在她身旁：

“如果不是保尔，你也这样干吗?”

“是保尔。”

“对德妮兹来说，保尔并不意味着什么。”

“她同意了，我们组成小队。”她沉思着，“可我要向你提建议：这次，我自己去。”

“不行，稍有差池，如果你一人去，就完了。”他把烟火在鞋底上捻死，“我同你一道去。”

“你？你不应参加任何外边的危险行动，这是一条绝对的纪律。”

“我知道。”让说，“我派别人去送命，而我却不能和他们共命运。”

“即使你和他们共命运，也丝毫改变不了什么。”她说。

一阵沉默。

“你有危险，而我不能在你身边，我受不了。”他说。

“你会在我身边的，”她说，“距离没有什么，你永远在我身边。”

他用一只胳膊搂住她的肩膀，她把脸贴着他的脸。

“你的话有道理，”他说，“现在什么也不能把我们分开来，永远分不开了。”

“你知道，”海伦说，“头几次，我害怕，然而现在我为我不再害怕而感到幸福。”

“我亲爱的心肝。”他说。

园子的另一端有人在叫：

“海伦!”

海伦站起来:

“明天见，给拉米打电话，他能给你们信号。一个钟头之后我们就在那里了。”

“当心点。”让说，“快回来。”他把她抱在怀里，“回到我身边来。”

他松开她，她向车棚冲过去。

“瞧，我准备好了。”她说。

德妮兹把小卡车的车篷放下，那里堆着包着脏衣服的包裹。她用一块头巾包着头发。

“一切准备就绪。”她说。

海伦在下巴下面系上一条头巾:

“你有化装用的衣服吗?证件呢?”

“我什么都齐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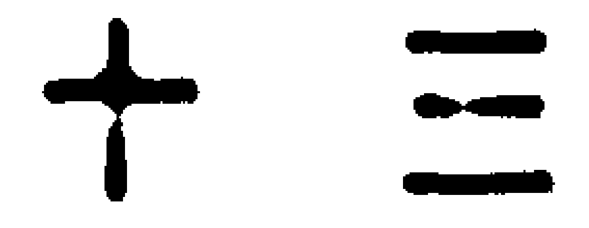
她们上了汽车，海伦抓住方向盘。

“让不愿让我们去。他说这样不谨慎。”

“他对我说过。可保尔的命全靠我们了。很快夜就不那么黑了。”

海伦踩下离合器。那边，保尔蜷缩在一座木板屋的后面，在寂静中倾听着。拉米骑上自行车，唱着歌从集中营前经过。让向车站走去。她没有离开他，现在，她永远不再是孤独的，永远不再是无用的，或在空阔的天空下走投无路了。她存在着，同他在一起，同马塞尔，同马德莱娜，同洛朗，同伊冯娜在一起，同所有那些睡在木板房里的陌生人在一起，同那些从来没有听到过她的名字的人们，同一切希冀着明天的人们在一起，甚至同那些不知希冀些什么的人们一起存在着。外壳被打碎了，她为某些事而存在着，为某个人而存在着。整个大地亲切地存在着。

“多美的夜啊!”她说。



一道曙光透过百叶窗。正是五点钟。早起的人们打开了自己的房门。医生、助产士跑到病人和产妇的床前。冷落的街道上的秘密跳舞厅空荡荡的。车站附近的几家咖啡馆还亮着灯。人们使他们靠在墙上。他把手插进兜里。严峻而寒冷的时刻。一个玩具。“人们不会相信那会杀死人的。”这能杀人。他走到床前，她过不了今夜了。而夜几乎已过去了。难道我还在那儿说：“我杀死了她吗?”在说：“还要杀人吗?”这个声音……是为了我它才讲话，为了我它必须保持缄默。我保持沉默就是一种声音，这对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什么能拯救我。然而我可以入睡，把自己淹没在祸水之中。忧虑使我撕心裂肺，它占据了我的全部身

心。让这种占据结束吧……

“让。”

他转过身来。她睁开了眼睛。她望着他。

“保尔回来了吗?”

“是的，他在这里。一切都顺利。”

“啊！我很高兴。”她说。她的声音微弱，但很清晰。他坐在床沿上。

“你感觉怎样?”

“我很好，”她双手握住他的手，“你知道，别难过。我不怕死。”

“你不会死。”

“你这样认为?”

她望着他，用和从前一样的目光，疑惑，苛刻。

“医生说什么了?”

这次，他不能犹豫了，他不怀疑，尽管他太阳穴上沁出汗珠，他的声音断断续续，那不是一个可怜的肉体；一道目光，是一种自由；她这最后的时刻只属于她自己。

“他没有留下多少希望。”

“啊!”她说，“我似乎很好。”她沉默了一会儿，“那并不使我感到厌烦。”她重复着。

他俯下身子，用唇轻轻吻她那淡紫色的脸颊。

“海伦，你知道我爱你。”

“是的，现在，你爱我了。”她说，她紧握住他的手，“你在这儿我感到幸福，你会想我的。”

“我唯一的爱人，”他说，“你在这儿，是由于我的错误所致。”

“那有什么错误?”她说，“是我自己愿去。”

“可我本来可以禁止你去。”

她微笑了："你没有权利决定我的事。"

同样的话。他望着她，这正是她。她说："由我作决定。"她那暗淡的头发闪闪发光，她那塌陷的面颊闪烁着生命之光，这是她。同样的自由。我没有背叛任何人吧？我是跟你讲过的吧？在你生命的唯一真理中，我只对你讲过。在这喘息中，在这蓝色的眼皮里，你还能认出你的意志吗？

"这是过去你说的，我让你选择，但你知道你选择的是什么吗？"

"我选择的是你，假如再让我选择，还是选择你。"她摇着头，"我不想有另一种生活。"

他简直不敢相信他所听到的话，但他紧缩的心放松了，希望之光在夜里升起来。

"你遇到我，并不是事先出于你的选择，"他说，"你碰上了我，就像碰在一块石头上。而现在……"

"现在，"她说，"又有什么可懊悔的呢？难道我非要活到老不可吗？"

她的话艰难地从口中吐出，但她的目光活生生地存在着，搜寻着。时间对她来说变得无关紧要了，这些她不复存在的时间，好像突然对她变得无关紧要了，因为此刻她存在着，自由而无限地存在着。

"你真的没有什么懊悔吗？"

"没有。你为什么这么说？"

"为什么？"他重复着。

"你尤其不要感到负疚。"她说。

"我试试。"

"不要感到内疚。"她衰弱地微笑着，"我做了我想做的。你过去真像一块石头。石头也很有用处，它们可以铺成道路，否则，人们怎么选择一条路呢？"

“可能有道理。”他说。

“是这样的，我确信。如果我不出事，又会怎样呢?”

“啊！我愿意相信你。”他说。

“你还相信谁?”

“我看到你时，我就相信你了。”他说。

“看着我。”她闭上眼睛。“我还要睡一会儿，我很疲劳。”

他望着她。“好吧!”保尔讲“好吧”大概是有道理的。她恬静地呼吸着。他望着她，仿佛他不知道她面临着另一个死亡，另一个生命。我信任你，我应该信任你。我对你没有半点恶意。在你的脚下，我只是一块无知的石头。像石头那样无知，像撕裂你的肺的弹片那样无知。它没有杀你，不是我杀害了你，我亲爱的心肝。

“海伦!”

他压抑着自己的呼喊。血管膨胀着，微张着嘴。她睡着了，她忘记了她正走向死亡。刚才她还知道，现在她正走向死亡，但她已不知道了。别睡了，醒醒吧。他俯下身子，真想抓住她肩膀，摇晃着她，请求她，像用尽平生的力气去吹动阑珊的火焰，使她重新燃烧起来。但从我的嘴到她的生命，已经不能相通了，只有她自己才能够重新放射出光华。海伦！她还有一个名字：人们再不能呼唤她的名字了吗?肺部困难地呼吸着，气流从肺部来到唇边又从唇边回到肺部，发出微弱的声音，已经奄奄一息了。然而她还是完好的，她完好地直到最后一刻。难道你就不想把精力用在其他事情上而不是用在死亡上吗?她的心脏的每一次跳动都使她向死亡逼近一步。停下来吧。她的心脏继续无情地跳动着；等它不跳的时候，她已经死去了，那就太晚了。马上停下来，你停止死亡。

她睁开眼睛，他把她抱在怀里。她睁得大大的眼睛却什么也瞧不见了。海伦！她已经听不见了。某件事物延续着，对它本身

来说还没有不存在，但对大地、对我来说已经不在了。她的眼睛里，还有一丝光，但那是凝滞的目光，她什么也看不见了。她的气息中断了。她说过："你在这里我感到幸福。"但我不在这里了。我知道某件事发生了，但我不能参加，无论这里，还是其他地方这事都不会发生：而在一切存在之外。她又呼吸了一次；眼睛暗淡了下来，世界离开了她。他瘫倒在床上，然而没有离开世界。在人世间，她变成了我怀抱中的死者。她的嘴角上留下一丝微笑，她的眼神没有了。他把凝滞的眼睛上的眼皮放下来。亲爱的面容，亲爱的身体。这是你的额头，这是你的嘴唇。你离开了我。然而，你不存在了而我还在爱着。这种不存在仍保留着你那永不消失的面容，它在这儿，出现在这一动不动的形象中。你永存着，永远和我在一起……

他抬起头来，他该是待了很长时间，把额头放在这颗止息了的心上。这肉体它曾经是你的。他焦虑地望着那凝滞的面颊。它依然是它那样子，然而，这已不再是她了，而是一具遗体，一幅肖像。不再是人了。她不在了，失去了音容笑貌，结束了在人间的挣扎。但世间还像昨天一样地充实，什么也没有缺少，没有一点缺陷，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仿佛在这人世间她是一个无。

仿佛我也是一个无。是无，又是一切存在。通过这整个人间，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又和他们永远地分别了。负罪，无辜，就如同路上的石子，是那样沉重，又没有任何分量。

他打个寒战。有人敲门。他向门口走去。

"什么事？"

"你必须回答我。"洛朗说。他向前迈进一步，望着床。

"是的，"布劳马说，"完了。"

"她没有痛苦吗？"

"没有。"

他望望窗子。天已经亮了。时光如奔腾的波涛，互相追逐

着，连绵不尽。前进。决定。丧钟重新敲响了，一直敲到我的死亡。

“机器放在这里约有一小时了，”洛朗说，“你同意不同意？”

他望着床上。对你，不过是块无知的石头：你选择了。那些明天被枪毙的人们没有选择；我是压碎他们的石头，我逃不过诅咒，对他们来说，我永远是一个他人。对于他们，我永远是命运中盲目的力量，和他们永远是分开的。然而我只是全力捍卫着这使所有石头成为无辜而枉然的最高财产，捍卫这把每个人从他人和自我之中拯救出来的财产——自由，那么，我的激情将不会是没有用处的。你既然不给我和平，我为什么要和平呢？你给了我永远冒险和焦虑的勇气，给了我承受我的罪过和使我感到无限痛心的内疚的勇气，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

“你不同意吧？”洛朗说。

“不，”他说，“我同意。”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他人的血
作者＝西蒙娜·德·波伏娃
页数＝２５７
ＳＳ号＝１０５２８９７５
出版日期＝１９９９年０８月第１版